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学点经济学

2022年12月

目 录

第一单元 经济学理论	1
第一期 啥是GDP?	2
第二期 支出法GDP.....	5
第三期 收入法GDP.....	10
第四期 生产法GDP.....	15
第五期 名义GDP与实际GDP.....	21
第六期 就业与失业.....	24
第七期 市场经济中的消费.....	31
第八期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	35
第九期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收入和支出.....	40
第十期 短期宏观经济模型.....	44
第十一期 价格水平.....	52
第十二期 阶级斗争和工资.....	57
第十三期 市场经济中的货币.....	65
第十四期 银行和借贷资本.....	71
第十五期 市场经济中的利率.....	76
第十六期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84
第十七期 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	91
第十八期 国际收支与汇率.....	97
第十九期 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	104
第二单元 经济演变与阶级斗争	111
第二十期 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的美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112
第二十一期 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中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123
第二十二期 新自由主义全面发展时期的美国经济和阶级斗争.....	135
第二十三期 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期的中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142
第二十四期 新自由主义从繁荣走向危机.....	148
第二十五期 中国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第一个十年.....	154
第二十六期 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第一阶段.....	158
第二十七期 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162

第三单元 中国经济问题	169
第二十八期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170
第二十九期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阶级斗争，1980-2020年.....	177
第三十期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2000-2021年.....	189
第三十一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一）——从“房地产经济”说起.....	196
第三十二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二）——房价与工资.....	199
第三十三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三）——投资房地产赚钱吗？.....	205
第三十四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四）——房地产与财政.....	209
第三十五期 “碳中和”与中国经济.....	218
第三十六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一）——从“新时代社会契约”说起.....	223
第三十七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二）——经济增长的隐患.....	227
第三十八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三）——高投资陷阱.....	232
第三十九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四）——低投资陷阱.....	236
第四十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五）——再分配陷阱.....	239
第四十一期 中国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2000-2020年.....	243
第四十二期 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000-2020年.....	252
第四十三期 中国和不平等交换，2000-2020年.....	258
第四十四期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2000-2021-2050年.....	271
第四十五期 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财政危机.....	280
第四十六期 中国经济形势与马列毛主义者.....	287

第一单元 经济学理论

第一期 啥是GDP?

作者：草庐棋士

啥是GDP? 鸡的屁、狗的屁，百无一用、臭不可闻，还是个骗人的玩意。

经过十几年的拉锯战，群众的认知水平已经领先了公知整整一代，我们逐渐走出了对他们的崇拜和恐惧，开始嘲讽他们卖弄的字眼，这是好事。不过兵法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彻底识破公知的小九九，我们就既要在“红”的方面强过他们，还要在“专”的方面压倒他们。要比公知还要“专”，那就必须去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尤其是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经济学。我们既要揭穿其“社会科学”的“社会”部分，明确这些理论概念为谁服务；也要探索其“科学”的部分，观察和思索对手如何试图正确认识世界，为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提供依据。为了揭穿“社会”，探索“科学”，本棋士准备于精深研究棋术之余，陪大家聊一聊于人们的收入、就业、购物、健康息息相关，又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兴亡的“经济学”。

作为“学点经济学”的开篇，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聊一聊GDP。

GDP的学名叫“国内生产总值”，它是衡量一国生产产品和服务能力的指标，即所谓“综合国力”的经济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从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经历大大小小的危机，到了1929-1933年大萧条时，经济危机有着演化为政治危机乃至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趋势。然而，当时的各国统治阶级却没有一个现成的反映经济整体运行趋势的指标，有的只是一些具体部门的零散数据，结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大大干扰了他们的决策过程。要知道，搞经济的不知道国家生产了多少东西，就等于打仗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催生了反映一国整体生产力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简称国民账户）。而GDP就是国民账户的核心概念。

GDP来自于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的缩写。GDP的完整定义是：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总和。首先，GDP是个“流量”单位，反映的是一国在一个时期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反映累积起来总财富的“存量”指标。其次，GDP反映的是某一个时期内“新”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市场上交易的旧车旧房旧书报都不算做GDP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不是“新”生产出来的产品。第三，包括在GDP中的产品和服务必须是“生产”出来的，所以不是被“生产”出来的金融资产的交易（比如股票交易、债券交易）都不是GDP的一部分。不过，在资产阶级统计中，金融业的资

本家和工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被认为是提供了“服务”，由此形成的收入被认为是GDP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本棋士在讲到国民经济的产业划分时还会进一步介绍）。

第四，GDP指的是最终产品，或者说，GDP不包括所谓“中间投入”。什么是“中间投入”呢？这里指的是一个企业为了生产一定的“最终产品”而向其他企业购买的原材料等产品。比如，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为了生产汽车，需要先购买钢材、橡胶等原材料，在生产中还要消耗电、煤气、水等辅助材料。这里，汽车就是用于“最终消费”的产品，而汽车企业使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都属于“中间投入”。在计算GDP时，只计算像汽车这样的最终产品的产值，但是不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中间投入”的产值。

不过，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各个企业都是相互联系的，往往相互交叉购买各种各样的“中间投入”。有的产品，在一种情况下是“中间投入”，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最终产品”。比如，煤气公司生产的煤气，如果直接供应给居民，那就是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而如果供应给工厂、商店、办公楼，就成了企业使用的“中间投入”。所以，计算GDP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把所有企业在生产中形成的“增加值”都加起来。以上面的汽车企业为例，这个企业在一个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汽车按照市场价格加总起来，就是这个企业的总产值；这些汽车如果销售出去，所形成的受益就是“销售收入”。这个企业为了生产这些汽车而在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中间投入”上花费的成本，就是中间成本。如果用总产值减去中间成本，其差额就是这个企业的“增加值”。

在理论上，如果将一个国民经济中所有企业所生产的“增加值”都加起来，应该正好等于这个国民经济在一个时期中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之和。但是在实际上，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统计误差”。

所以，GDP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或者说“加总”。首先，GDP要被生产出来，它是一个国家各个不同产业增加值的总和。由此计算出来的GDP叫做“生产法”GDP。不同的国家的有着不同的产业结构，以“生产法”计算的GDP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这些国家不同的产业结构，比较哪些国家的产业结构更加高端，从而揭示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

第二，GDP是一个时期内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有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这些“最终”产品和服务都必须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才能被“实现”，即转化为人们的收入。因此，GDP也可以用一个时期内人们在“最终”产品和服务上所花费的总支出来计算。由此计算出来的GDP叫做“支出法”GDP。“支出法”GDP又可以分为为居民消费、投资（又叫“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和净出口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划分告诉我们一国

生产出来的东西都用来干了啥。

第三，GDP代表一个国家的总的国民收入，由此形成的国民收入又分配给不同的社会阶级。由此计算出来的GDP叫做“收入法”GDP。“收入法”GDP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揭示劳资双方的阶级力量对比，为研究和指导阶级斗争提供分析材料。

砖家们谈GDP，我们也谈GDP。但是和夸夸其谈卖弄字眼的砖家不一样，我们研究GDP乃至研究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对手的情报、思路和策略，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服务。美式装备扔给蒋匪帮就是根烧火棍，拿在人民军队手里就能帮助我们如虎添翼。GDP在砖家手里就只是忽悠人的玩意儿，在我们手里，会成为洞悉中国和世界发展方向的利器。在接下来的“学点经济学”中，本棋士将从“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三个角度带大家认识和操作GDP这个美式装备。

第二期 支出法GDP

作者：草庐棋士

上回咱们谈到了三种加总GDP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讲讲“支出法”GDP的含义和如何利用支出法GDP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和趋势。

“支出法”GDP可以分为为居民消费、总投资（又叫“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和净出口四个部分。一国在特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总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支出法”的含义就是将用于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总支出分解为上述四个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需求”就是去市场花钱买东西，支出法GDP的四个部分同时也是人们常说的“总需求”的四个部分。

居民消费支出包括购买消费品的支出和服务消费支出。购买消费品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支出，它不仅包括我们购买食品、衣物、新书和化妆品等非耐用日常消费品，也包括私家小轿车、电脑、冰箱等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支出指的是我们购买餐饮、交通、娱乐、医疗、教育、住房等服务的支出。服务消费支出是GDP中争议较大的部分。一部分在现实中没有发生交易的支出，比如自有住房提供的“服务”，需要假设房主“租”了自己的房子，并把这笔估算出的“房租”算进消费。而家庭主妇（或主男）的家务劳动尽管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且对劳动力再生产有着重大影响，但却不算在GDP之内。居民消费支出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一国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由居民消费支出直接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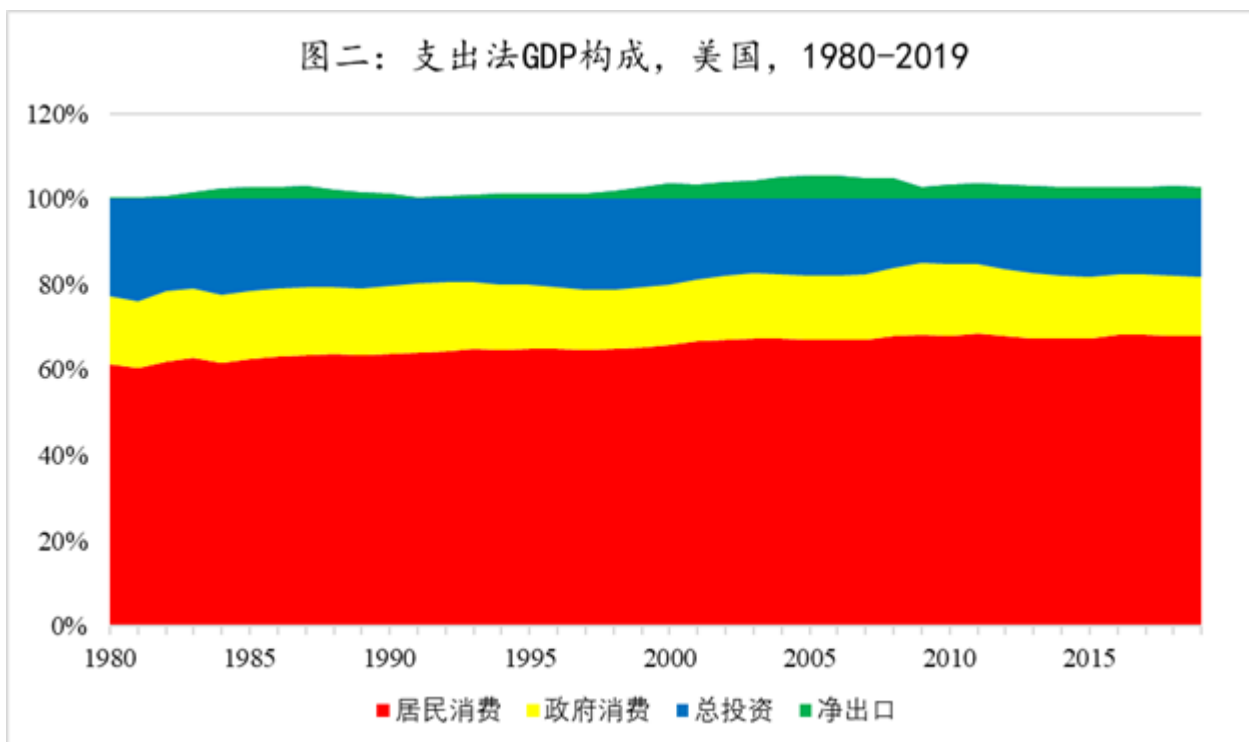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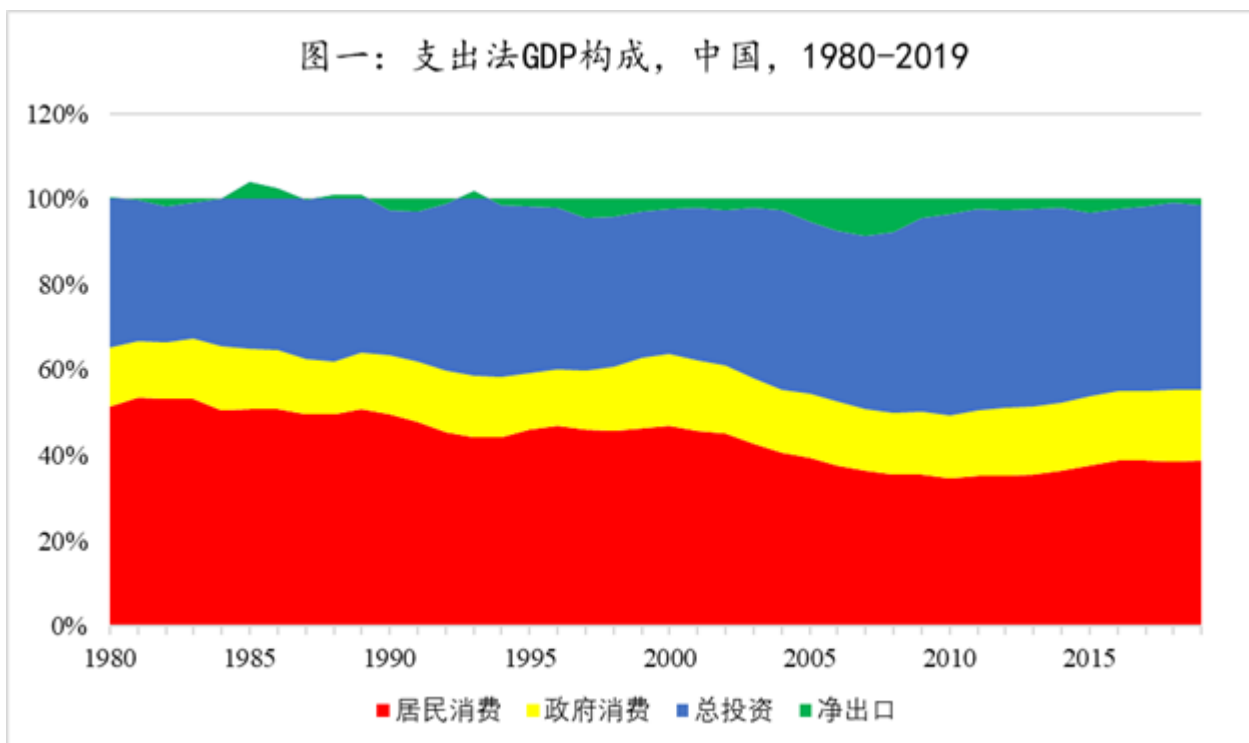
总投资，又叫“资本形成”，指的是购买当期生产的资本品和存货的支出。总投资是四项支出中波动最剧烈，对一国总需求的短期变化影响最大的部分。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变动。固定资产投资既包括企业部门购买新建厂房设备的支出，也包括住户部门购买新建住房的开支，还包括政府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大致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和。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部分用于补偿本期的企业固定资本折旧，维持现有固定资本存量的简单再生产，另一部分用于额外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进行扩大再生产。政府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政府建设的办公楼、购置的办公设备以及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各项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等）。此外，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定义，政府购买的各种军事装备和设施也是政府“投资”的一部分。存货指的是还没有卖出去的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包括成品和半成品）以及已经购买但尚未消耗掉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存货变动指的

是存货的增加或减少。如果存货增加，增加的部分假设为是一种企业投资；如果存货减少，减少的部分可以理解为负投资，从总投资中扣除。有必要说明的是，经济学中的投资指的是对实实在在的资本品（厂房、办公楼、其他建筑物、机器设备）和存货的购买。金融场所交易的各种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不属于国民经济生产出来的商品，不算在经济学所说的投资之内。

政府消费指的是政府部门所购买的服务以及为了日常办公所购买的各种商品。所谓政府购买的“服务”，在主流经济学中指的是政府购买的由政府自身所提供的“服务”。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以及由政府承办的各种事业单位（如公立教育、公立医疗）向全社会提供了“服务”，因而创造了“增加值”。所谓政府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包括政府部门（含事业单位）雇员的报酬以及政府部门固定资本的虚拟折旧。需要说明的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养老保险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失业保险支出等属于转移支付，即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其他人支付的行为，而不是政府部门直接购买商品或服务，因而不算作政府消费，也不算作GDP的一部分。

净出口指的是一国在一个时期内出口的货物和服务的总价格减去进口的货物和服务的总价格，是外国对本国产品和服务的净需求。当出口大于进口时，净出口为正值，这种情况被称为贸易盈余（出超、顺差）；当出口小于进口时，净出口为负值，这种情况被称为贸易赤字（入超、逆差）。

以上就是支出法GDP各部分的含义及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从1980年到2019年的支出法GDP的结构。



在上面两个图中，横轴是年份，纵轴是支出法GDP四个部分占全部GDP的百分比。

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图中红色区域）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51%下降到2010年的35%，直到近几年才有了缓慢回升，但是远没有回

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水平。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61%稳步上升到了2019年的68%。中国消费比例的下降主要是由投资比例（图中蓝色区域）上升引起的，中国的总投资率从1980年的35%一路上升到了2010年的47%，近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总体仍然维持在43%以上；而美国的总投资率却常年维持在21%左右。中国GDP中用于投资的比例通常是美国的两倍还多。

中美投资比例差异是两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体现。中国是个向全世界输出廉价劳动产品的半外围国家，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来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生产足够多的产品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了全球资本积累的中心。同时，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要保持廉价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压低劳动力成本，而低工资也直接反映在消费占GDP的低份额上。**中国劳动人民只有勒紧裤腰带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才不会给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添麻烦。**美国是已经完成资本积累历史任务的核心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企业广泛地通过外包等方式把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向中国、印度、东南亚这样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外围半外围国家，这一方面直接降低了美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利润，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美国借债消费的增长。近二十年来中美两国之间最主要的经济联系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中国压低工资以生产廉价消费品，美国进口廉价消费品供工人借贷消费以压低工资。**与作为积累中心的中国不同，传统制造业的衰落让美国不再依赖国内投资需求，投资份额维持在较低水平，资本积累速度也较为缓慢。

在图一和图二中，绿色区域代表净出口。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总投资加起来不到GDP的100%，从而这个国家的净出口为正，在图中就表现为绿色区域出现在100%的横线之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总投资加起来超过GDP的100%，从而这个国家的净出口为负，在图中就表现为绿色区域出现在了100%的横线以上。

中国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处在贸易顺差状态，中国的净出口在2007年一度占到了GDP的将近9%。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净出口占比有所减小，但是中国出口和进口的总量是不低的。以2018年为例，中国全部的货物和服务出口约占GDP的18.3%，进口约占GDP的17.6%。如果从结构上看，中国在货物贸易（即商品贸易）上常年维持顺差；在服务贸易上，中国在2008年之前大体保持均衡。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服务贸易自2008年以后就进入了逆差状态。到了2018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达到了1870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将近2%，几乎抹平了货物贸易的顺差，其原因主要是迅速增长的出国留学（算作教育和旅行服务进口）、国际旅游（算作运输和旅行服务进口）以及向外国高科技公司支付的专利费（属于知识产权使用权进口）。中国的进出口结构是整个中国经济

在世界中地位的缩影。中国是一个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出口货物的国家，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向发达国家缴纳大量“学费”和知识产权费用的国家。中国人民挤出去的是奶，吃进来的是什，大家心里都有杆秤。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处在贸易逆差状态，正如我们上面所讲，这是由美国传统制造业向外围半外围国家转移所决定的。在美国工人工资增长停滞的四十年间，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廉价消费品构成了维持美国劳资妥协的物质基础。至于这个物质基础可以维持到何时，我们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

最后看一下政府消费，中国和美国的政府消费（图中黄色区域）常年都维持在GDP的13%到15%的水平，两者不相上下。过去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有个大政府，政府雇员队伍庞大臃肿，美国有个小政府，每年能为纳税人省下不少钱。但是两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然让这种虚假宣传不攻自破。

以上就是支出法GDP的四个部分以及中美两国支出法GDP的比较分析。总的来讲，支出法讲的是GDP被“怎么用”的问题。在下一篇收入法GDP中，我们就来探讨GDP“怎么分”、“分给谁”的问题。

第三期 收入法GDP

作者：草庐棋士

上次咱们讲了支出法GDP。主流经济学用支出法划分GDP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居民消费、总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的比例以及变化趋势，从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政策挽救资本主义。我们比主流学者强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利用支出法GDP去分析一国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历史演化，形成对不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正确认识，揭穿有些半吊子学者关于中国将要甚至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帝国”、“剥削全世界”的胡话。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收入法GDP。无论一国一年有多少总需求或总支出，这些决策都是形形色色的人做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在宏观经济上，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表现为收入分配的高低起伏。收入法GDP讲的就是分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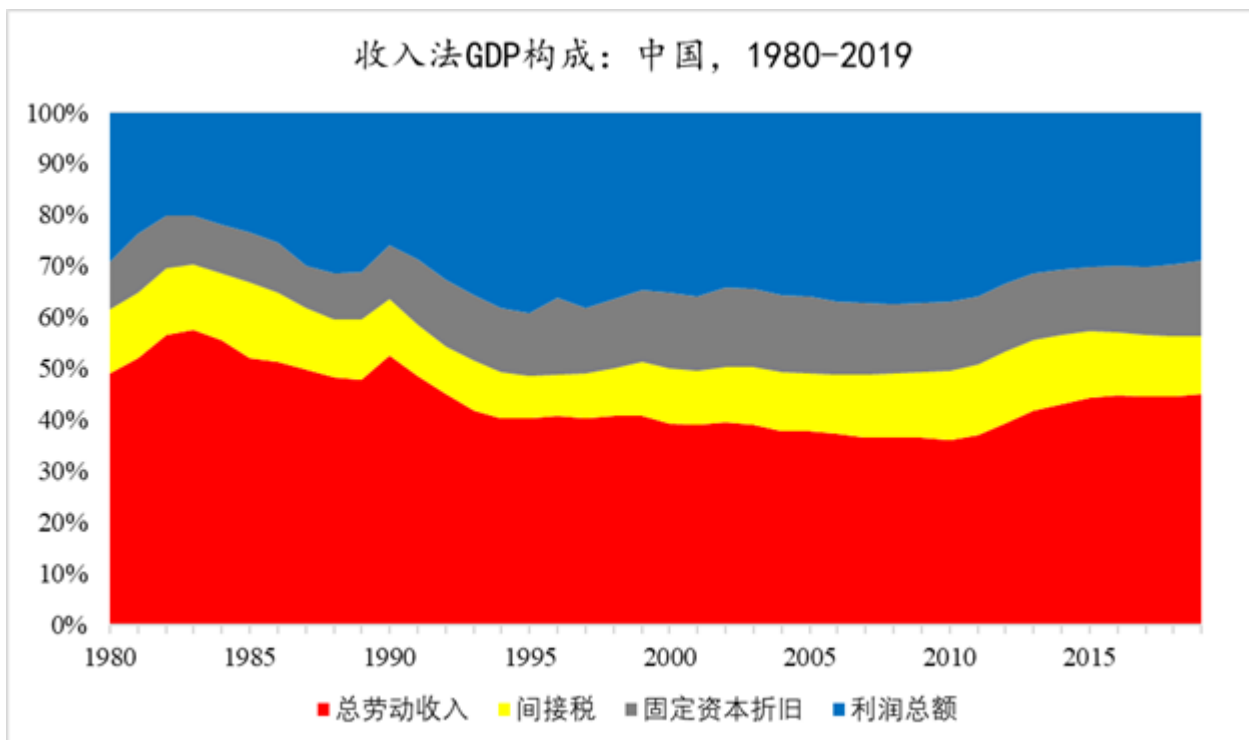
在讲收入法GDP的具体项目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对待官方统计资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砖家”曾经最飞扬跋扈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使用官方统计资料并对其进行解释，而多数进步人士尽管有着先进的理论，但是对统计资料尤其是宏观经济数据并不熟悉。在涉及全局性的分配问题的时候，更是一头雾水。一些愿意下苦功夫的人针对某些具体企业，用马克思时代的方法，结合一些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做过初步的剩余价值率分析。这些人的努力无疑值得赞赏，但是在面对未来的考验时，我们不仅需要这样以小见大的本事，更需要直接把握全局的能力。既然要把握全局，唯一现实的数据来源就是官方的宏观统计资料。我们知道，官方统计经济数据的目的与我们使用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一样的，统计方法和理论依据也有差异，但是据此就认为官方的数据完全是造假且毫无意义，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事实上，无论是官方还是其他什么机构，想要做出符合其客观利益的决策，其基本前提都是对现实情况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当年毛主席能从缴获的报纸中发现有用信息，作出进军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的决策。我们今天也能从官方的收入法GDP数据中提取出有意义的信息，分析收入分配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全局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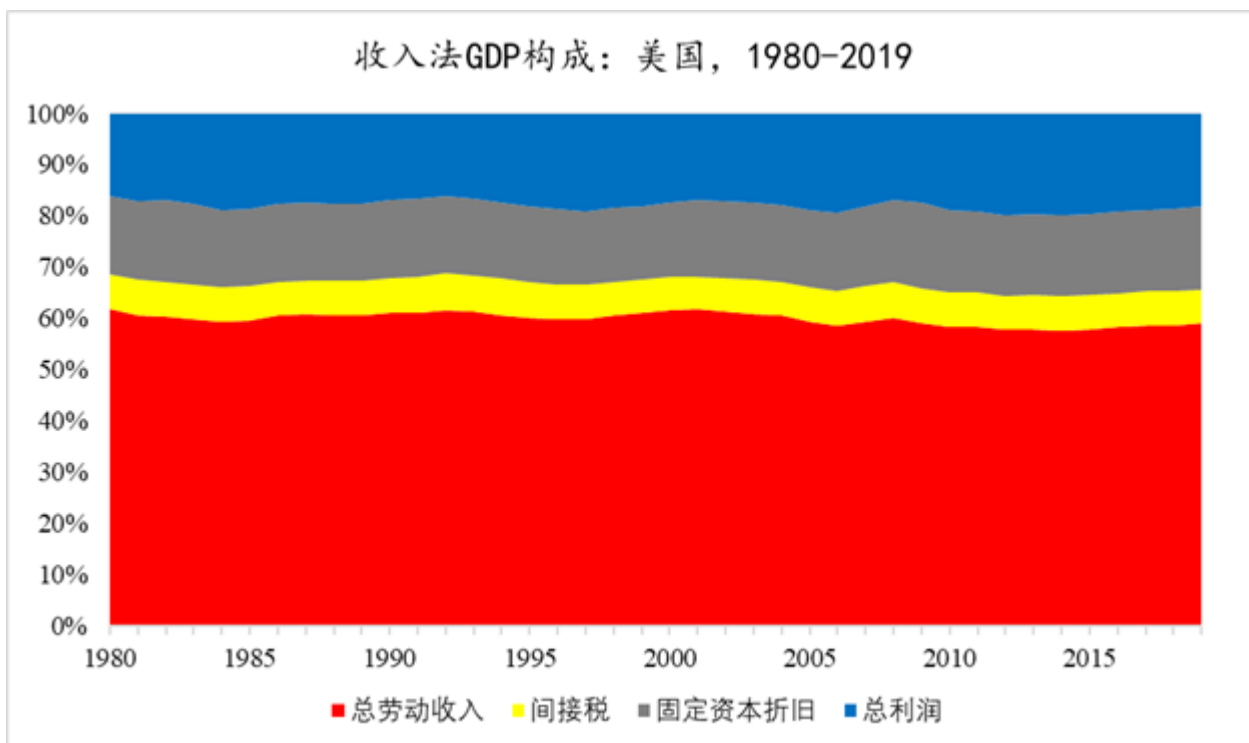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社会总产品中每年新生产的价值分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后者又被分为利润、利息、租金等部分。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就是剩余价值率，其高低直接反映着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官方宏观经济统计依据的是主流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GDP被理解为包括劳动和资本等各个“生产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各个生产要素

都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做出了贡献，因而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就是为这些生产要素分配报酬。

尽管官方收入法GDP中关于谁创造价值的理论出发点是错误的，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却是一致的。马克思讲的社会产品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就是GDP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

下面两张图展示的是中国和美国从1980年到2019年的收入法GDP构成。





尽管各国官方数据具体统计细则不同，GDP仍然能够按照收入法划分为四个部分。

在不考虑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划分的前提下，总劳动收入（图中红色部分）大体相当于我们所熟悉的劳动力价值。美国的总劳动收入是雇员报酬和小业主劳动收入之和，其在2004年前略高于60%，在其后略低于60%。在上一篇中，我们介绍了美国居民消费占GDP份额存在上升趋势。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份额却能“逆势上扬”的主要原因，是在消费主义和“金融创新”环境下催生的借贷消费。

中国的总劳动收入是乡村劳动者总劳动收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工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工资、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总劳动收入、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和其他福利五项加总之和。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期支出法GDP中消费比例的演变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中国自1980年至2019年总劳动收入的比例大体服从同一个趋势。从八十年代后半期直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是下降的（从1983年的58%下降到了2010年的36%）。下降最快的90年代也是国企私有化引发数千万国企工人大下岗的时期。同时，乡镇企业的衰落也让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给城镇工人的工资谈判力带来不小的压力。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失败让那个时候的中国劳动者经历了最黑暗的二十年。有意思的是，从2010年起，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有所回升，到了2019年的时候，已经基本抹平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下降。就是在同一时期，各地关于“用工荒”之类的报道也多了起来。从主流经济学的话讲，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已经基本耗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理论来说，就是中国的产业后备军已经开始见底，工人的谈判力量和意志都明显增强。尽管从2016到2018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其上涨势头在2019年又重新恢复。2019年，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5%。

未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具体的、细节的变化可能有很多，但是几个主要因素全都指向继续上涨的趋势。首先，中国六十年代灾后婴儿潮时期诞生的劳动者将要退休，他们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诞生的子女已经超过或接近三十岁，而95后00后的人口数量明显少于他们。半外围国家高强度长时间重复性劳动（996）所依赖的年轻“新鲜”劳动力供给已经捉襟见肘。第二，新一代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和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祖辈那么任劳任怨、好蒙好骗，势必会提出更高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要求。第三，新冠疫情结束后美国新政府可能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缓解国内矛盾，势必会加剧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所以，对于中国的雇主来讲，未来的劳动力少了、老了、“懒”了、“不好管”了，还不得不依赖他们。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趋势很可能会延续下去。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劳动收入份额上涨，我们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剩余价值的份额要下跌。这个直觉是正确的。图中的利润总额（蓝色部分）是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财产收入的总和，在概念上类似于私人资本家拿到手的各类剩余价值之和。中国的利润份额在2008年达到高峰37%后就开始下降，到了2019年只有29%，比高峰水平下降了8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还要持续下去。利润份额的下降最终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利润挤压”危机。我们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仔细探讨经济危机问题。2019年，美国的资本家总利润占GDP的比例为18%，比中国的利润份额低11个百分点。

间接税（图中黄色部分）指的国家是针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款，常见的有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与直接税直接对课税对象征收不同（如所得税、遗产税等），间接税是对“物”征税从而间接让人承受税负。征收直接税的难度要远大于征收间接税，税务机关不仅需要关于纳税人财产和收入的准确信息，同时也需要有强力和有效的执行机构惩治偷税漏税。在历史上，间接税在民族国家建立初期有了简单的行政机构和海关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普遍，而直接税的广泛出现是二十世现代官僚体系建立之后的事情。一般来讲，一国的行政机构越是强有力，其直接税比例就越高，这通常是美国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资源支撑有效行政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就只能因陋就简地依赖间接税。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间接税份额

常常是美国的将近两倍，这无疑反映了税务机关无意掌握高收入群体财产和收入状况，且无力追查偷税漏税行为的现状。这不仅是关乎国家能力的行政问题，同时也是关乎高收入人群财富来源合法性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政府近年来推行减税降费，将间接税的份额从2012年的14%降低到了2019年的11%，但是这并没能挽救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美国近年的间接税占GDP的比例不到7%。

固定资本折旧是每年为了补偿每年报废的建筑、机器、运输车辆和军事装备等固定资本的价值。用于固定资本折旧的那一部分GDP是一国经济为了补偿固定资本消耗、维持现有固定资本存量和现有生产能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上一期我们讲的总投资减去本期讲的固定资本折旧就是净投资，即资本积累。固定资本折旧比例的上升不仅会直接“吞噬”掉利润份额，同时也反映着固定资本与GDP之比的上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讲，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2019年，固定资本折旧约占中国GDP的15%；约占美国GDP的16%。

总的来讲，收入法GDP反映着一国全局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为我们探寻中国市场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有着重大指导意义。不过，GDP总要被生产出来。从生产法来说，GDP是各产业增加值之和。下一期我们就介绍各个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

第四期 生产法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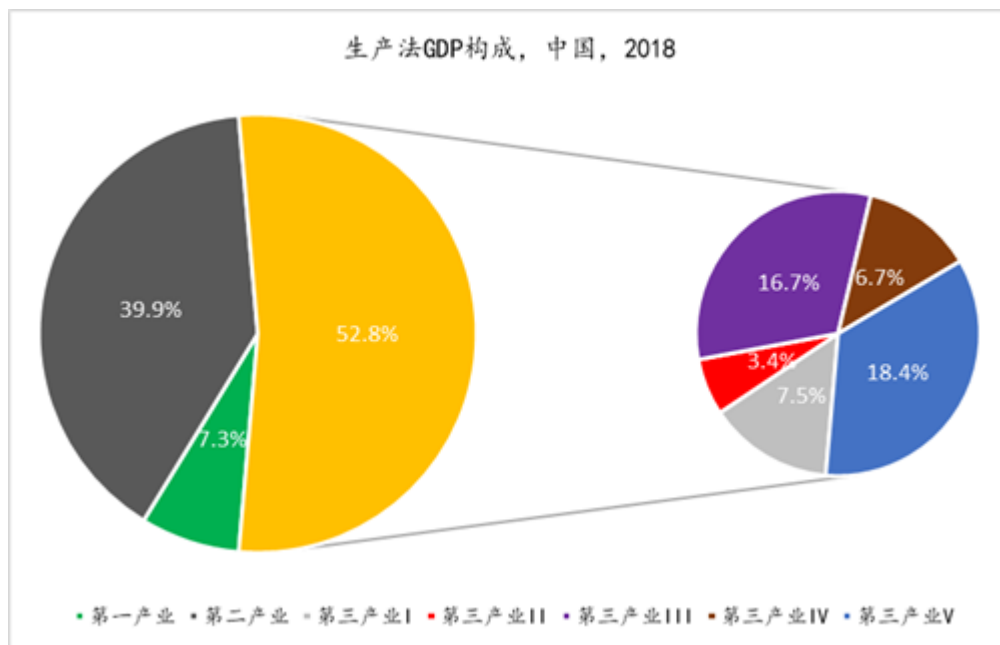
作者：草庐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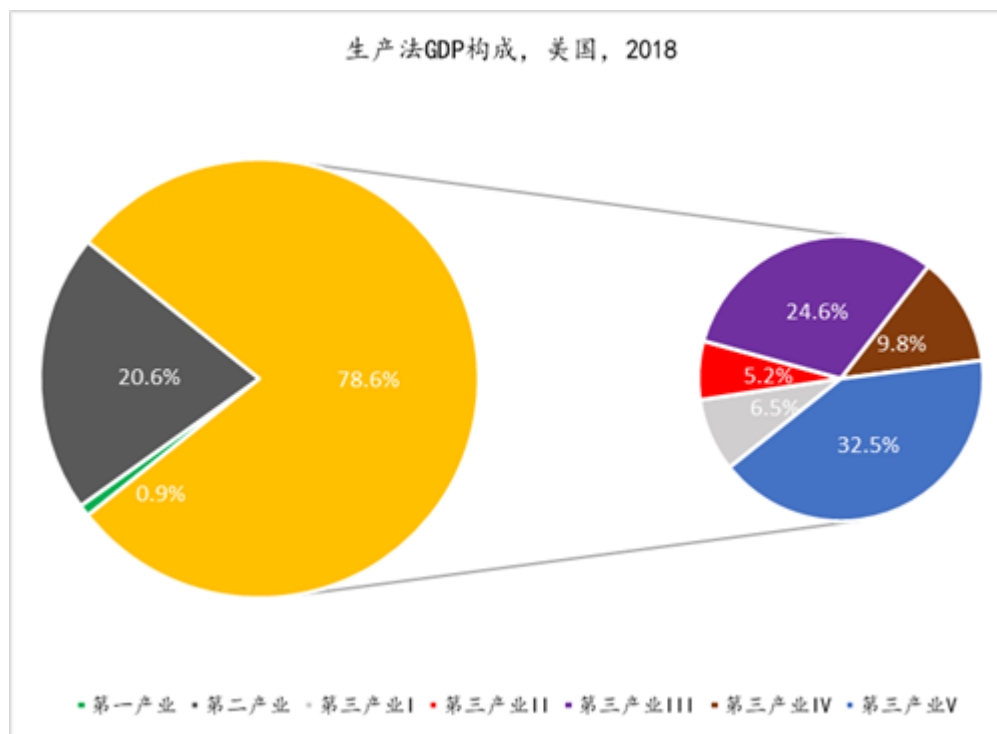
上一期收入法GDP讲的是GDP怎么分、分给谁的问题。其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和利润份额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劳资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对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总体趋势以及分析下一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都有帮助。

这一期我们来讲生产法GDP。无论GDP分给谁、用来干什么，它归根结底是一国各部门增加值的总和（相当于各部门产品的总产值减去原材料、水电气等“中间投入”后的差额）。从生产法GDP出发，可以了解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

我们常常在各种新闻中听到有关“三次产业”的报道，所谓“三次产业”，就是把GDP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指的是直接从自然中获取收成的经济活动，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的是对从自然中获取的原料进行加工的行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其中工业又包含采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第三产业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服务业。

下面两张饼状图反映的是中美两国2018年生产法GDP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





两张图的左半部反映的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即所谓三次产业结构。它们分别由绿色、深灰色和橙色表示。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在一国开始资本积累（工业化）之前，通常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有效的生产、获取、运输、存储和使用余粮是任何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也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中国历史上王朝衰亡，通常都和水灾、旱灾、病虫害造成的农业减产有直接联系。这些灾祸与本来就存在的土地兼并等问题共同作用，就有可能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

2018年，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7.3%，美国的第一产业占GDP的0.9%。中国在2018年仍有两亿左右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占劳动力总数的26.1%。与美国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大量人口在农村、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国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长期压制城市工人阶级的工资，构成中国“低工资优势”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地位的反映。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GDP除以农业劳动力）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只相当于中国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27.9%。中国无法实现食品基本自给，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和饲料，尤其是从美国。除去中国可利用土地面积少的劣势外，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迷和农村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小农的耕作面积少，无法有效进行农业机械化，缺少抗风险能力。农村收入

低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减少了农村本已十分有限的体力和智力资源。小农为了短期收成滥用农药和化肥不仅直接污染了环境，而且也在不断破坏土壤化学成分。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某些政策并不能引来“资本下乡”，反而加剧了农村土地和财富的积聚。解决新时代的三农问题，需要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中寻找正确答案。

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工业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然经济。社会化大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扩大了物质产品加工制造活动的规模。除了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外，矿产的开采、金属的冶炼、工具的制造不仅让当时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坚船利炮，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也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准，消费越来越多的制成品。生产这些产品就需要机器，机器则需要另一些企业用原料和工艺去生产。产业链的拉长和复杂化还带动了第二产业内部的分化，生产资本品的重工业从直接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中分离了出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第二部类”。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重工业的增长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快过轻工业，而轻工业本身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农业。再加上对住房和厂房的需要，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赶上、超过和彻底压倒了第一产业。在现在看来，一国是否初步完成工业化的门槛，就是第二产业占比是否高于第一产业。三十年代末的苏联、七十年代末的中国都以明显快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跨过了这一门槛，显示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今天的中美两国都是完成了工业化任务的现代市场经济。不过，中国的第二产业占比（39.9%）几乎是美国（20.6%）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将近四成是制造业产品、矿产和建筑业产品。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这一事实（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这个以后会讲），中国每年以实物形态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疑多于美国。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第二产业的比例会开始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例会超过第二产业，中美皆然。在各国的官方统计中，第三产业包括的项目门类繁多结构复杂，光是中国就包含了十四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种类，这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收入核算无法从科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加以分析所造成的混乱结果。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包括在所谓第三产业中的各个部门实际上可以依据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或特色市场经济）和社会中所发挥的不同职能进一步分成几类：

第I类（上两张图右侧浅灰色）虽然处在第三产业，但实际上是特殊形态的物质生产部门，这包括把物质产品以及旅客运送到世界各地的交通运输部门，和生产软件并提供配套服务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中，交通运输部门通过物质手段（消耗一定的能源和物质投入）

来改变货物和旅客的地理位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的虽然不是一般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且其实际职能是通过集成电路（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芯片”）这一物质媒介对电子信号加以加工处理和储存；无论是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以及所产生的产品都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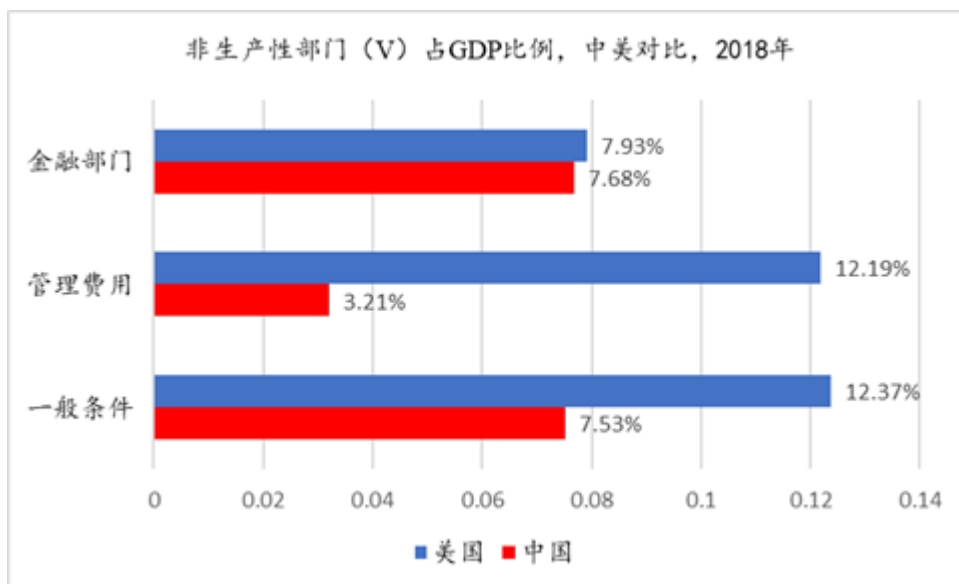
第II类（红色）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物质要素的补充。在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原来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比如饮食、住宿、修修补补、打扫个人卫生等）逐步商品化，被资本主义化或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所代替。这样的经济部门包括住宿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第III类（紫色）是辅助物质生产部门的“价值实现”（即帮助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者将其所生产的商品按照一定的、可以满足一定利润率要求的价格销售出去）并自身带有一定物质生产职能的经济活动。这样的部门包括出售一般工农业产品的批发零售业和出售或出租住房、办公楼的房地产业。这些部门可以理解为物质生产部门的延伸。

第IV类（棕色）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非物质要素的补充。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不仅要满足基本的在生理上生存的要求。为了这些劳动力能够有效地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为资本家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还必须要让他们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接受和服从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为此，就需要可以训练劳动者具备一定劳动力技能并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部门，还需要可以有助于维持劳动者的必要的身体健康的医疗卫生部门（后者相当于经常负责对劳动者身体进行“修理”的部门）。此外，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也起着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并用低级趣味来腐化人民群众、消磨反抗意识的作用。

第V类（蓝色）包括几种纯粹的非生产性部门，这一类部门既不参与物质产品和劳动力的生产，也不为这些生产提供直接的辅助作用，而是属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中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再分配于各种维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的活动。由此产生的活动往往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所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其他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者是不需要的，或者将采取根本不同的形式。

这样的非生产性部门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三种不同情况，如下图所示。



如图，美国经济中的三类非生产性部门之和的比例大大超过中国，其总和占到GDP的32.5%，远超过中国的18.4%。一般说来，非生产性部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负担，其所谓“增加值”的本质是从生产性部门中转移而来的剩余价值。非生产性部门越大，攫取的剩余价值越多，生产性部门能获得的剩余价值越少。仅从这一指标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似乎是比较“好”的市场经济，剩余价值中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的比例比较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核心国家，其资本家阶级不仅可以剥削本国工人的剩余价值，而且还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并占有全世界劳动人民所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样多的剩余价值掌握在美国资产阶级手中，就使得他们有条件将其中相当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各种非生产性的用途，以维持美国资产阶级作为“世界统治阶级”的地位。

非生产性部门中的第一种情况，是维持资本主义一般统治秩序和提供资本主义一般生产条件的部门。这包括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部门、水利管理和环境保护部门以及科学研究部门。所谓“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部门”即资产阶级国家。至于水利管理、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部门，一般来说，或者由资产阶级国家直接承办，或者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大量补贴。资产阶级国家通过税收和其他收费用等强制手段直接占有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由此而攫取的剩余价值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不过，按照资产阶级的国民收入核算，政府也被认为是从事了“生产”，并创造了一定的“增加值”。因此，按照主流方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计算（这里暂不详细说明）。美国政府部门的增加值占GDP的12.3%；中国上述

三种“公共”部门的增加值则占GDP的7.5%。

非生产性部门中的第二种情况是在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中所发生的各种非生产性管理费用，这主要包括所谓的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内部又分成许多个行业。但大体来说，其中有些是属于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管理服务（即帮助资本家监督和压迫劳动者并尽可能压榨劳动者劳动）的行业，比如属于商务服务业一部分的公司总部、行业协会等；另外一些，是属于为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服务（即帮助个别资本家从资产阶级攫取的总的剩余价值中谋取更大的一份）的行业，如所谓法律服务业、广告业、各种咨询业等。这样的经济活动是资本主义企业相互竞争所产生的损耗，是它们相互捅刀子、使绊子的副产品。按照某些“砖家”的观点，自由竞争能够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实现效率最大化。但可笑的是，就在号称市场经济“灯塔”的美国，看不见的手每年就以“管理费用”的形式糟蹋了GDP的12.2%。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少从官方统计看，这方面的浪费比较少，只占GDP的3.2%。不过，中国经济中各种上不得台面的腐败贿赂、保护费等到底有多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非生产性部门中的第三种情况是金融业。商品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本质是将散落的货币资本集中起来，并投入到各种可能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中（即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就使得控制了货币资本的资本家可以利用其对货币资本的垄断迫使生产性部门的资本家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在中国，金融行业的就业人员总数约800万，他们通过“提供金融服务”竟然“创造”了GDP的7.7%，比两亿农业劳动者创造的GDP还要多。这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尖锐的社会不平等。金融行业是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特有的现象；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这一行业将会被统一的簿记系统和计划调配所取代，由此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将会被用于改善人民生活。

第五期 名义GDP与实际GDP

作者：草庐棋士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的最终产品的**总和**（支出法）；GDP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各个阶级收入的**总和**（收入法）；GDP是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总和**（生产法）。总和是各项加总的结果。既然要加总，就需要有统一的单位或“度量衡”。在宏观经济统计中，价格就是这个度量衡。它把资本品和消费品，把卡车和猪肉折算成统一的数量单位。但是价格总会变，比如2019年，全国平均的猪肉价格大概是10块钱一斤，到2020年变成了猪肉20块钱一斤。价格变了，但是猪还是猪，作为实物需求、作为实际收入、作为物质产品都没变。价格的变化可能会扭曲我们对GDP的度量。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区分名义GDP和实际GDP。

名义GDP指的是用当年价格衡量的GDP。中国2019年的GDP就是中国在2019年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以2019年价格计算的价格总额。打个简单的比方，假设某国2019年没生产别的，扣除中间投入之后就生产了1000亿斤猪肉。假设每斤猪肉10元，那么该国2019年的GDP就是1万亿元。2020年，假设该国扣除中间产品之后生产了1010亿斤猪肉，每斤20元，那么该国2020年的名义GDP就是2.02万亿元。

上面只是个简单的比方，不过可以反映名义GDP的基本逻辑：名义GDP是实物产出与当年价格水平的乘积。在上面的例子中，某国的名义GDP从2019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2.02万亿元，增加了102%；但是真实的实物产出（猪肉产量）只增加了10亿斤或者说1%。我们知道，衡量一国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终究需要看实物产出。这就引出了实际GDP的概念。

实际GDP指的是用某个“基准年”不变价格衡量的GDP。维持价格水平不变时，实际GDP的变化反映的就是实物产出的变化。在上面的例子里，如果我们选取2019年为基准年的话，2020年的实际GDP就可以用如下方式计算：用2020年（当年）的猪肉产量（1010亿斤）乘以2019年（基准年）的猪肉价格（10元/斤），得出的结果是1.01万亿元。用2020年的“实际GDP”1.01万亿元与2019年的“实际GDP”1万亿元（2019年的当年价格就是基准年价格）相比较，可以得出，2020年的实际GDP比2019年的实际GDP增长了1%，与上面计算的猪肉产量增长率相一致。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国家不会仅仅生产猪肉一种产品。在千万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中，有些价格上升，有些价格下降，上升和下降的幅度还会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可能

很大，有些产品价格上升的速度可能相对缓慢。在统计上，一般用价格指数来代表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平均的价格水平。根据不同的统计需要，又有不同的价格指数。比如，用来反映各种消费品平均价格水平的价格指数，叫做“消费者价格指数”；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水平的价格指数，则叫做“GDP平减指数”。

名义GDP、实际GDP和平均价格水平之间的数学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代表：

$$\text{名义GDP} = \text{实际GDP} * \text{平均价格水平}$$

如果用英文字母Y来代表实际GDP，用P来代表平均价格水平，那么上面的公式也可以写成：

$$\text{名义GDP} = P * Y$$

上面的公式，还可以用各个变量增长率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数学上，如果X是Y和Z的积，那么，X的变化率就近似等于Y变化率和Z变化率的和。所以，名义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经济增长率”）和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也叫“通货膨胀率”）的数学关系是：

$$\text{名义GDP增长率} \approx \text{经济增长率} + \text{通货膨胀率}$$

还可以表示为：

$$\text{名义GDP增长率} \approx \Delta Y / Y + \Delta P / P$$

其中， Δ 是希腊字母“德尔塔”，在这里表示一个变量的变化。

下表反映的是1980-2019年期间中国和美国的名义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各个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1980-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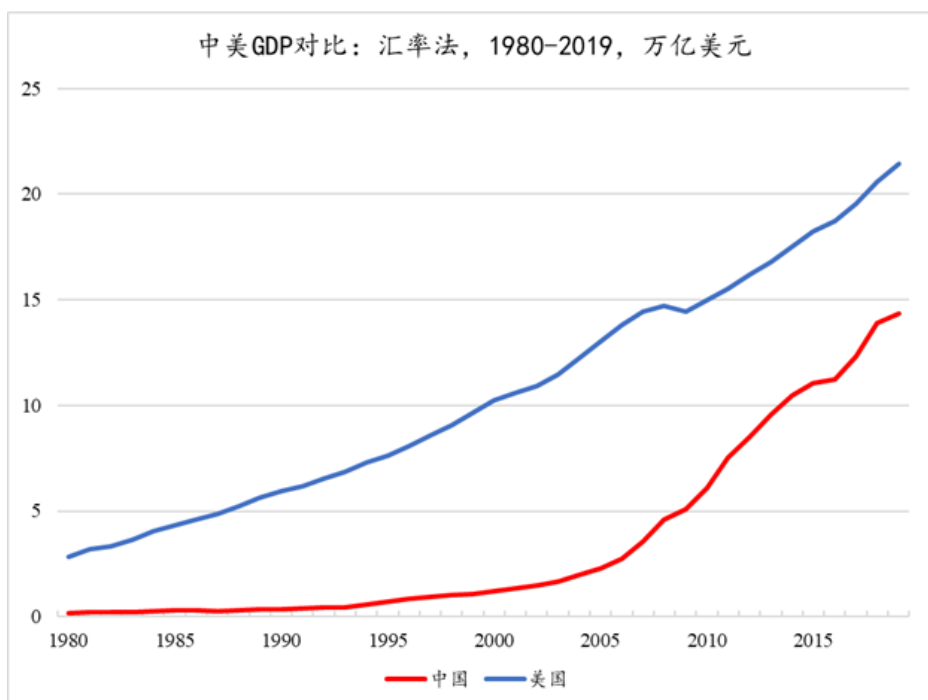
		1980-1990	1990-2000	2000-2010	2009-2019
中国	名义 GDP 增长率	15.2%	18.2%	15.2%	11.0%
	经济增长率	9.3%	10.4%	10.6%	7.7%
	通货膨胀率	5.4%	7.0%	4.2%	3.1%
美国	名义 GDP 增长率	7.6%	5.6%	3.9%	4.0%
	经济增长率	3.3%	3.4%	1.7%	2.3%
	通货膨胀率	4.2%	2.1%	2.1%	1.7%

在上述四个十年时期，中国的名义GDP、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都要高于美国。按照官方经济统计，在2010年以前，中国保持了约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或超过10%。因为名义GDP的增长率相当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如果官方统计低估了通货膨胀率，就可能高估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时代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我们这里暂时不探讨这一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平均的通货膨胀率偏高；九十年代时，价格水平年平均增长7%，相当于价格水平每十年翻一番。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有所下降。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3%以上。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名义GDP年平均增长保持在4%左右，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2%左右。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快于美国，所以中国和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一直在缩小。下图显示的是用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和美国的GDP。在1980年时，中国的GDP约相当于美国的6.7%。到了2019年，美国GDP约为21.4万亿美元，中国GDP约为14.3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7%。不过，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有余，中国的人均GDP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15%，即不到六分之一。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美国的25%；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的平均物质生活条件大约相当于美国二战刚结束时的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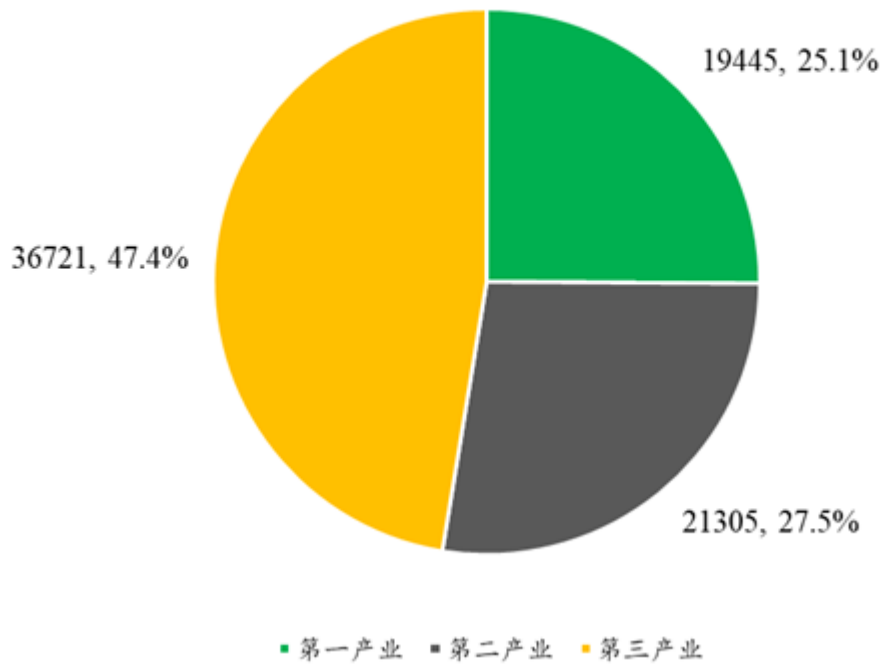
第六期 就业与失业

作者：草庐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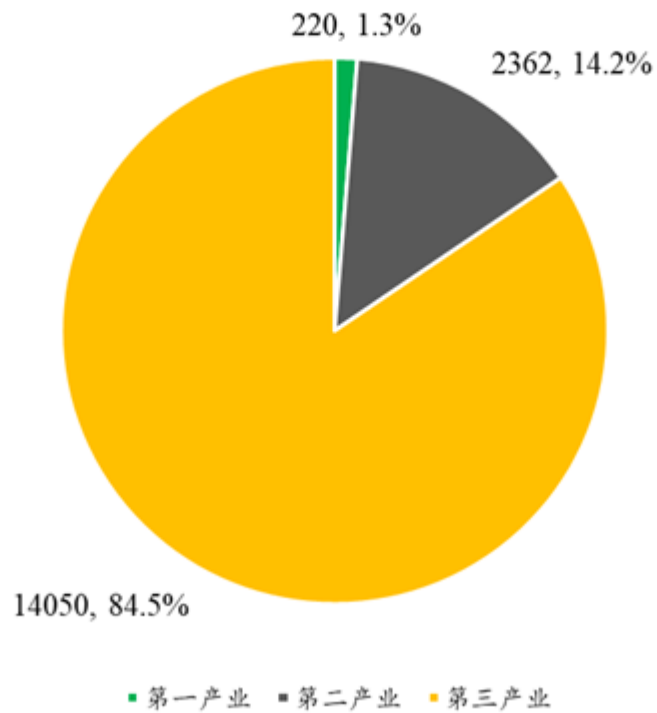
就业和失业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一般群众而言，不就业就没饭吃、没衣服穿、没地方住。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就业问题解决不好，轻则府库空虚、民怨沸腾，重则中原板荡、四方扰攘。中国古代找不到工作的“流民”就多次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一讲就业和失业的问题。

下面两张饼状图展示了2019年中美两国按照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

三次产业就业人数（万人）和比例，中国，2019年



三次产业就业人数（万人）和比例，美国，2019年



2019年，中国总就业人口为77471万人，美国为16632万人。中国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绿色部分）就业人口为19445万人，超过美国就业人口总数，占到中国总就业的约25%。尽管中国经济这些年取得了快速发展，人均GDP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并给一些人以“全面超越美国”乃至“称霸世界”的幻觉，但是仍有将近两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这是典型的半外围国家的特征。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在提供着相当数量的产业后备军，压制着城镇无产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工资水平。

中国2019年的第二产业（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公用事业，灰色部分）就业人数为21305万人，占中国总就业人口的27.5%。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第二产业工人群体，他们不仅负责修建和维护中国出口加工制造业所必须的庞大的基础设施，还为国内雇主创造大量利润，而且还为核心国家资产阶级制造廉价出口产品，维持这些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平，因而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美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只有2362万人，约为中国的九分之一，仅占美国总就业人口的14.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产业转移和外包让美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和规模萎缩。由此引发的工人失业、小业主破产和本土中小资本家的不满是推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新自由主义群众运动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橙色部分）的就业人口为36721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7.4%。美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1405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84.5%。我们知道，第三产业中包含大量的与物质资料生产并无直接联系的部门。美国第三产业就业的高比例实际反映了美国阶级斗争的两个重要趋势。第一，原本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工人在全球化中丢掉工作被摔进第三产业的低端部分，被迫从事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第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分工中，美国的信息技术行业和金融业得以扩张，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和工资待遇都有所上升。工资和就业都受到全球化严重威胁的美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人的下层在近些年出现了政治激进化的倾向。而美国的上层小资和在媒体及教育行业工作的次等小资，则构成了坚决捍卫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白左”群体的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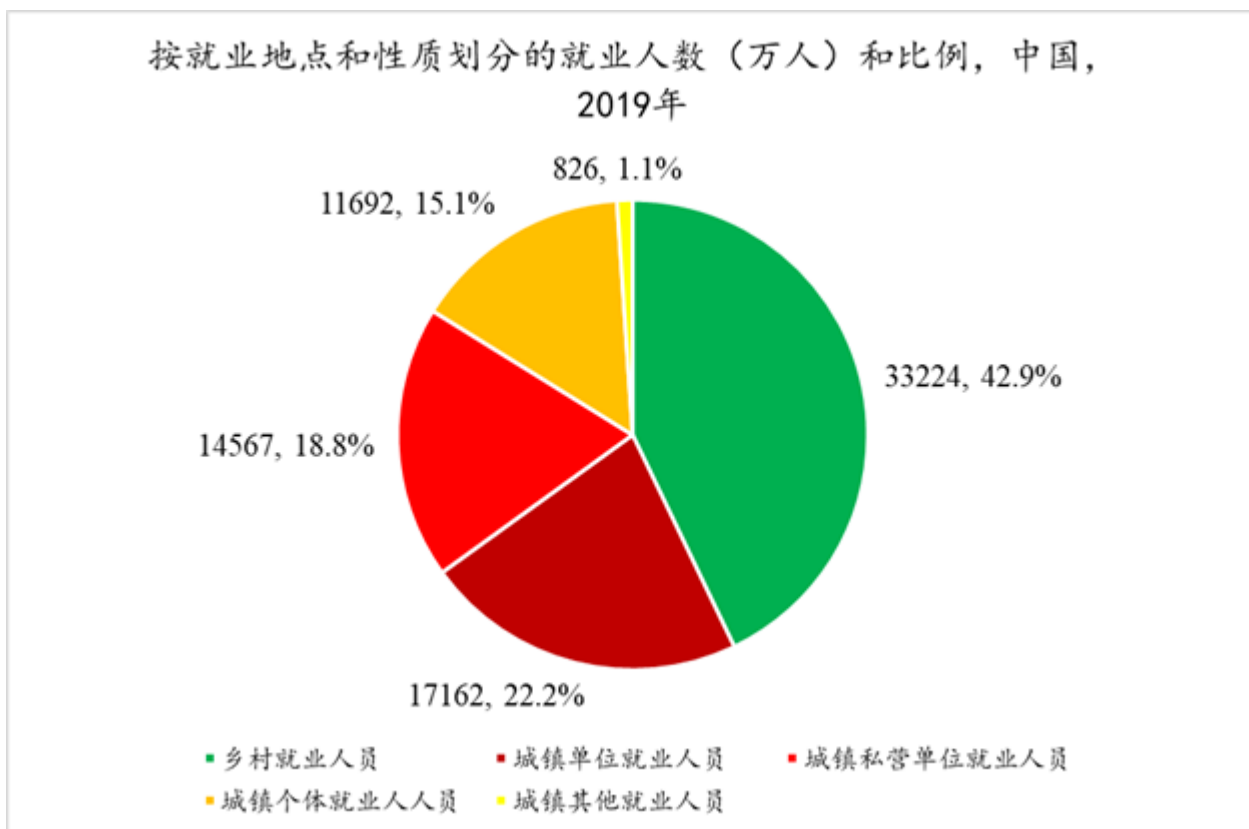
在美国，比较常用的失业人口统计口径指的是16岁以上人口中没有工作、想要工作并且在过去四周内积极寻找过工作的人。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总和就是劳动力，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寻找工作的人则不算在劳动力的范围内，故而也不算是失业人口。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text{失业率} = \text{失业人口} / (\text{失业人口} + \text{就业人口}) = \text{失业人口} / \text{劳动力}$$

中国曾有过两种官方失业统计概念。从前统计部门会公布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是通过城镇无业者主动到劳动部门登记而获取的失业率。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真实程度相当可疑，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统计的笑话。近些年统计部门采纳了“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一指标。该指标依靠的是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统计标准与美国类似，只不过寻找工作的期限为三个月而不是四周。理论上讲，调查失业率可能比登记失业率要准确一些，不过由于该数据只覆盖城镇地区，无法反映整个经济失业状况的全貌。在此，我们采用中国官方统计资料中劳动力和就业人口之差来代表失业人口。根据两国官方统计资料，中国的失业率在2018年约为3.45%，在2019年约为4.48%。美国的失业率在2018年约为3.89%，在2019年约为3.67%。两国的失业率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都处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较低水平。

美国的失业率统计方法相对成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经济周期的有力工具。一般而言，失业率会在经济繁荣期的末尾，即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前达到周期最低点；在经济危机和衰退时期上升，在复苏期的开始阶段达到周期最高点，然后随着复苏和繁荣开始下降，直至下一个周期。例如，上一次经济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三月，美国的失业率曾经达到过4.4%的周期低点，在衰退期过后的2009年十月达到10%的周期高点，随后一直下降。到了新冠疫情传播到美国之前的2020年一月，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到了3.6%，几乎是50年来的最低点。而在新冠危机最严重的2020年四月，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了14.7%。这样高的失业率，超越了二战以来所有的经济危机，只有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才能与之相比。到了2020年11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6.7%，相当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时的水平。

中国经济是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就业统计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除了按照三次产业和具体行业划分的就业结构之外，还有一类划分标准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有用信息。下面这张饼状图反映了中国2019年按就业地点和就业单位性质划分的就业结构。



2019年，中国共有乡村就业人员33224万人，约占总就业的43%。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约比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多出一亿四千万，这是因为中国的乡村中还有大量的人口以个体户（约6000万）和乡村私营企业雇员（约8000万）的身份从事非农业生产。图中猩红色部分代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7162万人，占总就业的22.2%），包括国有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鲜红色）就业人员约有14567万人，占总就业的18.8%。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橙色）约有11692万人，占总就业的15.1%。还有一些未能归入上述三类的城镇其他就业人员（黄色），约有826万人，占总就业的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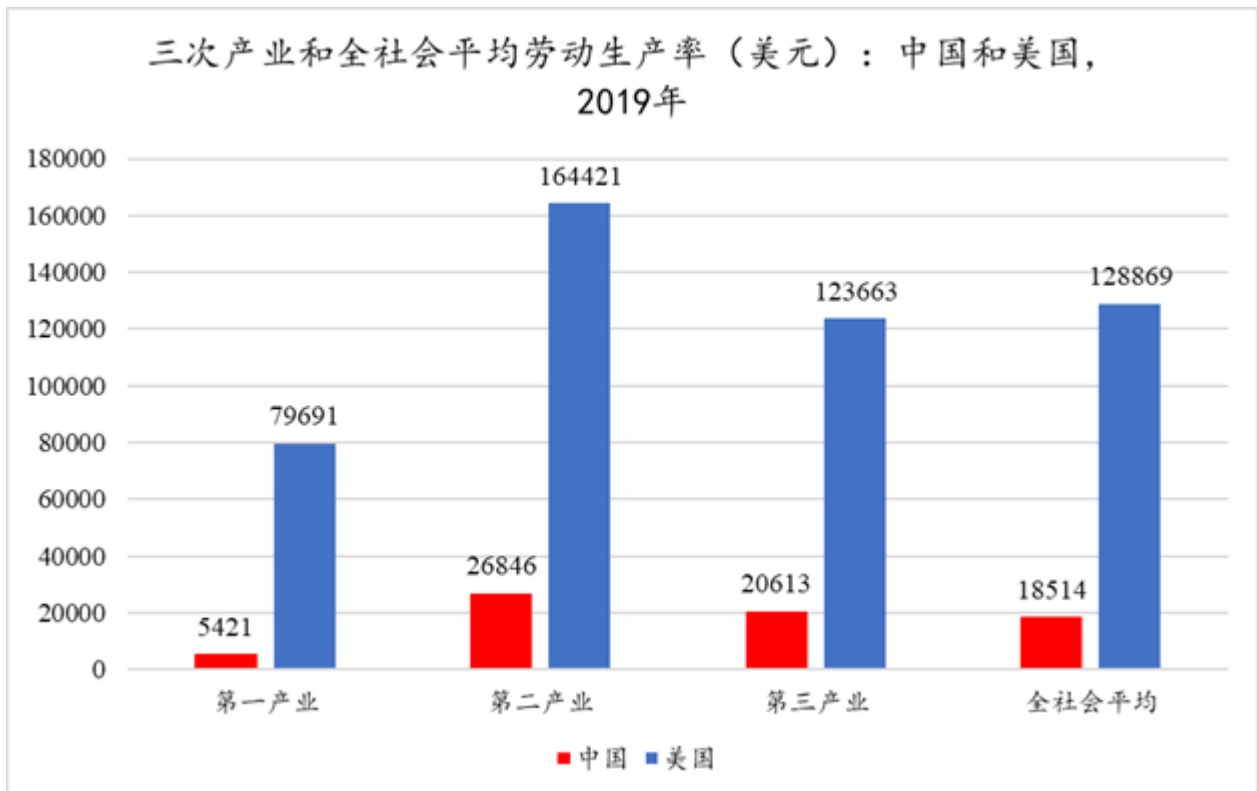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通常能享受到较为稳定的就业环境和较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各项待遇虽然明显不如城镇单位，但是一份工作的工资能够基本满足劳动力日常再生产（吃喝拉撒）的要求。上述两类就业人员，在扣除私营投资者、党政干部（某个阶级）以及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现代小资产阶级）以后的其余部分，大致构成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城镇其他就业人员和乡村就业人员大致构成中国的半无产阶级。他们获取的工资和经营收入很低，通常需要打几份工或者接受超长劳动时间才能满足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需要。

至于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生娃、养娃、育娃），则基本处于停滞或萎缩的状态。

讲完了就业和就业结构，我们再来看看中美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所谓劳动生产率就是每一名劳动者创造的GDP。其计算方法如下：

$$\text{劳动生产率} = \text{GDP} / \text{就业人数}$$

作为分母的就业人数只是总人口的一部分，因此劳动生产率总是大于人均GDP。下图展示的是中国和美国2019年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



2019年，美国的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蓝色）为128869美元，几乎是中国（18514美元，红色）的七倍。美国的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要远高于中国。其中，美国一次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约为中国的15倍，二次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约为中国的6倍，三次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约为中国的6倍。

在中美两国都存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农业部门都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成分。小农经济单位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除了包含农业生产物质投入的成本以外，主要反映的是农业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资本主义部门所生产

的产品价格除了物质投入成本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以外，还要包括资本家利润。所以，当包括小农经济成分的农业部门与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的非农业部门相互交换时，就会存在不平等交换（一单位非农业劳动可以交换多个单位的农业劳动），在统计上就表现为一国经济内农业部门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由于中国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而美国农业则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小农经济成分并存，所以中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比美国的更加严重。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更加巨大的差距。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的62%，而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的29%。

第七期 市场经济中的消费

作者：草庐棋士

在介绍GDP构成的时候，我们讲过GDP可以按照支出法分成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四个部分。上述四个部分也构成我们通常所讲的宏观经济总需求。居民消费是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的居民消费约占GDP的39%，美国的居民消费约占美国GDP的68%。

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559元，扣除价格因素之后的实际增长约为5.5%。其中最大的一项消费支出是食品烟酒消费，约占居民消费的28%。第二大消费支出是居住消费，约占23%。这里的居住消费包括房租（含统计局估计的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以及水电费、煤气费、暖气费等，并不包括购买新建或二手住房的支出（后者在统计上属于“投资”的一部分）。居民消费还包括交通通信（13%）、教育文化娱乐（12%）、医疗保健（9%）、衣着（6%）、生活用品及服务（6%）和其他用品及服务（2%）。

2019年，美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为44316美元，按汇率计算约合30万元人民币。其中，耐用品消费支出约占居民消费的11%，该项包括购买车辆、家具、大型电器、游艇等的支出。非耐用品支出约占20%，其中包括食品饮料、衣着、汽油、和其他非耐用品等。服务消费支出占到居民消费的69%；其中，居住和水电气消费占居民消费的18%，医疗健康消费占17%，其余各项服务消费共计占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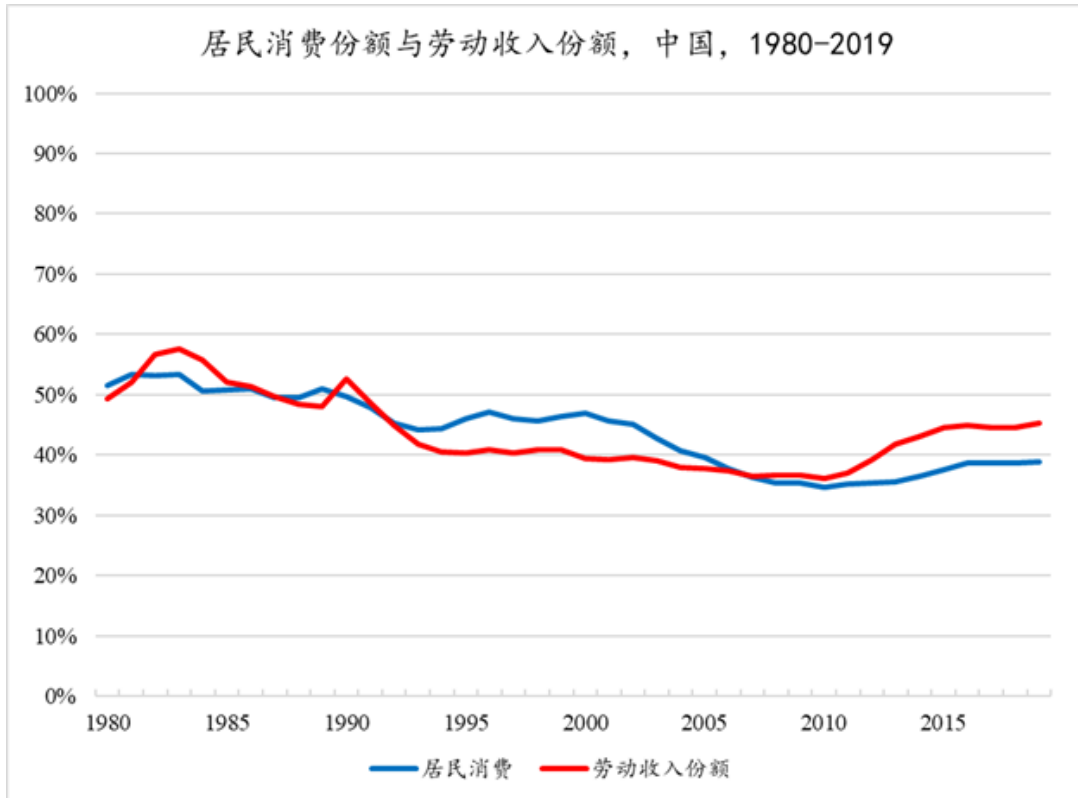
居民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国居民消费的水平呢？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社会再生产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社会再生产本身是特定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物，消费也一样。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一切消费本质上都是在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归根结底，生产决定消费。在统计上，一国的消费水平不可能长久地高于总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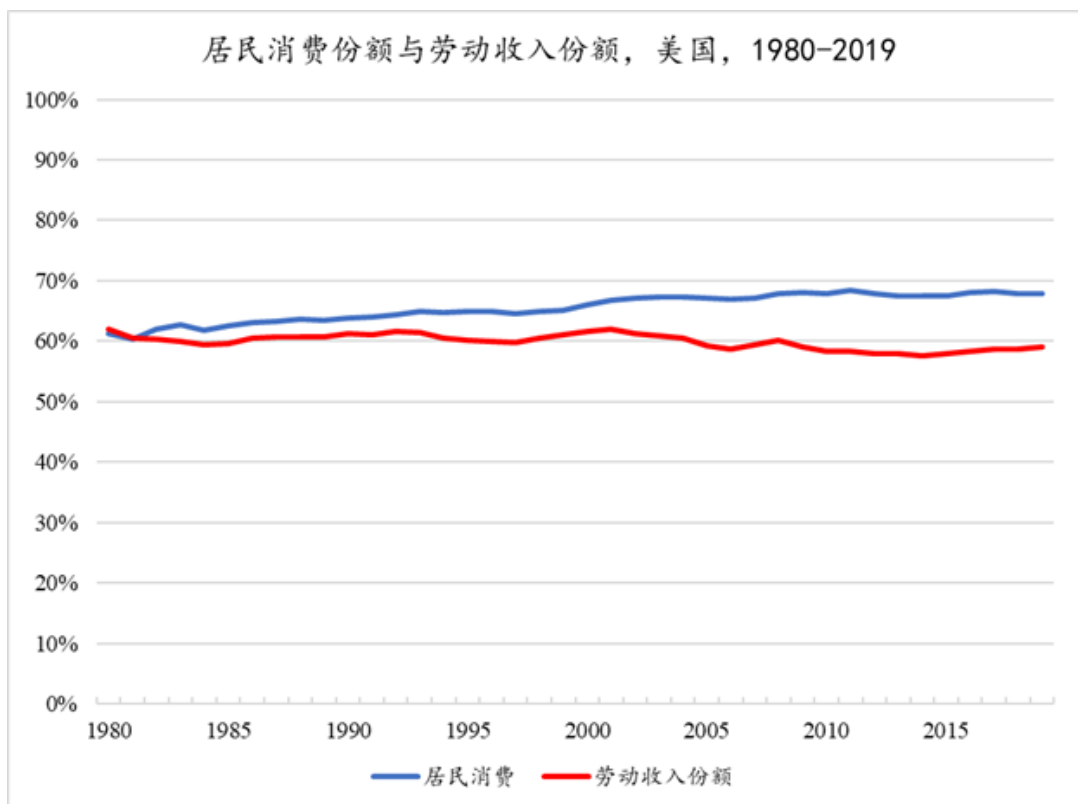
生产关系的核心是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阶级关系的焦点是有关收入分配的经济斗争。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一国的总消费水平首先取决于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换句话说，总需求的消费部分受到阶级斗争以及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下层一生收入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都被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的收入中只有一部分用于消费，另外一部分则储蓄起来，用于自己投资或

出借给别人。由于劳动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劳动者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消费，所以一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比例往往密切相关。

下面两张图反映了1980-2019年期间中国和美国经济劳动收入和居民消费分别占GDP的比例。





关于两国居民消费和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在1980年到2019年之间的变化我们已经在支出法和收入法GDP两篇文章中介绍过了。这里，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两个份额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居民消费份额在劳动收入份额附近波动。劳动收入份额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并在2010年左右回升，居民消费份额大体上服从同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略高于居民消费份额。

在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消费份额都比较稳定。劳动收入份额占到GDP的60%左右，而居民消费份额则从八十年代的60%左右上升到了近年来的68%。美国的居民消费份额明显高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趋于扩大。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愈发扩大。虽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其中诸如软件工程师、高级经理人、影视和体育明星之类的小资产阶级上层的收入增长明显快于一般工人阶级。美国的广大工人阶级家庭不得不通过借贷消费的方式才能满足美国社会环境下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中国和墨西哥等国生产的廉价消费品又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劳动群众物质消费的增长。这就造成了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常年低于居民消费份额的现象。

根据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函数（也可以叫消费模型）。经济学的模型是什么？我们知道汽车模型、坦克模型是用塑料、纸张和铁片模拟真实世界的汽车和坦克的形态。经济模型也是一样，它是用各种从历史经验中提取出来的数

据，根据特定的理论，用一个或几个公式来模拟经济的运行。经济学模型虽然是对真实情况的模拟，但它本身并不等于真实情况，它是对真实情况的抽象。所谓抽象，就是抽掉次要矛盾或不重要的现象，分析主要矛盾各个关键局部之间的本质联系。

下面的公式（消费函数），就代表了居民消费如何被各种因素所决定的数学关系。

$$C = c + \omega * Y$$

在上面的消费函数中，我们用英文大写字母 C 来代表居民消费总额；英文大写字母 Y 代表实际GDP；希腊小写字母 ω （欧米伽）代表劳动收入份额；英文小写字母 c 代表居民消费中不受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部分，我们称之为“自发消费”。

上面的消费函数表明，居民消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主要的部分是 $\omega * Y$ ，即劳动收入份额与实际GDP的乘积，也就是实际劳动收入的总额。消费函数的这一部分表示，居民消费与实际劳动收入同步变化。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当实际GDP或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时，居民消费也会上升；反之，则居民消费会下降。

“自发消费”反映的是居民消费中不受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部分。除了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并用于消费以外，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家庭还可能通过政府的福利支出（如社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获得“转移支付”并用于消费，或者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借债的方式维持消费支出。我们将这样的消费支出，统称为“自发消费”。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一个社会中劳动者家庭平均的储蓄率比较高，从而一部分劳动者家庭的储蓄超过并且抵消了另外一些劳动者家庭靠转移支付或借债维持的消费，那么整个社会的“自发消费”也可能是负值。

我们刚才介绍的消费函数是经济学模型的一部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继续介绍市场经济中的投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财政政策，然后提出一个简单的短期宏观经济模型。所谓“宏观经济模型”指的是用来说明一个国家总的经济产出水平是如何决定的模型；而所谓“短期”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人口、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大体上不变（或者变化不大）的一定时期。一般可以将这样的“短期”理解为几年的时间或者一个经济周期。有了短期宏观经济模型，就可以初步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了。

第八期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

作者：草庐棋士

投资是决定一国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投资直接决定一国资本存量的变动，从而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投资也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投资水平的稳定与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很大的关系。近年来，总投资（资本形成总额）约占中国GDP的43%，约占美国GDP的21%。

我们在支出法GDP中介绍过总投资的概念。总投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居民和政府部门所购买的“资本品”的总额。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定义，所谓“资本品”指的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生产出来并且可以用于未来生产活动的商品。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居民的住房也提供“服务”，所以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也属于购买“资本品”的支出，是投资的一部分而不算是消费的一部分。

按照投资所购买的资本品的物质形态区分，总投资可以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所谓固定资本，在统计上一般指的是使用寿命在一年以上的“资本品”，包括各种建筑物、机器设备、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所谓存货投资，指的是一个时期内**存货的变化**，即期末存货减去期初存货。存货包括企业已经生产出来但尚未销售出去的产成品、半成品以及企业已经购买但尚未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如能源、自来水）等。

按照投资购买主体区分，总投资又可以分为企业投资、居民投资和政府投资。下表说明了2018年中国和美国企业投资、居民投资、政府投资和总投资各自占GDP的比例。

企业投资、居民投资、政府投资和总投资占 GDP 的比例，中国和美国，2018 年				
	企业投资	居民投资	政府投资	总投资
中国	24.9%	11.2%	7.7%	43.8%
美国	13.4%	4.2%	3.4%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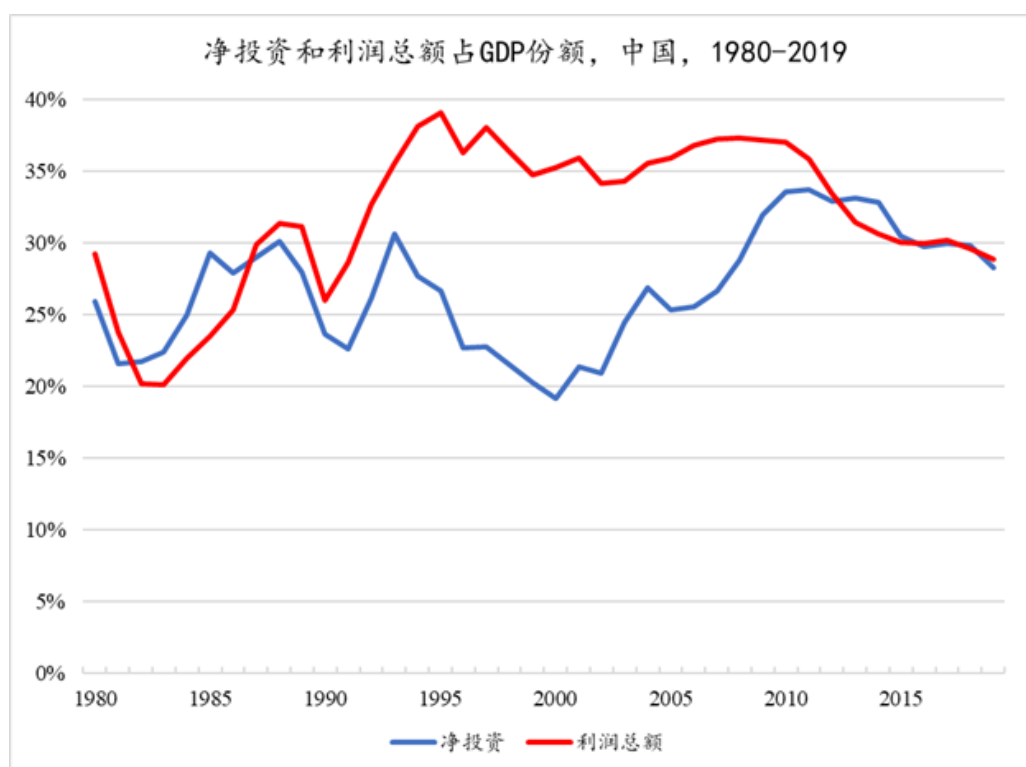
资本品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一国国民经济中所使用的建筑物、机器设备、计算机软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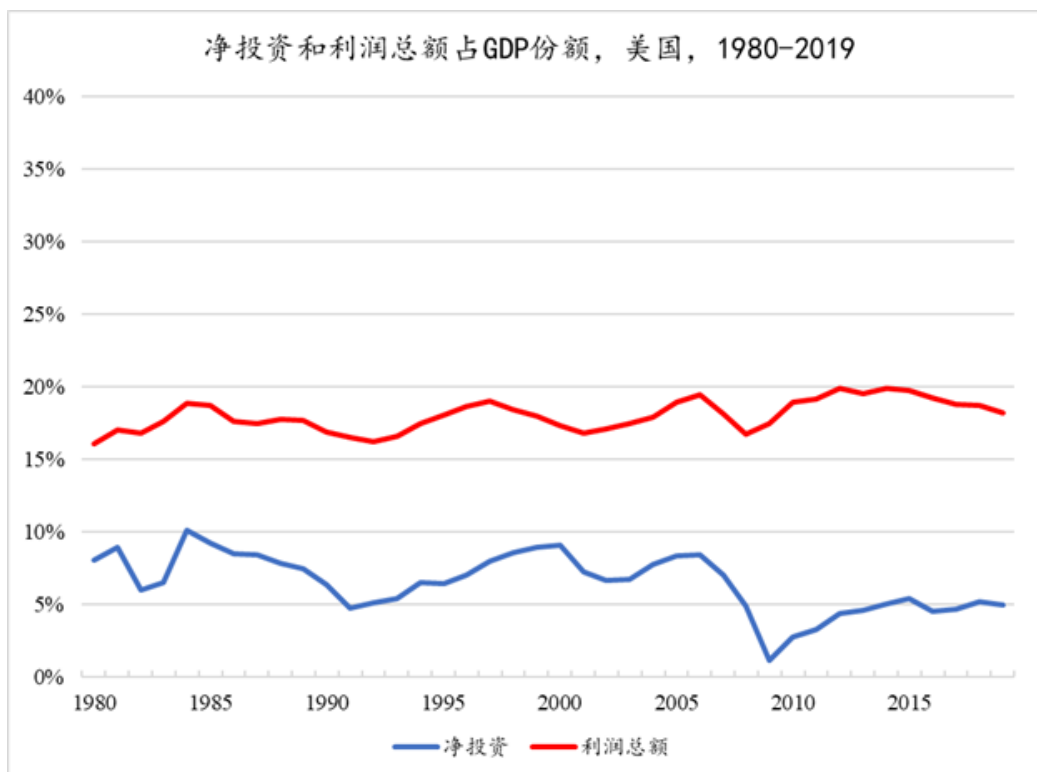
每年都有一定的比例会报废、损坏或过期失效。如果一个国家要维持原有的资本存量和原有的生产能力，就必须将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拿出来用于补偿固定资本的消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建筑物、软件和知识产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固定资本消耗（即通常所说的固定资本折旧）占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中国GDP的大约15%，美国GDP的大约16%要拿来补偿固定资本消耗。

我们用 $\delta * Y$ 来代表一个国家总投资中用于固定资本消耗的部分。其中，希腊小写字母 δ （德尔塔）表示固定资本消耗占GDP的比例，英文大写字母Y代表实际GDP。如果用一个国家的总投资减去固定资本消耗，剩余的部分就是净投资。净投资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总投资中可以用来扩大生产能力的部分，大体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积累概念。

在市场经济中，虽然居民和政府也参与投资，但是资本家所经营的企业是最主要的投资主体。比如上表中的企业投资在中美两国都站到了总投资的半数以上。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可以用于投资的储蓄也主要来自于资本家的利润。所以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的净投资水平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利润总额，后者又取决于阶级斗争力量对比。

下面两个图分别说明了1980-2019年中国和美国利润总额和净投资占GDP比例变化的情况。





对比上述两张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利润总额和净投资占GDP的比例都要高于美国经济，较高的净投资占比使得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速度明显快于美国。第二，多数情况下，净投资的上下波动与利润总额的上下波动同步或略慢于利润总额的波动。第三，中国的净投资相对于利润总额的比例长期高于美国。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利润总额几乎全部用于净投资。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资本家不吃不喝不消费，这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察也不一致；而是表明中国的劳动者家庭也有一定的储蓄，并且这些储蓄与资本家的消费大致抵消。另一方面，大约在2005年以前，美国经济利润总额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用于净投资，其余部分或者用于资本家的消费，或者转化为借贷资本，用来维持居民和政府的借债消费。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资本家的投资意愿低迷。近年来，美国经济利润总额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用于净投资。

所以，市场经济中的净投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利润总额占GDP的份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家将利润总额中多大一个比例用于净投资而不是挥霍浪费。我们用 $\sigma * \pi * Y$ 来代表一个国家的净投资。其中，希腊小写字母 π （读“派”）代表利润总额占GDP的比例（即利润份额），希腊小写字母 σ （西格玛）代表资本家的利润总额中用于社会净投资的比例（包括资本家直接用于自己拥有的企业的净投资或者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贷款给其他企业、居民和政府所进行的净投

资)。这样，我们的投资函数就包括两部分：固定资本消耗和社会净投资。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代表：

$$I = \delta * Y + \sigma * \pi * Y$$

上式中，英文大写字母 I 代表总投资。 $\delta * Y$ 代表固定资本消耗， $\sigma * \pi * Y$ 代表社会净投资。

在介绍收入法GDP时，我们已经介绍过，一个国家的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分为劳动收入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和固定资本消耗。如果用希腊小写字母 τ （读“套”）来代表一个国家的间接税总额占GDP的比例（相当于全社会平均的间接税率），那么一国的收入法GDP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代表：

$$Y = \omega * Y + \pi * Y + \tau * Y + \delta * Y$$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一国的GDP（Y）可以被分成劳动收入总额（ $\omega * Y$ ，劳动收入份额和GDP的乘积）、利润总额（ $\pi * Y$ ，利润份额和GDP的乘积）、间接税总额（ $\tau * Y$ ，间接税份额和GDP的乘积）、以及固定资本消耗（ $\delta * Y$ ，固定资本消耗份额和GDP的乘积）。把上面的公式两边除以Y，我们就能得出下面的等式：

$$1 = \omega + \pi + \tau + \delta$$

两边都减去 $\omega + \tau + \delta$ ，就能得到：

$$\pi = 1 - \omega - \tau - \delta$$

这个等式的意思是一国的利润份额等于1减去劳动收入份额，减去间接税份额，再减去固定资本消耗份额的结果。我们把上面的等式代入到投资函数中，可以得到：

$$I = \delta * Y + \sigma * (1 - \omega - \tau - \delta) * Y$$

我们将上面的等式稍微重组，可以得出：

$$I = \delta * (1 - \sigma) * Y + \sigma * (1 - \omega - \tau) * Y$$

在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一般来说， σ 是一个正数，即资本家会将其利润总额中至少一部分用于净投资。在其他一切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 ω 的变化会引发总投资的变化。由于与劳动收入份额相乘的系数是负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会引起总投资向反方向变化。如果劳动收入份额 ω 上升，虽然居民消费会相应上升（见第七期“学点经济学”），但却会导致投资下降。消费和投资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下的反方向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以及特色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我们将在以后的“学点经济学”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第九期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收入和支出

作者：草庐棋士

今天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同于十九世纪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广布于天下以来，政府无时无刻不在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手段有很多，最经常使用的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政策指的是政府部门用收入（主要是税收）和支出为手段来影响国民经济的政策。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以下两张表反映的是中国和美国在2018年政府部门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其中，中国的数据大多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资金流量表，美国的数据则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表3-1。

表一：政府部门收入，中国和美国，2018年

	中国		美国	
	亿元人民币	占 GDP%	亿美元	占 GDP%
各种间接税	95554	10.4%	14448	7.0%
企业所得税	35324	3.8%	2710	1.3%
个人所得税	13904	1.5%	20853	10.1%
外国人所得税			263	0.1%
社会保险缴款	61348	6.7%	13656	6.6%
其他转移支付收入	8466	0.9%	2239	1.1%
财产收入	21598	2.4%	2115	1.0%
以上合计	236193	25.7%	56284	27.4%
资本转移收入	20	0.0%	290	0.1%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62911	6.8%		
总收入	299123	32.5%	56573	27.5%

表二：政府部门支出，中国和美国，2018年

	中国		美国	
	亿元人民币	占 GDP%	亿美元	占 GDP%
政府消费支出	152011	16.5%	28913	14.1%
社会保险福利支出	64455	7.0%	29457	14.3%
其他转移支付支出	218	0.0%	515	0.2%
利息支出	10485	1.1%	8218	4.0%
价格补贴	290	0.0%	633	0.3%
以上合计	227459	24.7%	67736	32.9%
政府部门净投资	60005	6.5%	1378	0.7%
政府给企业的投资性补贴	11746	1.3%		
其他资本转移支出	58	0.0%	164	0.1%
其他非金融资产净购买			154	0.1%
国有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	44824	4.9%		
总支出	344092	37.4%	69432	33.8%
<i>附：国有土地出让总支出</i>	<i>68167</i>	<i>7.4%</i>		

中美两国统计体系和标准略有差别。在上面两张表中，我们把两国数据按照相同口径整理到各个栏目下。其中，表一中“以上合计”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政府部门经常性收入”。“以上合计”减去社会保险缴款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般公共财政收入”。表二中“以上合计”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政府部门经常性支出”，中国的“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大致相当于总支出减去国有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和社会保险福利支出。

我们先看表一。在“以上合计”部分中，政府的经常性收入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门类：各种间接税（营业税、消费税、增值税、关税等）、各种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国人所得税等）、转移支付收入（社会保险缴款和其他转移支付收入）以及财产收入（利息、红利、地租等）。中国政府的经常性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6%，中国政府的经常性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7%。不过，中国的税收结构严重依赖给一般劳动人民带来较大负担的间接税（占GDP的10%以

上），而实行累进税率、带有再分配性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2%。相比之下，美国的税收以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例为10%。

中国政府总收入占GDP的32.5%，大于美国的27.4%。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收入中有一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份额很大，占到了GDP的6.8%。这个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土地财政”的毛收入。所谓“土地财政”，就是通过出售国有土地长期使用权（其实就是事实上的所有权）获取收入的行为。其本质是将所出让的国有土地上未来产生的地租打包出售。与税收和转移支付这种无偿的、说一不二的强制征收不同，土地财政反映的是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国家机器对企业的妥协。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西方近代史上一些王室把对外贸易专营权、殖民地开拓权和一些税费的征收权出售给当时的贵族和商人来获取收入。中国近代史上也有通过出售官职来筹措国防经费（颐和园建设费）的“海防捐”。这些特别收入的性质都与今天的土地财政相类似。

再看表二。中国政府的经常性支出约占GDP的25%，美国政府的经常性支出约占GDP的33%，这当中的差距主要来自于美国政府巨大的社会保险福利支出。美国的社会保险缴款占GDP的6.6%，而其社会保险福利支出则占到了14.3%，是前者的两倍以上。美国政府的福利账户无法做到收支平衡，只能用政府的其他收入乃至是财政赤字来弥补福利账户的缺口。美国的福利国家一直被一些人诟病，说是美国版的“大锅饭，养懒汉”。其实不然，美国乃至其他核心国家的福利国家是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长期斗争的重要成果，是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被迫向群众作出的妥协。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保险福利支出和社会保险缴款大致相当，各占GDP的7%左右。中、美两国在社会保险福利支出方面的差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国各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

与经常性支出不同，中国政府的总支出（约占GDP的37.4%）反而大于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约占GDP的33.7%）。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每年需要花大量的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这构成了巨大的政府部门净投资（约占GDP的6.5%）。同时，中国政府还通过豁免债务等方式对企业进行投资性补贴。上述两项支出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特色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过，和日本、南朝鲜等目的明确、决心坚定的典型“发展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对投资的干预往往缺乏全局性和连续性，常常会出现忽冷忽热的现象，且投资多数集中于末端应用领域。对于需要长期大量投入的基础性部门，如理论科学、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等严重缺乏热情。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40年，一些重要行业仍然会被“卡脖子”的事实。中国的政府支出中有一项是国有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约占GDP的5%，该项主要指的是与国有土地出让相关的拆迁安置和补偿等

支出。如果我们用政府收入中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减去国有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就会得到国有土地出让净收入。这个净收入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2%。中国土地财政收入中大约七成实际上被用作补偿失地群众的经济损失。不过，拆迁补偿款发放的实际情况如何，就只有天知道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的政府收入和支出统计中，政府转让土地获得的收入不是单独列出，而是作为非金融资产净购买的负项用来冲销支出。如果按照与中国同样的口径来统计，美国的政府总收入和总支出都会比表一和表二所列出的数字略大一些。不过，由于土地财政在现代美国并不重要，由此造成的误差应该很小。

对比政府总收入和政府总支出，我们就能得到整个政府部门盈余或赤字的信息。如果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则政府部门有盈余；如果总支出大于总收入，则政府部门有赤字。中国和美国政府在2018年都有赤字。中国的赤字规模为44969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当年GDP的4.9%。美国的赤字规模为12859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6.3%。

第十期 短期宏观经济模型

作者：草庐棋士

我们在前几期讲了阶级斗争是如何决定总需求（支出法GDP）中居民消费和总投资的。今天，我们把总需求中的四个不同的项目加起来，讨论短期宏观经济的总体态势。在深入探讨模型本身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下何为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短期”。简单来说，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短期指的是一个经济周期之内的时间段。在短期中，一国的劳动力、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等变化不大，因此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变化不大。不过，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在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情况下仍然会经历周期性的危机、衰退、恢复和繁荣。短期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就是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而构建的。那么，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制度和社会因素是如何决定短期内市场经济宏观态势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问题。

从现象上看，决定短期宏观经济实际产出（实际GDP）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总需求是短期宏观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果说经济的周期起伏是短期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矛盾的话，那么总需求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在前几期“学点经济学”里面讲过，总需求包含居民消费、总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这可以用如下函数表示。其中模型中的字母和概念用相同的颜色表示。

$$Y = c + \omega * Y + \delta * (1 - \sigma) * Y + \sigma * (1 - \omega - \tau) * Y + gc + nx$$

其中， Y 是实际GDP，在这里也可以表示国内总收入。政府消费（ gc ）是一个由政府财政政策决定的外生变量，净出口（ nx ）是一个由世界经济形势决定的外生变量（在经济学中，所谓“外生变量”指的是各种由模型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变量）。我们把上边的等式稍作调整，可以得到总需求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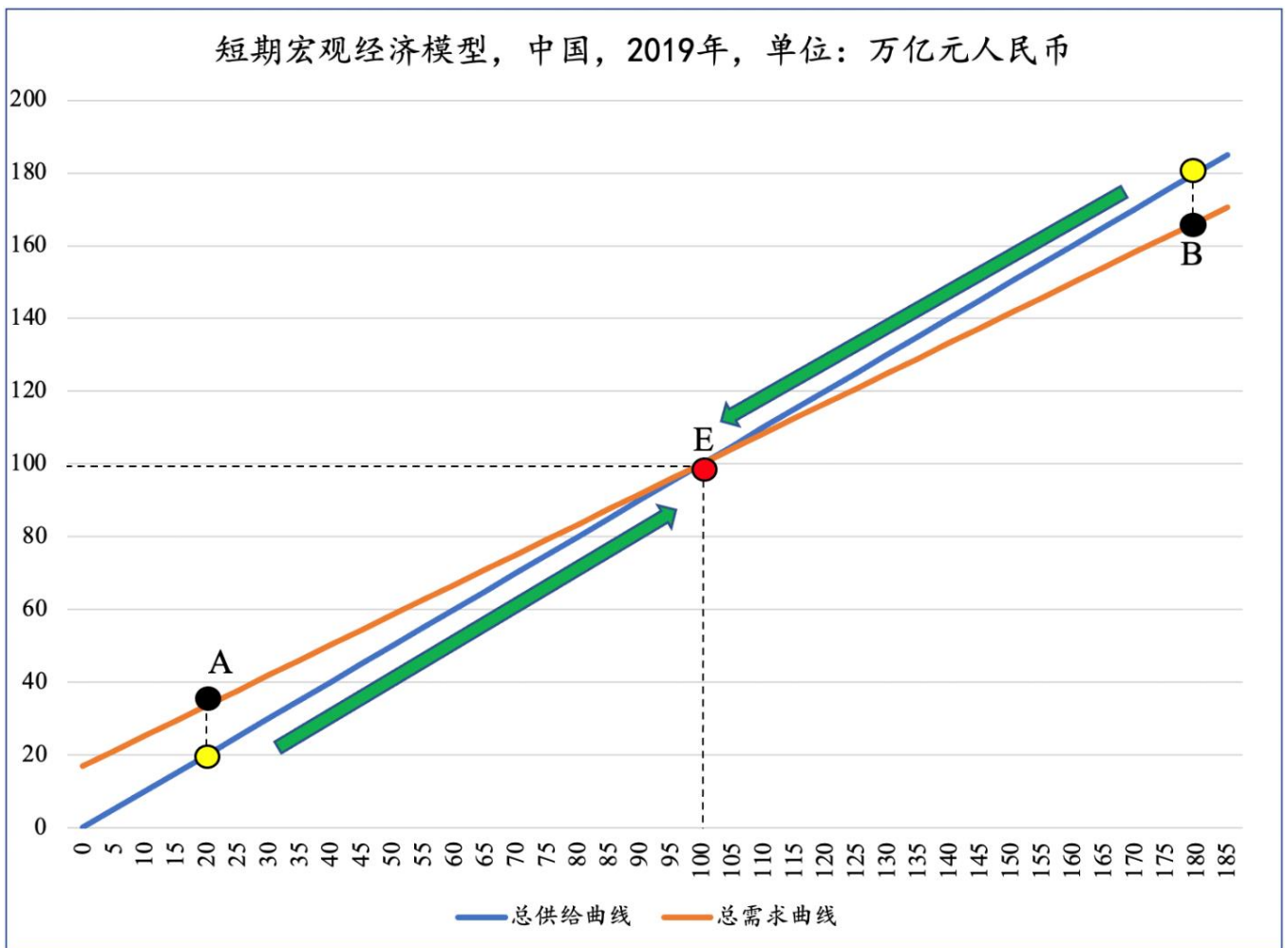
$$Y = c + gc + nx + [\omega * (1 - \sigma) + \delta * (1 - \sigma) + \sigma * (1 - \tau)] * Y$$

这就是短期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函数。其中，前三项之和为截距， Y 前面的系数为斜率。总需求函数中的自变量是 Y （收入）。短期总需求曲线的斜率始终为正，因为如果 σ （利润总额中用于净投资的比例）小于1，斜率中的三项全部为正，斜率肯定也为正。如果 σ 大于1，斜率中前两项虽负但接近零，但第三项接近1，所以仍然为正。短期总需求曲线的斜率为正的意义是，国内总收入越高，工人的工资总额和资本家的利润总额也越高，而消费和投资也会更高。

所谓总供给，就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居民和政府部门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总和。所以总供给就是总产出（Y），所以总供给函数可以用下面的等式来表达：

$$Y = Y$$

根据我们前面几期展示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用上述模型分析一下2019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居民消费与劳动收入份额大体相当，故可以假设中国的自发消费（c）为0，居民消费完全由劳动收入份额决定。2019年中国的政府消费（gc）大约为16.5万亿元，净出口（nx）约为1万亿元。根据2019年的历史数据，我们假设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 ω ）为0.45，折旧占GDP的比例（ δ ）为0.15，间接税占GDP的份额（ τ ）为0.15，资本家利润总额中用于净投资的份额（ σ ）为0.9。将上述参数带入总需求函数，可以得到如下图所示的结果。



图中的横轴代表总产出，纵轴代表总需求或总供给。蓝线是总供给曲线。由于短期内总供给

总是等于总产出 ($Y = Y$)，因此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从零点出发与横轴呈45度角的直线（在这条线上的每一点，纵轴坐标都等于横轴坐标）。橙线是总需求曲线，其与纵轴的截距是17.5 万亿元人民币 ($c + gc + nx = 0 + 16.5 + 1$)，其斜率为0.825 ($[\omega * (1-\sigma) + \delta * (1-\sigma) + \sigma * (1-\tau)] = [0.45 * (1-0.9) + 0.15 * (1-0.9) + 0.9 * (1-0.15)] = 0.825$)。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相交于E点，在这一点上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为100万亿人民币（历史数据为99.4 万亿人民币）。这就是短期宏观经济的均衡点。所谓宏观经济均衡点，就是产生总需求的各个部门（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以及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都不会主动改变自己行为方式的相对稳定状态。

当然，宏观经济并非总是处在均衡状态，比如在A点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这个时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会发现它们的存货（原材料、半成品和未卖出去的制成品等）不断减少。为了补足存货，企业会加快生产速度，并且会购买更多的原材料以备未来所需，因此总供给会上升。加速生产就要雇佣更多的工人，新上岗的工人也会获得收入，这些收入就会被用来购买消费品，进一步推高总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会进入一个相互影响、交替上升的过程，直到回到均衡点宏观经济E。如果宏观经济暂时处在B点（图中右上黑点），则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企业会发现自己囤积了比预想中要多的存货，为了不再积压更多的存货，企业就会解雇工人，减慢生产速度，总供给就会下降。工人被解雇后没有了收入，消费需求就会下降，导致总需求下降。这样，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交替下降，直到重新在E点建立均衡。

短期宏观经济均衡的表达式为：

$$\text{总供给} = Y = c + gc + nx + [\omega * (1-\sigma) + \delta * (1-\sigma) + \sigma * (1-\tau)] * Y = \text{总需求}$$

解出均衡点：

$$Y_{\text{均衡}} = (c + gc + nx) / [1 - \omega * (1-\sigma) - \delta * (1-\sigma) - \sigma * (1-\tau)]$$

我们刚才用过的2019年的中国经济的短期宏观均衡点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Y_{\text{均衡, 中国, 2019年}} = (0 + 16.5 + 1) / (1 - 0.825) = 100 \text{ (万亿元人民币)}$$

决定宏观均衡点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发需求，即表达式的分母项 ($c + gc + nx$)。宏观经济均衡点会和自发需求同步变动。比如，我们假设2020年世界经济由于新冠病毒的冲击发生重大衰退，别国对中国制造的产品需求大大减少，2020年的净出口从1万亿变为负2万亿的话（进口超过出口2万亿，其他一切条件不变），那么2020年的宏观经济均衡点就是：

$$Y_{\text{均衡, 中国, 2020年, 世界经济衰退}} = (0 + 16.5 - 2) / 0.175 \approx 83 \text{ (万亿元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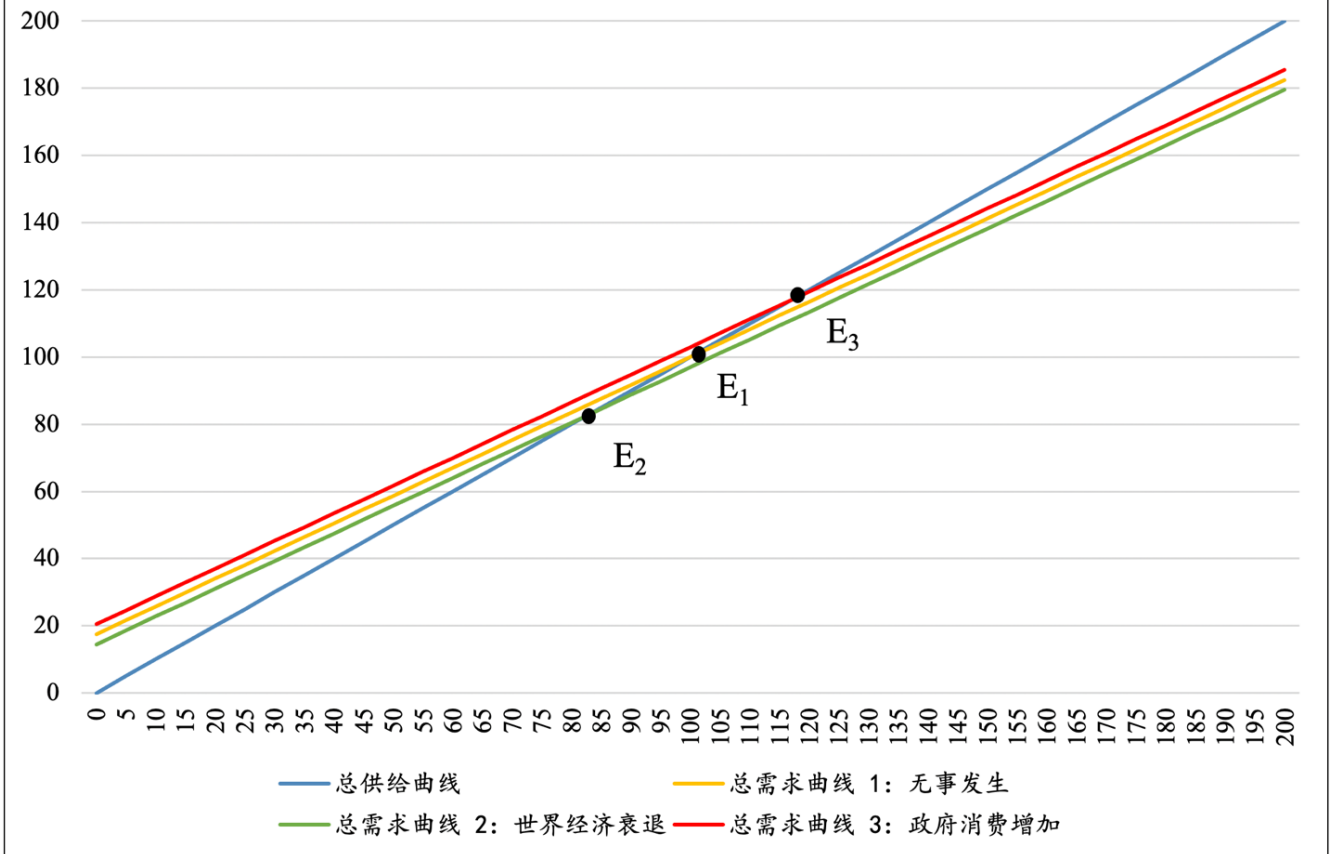
比起2019年的100万亿人民币，2020年的GDP将只有83万亿人民币，下降17%。再比如，我们假设中国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消费（gc）至19.5万亿元。那么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均衡结果将会是：

$$Y_{\text{均衡, 中国, 2020年, 政府消费扩大}} = (0 + 19.5 + 1) / 0.175 \approx 117 \text{ (万亿元人民币)}$$

与净出口和政府消费一样，居民自发消费（c）的变化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均衡GDP水平。

自发需求（居民自发消费、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也可以用模型中总需求曲线截距的变化来表示。上述三项自发需求增加，则总需求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变大，总需求曲线会向上平移，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更高的点。如果自发需求减少，则总需求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变小，总需求曲线会向下平移，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更低的点。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无事发生，则2020年的总需求曲线维持2019年的水平（下图中橙色曲线），并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₁，即100万亿元的水平，与2019年持平。在发生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总需求曲线向下平移到绿线的水平，形成较低的均衡点E₂。在中国扩大政府消费的情况下，总需求曲线上移到红线水平，形成更高的均衡点E₃。

短期宏观经济预测，中国2020年，自发需求变化，
单位：万亿元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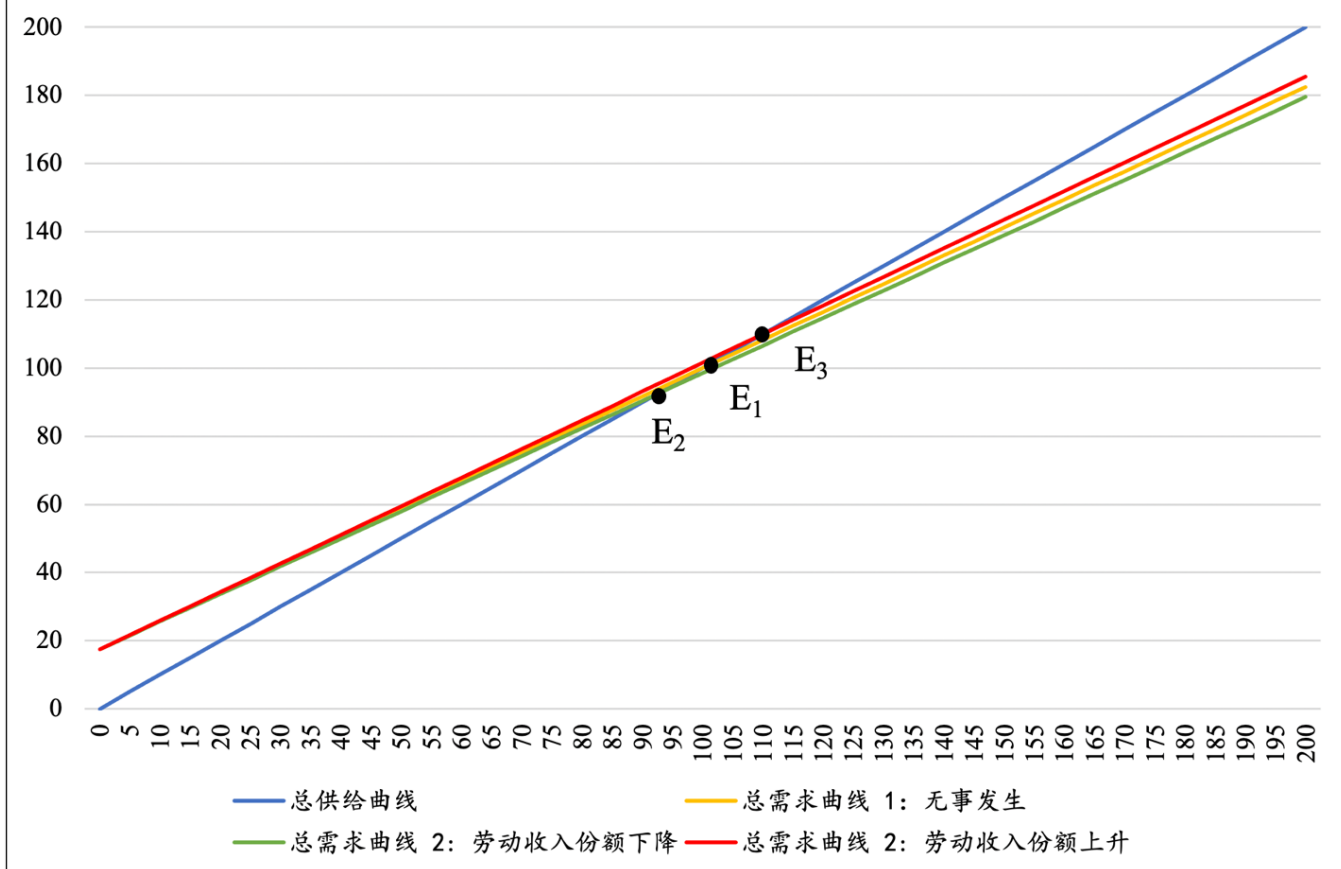


决定宏观均衡点的第二个方面是总需求乘数，即均衡表达式的分子项：

$$1 / [1 - \omega * (1 - \sigma) - \delta * (1 - \sigma) - \sigma * (1 - \tau)]$$

总需求乘数与我们前面几篇讨论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假设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 $\sigma < 1$ （资本家只把一部分利润用于净投资），那么当劳动收入份额（ ω ）下降的时候，总需求乘数就会变小，导致短期宏观经济均衡条件下的 GDP 降低。用模型图来表示的话，就是总需求曲线的斜率减小，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一个更低的点。如果 $\sigma < 1$ ，那么当劳动收入份额（ ω ）上升的时候，总需求乘数就会变大，导致短期宏观经济均衡条件下的 GDP 增加。用模型图来表示的话，就是总需求曲线的斜率增大，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一个更高的点。下图反映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和下降的情况。

短期宏观经济预测，中国2020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单位：万亿元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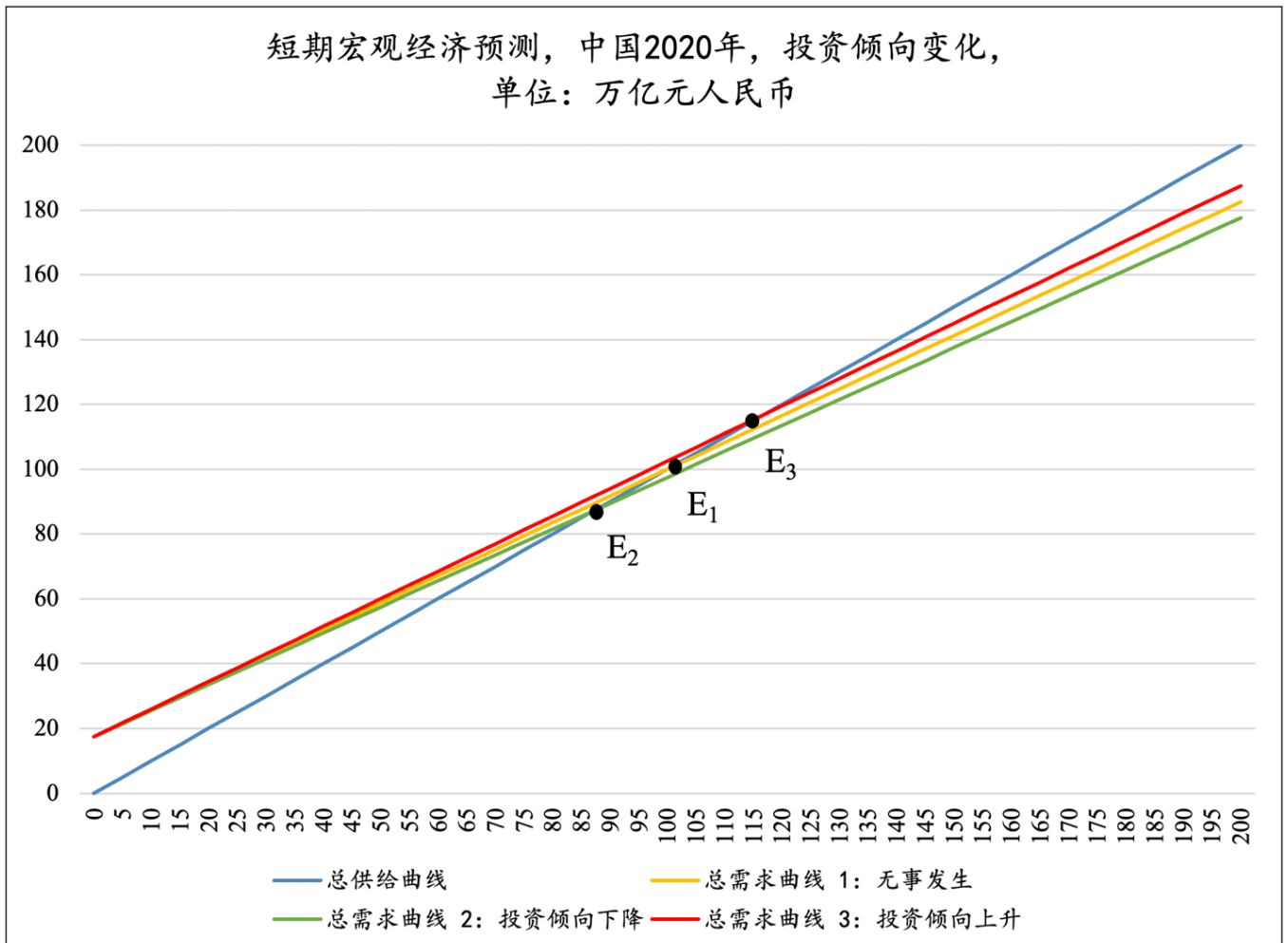
假设 $\sigma = 0.9$ 不变，如果劳动收入份额 (ω) 从 2019 年的 0.45 下降到 2020 年的 0.3 时（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遭到重大失败），那么总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减小，从原来的橙线顺时针旋转到绿线位置，并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 E₂（92 万亿元）。同样，假设 $\sigma = 0.9$ 不变，如果劳动收入份额 (ω) 从 2019 年的 0.45 上升到 2020 年的 0.6 时（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那么总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增大，从原来的橙线逆时针旋转到红线位置，并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 E₃（109 万亿元）。这种短期宏观经济均衡 GDP 水平随劳动收入份额正向变化的格局可以称为“工资主导型”经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如把一元人民币的国民收入分配给工人所造成的消费需求增加要大于把同一元人民币分配给资本家所造成的投资需求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越是倾向于工人（高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和短期均衡 GDP 也会越高。

假设 $\sigma > 1$ （资本家的净投资超过利润总额，即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向工人借钱投资），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由于资本家的投资倾向极高，把一元人民币的国民收入分配给工人所造成

的消费需求增加就会小于把同一元人民币分配给资本家所造成的投资需求增加。所以，越是倾向于资本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低劳动收入份额），越能提高该国的总需求和短期均衡 GDP。这种情况可以称为“利润主导型”经济。

当 $\sigma = 1$ 时，一元人民币的国民收入分配给工人所造成的消费需求增加等于把同一元人民币分配给资本家所造成的投资需求增加。收入分配格局对短期总需求没有影响。

资本家的投资倾向（ σ ）不仅决定了收入分配变化对短期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其本身也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均衡。比如，当中国的 σ 从 0.9 下降到 0.8 时，总需求曲线的斜率会下降，总需求乘数也会下降，最终的均衡点也会从 100 万亿下降到 86 万亿。在下图中，总需求曲线会顺时针从橙线位置旋转到绿线位置，均衡点也从 E_1 变为 E_2 。当中国的 σ 从 0.9 上升为 1 时，总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和总需求乘数会上升，均衡点也从 100 万亿上升到 117 万亿。在下图中，总需求曲线会逆时针从橙线位置旋转到红位置，并形成新的均衡点 E_3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如果资本家的投资倾向增加，那么同一元利润就能够转化出更大的投资需求。



第十一期 价格水平

作者：远航一号

在第五期“学点经济学”中，我们介绍了名义GDP（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实际GDP（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平均价格水平之积。

如果用PY代表名义GDP，P代表平均价格水平，Y代表实际GDP，那么，名义GDP与实际GDP、平均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PY = P * Y$$

在第十期“学点经济学”中，我们介绍了实际GDP在短期是如何由总需求的变化来决定的。以后，我们还会介绍长期经济增长的各种决定因素。在这一期“学点经济学”中，我们初步介绍一下现代市场经济中平均价格水平的决定过程。

我们用希腊字母 ω （欧米伽）来代表劳动收入份额，那么， $\omega * PY$ 就等于一个国家在一年内的名义劳动收入总额。这个名义劳动收入总额应当等于劳动者的年平均收入（可以简称为“平均工资”）与就业人数之积：

$$\omega * PY = w * N$$

上式中，英文小写字母“w”代表“平均工资”，英文大写字母N代表就业人数。经过简单代数运算后，可以得出：

$$P = (1/\omega) * [w / (Y/N)]$$

其中，Y/N是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每名劳动者生产的实际GDP，也就是平均劳动生产率。用平均工资除以平均劳动生产率，就是资本家为每单位产品所支付的工资成本。我们称“w / (Y/N)”为“单位劳动成本”。“1/ω”是资本家在单位劳动成本基础上的加价率；这个加价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成反比。上面的公式表明，每一单位产品的平均价格水平“P”，一方面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家的加价率；资本家所支付的折旧、税收以及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都来自于“P”超出单位劳动成本的加价部分。

如果用英文小写字母“y”来代表劳动生产率，那么，上面的公式就可以改写为：

$$P = (1/\omega) * (w/y)$$

如果采用增长率的形式，这一公式还可以表达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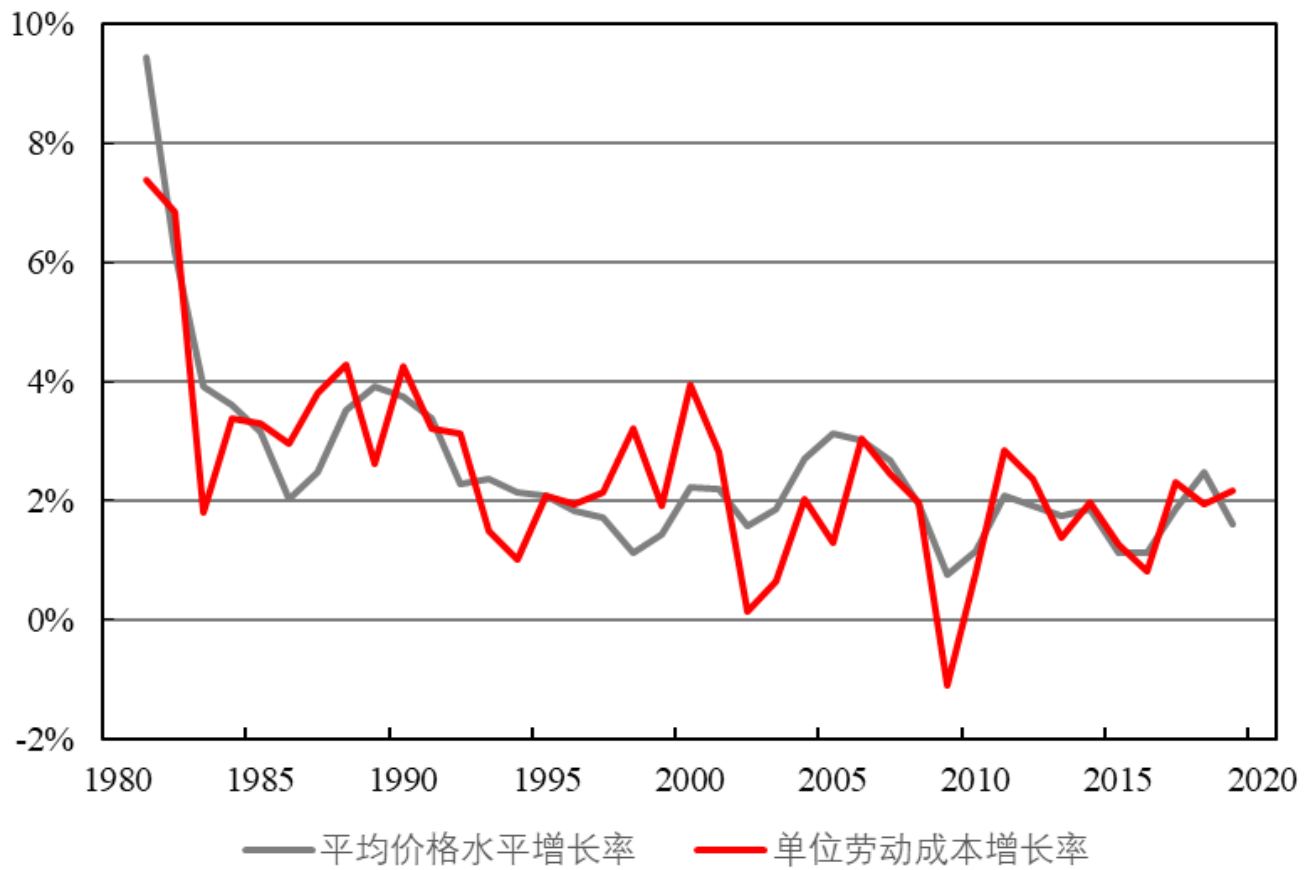
$$\Delta P/P \approx \Delta (w/y)/(w/y) - \Delta \omega/\omega$$

就是说，一个国家平均价格水平的增长率（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减去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率。其他一切条件相等，平均价格水平的增长率随着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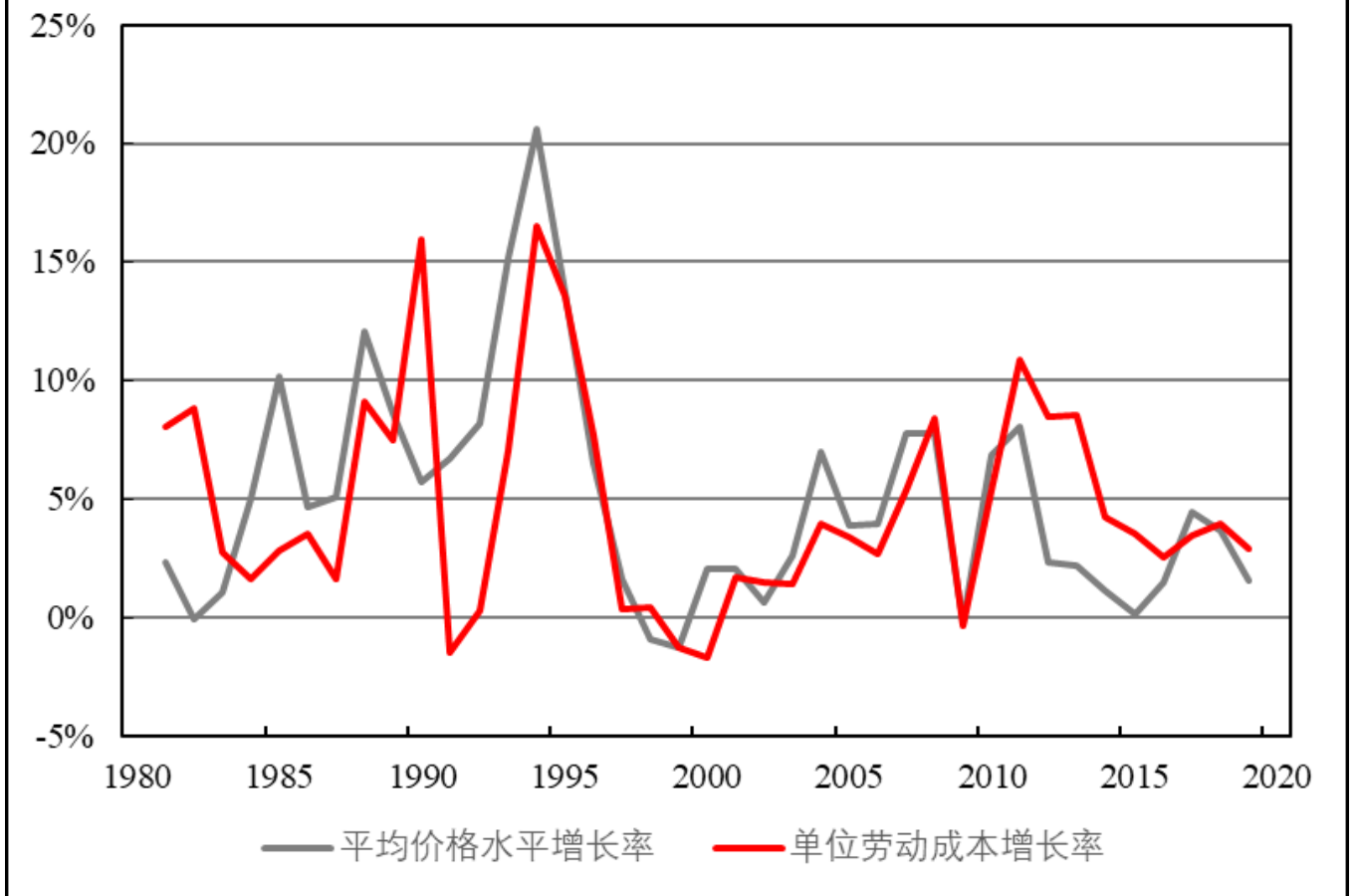
下面两个图分别介绍了1981-2019年期间美国和中国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和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平均价格水平用“GDP平减指数”来代表。

图中，灰线代表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红线代表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如果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超过了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就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如果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低于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就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上升。

价格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
(美国经济, 1981-2019年)



价格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
(中国经济, 1981-2019年)



美国经济除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较高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价格水平的增长率一般在2%上下波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一度出现改善；到了本世纪初，又连续多年恶化；2010年以来，则保持相对稳定。在1980-2019年的整个时期，美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年平均增长2.5%，单位劳动成本年平均增长2.4%，两者基本相当。这个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每隔30年翻一番。

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发生过两次通货膨胀高峰，分别是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前半期。1994年，中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一度达到21%。九十年代后半期，由于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原国有企业工人大批下岗，人民群众购买力不足，导致部分行业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中国经济一度发生了平均价格水平下降的情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此外，在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以及2015年，中国经济都曾经出现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下跌到接近零的

状况。

在1984-2007年长达24年的时间中，除了个别年份以外，中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始终高于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说明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处于下降的状况。不过，在2011-2015年期间，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显著超过了平均价格水平的增长率，说明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个时期有所恢复，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恢复和增长。

就1980-2019年的整个时期来说，中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年平均增长4.9%，单位劳动成本年平均增长4.7%；这个增长速度，相当于中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每隔15年翻一番。

第十二期 阶级斗争和工资

作者：远航一号

上一期“学点经济学”介绍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平均价格水平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平均价格水平的增长率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是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我们会在以后再探讨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怎样决定的。

那么，在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平均工资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工资的多少取决于雇主和雇员、老板和打工者，或者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可以决定雇佣谁不雇佣谁；只要资本主义的或者特色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不改变，资本家在劳资谈判中一般就占有优势地位。但是，工人一方，也并非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和条件。哪怕在政治上最不利的条件下，工人一方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有时也能争得较为有利的工资和劳动条件。

在这样的劳资谈判中，工人是一方，构成一个阶级；资本家是另外一方，构成另外一个阶级。所以，千千万万个工人和资本家许多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两大阶级斗争的过程。这一斗争的结果，不仅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和特色市场经济的兴衰，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心是否安定、社会能否长治久安。

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概括地说明这一阶级斗争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再用现实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数据来验证模型中的若干基本结论。

阶级斗争（工资谈判）模型

工人

在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现实选择，就是“老老实实”干活，干一天“公平”的工作，拿一天不那么“公平”的工资，为了养家糊口，不给老板惹麻烦。

假设如果工人不斗争，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可以用英文小写字母“w”来代表。

但是，总有一些较为敏锐的工人，从长时期的生活和劳动经验中知道，如果不斗争，就会被资本家欺负，甚至连“w”都得不到，而如果斗争，则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争取到显著超过一

般工资水平的利益。

设工人通过斗争所期望得到的工资为“理想工资”（ $w_{理想}$ ）。这个“理想工资”并不一定代表真正合理的工资水平，更不是相当于工人全部劳动成果的报酬，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工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所了解的劳资双方的一般力量对比，并结合资本家的盈利状况，认为自己能够争取到的、有一定现实可能性的最高工资水平。工人在评估这一可能的最高工资水平时，要考虑到当时社会平均的物价水平和平均的劳动生产率。

$$w_{理想}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理想工资”必然大于普通工资。

如果工人选择斗争，设工人斗争成功的概率为“ s ”，“ s ”是一个数值在零与一之间的正数；所以，工人斗争失败的概率就是“ $1-s$ ”。如果工人斗争成功，工人得到“理想工资”。如果工人斗争失败，工人将被开除。

如果工人被开除，一般也不会完全没有收入。这时又有两种可能性。工人可以设法找到新的工作，并得到普通工资“ w ”；或者工人会失业。为简便起见，假设工人失业的概率与全社会平均的失业率相等。设全社会平均的失业率为“ μ ”（希腊字母，读“缪”）；工人失业的概率是“ μ ”，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的概率就是“ $1-\mu$ ”。

如果工人被开除后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那么，如果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一般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如果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在特色市场经济，大量工人属于农民工，这时可以选择回家务农。无论是拿到失业救济金还是回家务农，工人都会拿到失业情形下的保底收入：“ $w_{保底}$ ”：

$$w_{保底}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保底收入”必须低于普通工资。

这样，工人如果选择斗争，那么斗争的预期收入可以用如下等式来表达：

$$工人斗争预期收入 = s * w_{理想} + (1-s) * \mu * w_{保底} + (1-s) * (1-\mu) * w$$

上述等式表明，工人斗争预期收入由如下部分组成：斗争成功的概率乘以“理想工资”，斗争失败的概率乘以失业率再乘以“保底收入”，斗争失败的概率乘以找到工作的概率再乘以普通工资。

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工人在什么条件下会做出斗争的决定。

显然，工人要决定斗争，其前提是，斗争的预期收入（包括斗争成功情景和斗争失败情景的

按概率加权平均的收入) 必须要大于“老老实实”干活所得到的普通工资。

所以, 如果下列不等式得到满足, 工人将选择斗争而不是“老老实实”干活:

$$s * w_{理想} + (1-s) * \mu * w_{保底} + (1-s) * (1-\mu) * w > w$$

经调整后, 可以得出:

$$s * (w_{理想} - \mu * w_{保底}) + \mu * w_{保底} > [1 - (1-s) * (1-\mu)] * w$$

从上面的不等式, 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推论:

(1) 如果 $s = 0$, 即工人斗争永远失败, 则工人将永远选择不斗争。

(2) 如果 $s > 0$ 且 $\mu = 0$, 即失业率为零, 工人将永远选择斗争。就是说,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 没有了失业的威胁, 工人将不再害怕斗争失败, 因而必然永远选择斗争。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一般情况下, 资本主义经济都必须保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失业队伍; 同样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从打破工人“铁饭碗”开始的。

(3) 如果 $s > 0$ 且 $\mu > 0$ 但 $w = w_{保底}$, 就是说, 工人的“保底收入”等于普通工资, 工人将永远选择斗争。这是因为, 如果“保底收入”与普通工资一样, 工人即使斗争失败、丢掉工作, 生活水平也不会下降, 而如果选择斗争, 反而有一定的可能得到“理想工资”。工人“保底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争取到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那么工人平均的“保底收入”就会比较接近在职时的工资水平。所以,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 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总是恶毒攻击社会福利制度。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走资派”总是用“大锅饭、养懒汉”来污蔑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

资本家

说完了工人, 咱们来说说资本家。资本家愿意付给工人一个什么样的工资水平呢?

许多有进步倾向的读者一定会说, 资本家吗, 贪得无厌, 一定是希望给工人付的工资越低越好。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 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资本家的总的目的当然是利润最大化。具体到劳动力市场来说, 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目的, 是为了让工人从事生产(或者各种非生产性的经营活动)。在付出一定工资以后, 资本家的首要利益在于在正常的、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中让工人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使用。

但是工人的斗争，无论采取怠工、罢工或出于义愤而破坏资本家财产、伤害资本家本人及家属等形式，都会造成资本主义正常生产过程的间断，减少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可以得到的利润。

虽然资本家常常可以求助于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一方面，即使资产阶级国家出面镇压工人，往往耗时耗力，并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家的损失；另一方面，在许多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法治并不“完善”，要让资产阶级国家下属的警察、法院、检察院等机构为资本家效劳，仅仅凭着资本家“纳税人”的资格往往还不够用。在这些地方，权利被“侵犯”的资本家往往还要自掏腰包，或者行贿腐败，或者为地方资产阶级政府机关提供“赞助”；即便如此，如果资本家的“上贡”不够标准，地方资产阶级机关的镇压也未必“到位”。

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家给工人支付的工资，在保证资本家盈利的前提下，往往还要对工人有一定的“吸引力”，最低限度，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略大于一般条件下工人选择斗争的预期收入：

$$w > s * w_{理想} + (1-s) * \mu * w_{保底} + (1-s) * (1-\mu) * w$$

经调整后，可以得出：

$$w > [s * (w_{理想} - \mu * w_{保底}) + \mu * w_{保底}] / [1 - (1-s) * (1-\mu)]$$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往往还会在上述最低限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保险系数”。我们用希腊字母“ θ ”（西塔）来表示这个“保险系数”。一般来说， $\theta > 0$ 。

下面的等式概括了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斗争决定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我们称之为“阶级斗争（工资谈判）曲线”：

$$w = [s * (w_{理想} - \mu * w_{保底}) + \mu * w_{保底}] / [1 - (1-s) * (1-\mu)] + \theta$$

在等式右侧，如果“ θ ”等于零，那么工人“老老实实”干活得到的普通工资就正好等于斗争预期收入。如果资本家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数量大小不等的“ θ ”，就更有把握避免工人斗争。

这个“ θ ”，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工资中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也受到一个国家阶级斗争总形势的影响。比如，在一个进步政府执政时期，“ θ ”就可能大一些；在一个反动政府猖獗时期，“ θ ”就可能小一些。此外，在某些国家的某些行业，为了支撑“996”式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资本家也可能支付较高的“ θ ”以吸引身体素质比较好、学历比较高的工人，并且用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来避免工人在巨大的非人劳动压力下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迅速崩溃。

对“阶级斗争（工资谈判）曲线”做进一步推导，可以得出：

$$w = s * w_{理想} / [s + \mu * (1-s)] + w_{保底} * (1-s) / (1 - s + s/\mu) + \theta$$

对上式做细致分析后，可以发现，工资水平“w”与失业率“μ”成反比关系。比如，如果μ = 1，即失业率为100%，则工人的预期平均工资等于：

$$s * w_{理想} + w_{保底} * (1-s) + \theta$$

也就是，如果工人斗争成功，得到“理想工资”，斗争失败，则只能得到“保底收入”，另外再加上资本家愿意支付的“保险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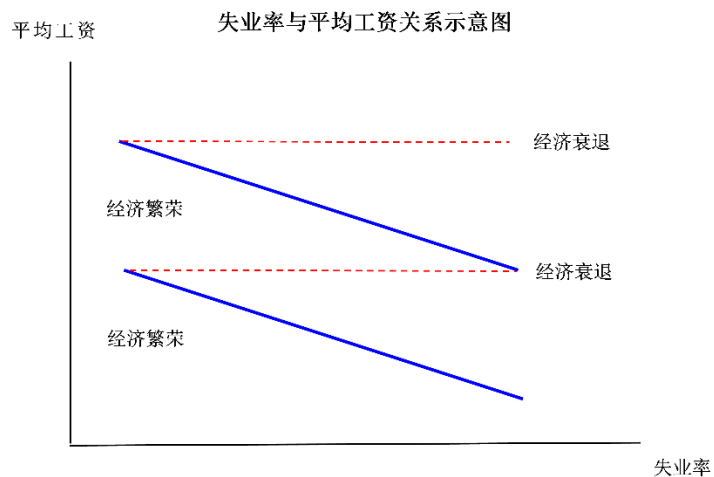
如果 μ = 0，即失业率为零，则工人的预期平均工资等于：

$$w_{理想} + \the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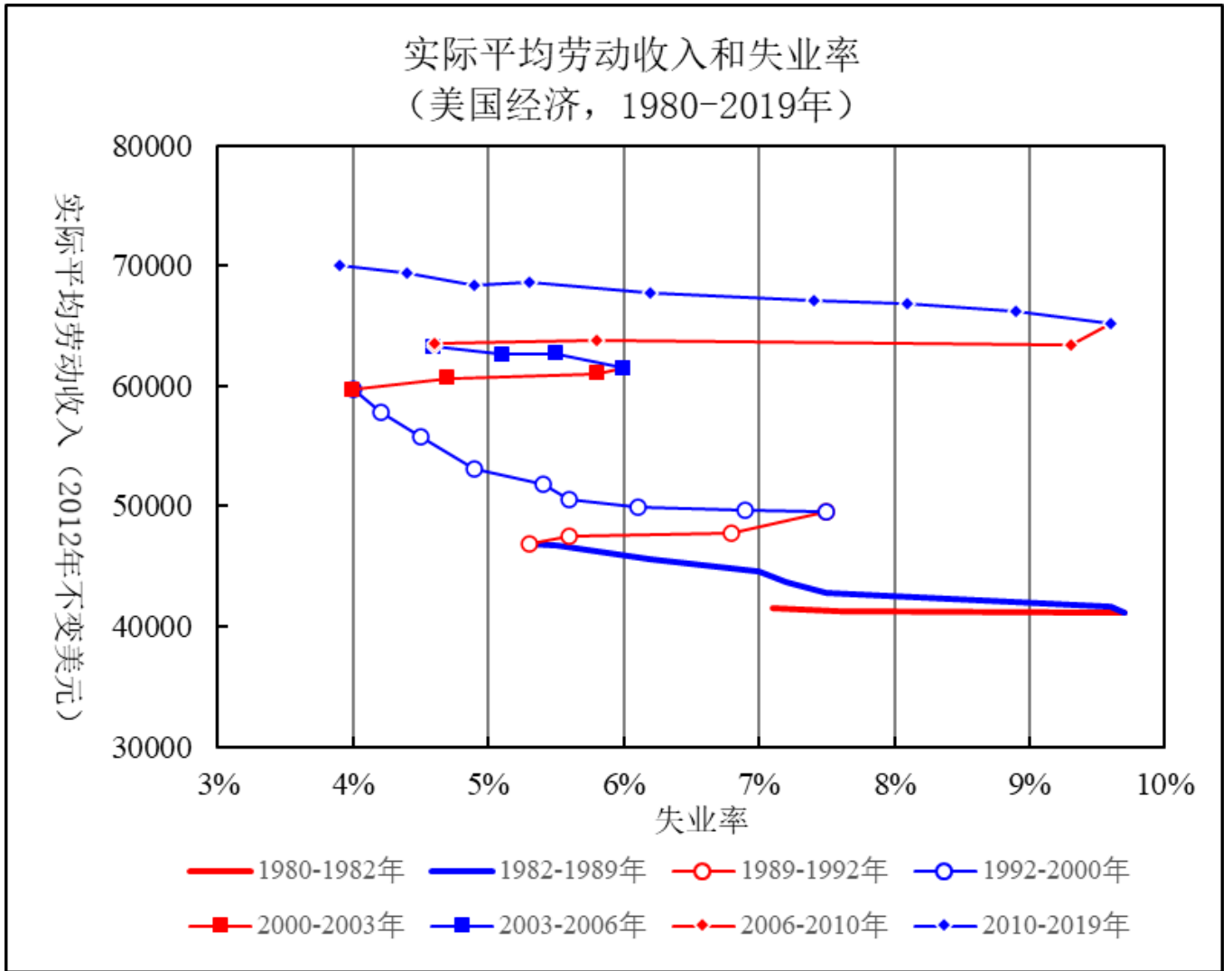
就是说，当失业率为零时，工人的平均工资将恒等于“理想工资”加“保险系数”。失业率为零时的预期平均工资显然高于失业率为100%时的预期平均工资。

以上的“阶级斗争（工资谈判）曲线”表明，在一个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给定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形势，给定当时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在短期，阶级力量对比主要受失业率（即“产业后备军”规模）的影响。失业率越高，工人斗争力量越弱，工资水平越低；失业率越低，工人斗争力量越强，工资水平越高。

这可以用下面的“失业率和平均工资关系示意图”来说明。图中，蓝色实线代表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期。这时，失业率逐步下降，工人斗争力量逐步增强，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直至失业率下降到最低水平时，经济繁荣达到周期性顶点。这时，发生经济危机，失业率沿着代表经济衰退的红色虚线急剧上升，工人斗争力量下降，与劳动生产率上升相互抵消的结果，平均工资陷于停滞。



这个示意图，可以基本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失业率与工人平均工资之间的关系。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中历年的失业率与实际平均劳动收入之间的组合关系。这里，“实际平均劳动收入”就是在扣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平均劳动收入，用2012年不变美元来计算，可以反映劳动者收入实际购买力的变化。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单位2012年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今天的美元大约高出10%。



如图，在1980-1982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从7.1%上升到9.7%，同一时期，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从41508美元略微下降到41168美元。1982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步恢复，随着失业率下降，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步上升；至1989年，失业率下降到5.3%，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上升到46928美元；与1982年相比，在七年时间中增加了5760美元。

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到6.8%，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虽然增加到47766美元，但与1989年相比，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此后数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至1995年，失业率回落到5.6%，那一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是50567美元。与1989年相比，六年时间仅增加了3639美元。

1995年以后，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等原因，一度出现经济繁荣。至2000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下降到4%，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上升到59715美元；与1995年相比，在五年时

间中就增加了9148美元。

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美国工人工资再度陷入停滞。至2003年，失业率上升到6%，实际平均劳动收入缓慢增长至61473美元。2006年，美国经济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中达到本世纪初周期扩张的顶点，失业率下降到4.6%，实际平均劳动收入达到63238美元。

2009年，美国经济陷入到那时为止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暴增至9.3%，实际平均劳动收入63393美元，与2006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

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缓慢但是逐步复苏。在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之前的2019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3.7%，实际平均劳动收入增加到71184美元；与上一次危机期间的2009年相比，实际平均劳动收入在十年期间增加了7791美元。

总的来说，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仍然在起作用。一般来说，工人斗争的力量与产业后备军的规模成反比；当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工人斗争条件比较有利，往往争取到比较多的工资上涨；反之，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工人斗争比较困难，工资往往陷于停滞甚至下降。

在特色市场经济中，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类似。不过，由于中国经济中的产业后备军主要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之官方的城镇失业率统计很不准确，目前还无法对特色市场经济中产业后备军与工资水平的关系做出可靠的统计分析。

第十三期 市场经济中的货币

作者：远航一号

第十一期“学点经济学”介绍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平均价格水平（P）。所谓“平均价格水平”，就是告诉我们，平均来说，如果要购买一单位的社会产品（一般用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来代表），需要多少单位的货币。

如果对平均价格水平取倒数（1/P），就可以告诉我们，一单位货币平均可以购买多少单位的社会产品，或者说，可以告诉我们一单位货币的平均购买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平均价格水平都是趋于上升的。所以，一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每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趋于下降的。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人民币和美元自1980年以来各自购买力下降的情况。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后，今天一单位人民币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六分之一；今天一单位美元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五分之二。

在市场社会中的人们每天都要与货币打交道。货币是人们似乎最熟悉却又往往说不清楚的经济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货币可以转化为货币资本，似乎具备了价值增殖的特质，因而就更增加了很多神秘。在今日中国的许多进步青年和左翼积极分子中，对于货币和金融问题也流行着许多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妨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

现代资产阶级的货币银行学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具体来说，货币有三种职能：（1）交换媒介，货币是人们用来买卖商品和资产的媒介；（2）价值贮藏，货币是人们用以保存购买力的手段；（3）核算单位，货币是人们用来计算商品和资产价格的手段。

马克思认为，货币有五种职能：（1）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3）贮藏手段；（4）支付手段；（5）世界货币。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大致相当于现代资产阶级货币银行学所说的货币作为“核算单位”的职能；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大致相当于现代资产阶级货币银行学所说的“交换媒介”的职能；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大致相当于现代资产阶级货币银行学所说的“价值贮藏”的职能。

除了以上几种职能以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马克思所说的“支付手段”指的并不是货币可以作为购买商品的媒介，而是指的在商品社会中人们通过货币来完成某种带有强制性的（通常是由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用货币纳税，或者偿还债务、支付债

务契约所规定的利息等。马克思提出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特殊职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代资产阶级货币银行学所关注的“流动性”的概念。了解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特殊职能对于我们深入和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金融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

至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货币”，则是指的货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世界货币”主要表现为世界市场上通行的国际储备货币。

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哪些资产可以承担货币的上述职能呢？这首先包括人们最熟悉的现金（一般包括作为主币的纸币和作为辅币的硬币）。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现金以外，往往还有大量的其他资产在不同程度上可以承担交换媒介、贮藏手段和核算单位等职能。依据各类资产执行货币职能的难易程度，一般将那些可以最方便地用来执行货币职能的资产称之为“狭义货币”（即M1，在中国也叫“货币”）；将那些可以比较方便地用来执行货币职能的资产与“狭义货币”相加，称之为“广义货币”（即M2，在中国也叫“货币和准货币”）。每个国家根据各自的经济实践以及金融制度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的货币定义往往又有很大差别，相互之间不完全可比。

美国的“狭义货币”（M1）主要包括流通中现金和银行部门中的支票存款。美国的“广义货币”（M2）包括M1和银行部门中的储蓄存款、小额定期存款以及类似于支票存款的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余额。2019年，美国的流通中现金约有1.76万亿美元、狭义货币3.98万亿美元、广义货币15.32万亿美元。在广义货币中，流通中现金约占11%，各类存款约占89%。

中国的“货币”（M1）主要包括流通中现金、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中国的“准货币”（即M2和M1之差）主要包括企业定期存款、城镇居民存款和外币存款。2019年，中国的流通中现金约有7.7万亿元，货币供应量57.6万亿元，准货币供应量141万亿元。货币供应量中，流通中现金约占13%，各类存款约占87%。

从所包含资产的性质、占经济活动的规模以及与流通中现金的关系来看，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广义货币”。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广义货币”中的储蓄存款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活期存款。

从以上列举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绝大部分是由各类银行存款组成的，而银行存款会被银行转化为贷款或投资于债券、股票。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构成了借贷资本的一部分。

在以前的“学点经济学”中已经说过，名义GDP可以表达为价格水平和实际GDP之积（ $P*Y$ ）。如果用英文小写字母“ k ”来代表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那么价格水平、实际GDP与货币供应量的比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达：

$$M = k * P * Y$$

在上式中，“ M ”是货币供应量，“ k ”是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之比，也可以用来表示为了完成每一元GDP的经济活动需要多少元的货币；“ k ”的倒数则可以告诉我们每一元货币可以帮助完成多少元GDP的经济活动，所以也叫做“货币流通速度”。

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占GDP比例历年变化的情况。其中，美国的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货币”（ $M2$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采用“货币”（ $M1$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大约占美国GDP的60%左右；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例下降到50%左右（隐含货币流通速度约为2）。这大概反映了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相对繁荣，因而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经济陷于停滞，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年来，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70%以上。

在1990年以前，中国没有按照现代货币统计标准计算的货币供应量数据。1995-2003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例从约40%增加到约60%。根据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这大约主要反映了随着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一直在GDP的60%上下波动。

从上面的货币与名义GDP关系的公式中，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如果货币供应量（ M ）增加，价格水平（ P ）也就会增加；货币增加多少比例，价格水平就会上涨多少比例。在经济学说史上，对于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关系持这样一种认识的观点，叫做“货币数量论”。在普通群众与许多左翼积极分子中，对于货币问题的认识，也往往停留在“货币数量论”。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观察到物价上涨，往往就埋怨银行发票子发多了。在许多自以为是的业余经济写手的网上文章中，动辄就有诸如“美联储印钞”、“央行放水”一类耸人听闻的标题，极度夸大货币供应量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脱离阶级分析、脱离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认识 and 理解的所谓“金融战”、“货币战”之类的炒作，更将许多人对于货币和金融的认识引入歧途。

实际上，简单的“货币数量论”比较符合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的经验（也不完全正确），或者在一定意义上符合虽然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但尚未开始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某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比如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但是一般来说，不能够正确说明货币在现代资本

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从上面的货币公式中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M）增加或减少，要直接传导为价格水平（P）的增加和减少，还需要两个假设，那就是：（一）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不会影响到实际GDP（Y）的增减；（二）货币流动速度（k的倒数）要保持不变。否则，比如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但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表现为k增加），那么名义GDP完全可以不变；或者即使名义GDP增加了，但如果名义GDP的增加主要被实际GDP的增加所吸收，那么价格水平仍然可以保持不变或变化不大。

作为当前世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斗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反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问题的观点就是经典的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名言“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表达的就是一切通货膨胀都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而引起的货币数量论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历史反动浪潮中，根据弗里德曼货币理论制定的货币紧缩方案是拉丁美洲各国所经历的“结构调整”、东欧和前苏联各国所经历的“休克疗法”的核心组成部分，给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灾难。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批判过货币数量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b）小节中，马克思指出：“在十七世纪，特别是在十八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充当了流通手段。”“**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 假设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流通货币量之所以增减，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总额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增减。**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上涨，或在另一种情况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而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增加或减少。”“**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 ...**”

在上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很明确地主张，商品价格总额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是反过来）；如果商品量已定，那就是平均的价格水平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说，名义GDP（通过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决定整个经济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而不是货币量的多少决定名义GDP的多少。马克思关于货币与价格水平的观点为国际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经济学家所继承。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格总额决定流通中货币量的观点是从贵金属（金、银）充当货币商品的时代的货币流通规律中推导出来的，但其基本观点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仍然适用。在现代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名义GDP取决于实际GDP和价格水平。其中，实际GDP在短期取决于总需求，阶级斗争是影响总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价格水平的变化率主要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率；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率则取决于工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工资的增长速度则主要取决于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实际GDP、价格水平以后，再通过货币流通速度的传导，进而决定为了完成一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货币量。

讲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会提出一个疑问：难道经济中的货币量不是由“政府”（更准确点说，是中央银行）来决定的吗？难道不是“央行”要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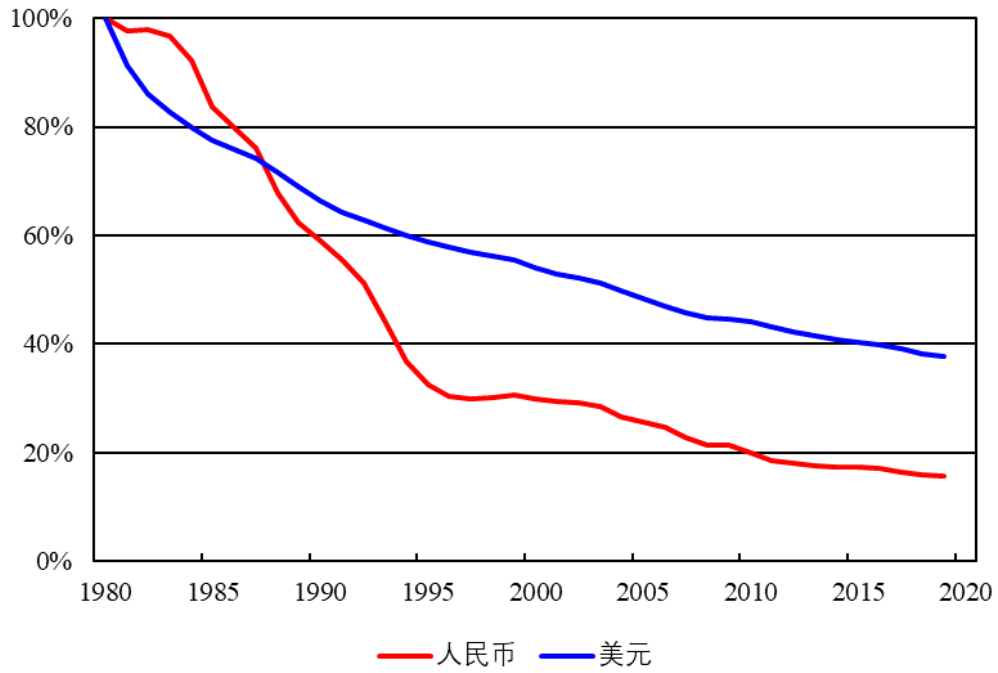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要请各位读者注意，在现代货币中，“钞票”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约仅占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现代货币不是“钞票”，而是银行存款。所以认为由于“央行”印钞票，就可以决定货币多少的想法，是极大的误解。

那么，如果“央行”并不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的多少，那么“央行”起什么作用呢？在现代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真实作用不是决定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多少，而是参与借贷资本的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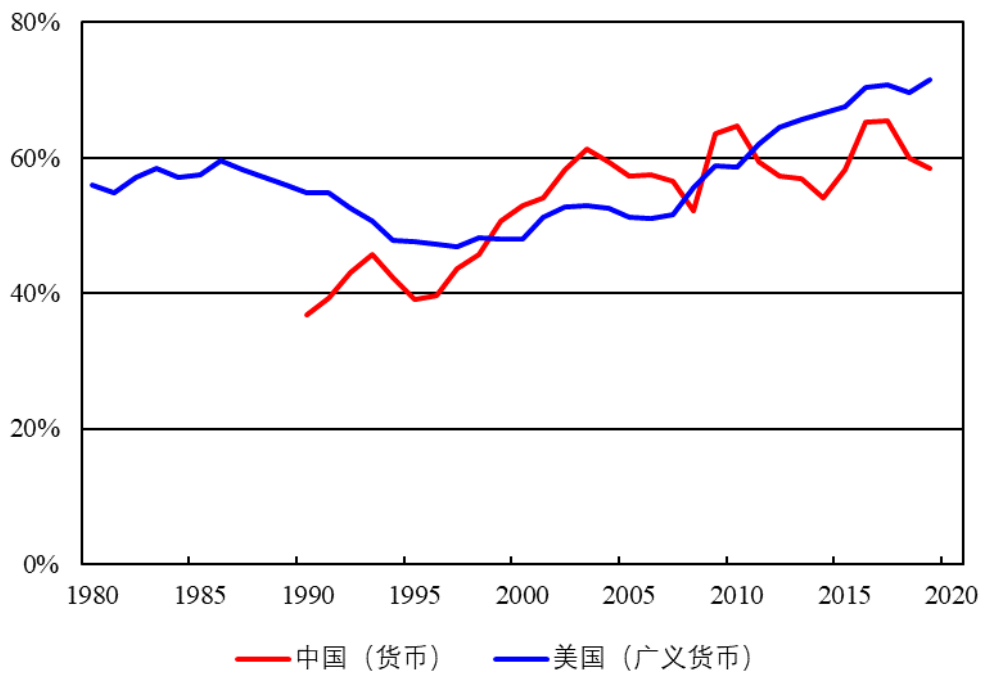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绝大部分属于借贷资本的一部分。借贷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金融市场上的利率，而利率的高低可以影响到资本家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总需求。

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和利率的决定，我们在下一期“学点经济学”中再做介绍。

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
(相当于1980年各自购买力%, 1980-2019年)



中国和美国的货币供应量
(占GDP%, 1980-2019年)



第十四期 银行和借贷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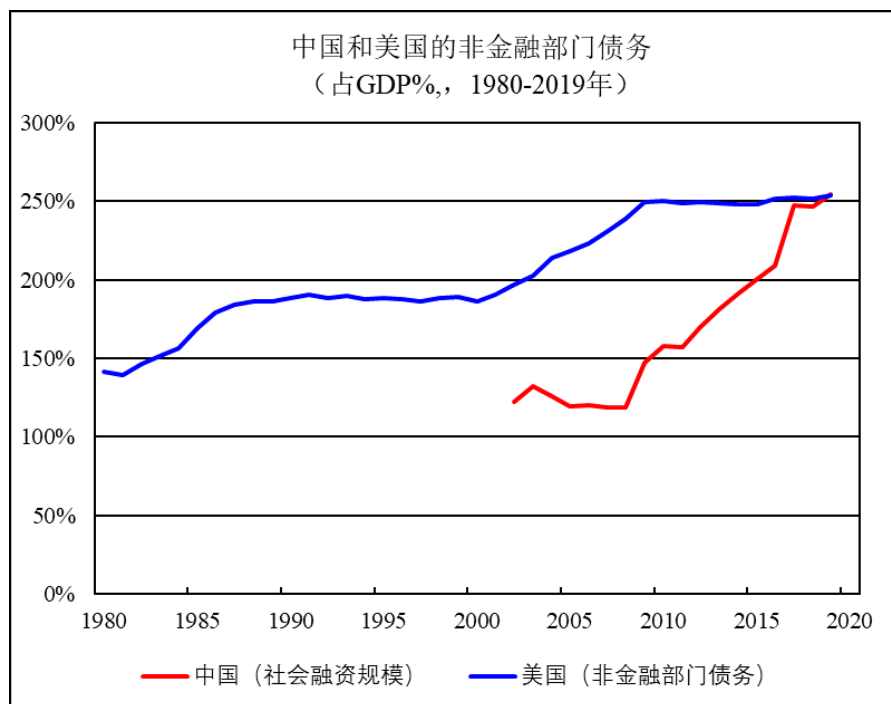
作者：远航一号

所谓“借贷资本”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以收回本金、利息等为条件，暂时让渡货币使用权来谋利的资本。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指的就是将社会上闲置的大量货币资本以借贷资本的方式转化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等用途的过程。提供借贷资本的一方也是债权人，使用借贷资本的一方也是债务人；通过出借借贷资本，债权人因而获得对债务人未来一个时期一部分收入乃至资产的索取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影响。认为金融活动对资本主义积累仅有有限的影响还是有决定性的、压倒一切的影响，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与各种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经济胡说之间的一个区别。

在现代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借贷资本总量的规模有多大？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美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与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美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包括了住户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2000年以前，美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不到GDP的200%。从2000年至2009年，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但是，在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以前，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一直稳定在占GDP250%左右的水平。

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在概念上接近于美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企业和居民发放的各类贷款、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也包括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和尚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商业信用。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水平比较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约占GDP的120%。自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债务水平大幅度上升，至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上升到约占GDP的250%。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中国经济的整体相对债务规模已经与美国相当。



2019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约251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约152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所以，银行贷款是中国经济中借贷资本供给的主要方式。下面的表用简化的方式说明了2019年中国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平衡情况：

中国非货币当局存款性公司（银行部门）资产负债平衡表，2019年

单位：万亿元

资产（资金使用）		负债（资金来源）	
企业和其他单位贷款	97.3 万亿元	单位活期和定期存款	86.2 万亿元
住户贷款	55.3 万亿元	个人活期和定期存款	81.9 万亿元
		其他存款	24.2 万亿元
政府债券	30.7 万亿元	债券发行	28.0 万亿元
其他资产	82.3 万亿元	其他负债	52.5 万亿元
在中央银行存款	23.1 万亿元	对中央银行负债	9.9 万亿元
库存现金	0.6 万亿元	实收资本	6.5 万亿元
总资产	289.3 万亿元	总负债	289.3 万亿元

这个表叫“非货币当局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平衡表”。所谓“非货币当局存款性公司”，就是除了中央银行以外的从事存贷款业务的公司企业，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银行部门。具体来说，中国的银行部门包括四大国有控股银行、若干已经私有化的“股份制银行”、由地方政府主办的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外资银行以及各种政策性银行。

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侧，银行实收资本（也就是银行自有资本或净资产）6.5万亿元，占银行部门资金总来源的2.2%。这说明银行属于高度“杠杆化”的企业，也就是总债务与净资产的比值非常高。中国银行部门的平均“杠杆率”（资金总来源与净资产之比）达到44。换句话说，银行主要是借别人的钱而不是靠银行投资者自己拿出资本来做生意。

银行部门的各项资金来源中，最大的一类是各类存款，约192万亿元，占银行部门资金总来源的66%。现代银行部门除了办理存款业务以外，还通过债券发行、金融衍生工具、向国外借款等方式融资，银行相互之间也会有拆借。这些非传统融资方式，融资成本一般比传统的存款方式要高，也更加不稳定。债券发行与其他负债相加，共83.5万亿元，占资金总来源的29%。

在负债一侧，还有一项，是银行部门“对中央银行负债”，这是指的中央银行向银行部门提供的低息贷款，属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种手段。

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侧，最大的一类是银行部门给企业、机关团体和住户的贷款，共约

153万亿元，占银行部门总资产的53%。银行部门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2019年，银行部门共持有政府债券约31万亿元，占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的81%，对于政府财政政策的推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银行部门的其他资产约82万亿元，占银行部门总资产的28%，包括银行部门持有的企业债券、商业汇票、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货）、国外资产和银行企业的固定资产（如办公楼、办公设备）等。

银行部门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银行库存现金共同构成银行的准备金，两者相加约24万亿元，约占银行部门总资产的8%、占存款总额的12%。银行是办理存贷款业务的企业。银行承担随时满足活期存款客户提取现金要求的义务，并且要满足定期存款客户存款到期时提取现金的要求。所以银行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准备金以满足存款客户的“提现”（提取现金）要求。

在有中央银行以前，私人银行常常面临客户大规模挤兑的风险，由此而形成的银行挤兑风波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许多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现代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一般已经很少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了。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基本可以控制银行准备金的规模（对于中央银行如何控制银行准备金的规模，我们将在以后再介绍）。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特色市场经济中，银行经营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银行利润等于银行收入减成本。为了简要说明问题的目的，我们假设银行全部收入来自于贷款获得的利息，而凡是用于贷款的资产都用做银行的准备金（准备金没有利息）。以英文大写字母“L”代表贷款，以英文小写字母“i”代表贷款利率，那么，银行的收入就可以用“ $L * i$ ”来表示。

银行部门的资金来源以存款为主。仍然为了简便起见，假设银行的资金来源全部来自存款（D），并设“ i_D ”为银行存款利率，再假设银行不需要支付其他营业成本；那么，银行的总成本就是“ $D * i_D$ ”。

这样，银行利润就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说明：

$$\text{银行利润} = (L * i) - (D * i_D)$$

如果在等式两边都除以银行贷款（L），就可以得出每一元银行贷款所得到的利润：

$$\text{每一元银行贷款所得利润} = i - D/L * i_D$$

从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到，银行的总资产一定等于总负债，所以银行的总资产在量上就等于银行部门的全部资金来源。如果用英文大写字母“R”来代表银行准备金，那么，银行存款就等于银行贷款与准备金之和： $D = L + R$ 。将这一组关系代入上式，就可以得出：

$$\text{每一元银行贷款所得利润} = (i - i_D) - (R/L) * i_D$$

对 (R/L) 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D, 再做一些调整, 就可以得出:

$$\text{每一元银行贷款所得利润} = (i - i_D) - [(R/D)/(1-R/D)] * i_D$$

每一元银行贷款所得利润取决于两项: 第一项是存贷款利差, 贷款利率越高, 每一元银行贷款所得利润越高, 银行越愿意增加贷款。第二项是负值, 表明银行通过存款获得的资金, 如果不是用于贷款, 而是放在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 不但不能获利, 反而因为支付存款利息而造成损失。

在第二项中, R/D的比值越大, 负值越大。R/D即准备金占存款的比率, 简称“准备金率”。准备金率越高, 银行相对来说越有能力应对银行挤兑、贷款逾期不能偿还等风险, 但银行在利润方面损失越大。如果贷款利率更高, 银行相对来说就更愿意冒风险降低准备金率, 以换取更高的利润。

银行贷款 (L) 与银行准备金 (R)、准备金率的关系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说明:

$$L = (L/R) * R = [(1 - R/D)/(R/D)] * R$$

所以, 银行贷款与准备金本身成正比, 如果准备金率不变, 准备金越多, 银行贷款越多; 但与准备金率成反比, 给定一定的准备金, 准备金率越低, 银行贷款越多。

如果贷款利率上升, 且准备金不变, 那么银行就更有意愿通过降低准备金率来增加贷款。反之, 如果贷款利率下降, 银行就会倾向于增加准备金率、减少贷款。所以银行贷款的供给意愿与贷款利率成正比关系。

那么, 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又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下一期“学点经济学”中再来探讨。

第十五期 市场经济中的利率

作者：远航一号

在上一期“学点经济学”中，我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金融市场的活动（准确地说，就是借贷资本的供求）对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有一定的、有限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影响。

金融市场对现实的产出和就业发生影响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利率（也叫“利息率”）。所谓利率，简单来说，就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时，年利息与本金之比。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利率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存款利率、贷款利率、政府债券利率、企业债券利率、商业汇票贴现率以及实际属于利率性质的股票盈利市价比等。

利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日常流动资本（一般包括企业购买水电气、原材料、日常办公用品乃至支付工资而投入的资本）往往是通过银行贷款、商业信用（比如赊购赊销）或发行短期债券等形式来提供的。如果利率上升，企业流动资本的融资成本就要上升，企业投资或增加就业的积极性就会相应下降。对于企业的长期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来说，如果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往往要通过贷款或发行债券、股票才能完成。如果利率上升，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就会打折扣，从而会减少投资。另外，利率上升，还会引诱资本家将更多的资本投入金融市场而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

在美国，很多工人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家庭依靠借债维持消费。利率上升会直接影响这些家庭的消费需求。近年来，在中国，各种借债消费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利率的升降还会直接影响居民购买住房的意愿。按照现在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居民购买的新建住房也属于投资的一部分。

在第十期“学点经济学”中，我们简要地介绍了短期宏观经济模型。按照短期宏观经济模型，决定短期经济产出的公式如下：

$$Y_{\text{均衡}} = (c + gc + nx) / [1 - \omega * (1 - \sigma) - \delta * (1 - \sigma) - \sigma * (1 - \tau)]$$

其中，Y是实际GDP，“c”是居民部门自发消费，“gc”是政府消费，“nx”是净出口，“ ω ”是国民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 σ ”是资本家总利润中用于净投资的比例（也可以叫做资本家的“投资倾向”），“ δ ”是固定资本消耗或折旧占GDP的比例，“ τ ”是间接税占GDP的比

例。

利率对这里的自发消费“c”和资本家投资倾向“σ”都有影响。如果利率上升，自发消费会减少、资本家投资倾向会下降，两者都会造成实际GDP下降。反之，如果利率下降，则可能带来实际GDP上升。

那么，金融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利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如上所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有多种多样的利率。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所有情况下），这些利率往往都按照同一个方向发生运动，一起上升或下降。在中国经济中，银行贷款又是借贷资本的主要形式。下面咱们就仍以银行贷款市场为例来说明利率的决定过程。

在上一期“学点经济学”中已经介绍过，银行贷款的供给取决于银行准备金和准备金率两个因素：

$$L_s = (L/R) * R = [(1 - R/D)/(R/D)] * R$$

“L_s”在这里表示贷款的供给量。“R”是银行准备金。这里我们先假设银行准备金的量由中央银行决定（其具体过程以后再介绍）。“R/D”是银行准备金率（准备金与存款之比），这是一个主要由银行根据盈利动机和经营策略所决定的比率。一般来说，如果利率越高，银行为了谋利，就愿意将总资产中更大一部分拿出去贷款，而不是留作准备金；这样银行的准备金率就会降低，贷款量就会增加。从上面的公式中也可以看出，如果“R”不变，那么，“R/D”下降，贷款供给量就会变得更大。所以，如果画一条曲线来表示贷款供给量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一条正斜率的曲线。

有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银行准备金不变，银行又如何能做到降低准备金率、增加贷款呢？换句话说，银行用来贷款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银行可以选择两种做法。一种办法是，银行可以提高存款利率或发行债券，将流通中现金的一部分吸引过来，以增加银行存款或其他形式的资金来源，再用由此获得的钱增加贷款。但是，如第十三期“学点经济学”讲过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流通中现金仅仅是总的货币供应量中很少的一部分，因而用吸收流通中现金的方法能够得到的额外资金不会太多。

银行最常用的是这样一种方法：比如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100万元，那么，银行就会一方面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侧增加100万元贷款，同时又将这100万元存入这家企业在该银行的账户，从而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侧也增加100万元。这样，这家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就会同时增加100万元。

如果以后这家企业将这100万元转存到其他银行，或者用这100万元向其他企业购买产品，再转存入其他企业在其他银行的账户，那么这时，一开始提供贷款的银行的准备金当然要相应减少，但其他银行的准备金会相应增加，整个银行系统的准备金仍会保持不变。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整个银行系统的准备金与发生贷款以前一样，而贷款和存款都会比以前增加，整个银行系统的准备金率会下降。其详细的过程，现在一般的货币银行课程都会讲到，此处受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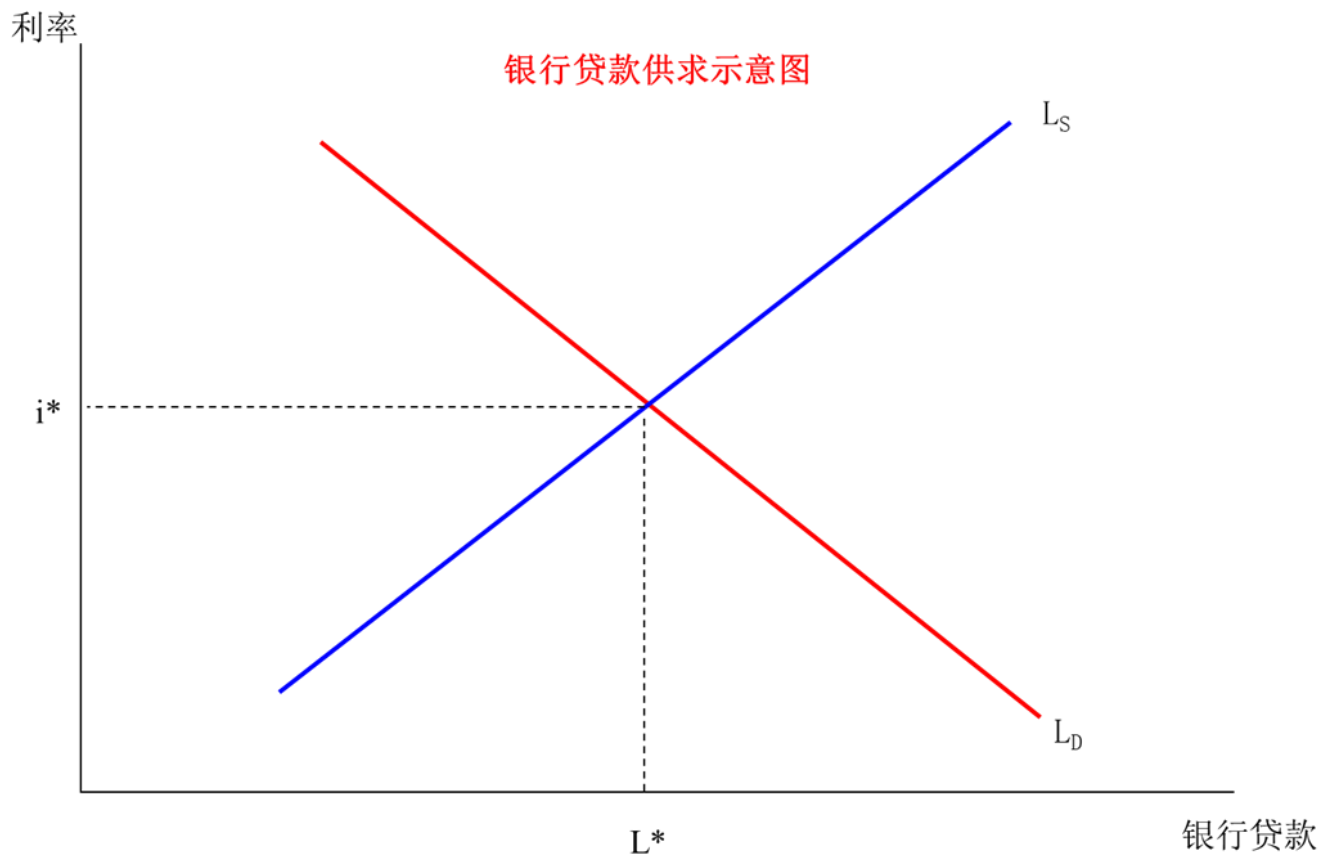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银行系统的贷款和存款因此就可以无限地增加下去呢？那倒也不是。因为给定银行准备金，银行系统放出的贷款越多，银行准备金率就要相应下降，从而银行系统以及个别银行的经营风险就会相应增加。银行需要在增加贷款谋利与经营风险增加之间做出权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权衡当然不会是一个精确而科学的过程，而是带有很多赌博的成分。但是一般来说，利率越高，银行赌博的天平就越会倾向于增加贷款供应；利率下降，银行放出贷款就会更加谨慎。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发生金融危机时，整个银行系统可能会变得极度谨慎，即使很高的利率也不能引诱银行放出贷款。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以后专门讨论。

讲过了银行贷款的供给，再来讲需求。前面已经讲过，在现代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往往要通过贷款来维持流动资本的周转，要通过贷款或发行债券来从事一部分长期投资；工人和小资要通过借债来买房或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准”。这些贷款需求都与当前经济活动有关。所以一般来说，贷款需求与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就是与名义GDP）成一定的比例。下面的公式说明了贷款需求的决定条件：

$$L_D = \lambda * P * Y$$

上式中，“ L_D ”表示对贷款的需求量，“ P ”是价格水平，“ Y ”是实际GDP，希腊字母“ λ ”（读“朗姆达”）表示每一元名义GDP所产生的贷款需求。如果利率上升，资本家的投资成本就更高、一般工人和小资家庭的债务负担更重，对贷款的需求就会有所下降；反之，如果利率下降，资本家就会有更大的动机借债投资、工人和小资也更加倾向于借债消费。所以，一般情况下，“ λ ”与利率成反比。

下面的图概括说明了银行贷款供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均衡利率的决定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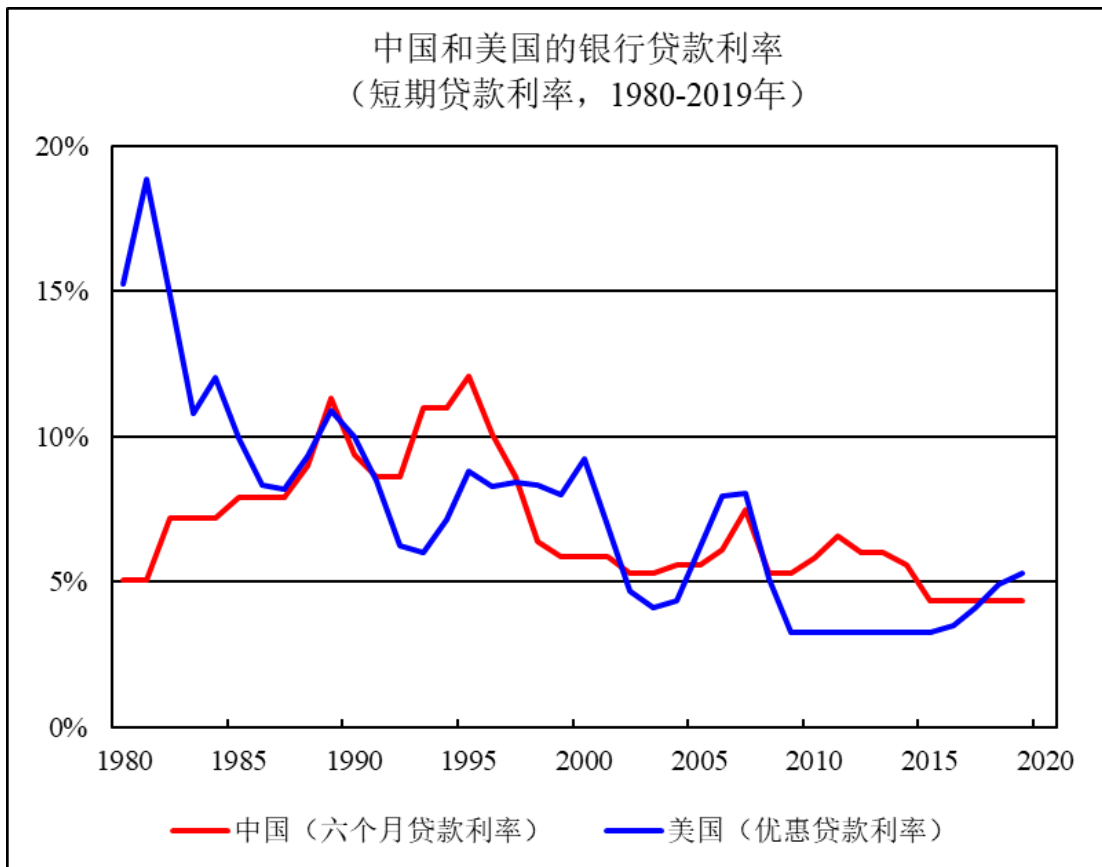
上图中，贷款供给用向上倾斜的蓝线来表示，贷款需求用向下倾斜的红线来表示。两线相交处，表明贷款需求等于贷款供给，供求平衡时的贷款额是均衡贷款额（ L^* ），供求平衡时的利率是均衡利率（ i^* ）。如果金融市场上的利率高于均衡利率，银行的贷款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这时，银行之间就会相互竞争，向客户提供更为优惠的贷款条件，直至将利率压低至均衡水平为止。如果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低于均衡利率，这时需要贷款的企业、居民乃至政府就会发生贷款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于是竞相抬高利率，直至利率上升至均衡水平为止。

上图中，假定一定规模的银行系统的准备金，同时假定总的经济规模（名义GDP）保持一定，这两个变量分别决定供给曲线和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另一方面，银行系统的准备金率和“ λ ”（即每一元名义GDP产生的贷款需求）则分别决定着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斜率，也就是贷款供给和需求分别对一定的利率变化做出反应的程度或者“敏感度”。

如果中央银行增加了银行系统的准备金，供给曲线（蓝线）就会向右移动，代表在每一个利率水平上银行愿意提供的贷款额都增加了；反之，则向左移动。

如果名义GDP增加了（无论是由于价格水平增加还是实际GDP增加），需求曲线（红线）就会向右移动，代表在每一个利率水平上企业、居民和政府对于贷款的需求都会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则向左移动。

第二个图比较了中国和美国自1980年以来银行贷款利率变化的情况。图中，中国银行贷款的利率用的是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这种贷款主要是为企业提供短期流动资金。美国贷款利率用的是美国银行部门的优惠贷款利率，是各种贷款中利率最低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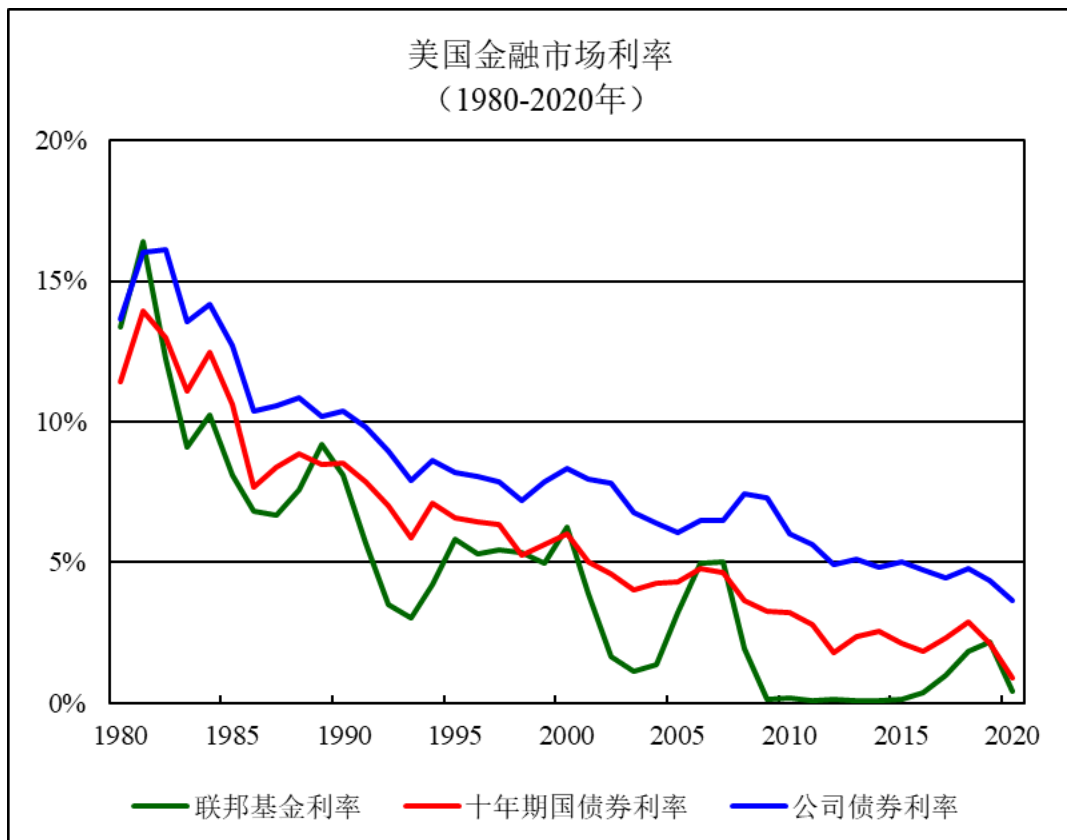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银行的贷款利率很高，最高时年平均利率曾经达到19%（1981年）。这部分地是因为那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很高，1981年的通货膨胀率接近10%（见第十一期“学点经济学”）。但是，即使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1981年美国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也在9%以上。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银行贷款利率总的来说一直趋于下降，但是一般在经济衰退以后的复苏期下降得更多，而在每个经济周期后半段的扩张期有所回升。在2008-2009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后，美国银行贷款利率连续五年保持在3.25%的低水平上，直到新

冠疫情爆发以前的2019年，才恢复到5%以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仍然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特色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到1995年，中国银行短期贷款利率涨到了12%。这一时期利率的上涨是利率市场化的结果。1995年以后，中国银行利率的波动范围与美国银行利率的波动范围大体上一致；这反映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强，导致中美金融市场利率出现了趋同的倾向。

第三个图介绍了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另外三种利率自1980年以来的变化情况。其中，2020年的数据指的是2020年前11个月的平均值。

图中的三种利率分别是联邦基金利率、十年期国债利率和Baa等级的公司债券利率。所谓“联邦基金利率”实际上是美国银行相互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是对金融市场行情最敏感的短期利率，也是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的中央银行）主要干预对象的“目标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即债券买卖）来确保联邦基金利率围绕一定的目标值上下波动。



十年期国债利率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零风险的长期利率。国债利率与公司债券利率之间的差可以认为是债券投资者在主观上认定的“风险附加”；就是说，因为公司债券比国债风险更大，必须要给投资者更高利率才能补偿投资者的风险。所谓“Baa”等级的公司债券，是公司债券的一种，由债信公司所评定的有中等投资风险但有一定投资价值的公司发行。近年来，Baa公司债券利率一般比十年期国债利率要高两三个百分点。

三种利率的长期趋势基本一致。八十年代初，三种利率都在15%上下波动；近年来，都下降到了5%以下。联邦基金利率在平时一般大大低于十年期国债利率，但是在衰退年或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往往会上涨到十年期国债利率以上。这种情况发生在1981年、1989年、2000年、2007年和2019年。这种情况（短期利率超过长期利率）叫做“利率倒挂”。“利率倒挂”现象被认为是预测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的最准确的指标之一。

除了以上几种利率以外，还有一个可以介绍的指标是股票市场上的盈利市价比。所谓盈利市价比，就是公司平均每股净利润与股票市价之比，也就是中国股民所熟悉的“市盈率”的倒数。股票持有者虽然名义上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是绝大多数参与股票买卖的人从来不参加公司管理，甚至不关心分红，只是希望从股价上涨中获利。所以大多数参与股票投机的货币资本可以视为变相的借贷资本。盈利市价比可以告诉我们股票持有者的每一元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公司净利润。从公司现有所有者的角度来看，盈利市价比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通过出售股票筹资的融资成本（每出售一元股票需要向新所有者让渡多少净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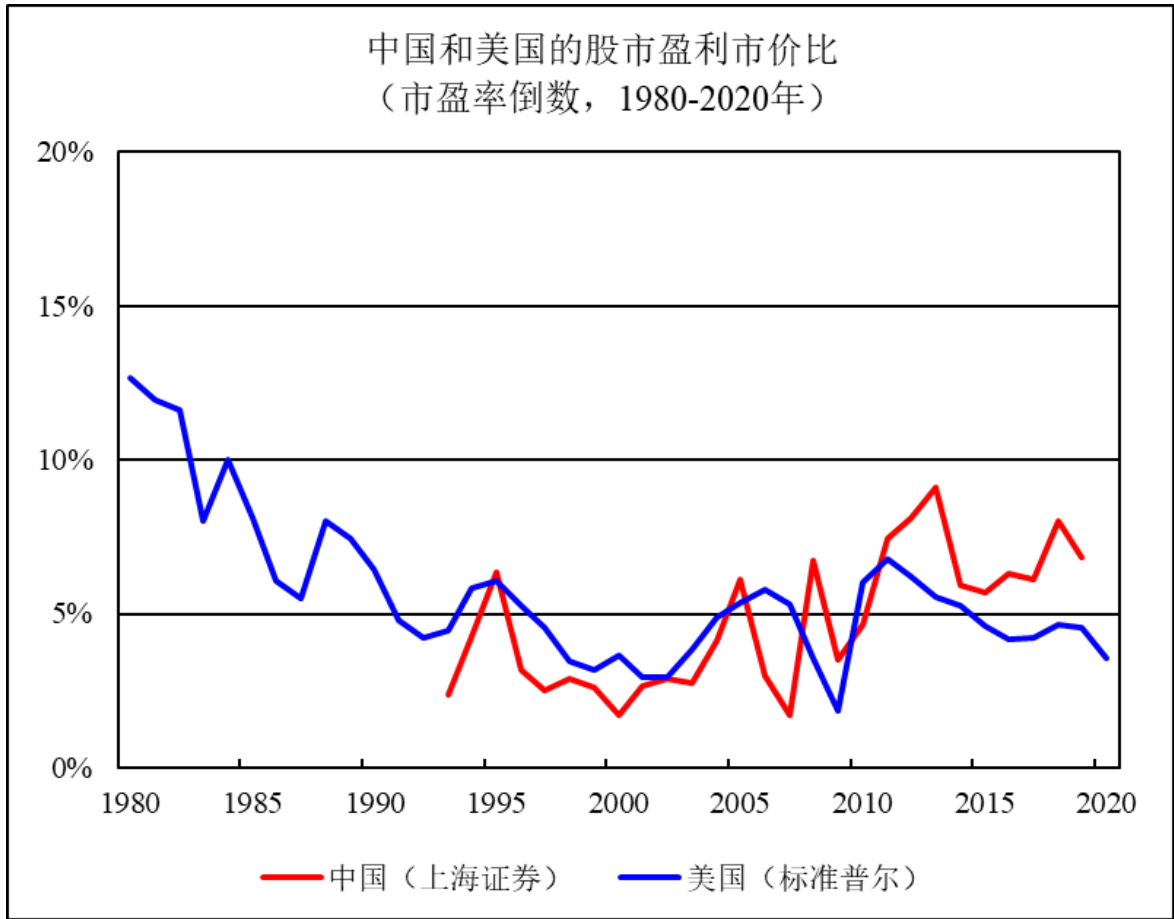
第四个图比较了中国和美国股市的盈利市价比。中国数据采用上海证券市场数据；美国数据采用标准普尔500种公司股票数据。美国2020年的数据用的是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平均值。

美国股市盈利市价比的变化趋势与各种利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2000年前后，美国股市的盈利市价比偏低，且显著低于当时的公司债券利率，反映了当时美国股市上的巨大泡沫（高股价导致高市盈率、低盈利市价比）。近年来，美国股市的盈利市价比保持在略低于5%的水平，与公司债券利率大体相当。

在2007年以前，中国股市的盈利市价比经常处于异乎寻常的低水平，2000年和2007年时分别下降到只有1.7%。这说明当时中国股市中存在着巨大的泡沫，与现实经济运行几乎毫无关系。不过，近年来，中国股市的盈利市价比已经上升到比较“正常”的水平，在6-8%的区间波动。

2019年，中国境内非金融企业通过股票发行融资获得的资金一共只有约3500亿元，占全社会当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1.4%。通过观察股市波动，对于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整体运行情况，几

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第十六期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作者：草庐棋士

长久以来，在普通群众乃至许多经济学专业人士中一直流传着对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一些极端看法。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随意地“点石成金”，把本来一文不值的纸张变成通行天下的货币。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随意地“化金为土”，把自己兜里的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乃至变成废纸。在现实世界里，中央银行确实在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特色市场经济的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却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法力无边”。

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是与特色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规模有限，劳动力主要由非市场经济主体分配，企业之间的物质产品交换也主要依托国家计划。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基本上履行着“总”商业银行的职能。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所谓“四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才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专门经营以存贷款业务为核心的商业银行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则成为了以执行“货币政策”为专职的中央银行。

所谓“货币政策”，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就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政府政策，一般由中央银行来执行。正如第十三期“学点经济学”中已经介绍过的，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并不能决定货币供应量，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借贷资本的供给。这里，我们还是沿用一般习惯，将中央银行所执行的通过调节银行准备金、利率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政策称之为“货币政策”。

下表是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2019年

单位：万亿元

资产（资金使用）		负债（资金来源）	
外汇储备	21.2 万亿元	流通中现金	7.7 万亿元
黄金储备	0.3 万亿元	银行库存现金	0.6 万亿元
给银行部门贷款	9.9 万亿元	银行部门存款	23.1 万亿元
对银行部门其他债权	1.9 万亿元		
政府债券	1.5 万亿元	财政部存款	3.2 万亿元
其他资产	2.3 万亿元	其他负债	2.5 万亿元
		自有资本	0.2 万亿元
总资产	37.1 万亿元	总负债	37.1 万亿元

首先看负债一侧。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钞票）本质上是现金持有人对中央银行的债权。在20世纪以前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民众理论上可以用手头的现金要求中央银行兑换贵金属。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中央银行）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还在提供美元兑换黄金的服务。在当代市场经济中，虽然现金不能再用来直接向中央银行兑换金银，但是其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效力是由国家政权和整个信用制度所保证的，拒绝现金支付在理论上属于违法行为。2019年，中国共有流通中的现金7.7万亿元。

银行库存现金（0.6万亿元）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23.1万亿元）是整个商业银行系统开展存贷款业务所凭借的准备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占到了中央银行资金来源的约64%，调节商业银行系统准备金规模的大小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

中央银行同时也代理国库业务。财政部在中央银行有着3.2万亿元的存款以备随时支取。中央银行的其他杂项负债约有2.5万亿元。

中央银行的自有资本，即会计上的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只有0.2万亿元，其“杠杆率”高达186，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系统的44。从数值上讲，中央银行业务的“风险”要比商业银行系

统大很多。然而，商业银行主要是凭借自身的信用维持“杠杆率，而中央银行的“杠杆率”则是由整个市场经济的总体信用来维持、靠国家政权来保障的。只要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系统性抛弃本国货币的极端状况，中央银行是不存在支付能力限制的。

再看资产一侧。中央银行持有资产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中国历年的贸易盈余和资本净输入累积起来形成的对外国的债权，主要以外国国债、机构债券和外币现金的形式存在。201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约有21.2万亿元，占中央银行资产总额的57%。由于中国实行接近于固定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的币值提供了某种保障。只要人民币的对外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那么，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不大可能显著超过或低于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关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我们会在以后的“学点经济学”中加以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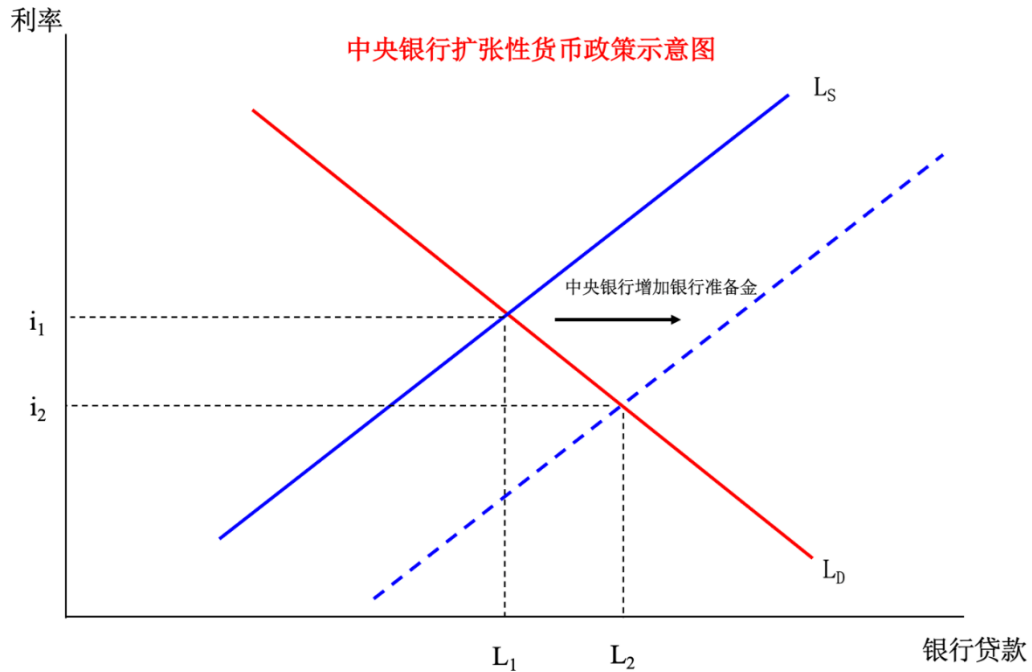
中央银行持有对银行部门贷款9.9万亿元，掌握银行部门其他债权1.9万亿元，持有政府债券1.5万亿元，持有其他资产（包括中央银行办公大楼等固定资产）2.3万亿元。

在第十四期和第十五期“学点经济学”中已经介绍过，银行借贷资本的供给（ L_s ）一方面取决于银行准备金（ R ），另一方面取决于银行准备金率（ R/D ，这里，“ D ”代表银行存款）：

$$L_s = (L/R) * R = [(1 - R/D)/(R/D)] * R$$

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影响、控制银行准备金的大小来贯彻自己的“货币政策”。以中国人民银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央行”）来说，影响银行准备金的手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办法，是提高或降低向商业银行提供的再贴现贷款的利率。所谓再贴现贷款，就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因为再贴现贷款利率通常低于商业银行放出贷款的利率，商业银行可以借入这种再贴现贷款来开展自己的贷款业务，或者将其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比如，中央银行要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那么，中央银行可以选择降低再贴现利率，于是，商业银行就会有更大的盈利动机借入再贴现贷款。在中央银行平衡表的资产项目中，“给银行部门的贷款”一项就会增加；在其负债项目中，“银行部门存款”也会随之增加。商业银行系统的准备金总额由于借入了再贴现贷款而增加，如果银行系统不改变准备金率，那么，银行每一个利率水平上愿意放出的贷款就会相应增加。反映在下图上，就是银行贷款供给曲线 L_s 向右移动，与贷款需求曲线 L_d 相交于一个新的均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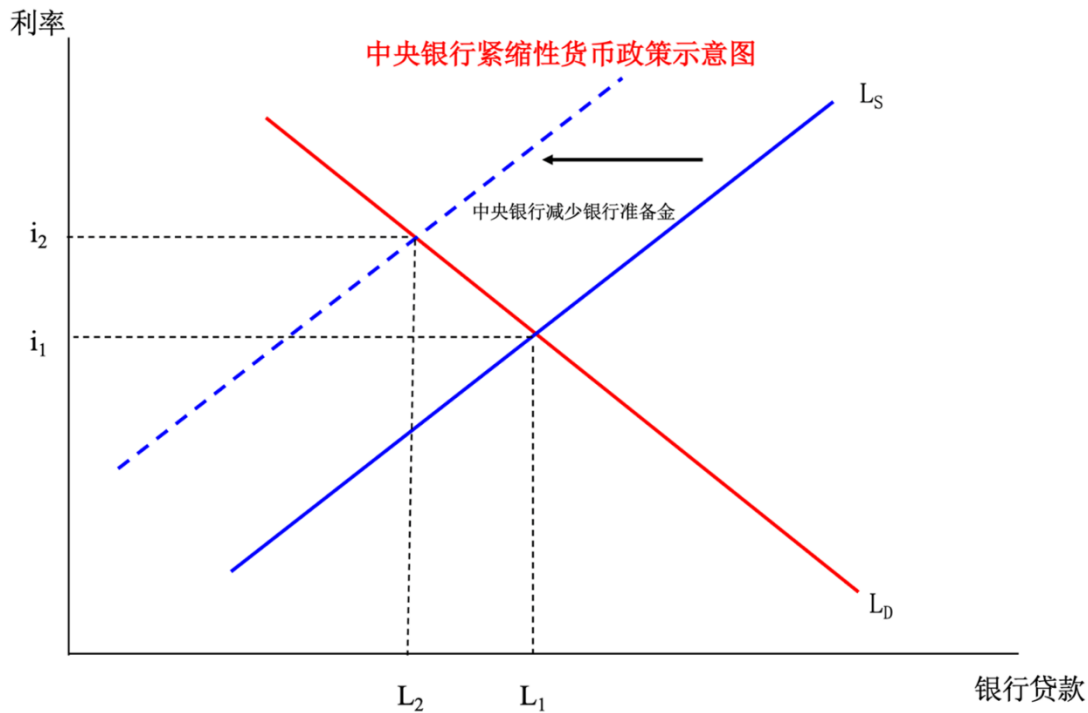
在新的均衡点上，利率更低，银行贷款总额更大。在这种理想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扩大借贷资本的供给、降低利率，进而刺激消费、投资，提高总需求。



另一种货币政策是“公开市场操作”，即中央银行买入或卖出政府债券。假设中央银行决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它就会从银行那里买入政府债券。由于卖出了政府债券，商业银行系统的准备金就会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平衡表中，资产一栏的“政府债券”就会增加，负债一栏的“银行部门存款”也会增加，其效果与上图所绘的降低再贴现利率类似。

在有的情况下，比如经济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泡沫、通货膨胀恶化等情况，从而中央银行认为“经济过热”，有必要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时，中央银行可以选择提高再贴现利率或者出售政府债券。这样，银行系统的准备金就会减少，银行贷款的供给就会萎缩。这种货币政策的效果可以用下面第二个图来说明。如图，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后，供给曲线 L_S 向左移动，与贷款需求曲线 L_D 相交于一个新的均衡点。

在新的均衡点上，利率更高，银行贷款总额变小。在理想情况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起到抑制投资和消费，从而避免经济过热的政策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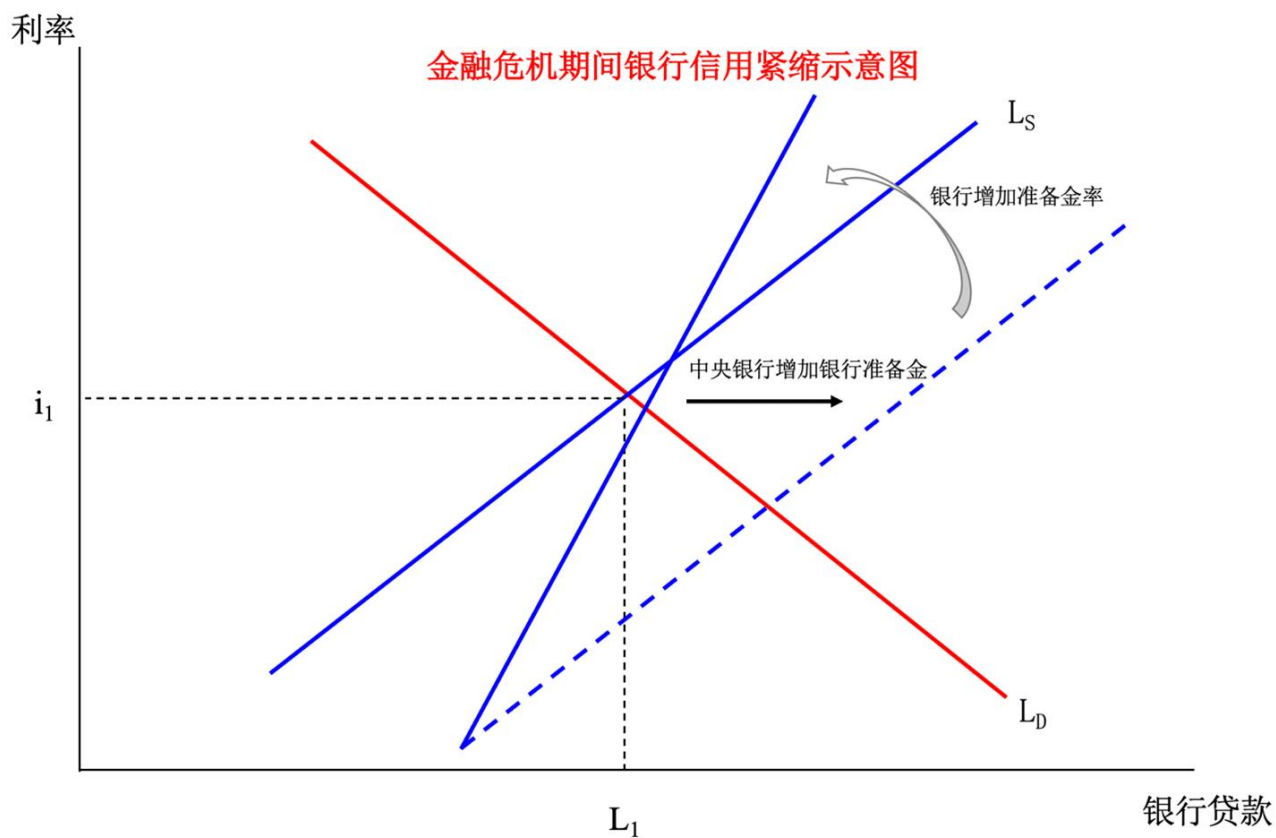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本世纪初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新增外汇储备。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就必须经常不断地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而中央银行购买外汇的同时，就会导致银行部门准备金相应增加。如果不采取其他的步骤，银行部门准备金的增加可能会与中央银行既有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这时，中央银行就需要采取提高再贴现贷款利率、出售国库券（政府债券）、出售中央银行票据（一种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等办法以回收银行部门通过出售外汇而新增的准备金。这种货币政策操作在金融界称之为“对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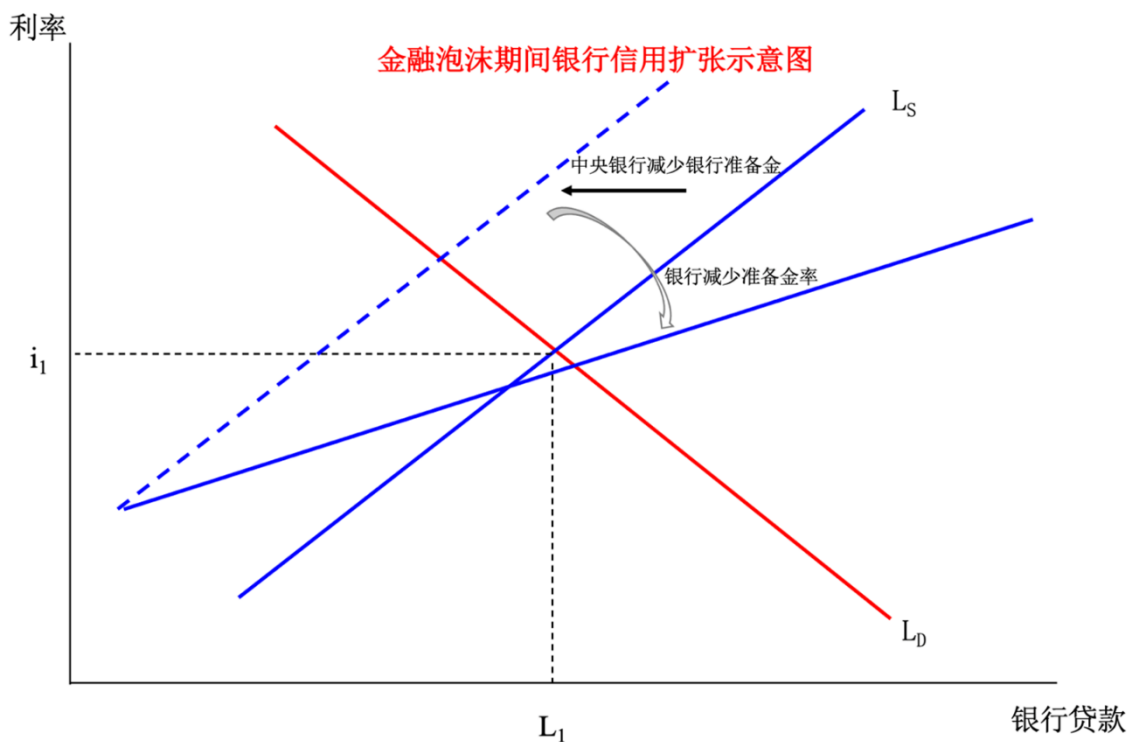
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是买卖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操作。在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美联储执行了一套名为“量化宽松”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其内容不仅包括大规模购进政府债券，还包括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手里购进房地产贷款以及以房地产抵押贷款为后盾的各种证券。

上面所介绍的中央银行扩张性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假设的是理想情况。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借贷资本供给的扩大或缩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银行以追求私人利润为动机而做出的经营决策的限制。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巨大不确定性中，商业银行和一般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往往无法搜集到足够的信息，因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对未来的信心作出贷款决策。这不仅会造成了贷款供给的巨大波动，而且还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

下面第三个图可以说明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银行部门的商业经营决策如何抵消中央银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比如，当发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银行为了抵消危机造成的总需求下降，可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银行准备金。这时，如果银行系统的准备金率不发生变化，贷款供给曲线 L_S 就会向右移动（在图中用蓝虚线来代表）。然而，危机造成的恐慌让商业银行对贷款供给十分谨慎。即使企业或个人借款人这时愿意接受高利率，由于观察到许多企业、个人破产，银行无法确定新贷款是否还能够收回。这样，银行就不愿意轻易放贷，旧贷款收回或者利息回流后，也会将其中一部分转入准备金。这样，整个银行系统的准备金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导致借贷资本供给萎缩。在下图中，这就表现银行贷款供给曲线的斜率上升。就是说，即使利率提高，银行部门也不愿意增加很多贷款，或者说，银行贷款供给对利率变化的反应变得迟钝，从而导致贷款供给曲线 L_S 逆时针方向旋转，变得更加陡峭。这样，中央银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银行自发地紧缩信贷而抵消，从而无法有效增加贷款供给、降低利率。



另一方面，当发生金融泡沫时，中央银行也许会尝试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在下面第四个图中，中央银行减少银行的准备金，导致贷款供给曲线 L_S 向左平行移动（用蓝虚线来表示）。然而，在金融泡沫期间，金融资产价格上升，表面上企业利润上升、个人收入增加，银行也希望大量放出贷款以参与谋利。这时，为了不落在其他银行后面、失去客户，每个银行都想方设法在现有准备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增加贷款，从而导致准备金率下降。于是，银行的贷款决策变得更加大胆，利率的些许上升就能吸引银行提供大量额外贷款。在图中，这就表现为贷款供给曲线 L_S 顺时针旋转，整个贷款供给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虽然中央银行企图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其实际效果就很大程度上被商业银行自发地信贷扩张所抵消，利率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无法有效遏制金融泡沫。



第十七期 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

作者：草庐棋士

在从前的“学点经济学”中，我们介绍了一国之内资本主义经济或特色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探讨整个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共同处在一套世界分工体系中，这个分工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各国平起平坐、共同繁荣的国际“大家庭”。相反，该体系内的各个经济体都处在一套等级森严且相对稳定的结构中。这套结构包含核心国家（地区）、外围国家（地区）和半外围国家（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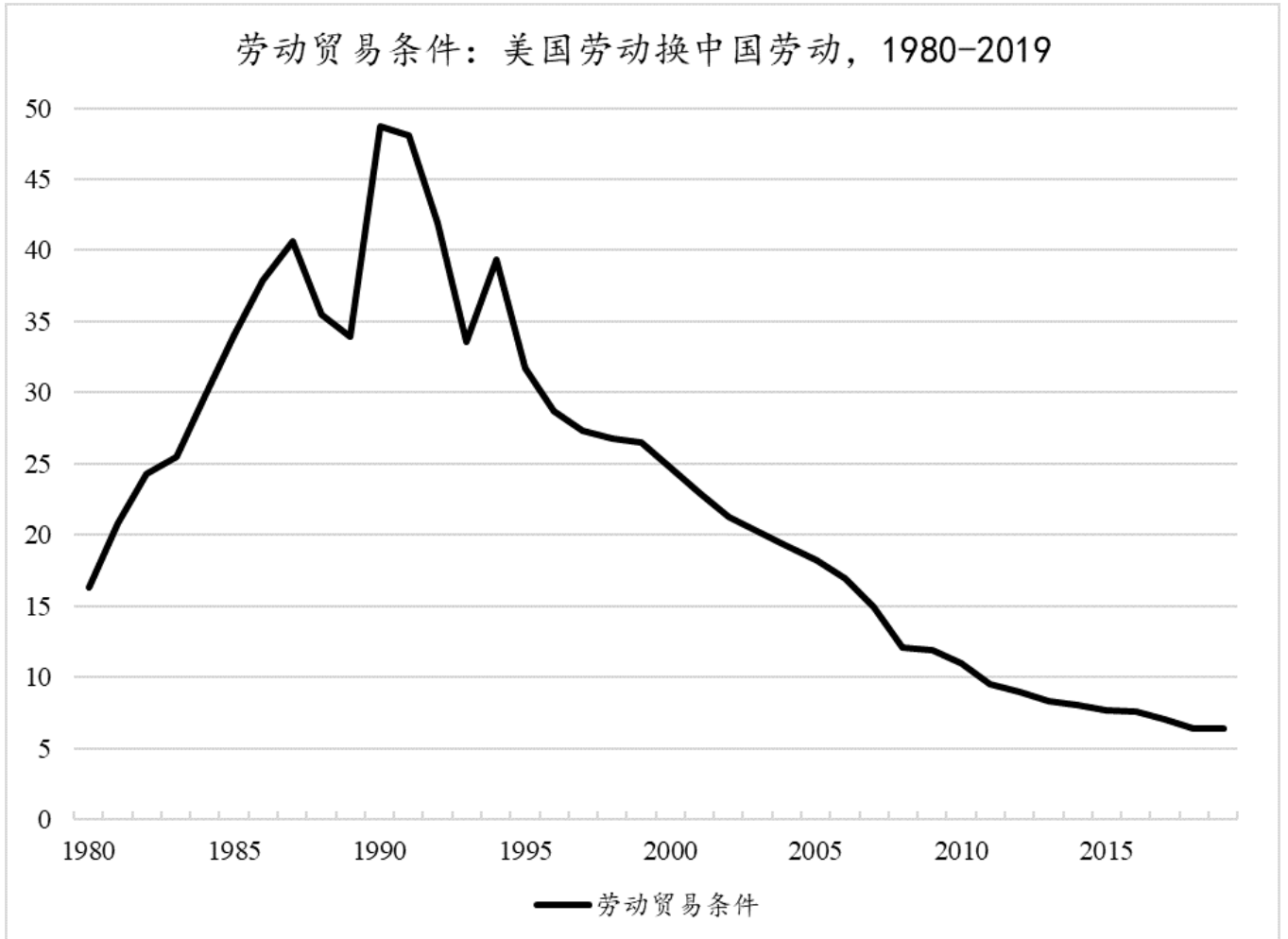
联系这三种国家（地区）的，是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比如，C国为了从A国进口包含1小时劳动的商品需要用包含5小时本国劳动的商品去交换，那么C国就在不平等交换中净损失了4个小时的劳动时间，或者形象地说，给A国“进贡”了相当于4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核心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不平等交换的受益方；外围国家是不平等交换的损失方；半外围国家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是损失方，在与外围国家的贸易中获益，但总体上损失大于收益。

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是核心国家占据国际分工中的垄断环节，如信息技术、高端材料、生物化学工业和军工产业等，可以通过提高本国产品较高的相对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外围在国际分工中则被压制在竞争性环节，如原材料、初级制成品和日用消费品等。由于其他外围国家的竞争，它们不可能通过提高本国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相反，为了维持本国产品低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它们会积极采取措施压低本国工资，放宽环境污染标准，并放松对本国企业违反劳动法规的惩处力度。

半外围国家的产业结构兼有外围、核心国家的特点。一般来说，半外围国家的大多数行业与外围国家类似，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掠夺环境和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有少数行业或个别产品可以与核心国家竞争。

不平等交换的后果是将大量的**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从外围半外围国家**转移**到了核心国家。在历史上，不平等交换在核心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廉价的原料和半成品降低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核心国家的企业能够支配的剩余增加，从而有助于提高投资水平。在今天，不平等交换仍然是核心国家赖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国内物价水平、**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重要条件**。

今天的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中国处于对外净输出劳动的不利地位（注意：中国因为不平等交换对外净输出的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不是“劳动产品”）。下图显示的是中美之间从1980年到2019年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



所谓美中之间劳动贸易条件，就是一单位美国劳动在世界市场中能够交换多少个单位的中国劳动。这个数值越高，代表一单位美国劳动能够换到的中国劳动越多，代表中国在与美国的不平等交换中越是处在不利的状况。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刚开始建立的八十年代初，一单位美国劳动大约能够交换16单位中国劳动。但即使在如此不平等的交换比之下，中国的当时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的工业部门劳动力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型经济仍然是太“昂贵”了。在整个80年代，美中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不断升高（意味着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两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到了199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换到将近50单位中国劳动。

便宜的中国劳动力成为了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根据这个“比较优势”，一些人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大量进口外国技术和设备，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和简单的加工，并将产品最终销往国外。从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指导方针一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逐渐改善，到了2005年基本恢复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到了2019年，只需要大约6个单位的中国劳动就能交换一单位的美国劳动。目前，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那么，未来，随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劳动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中国能否最终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如某些“工业党”所期盼的或者如某些左翼青年所畏惧的，成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呢？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决定一个国家劳动贸易条件的各种因素。一单位美国劳动能够换到多少中国劳动是由三个方面的条件决定的。第一个方面的因素是两国之间实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如果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中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么一单位美国劳动生产的产品相对于一单位中国劳动生产的产品就会减少，从而一单位美国产品所包含的劳动相对于一单位中国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就会增加，美中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就会发生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反之则反是。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是两国各自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其他条件不变，那么美国的产品就会变得相对便宜，一单位美国劳动能够换到的中国劳动就会变少，美中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就会相应下降，反之则反是。第三个方面的因素是汇率的变化。如果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单位美国劳动的国际购买力就会下降，能换得的中国劳动就会减少，反之则反是。

我们可以用下面几组公式来进一步说明这三方面因素对美中劳动贸易条件的影响。

如上所述，美中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表示的是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多少单位的中国劳动，用公式表示就是：

$$\text{美中劳动贸易条件} = \text{每一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包含劳动} / \text{每一美元美国出口商品包含劳动}$$

每一美元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实际上等于出口部门按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倒数。所以，上式可以改写为：

$$\text{美中劳动贸易条件} = \text{美国出口部门按名义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 \text{中国出口部门按名义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上面说到了“名义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按照当期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不考虑物价水平的变化。

人民币的美元汇率一般表示为一单位美元可以购买多少单位的人民币。所以，中国出口部门按名义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可以表示为“中国出口部门按名义人民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除以人民币的美元汇率”。人民币的美元汇率如果上升，表示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反之，则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

所以，美中劳动贸易条件的公式可以再改写为：

$$\text{美中劳动贸易条件} = \text{美国出口部门按名义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 (\text{中国出口部门按名义人民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 \text{人民币美元汇率}) = (\text{美国出口部门按名义美元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 \text{中国出口部门按名义人民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 \text{人民币美元汇率}$$

上面的公式仍然没有考虑到中国两国各自价格水平的变化情况。将价格水平的变化考虑进去，美中劳动贸易条件的公式可以进一步改写为：

$$\text{美中劳动贸易条件} = \left[(\text{美国出口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 * \text{美国物价水平}) / (\text{中国出口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 * \text{中国物价水平}) \right] * \text{人民币美元汇率} = (\text{美国出口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 / \text{中国出口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 * (\text{美国价格水平} / \text{中国价格水平}) * \text{人民币美元汇率}$$

上式中第二个等号后面，第一组括号中的比例就是美中两国之间实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值，第二组括号中的比例就是美中两国之间价格水平的相对比值。如果对上面的公式做增长率的处理，就可以得出：

$$\text{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增长率} = (\text{美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text{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text{美国通货膨胀率} - \text{中国通货膨胀率}) + \text{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率}$$

根据这个增长率公式，我们可以对过去四十年美中之间劳动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做如下分析：

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变化原因分析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0-2019
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增长率 ¹	11.5%	-6.5%	-8.0%	-6.1%
美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差 ²	0.7%	-7.2%	-4.0%	-4.9%
美中通货膨胀率之差 ³	-1.2%	-4.6%	-2.0%	-1.4%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率 ⁴	12.1%	5.6%	-2.0%	0.1%

¹ 正增长率表示美中之间不平等交换程度加深（中国对美劳动贸易条件恶化）；负增长率表示美中之间不平等交换程度减轻（中国对美劳动贸易条件改善）。

² 正值表示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得比中国快；负值表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

³ 正值表示美国通货膨胀率高于中国；负值表示中国通货膨胀率较高。

⁴ 正增长率表示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负增长率表示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平均每年增长 11.5%，说明中国在世界不平等交换格局中的地位迅速恶化。中国在这一时期劳动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1980 年，一美元可以兑换 1.5 元人民币；到 1990 年，一美元可以兑换 4.8 元人民币。1981-1990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平均贬值约 12%，占这一时期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增长率的 105%。就是说，人民币贬值可以完全解释这一时期中国劳动贸易条件的恶化还有余。这一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稍稍抵消了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相对于美国的贸易条件开始改善。1991-2000 年，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平均每年下降 6.5%。这一时期，中国劳动贸易条件改善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比美国高出 7.2%，占这一时期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年平均下降率的 111%，可以完全解释这一时期中国劳动贸易条件的改善还有余。这一时期，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继续贬值，但是人民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大部分被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所抵消。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出口制造业中心。2001-2010 年，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平均每年下降约 8%。其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增长更快，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差大约占这一时期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年平均下降率的一半。这一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高于美国，另外人民币对美元转为升值，两者相加贡献了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年平均下降率的另外一半。

2010 年以来，美中劳动贸易条件继续下降，年平均下降约 6%。2010-2019 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比美国高出约 5 个百分点，占这一时期美中劳动贸易条件年平均下降率的 80%。

如上所述，虽然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处于因为不平等交换对外净输出劳动的不利地位；但是，自 1990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不平等交换程度确实在不断减轻；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那么，中国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方面的优势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吗？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种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未来可以持续吗？这些是我们在以后的“学点经济学”中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此外，在本文中所列举的劳动贸易条件公式说明，不同国家货币相互之间的汇率是影响劳动贸易条件的一个因素。那么，汇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对此，我们将在下一期“学点经济学”中加以说明。

第十八期 国际收支与汇率

作者：草庐棋士、远航一号（文中红色字体部分为远航一号修改处）

在上期“学点经济学”中，我们讲到汇率是决定不同国家之间劳动贸易条件从而决定不平等交换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

所谓汇率，就是在外汇市场上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比如 2021 年 3 月 5 日，1 美元可以兑换 6.5 元人民币就是人民币与美元之间汇率，也可以理解为按照人民币计价的一美元的“价格”。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那么 1 美元可以兑换到的人民币就会减少，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美元相对于人民币升值），那么 1 美元可以兑换到的人民币就会增加。决定现实世界生活中不同国家货币之间汇率的主要因素是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的汇率制度。

下表是 2019 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19 年

单位：亿美元

	借方（资金运用）		贷方（资金来源）
经常账户：			
货物进口	19737 亿美元	货物出口	23990 亿美元
服务进口	5055 亿美元	服务出口	2444 亿美元
雇员报酬	112 亿美元	雇员报酬	143 亿美元
投资收益	2570 亿美元	投资收益	2198 亿美元
其他收入	164 亿美元	其他收入	277 亿美元
资本和金融账户：			
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	977 亿美元	外国及港澳台在华直接投资	1558 亿美元
中国在海外证券投资	894 亿美元	外国及港澳台在华证券投资	1474 亿美元
中国对海外银行贷款	-331 亿美元	外国及港澳台对华银行贷款	425 亿美元
中国居民增持外汇及存款	863 亿美元	海外居民增持人民币及存款	-557 亿美元
中国在海外其他投资	-213 亿美元	外国及港澳台在华其他投资	-342 亿美元
以上各项合计	29828 亿美元	以上各项合计	31610 亿美元
外汇储备增加	352 亿美元		
扣除：储备资产增值	-550 亿美元		
央行增持外汇储备	-198 亿美元		
统计误差和遗漏	1980 亿美元		

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的是一国在特定时间段（如一年内）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所引起的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对于中国这样的本国货币并非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也可以理解为外汇流入和外汇流出。**所谓“外汇”，就是外国的货币或者以外国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与前几期“学点经济学”谈到的资产负债表不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各个项目反映的是流量而非存量，是在一定时间段以内发生的交易而非以往交易的累积。

该表的贷方（资金来源）反映的是中国在 2019 年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外汇总量，借方（资金运用）反映的是中国在 2019 年通过各种渠道支出的外汇总量。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该表中的各个项目都以美元计价。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第一个大项是经常账户的收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指的是由国际贸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报酬支付和转移支付组成的收支项目。其中前两行是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状况。中国在 2019 年约有 4300 亿美元的货物贸易盈余，但是

在服务贸易上约有 2500 亿美元的赤字。经常账户的后三行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收入流动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在海外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外国在中国的总资产（中国在海外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因而在理论上中国属于“净资本输出国”，但是由于中国付给外国资本家的回报率远远大于中国投资在海外获得的回报率，中国从海外得到的“投资收益”反而比外国在中国获得的“投资收益”要少大约 400 亿美元。

就整个经常账户来说，2019 年，中国有大约 1410 亿美元的顺差。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第二个大项是资本和金融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反映的是中国与外国之间资本流动的情况。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资本流动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以获取利润、利息、资本利得（比如，预期的股票和债券涨价）等为目的在外国从事投资的行为。

资本和金融账户下面的第一项是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在外国开办新建企业或者通过收购足以控股的外国企业股票从而获取外国企业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的获利方式主要是通过在海外的长期投资以获得企业利润。比如，郭老板的富士康在郑州投资建立手机组装工厂就是外国及港澳台在华直接投资。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来自传统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的直接投资属于典型的生产资本输出。其本质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企图绕过本国劳动人民斗争得来的高工资，以直接榨取外国廉价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列宁曾经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大帝国主义国家都把对外直接投资视为提高利润率的重要手段。2019 年，外国及港澳台对华直接投资约为 1600 亿美元。

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 1000 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投资在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带有掠夺当地资源和剥削当地劳动群众的性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大约五分之四）是投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城市特区或城市国家的房地产以及设立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带有比较明显的上层官僚和资本家对外转移非法所得的洗钱性质。

资本和金融账户下面的第二项是证券投资。证券投资的主要形式是购买债券、股票等有偿证券。与直接投资不同，证券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短期利润，带有比较突出的金融投机的性质。2019 年，中国对海外的证券投资约 900 亿美元，外国及港澳台对华证券投资约 1500 亿美元。

资本和金融账户下面的第三项是银行贷款。2019 年，中国对海外银行贷款一项是“-331 亿美元”，就是说，这一年中国银行部门在海外的贷款余额减少了 300 多亿美元。

资本和金融账户下面的第四项是一个国家居民增持的外汇现金和外汇存款。2019 年，中国居民增持外汇现金和外汇存款约 900 亿美元，海外居民则减持人民币现金和人民币存款约 600 亿美元。

就整个资本和金融账户来说，2019 年，中国有大约 570 亿美元的顺差。

到此为止，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贷方合计为 31610 亿美元，借方合计为 29828 亿美元。两者抵消，在考虑外汇储备变化之前，中国 2019 年的国际收支账户共有顺差 1782 亿美元。这说明，如果没有统计误差，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应该在这一年增加大约 1782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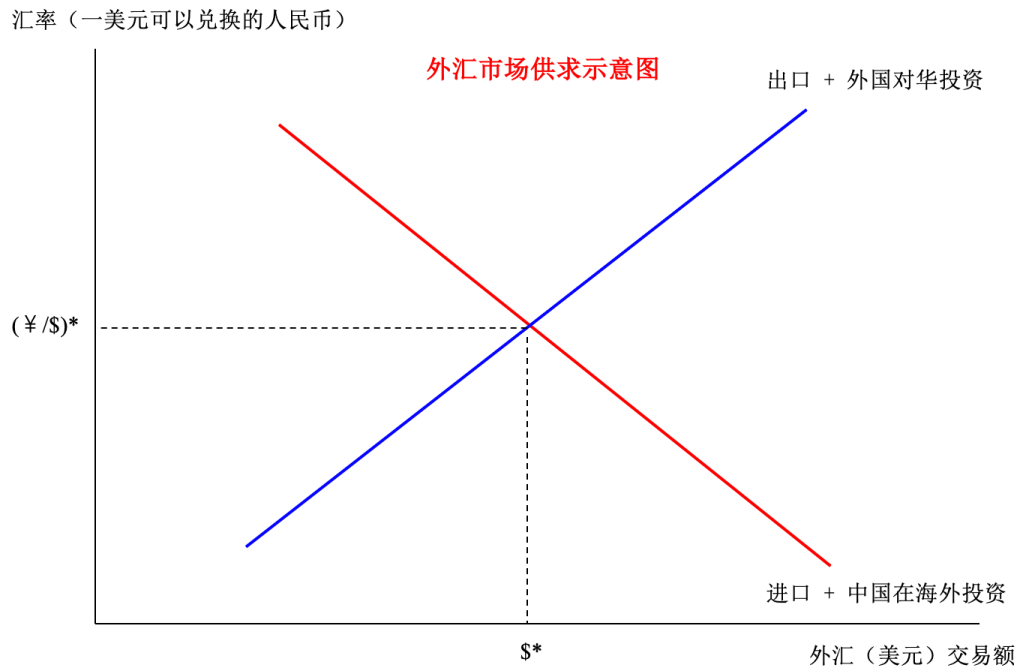
实际情况是，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只增加了 352 亿美元，而且这些增加完全是由于汇率变化和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所包括的海外资产的市价上升带来的。在扣除了汇率变化和资产价格上升的因素以后，在当年有统计的外汇买卖中，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减持外汇储备 198 亿美元。

这样，中国的国际收支账户本有顺差 1782 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买卖中不仅没有增加外汇储备，反而减少外汇储备 198 亿美元。这样，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贷方一侧各项相加与借方一侧各项相加相比，就多出了 1980 亿美元无法解释。由此产生的“统计误差和遗漏”是否代表了各个大小官僚和资本家各种未便统计、未便说明的资本外逃，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还可以借用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说明外汇市场的供求以及影响一个国家货币对外币汇率的各种因素。在上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贷方的主要项目包括中国向外国出口货物和服务以及外国对华的各项投资。当中国企业向外国出口货物和服务时，外商用外汇（这里用美元来代表）来支付。当外国资本家向中国投资时，要用美元等外汇换成人民币以购买按照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资产。因此，中国向外国出口货物和服务、外国对华投资，都可以理解为中国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给（同时也是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上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借方的主要项目包括中国从外国进口货物和服务以及中国在海外的各项投资。当中国企业从外国进口货物和服务时，中国进口商要先用人民币购买外汇（仍用美元来代表）。当中国资本家向海外投资时，也要先用人民币购买美元等外汇，然后再购买按照外币计价的外国资产。因此，中国从外国进口货物和服务、中国在海外投资，都可以理解为中国外汇市场上对外汇的需求（同时也是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供给）。

下图说明了外汇市场上供求之间的基本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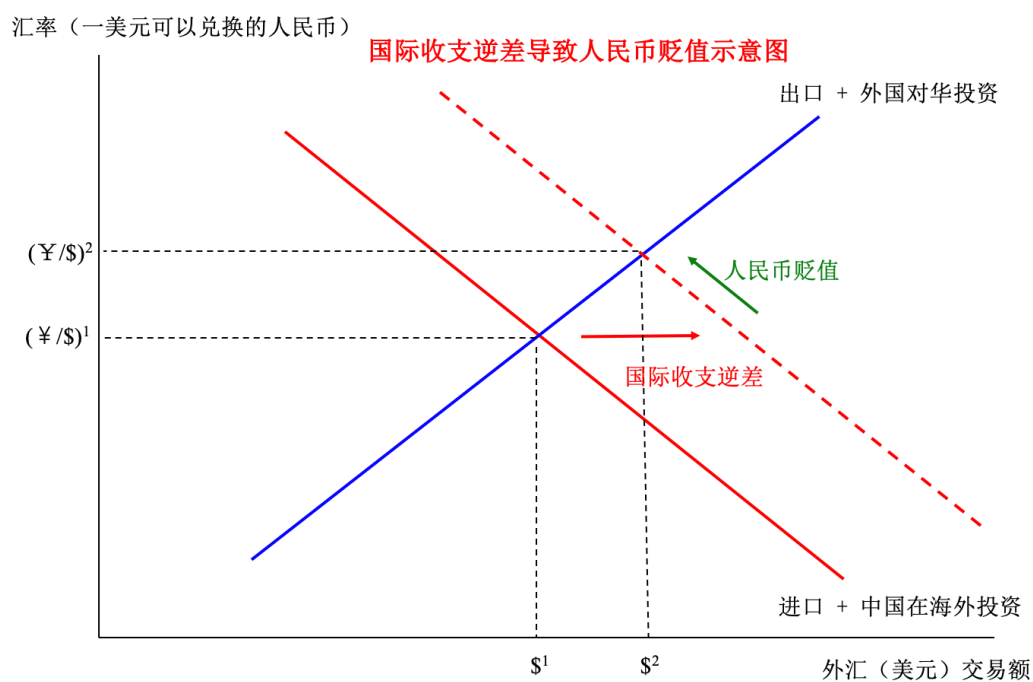


该图横轴表示的是外汇（美元）交易额，纵轴表示的是人民币汇率（一美元可以兑换的人民币，也可以理解为按照人民币计算的一单位外币的“价格”）。图中，蓝色曲线代表的是外汇（美元）的供给。假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美元相对于人民币升值（一美元可以兑换更多的人民币），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商品按照美元计算就会更加便宜，按照美元计算的中国资产价格也会下降，从而刺激外国的资本家增加对中国商品和资产的需求。在中国的外汇市场上，这就会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同时增加外汇的供给。因此，蓝色曲线是一条正斜率的、向上倾斜的曲线，说明外汇的供给与一美元可以兑换的人民币（按照人民币计算的一单位外币的“价格”）呈正相关关系。

红色曲线代表的是对外汇（美元）的需求。假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一美元可以兑换比较少的人民币），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按照人民币计算就会比较便宜，按照人民币计算的外国资产价格也会下降，从而刺激中国的资本家增加对外国商品和资产的需求。在中国的外汇市场上，这就会增加人民币的供给，同时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因此，红色曲线是一条负斜率的、向下倾斜的曲线，说明对外汇的需求与一美元可以兑换的人民币（按照人民币计算的一单位外币的“价格”）呈负相关关系。

当红蓝两线相交时，说明外汇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了均衡，这个时候的汇率也就是外汇市场上的均衡汇率。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资本家由于对特色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发生了大规模资本外逃，从而导致中国的国际收支账户发生大量逆差。在外汇市场供求示意图中，这一情况可以用外汇需求曲线（红色曲线）向右移动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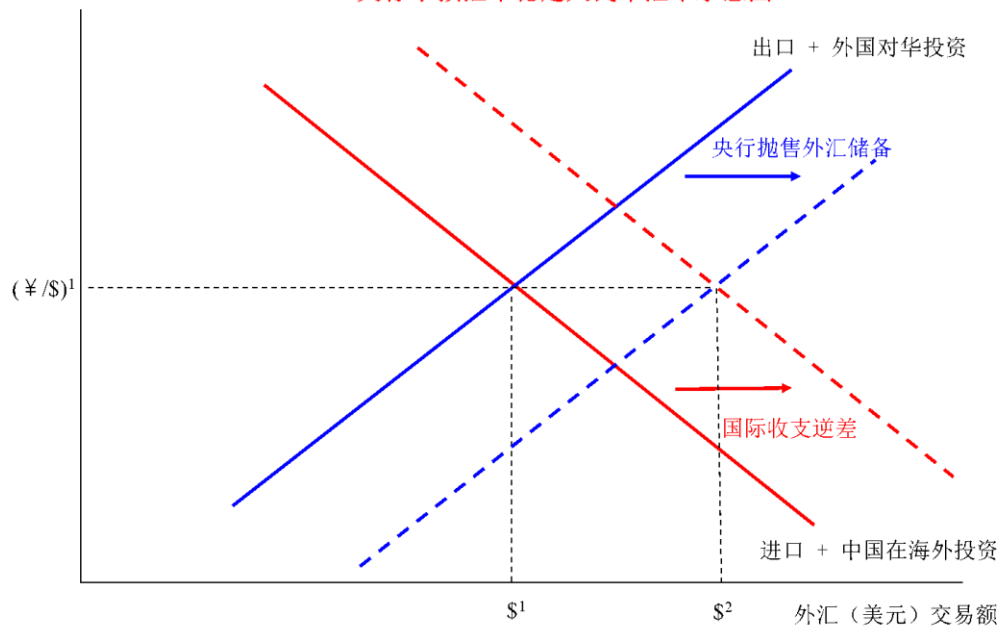


由于外汇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原来的汇率水平上，对外汇的需求大于外汇的供给，从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这时，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干预，在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计算的外汇（美元）价格就会不断上涨。随着按照人民币计算的外汇（美元）价格上涨，对外汇的需求会有所减少、供给会有所增加，直至外汇需求曲线与外汇供给曲线相交于一个更高的均衡点。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国实行的是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中央银行虽然不设定法定汇率，但却通过**买卖外汇**的方式干预外汇市场，**将汇率波动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如果中国经济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逆差，中央银行可以选择对外汇市场做出干预以稳定汇率。下图说明了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汇率的情况：

汇率（一美元可以兑换的人民币） 央行干预汇市稳定人民币汇率示意图



当外汇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时，中央银行可以选择抛售外汇储备，以增加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给。在上图中，这表现为蓝色曲线向右移动。如果蓝色曲线右移动的幅度与红色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一样大，那么虽然发生了国际收支逆差，人民币汇率仍然可以保持稳定。如果这里设想的国际收支逆差是由私人资本家的资本外逃引起的，那么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实质，就是用中央银行以往积累的外汇储备来满足私人资本外逃的需要。

但是，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汇率的能力受到其所积累的外汇储备的限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非常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不断地消耗中央银行原来持有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最终会因为外汇储备枯竭而不得不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那时，这个国家的货币就会发生的大幅度的急剧贬值，正如 1997-1998 年多个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俄罗斯曾经遭遇的情况。

第十九期 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

作者：远航一号

在以前的“学点经济学”中曾经介绍过，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就业人数乘以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在长期是趋于不断增长的。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阶级将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不断用于新投资、开发新技术从而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各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

那么，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怎样实现的呢？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为此就要努力增加每单位劳动力操作的机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等并为这些不断增长的机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提供厂房、办公楼等操作空间并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发电厂、自来水厂、供暖供气设施、炼油厂、加油站等）。这样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需要每单位劳动力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存量（所谓“固定资本”，即可以长期使用的机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建筑物等生产资料）不断增长。我们将每单位劳动力使用的固定资本存量称之为“资本劳动比”（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将每单位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 GDP（等于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劳动比之比）称之为“资本生产率”（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倒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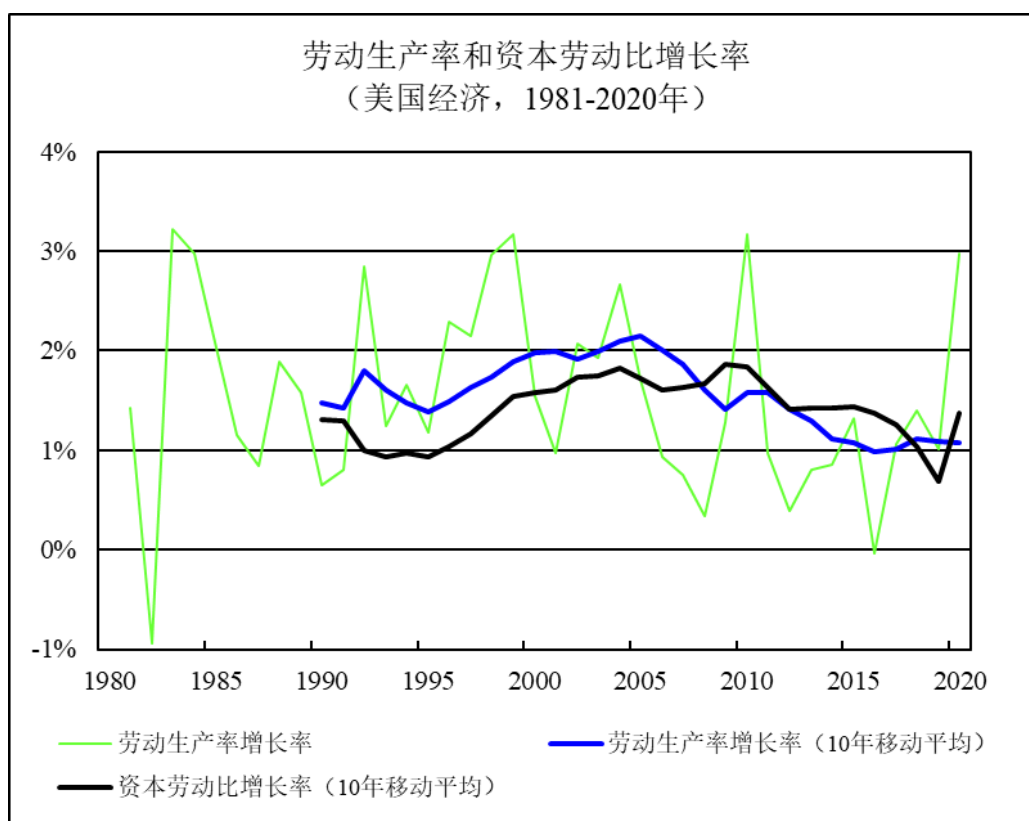
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以外的方法来改进技术、改善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我们将后面这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称之为“自发的技术进步”。

如果用英文小写字母“y”来代表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用“ $\Delta y/y$ ”来表示。其中，希腊字母“ Δ ”表示一个变量的变化。再用英文小写字母“a”来表示自发的技术进步率，用英文小写字母“k”表示资本劳动比，用“ $\Delta k/k$ ”表示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那么，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自发技术进步率和资本劳动比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说明：

$$\Delta y/y = a + \beta * \Delta k/k$$

上式中，希腊字母“ β ”（读作“贝塔”）代表“资本产出弹性”，也就是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资本劳动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多少个百分点。一般来说，“ β ”大于零但小于一。

关于怎样计算“资本产出弹性”，经济学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一种常用的方法，是用资本总收入（包括利润和固定资本折旧）占资本总收入与劳动收入之和的比例来估算。按照这种方法估算，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大约是 0.4，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大约是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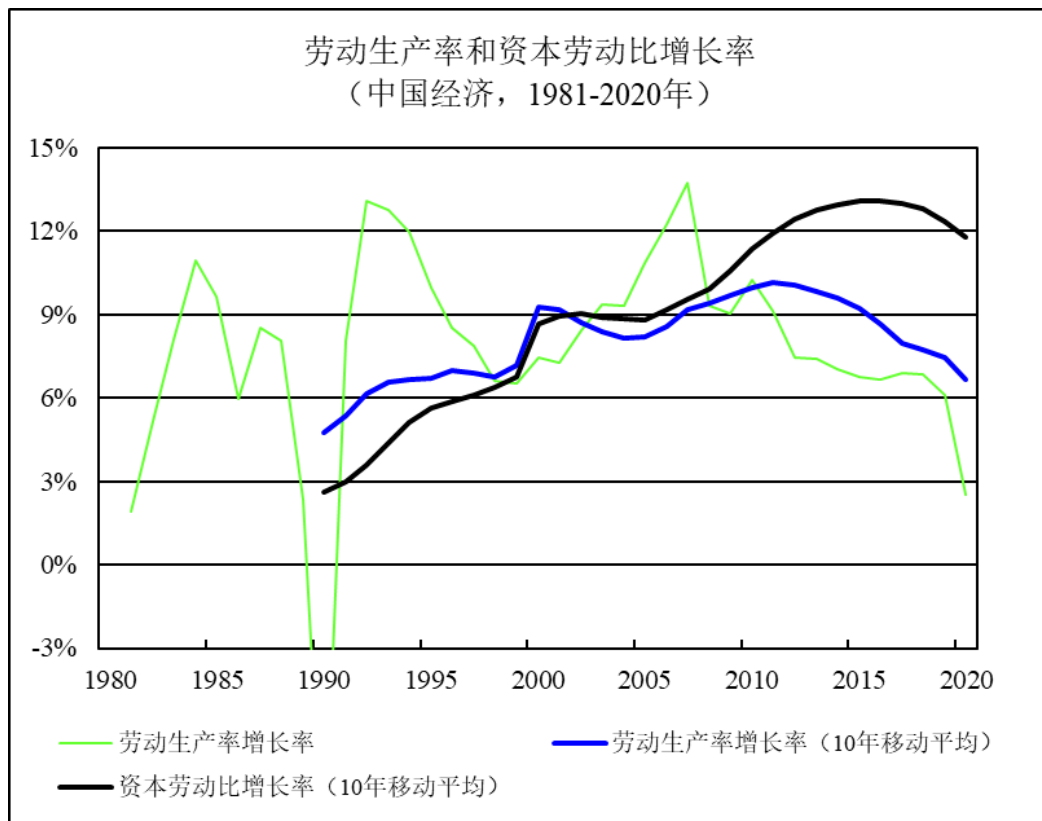
上面第一图比较了自 1981 年以来，美国经济历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十年移动平均值以及资本劳动比增长率的十年移动平均值。

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带有比较明显的随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过去，一般来说，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经济衰退年会大幅度下降（在 1982 甚至负增长 0.9%），在经济复苏的初期则会显著加速。但是，在 2020 年，根据美国官方的初步统计数据，虽然美国经济萎缩 3.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美国经济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反而增长了 3%；这说明在新冠疫情衰退期间失业的主要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一些行业的就业人员。

就美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资本劳动比增长率的比较来说，大约在 2005 年以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一般高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说明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是趋于增长的。在 2005 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资本劳动比增长率大致相当，说明自那时以来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大致保持稳定。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十年移动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反映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在 1986-1995 年期间是 1.4%，此后逐年上升，至 1996-2005 年期间达到了 2.1% 的高峰。这反映了在这一时期，由于以计算机、网络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美国经济一度出现了技术进步加快的趋势。但是，自那时以后，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便一直趋于下降。至 2011-2020 年期间，美国经济十年移动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1.1%。所以，与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以及迷信资本主义技术的狂热的“工业党”分子所鼓吹的相反，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不是在加快而是逐年放缓。

下面第二图比较了自 1981 年以来，中国经济历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十年移动平均值以及资本劳动比增长率的十年移动平均值。



从 1981 年至 2011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总的来说趋于上升（其中 2007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一度高达近 14%）。中国经济十年移动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 1981-1990 年的 4.7% 增加至 2002-2011 年的 10.1%。但是，自那时起，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便趋于下降。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到 2.5%，这是在中国经济全面完成资本主义过渡以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最低水平。2011-2020 年，中国经济在这十年中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 6.7%。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致相当。但是，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已经显著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似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反映了中国经济近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高强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自发的技术进步。

下面的表比较了自 1981 年以来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在各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资本劳动比的平均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来自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用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乘以“资本产出弹性”）以及自发技术进步速度。由于四舍五入等原因，表中的第三列和第四列数字之和有时并不一定恰好等于第一列的数字。

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和技术进步

(美国和中国, 1981-2020 年)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资本劳动比 增长率	资本劳动比对 生产率增长贡献	自发技术进步对 生产率增长贡献
美国:				
1981-1990 年	1.5%	1.3%	0.5%	1.0%
1991-2000 年	2.0%	1.6%	0.5%	1.5%
2001-2010 年	1.6%	1.8%	0.7%	0.9%
2011-2020 年	1.1%	1.4%	0.5%	0.6%
中国:				
1981-1990 年	4.7%	2.6%	1.0%	3.9%
1991-2000 年	9.3%	8.6%	4.5%	4.9%
2001-2010 年	10.0%	11.3%	6.4%	3.6%
2011-2020 年	6.7%	11.8%	6.1%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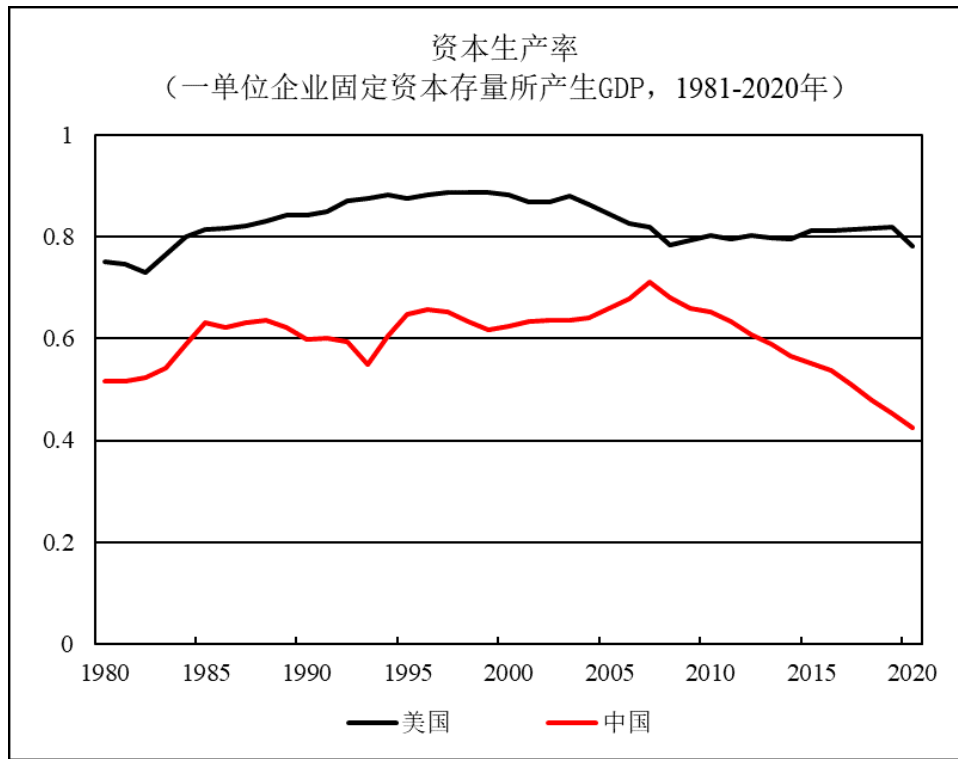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于自发技术进步,其余来自于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2001 年以来,自发技术进步的贡献占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其贡献的份额一般仍然在一半以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发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的比例一度达到近 80%。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自发技术进步贡献的比例已经不到一半。自 2011 年以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几乎全部依赖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后者贡献的比例超过了 90%)。

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贡献来源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在中国经济争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制造业出口中心的年代,由于核心国家已经“成熟”的工业资本和技术(即已经丧失垄断地位、在核心国家中不再有利可图的行业)大量向中国转移,中国得以在若干中低附加价值的产业实现技术“赶超”,在统计上就表现为比较快速的技术进步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核心国家不再向中国转移最尖端、垄断利润最高的技术,资本家的急功近利和官僚体系的腐朽又决定了中国所谓“自主技术创新”在所有重要的、实质性的方面都必然遭到失败。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空间日益枯

竭，不得不依靠高强度的固定资本投资勉强维持一定速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出现了急剧的、大幅度的下降。



上图比较了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资本生产率（一单位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所产生的GDP）。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1980年至2000年），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是趋于上升的。2003年以后，由于投资泡沫等原因，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一度下跌。自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一直保持在0.8左右（即每一美元的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带来0.8美元的GDP）。

在1985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一般在0.6上下波动（即每一元人民币的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带来0.6元的GDP）。到了2007年，由于出口繁荣，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一度增加到0.71。然而，自那时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就一直趋于下降，至2020年，已经下降到0.43；与2007年高峰时相比，已经下降了39%；与美国2020年的资本生产率相比，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55%。

这一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有重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生产率大致保持不变，那么一定的投资率（固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例）可以在未来转化为一定的、与当前增长率水平大致相当的经济增长率；换言之，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未来会大致保持稳定。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生产率不断地趋于下降，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必须用越来越高的投资率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如果资本生产率趋于下降，投资率却保持不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趋于下降。

第二单元 经济演变与阶级斗争

第二十期 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的美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作者：草庐棋士、远航一号

在以前的“学点经济学”中，我们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和有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知识。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把历史、理论和统计结合起来，分成几个时期分别分析美国和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经济结构的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可以与读者一起来认识和把握美、中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条件下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主要阶级矛盾的若干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条件并展望世界革命的伟大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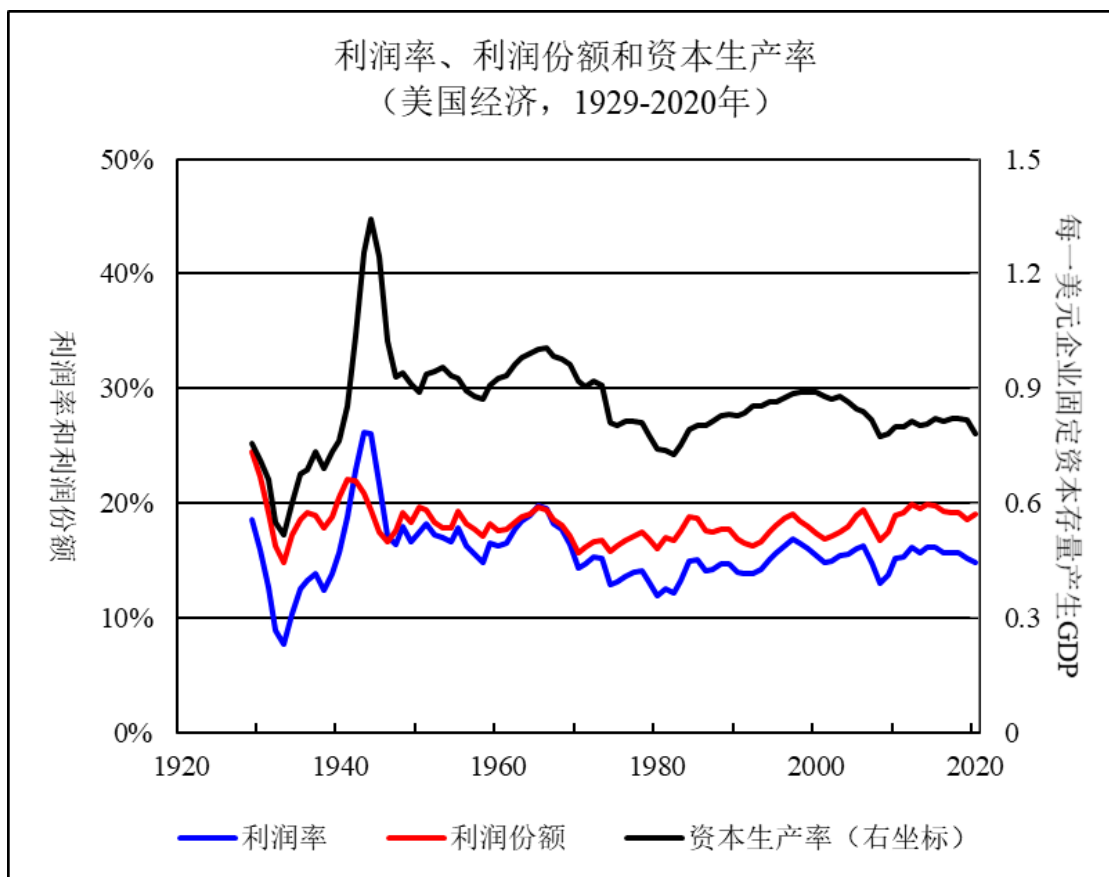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完全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随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战败，在世界各大国之间恢复了“和平”。在军事上，美国的海空军控制着世界各大洋以及主要海峡、航道，其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在经济上，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值的一半、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的 90%。

按照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来说，1950 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 27%，英国经济占 7%，法国经济占 4%。苏联虽然在战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胜利，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人口和物质财富方面都蒙受了重大损失。1950 年，苏联经济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0%。

中国在以往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据估计，在十九世纪初，中国的经济产值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但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历了帝国主义以及本国反动统治者一个多世纪的残酷压榨以后，至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 年时，中国经济产值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5%。

总之，在二十世纪中期时，美国相对于其他各主要大国都拥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下图显示了美国经济从 1929 年到 2020 年的利润率（蓝线），利润份额（红线）和资本生产率（黑线）：



图中，利润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与资本家阶级的预付总资本（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之比。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资本生产率（见右坐标）是每一美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经济产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利润率 = 利润份额 * 资本生产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总利润，指的是“税前利润”，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度十分繁荣。1929年时，利润份额达到24%。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的投资泡沫和生产过剩比较严重，1929年时，资本生产率为0.76（处于较低水平）。利润份额与资本生产率相乘，1929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约为19%。

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崩溃。1933年，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下跌到0.52，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不足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相反，美国实行了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全面动员，政府采购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失业和生产过剩一扫而光，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奇迹。从 1939 年至 1944 年，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15%，在五年时间中翻了一番。

由于战争动员，1944 年，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暴涨至 1.34，平均利润率上升到 26%。不过，战争期间，企业所得税约占美国公司企业利润的一半；此外，美国资本家当时还要缴纳高额的累进个人收入所得税。

朝鲜战争以后的数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1954 年、1958 年、1960 年，美国经济在短短六年时间中经历了三次衰退。六十年代前半期，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代，美国政府第一次自觉地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扩张。约翰逊上台后，一方面提出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的所谓“伟大社会”计划，另一方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动几十万地面部队直接侵略越南南方。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了既要大炮又要黄油的“黄金年代”。

1965 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的繁荣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分别达到了近 20%。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物极必反，在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全面爆发。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基本上消耗殆尽。由于害怕工人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做出让步，实行了各种社会福利项目。然而，福利国家的扩大以及长期的低失业率，使得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大大增强，有组织的工人队伍也不断增长。工会会员人数占非农业部门雇员总数的比例从 1935 年的 13% 增加到 1945 年的 35%，并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中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平。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明显增强。到 1970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了 14%、利润份额下降到了 16%。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全面激化。1970 年，由于美国黄金储备枯竭，美元被迫贬值。同年，美国常规石油产量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美国从此失去了世界石油市场的定价权。1973 年，为抗议美帝国主义支持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提高油价，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从这一年的平均每桶约 3 美元暴涨到次年的平均每桶约 11 美元。石油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在战后曾经长期实行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1973年初，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巴黎签署和平协定，承诺从越南撤出全部武装力量，标志着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完全失败。1975年，越南南方全境解放，越南统一。

与此同时，美国资本主义的国内经济也陷入困境，出现了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停滞膨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此束手无策。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美元暴跌。黄金价格从1970年以前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暴涨到1979年末的46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1980年，黄金价格一度暴涨到85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年末回落到约60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元面临着彻底崩溃、丧失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危险。至1980年，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下跌到0.74，平均利润率下跌到12%；两者均为大萧条以来最低水平。

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内国际形势，美国资产阶级在经过内部的激烈争吵以后，逐渐形成了新的反革命共识。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和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时代。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和外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中仍然流行着种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套经济政策，企图全面复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否定国家干预的必要。这些人认为，如果有些国家实行了“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就不能算是新自由主义。还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金融化，是金融资本压倒产业资本；从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不仅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产业资本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些人认为，如果有些国家的资本积累似乎以产业资本为主，也不能算是新自由主义。我们认为，上述的两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片面的。

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由于世界资本主义长期矛盾的积累以及美帝国主义霸权地位的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改良并缓和一系列基本矛盾的能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当帝国主义的霸权还处于全盛和扩张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大幅度增长，由于这些国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一度向工人阶级靠拢，也由于广大外围地区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陷入了严重危机。为了挽救这一严重的危机，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得不集结其尚能动员的全部力量向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止利润率的下降、恢复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主要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内部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大大向前推进，全球生态体系

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帝国主义在一度“中兴”以后又加速衰落。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大反扑因而最终将为埋葬他们自己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早在里根政府粉墨登场之前，国际资产阶级就已经在酝酿世界范围的新的反革命攻势。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策划由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阿连德进步政府，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然后进行了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的第一场“货币主义”实验。所谓“货币主义”，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种学说（其创始人即备受中国资产阶级推崇的美国反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货币主义主张用大幅度紧缩货币供给、提高利率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其真实目的，是企图用人为制造经济危机、增加失业率的办法，来打击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恢复资本家的利润率。

1976年，中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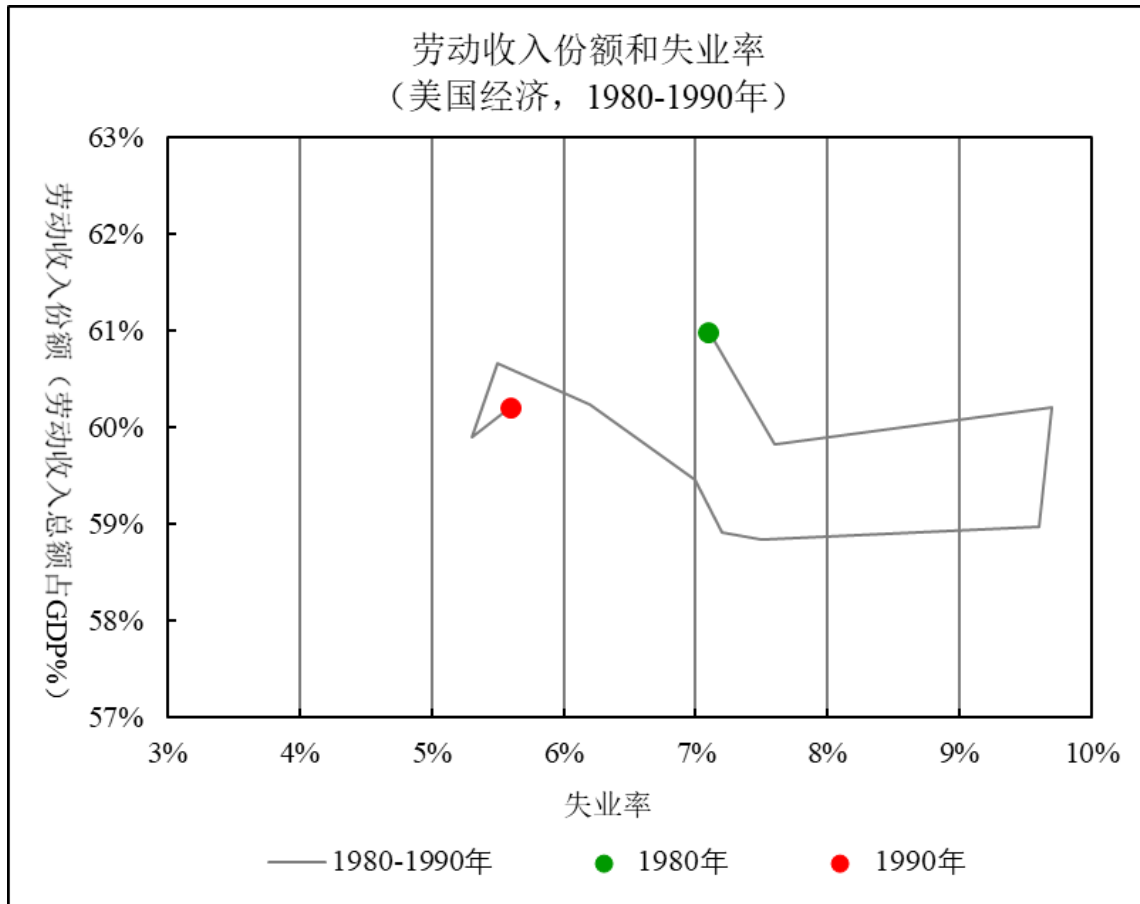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内外交困。1974年初，由于煤矿工人罢工，英国被迫实行每周对一般企业和居民区仅供电三天的供电制度，各电视台、广播公司在晚10点半以后一律停止广播。1978年末、1979年初的冬天特别寒冷，英国各行各业工人纷纷罢工；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争取到了工资一次性上涨17%的胜利。

1979年，以卡拉汉为首的工党政府垮台，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撒切尔上台后，叫嚣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以外，“别无选择”；主张要建立一个“三分之二富人、三分之一穷人”的社会（所谓“三分之二富人”当然是欺骗，而“三分之一穷人”则是用制造大量赤贫来恐吓工人阶级）。

1979年，保罗·沃尔克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此公后来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开始全面推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到1980年，美国银行优惠贷款利率上涨到约15%，三十年住房贷款利率上涨到约14%。1981年，美国联邦航空管制员发起了要求缩减工时、增加工资的罢工。里根政府拒绝与罢工工人谈判并强令工人复工。最后，里根当局将不服从复工命令的工人全部开除，用军队系统的航空管制员来代替。航空管制员罢工的失败是美国有组织工人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此后，美国工人的工会参与率直线下降。至1990年，美国私人部门工会会员占全部雇员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2%，低于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1980年到1990年间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和失业率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图中的绿点说明的是1980年的失业率（见横

轴坐标)和同一年的劳动收入份额(见纵轴坐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的组合在图中划出一道灰色的轨迹,最终在红点(1990年)收尾。这里的劳动收入包括了全部雇员报酬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



1982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达到到了9.7%。这是美国在战后历次经济危机中所经历过的最高的失业率,甚至超过了后来2009年“大衰退”期间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的年平均失业率。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约61%下降到了1983年的59%。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在八十年代中期走向复苏,劳动收入份额也开始回升。1988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下降到5.5%,劳动收入份额则达到了近61%。可见,虽然美国资产阶级在八十年代初发起了货币主义攻势,有组织工人运动又受到重大挫折,美国工人阶级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斗争力量,甚至在经济周期后期还有能力基本恢复原有的劳动收入份额。美国劳资双方的经济斗争在八十年代还处于僵持的状态。

在最初几期“学点经济学”中，我们介绍了支出法和收入法 GDP，两者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达：

$$GDP（支出法）= 居民消费 + 国内总投资 + 政府消费 + 净出口$$

$$GDP（收入法）= 劳动收入总额 + 间接税 + 固定资本折旧 + 利润总额$$

如果没有统计误差，收入法 GDP 就等于支出法 GDP。于是就有：

$$\begin{aligned} & \text{劳动收入总额} + \text{间接税} + \text{固定资本折旧} + \text{利润总额} \\ & = \text{居民消费} + \text{总投资} + \text{政府消费} + \text{净出口} \end{alig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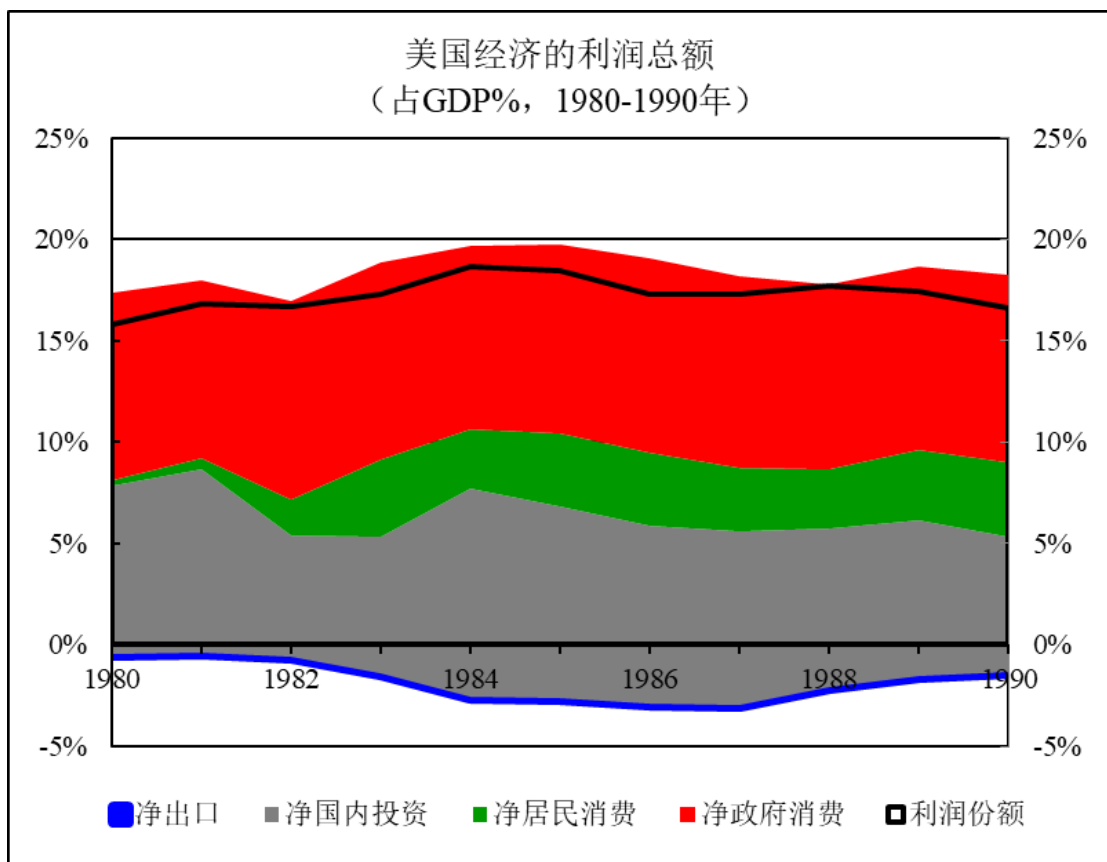
我们把劳动收入总额、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折旧转移到等式的右边，就能得到：

$$\text{利润总额} = \text{净出口} + (\text{总投资} - \text{固定资本折旧}) + (\text{居民消费} - \text{劳动收入总额}) + (\text{政府消费} - \text{间接税})$$

$$\text{利润总额} = \text{净出口} + \text{净国内投资} + \text{净居民消费} + \text{净政府消费}$$

上式中，净居民消费反映的是全部居民消费超出劳动收入总额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是资本家消费，一部分是工人阶级家庭为了维持生活水平而被迫进行的借债消费；在经济危机期间，净居民消费的规模也受到政府发放的失业补助金、社会保险金等转移支付的影响。净政府消费是政府消费（其中主要部分为政府部门雇员报酬）扣除间接税以后剩余的部分，是一个与政府财政赤字有关但不完全相等的概念。八十年代时，美国净政府消费占 GDP 的比例大约比政府部门赤字占 GDP 的比例高出三个百分点。

通过将利润总额分解为这四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对资本家利润总额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分析资本家利润总额在各个经济部门的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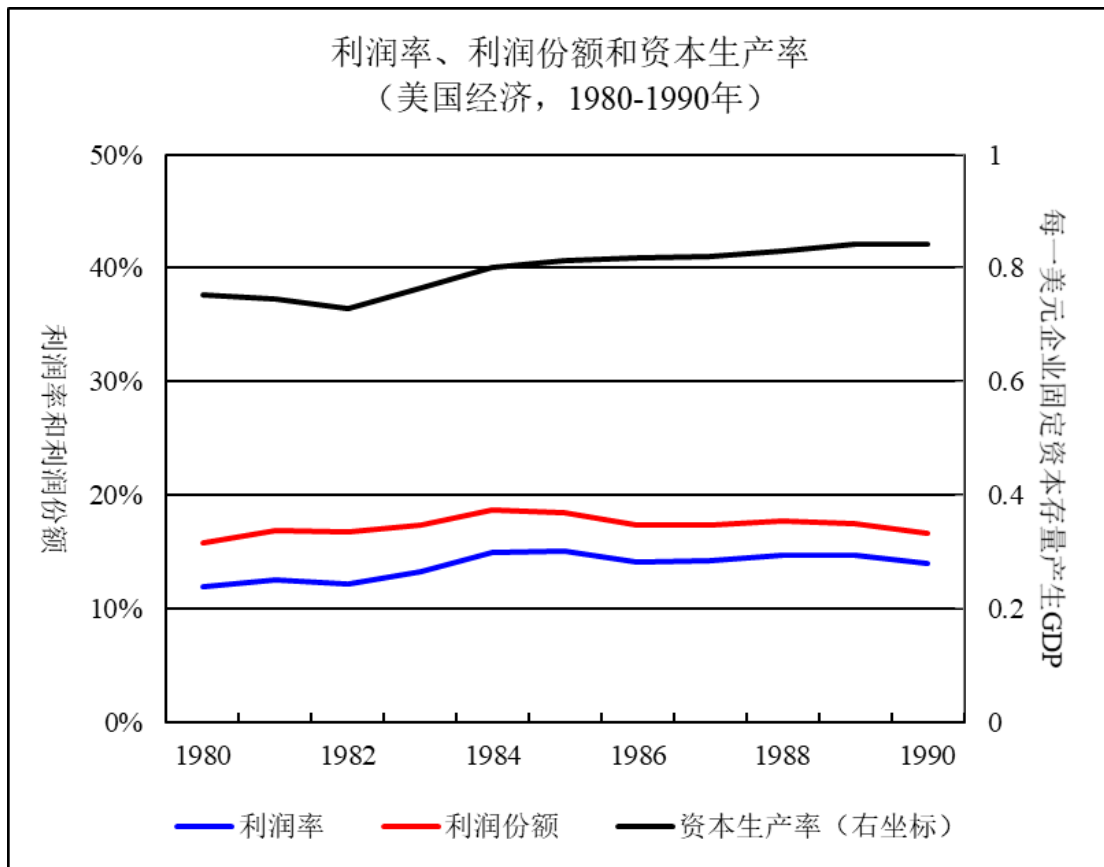
上面第三个图介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利润总额及其四个组成部分。图中，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GDP的比例。在整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贸易中都处于逆差，所以净出口一直都是负值；在图中，贸易逆差用零线以下的蓝色边框来表示。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出，按收入法计算的利润份额与净出口、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相加所得的利润份额并不完全一致，这是由于收入法和支出法GDP之间的统计误差造成的。

1980年时，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为15.8%。如果从需求角度分解，这一年美国的净政府消费占GDP的9.2%，净国内投资占GDP的8.3%，净居民消费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从需求角度分析，净政府消费在这一年“贡献”了美国资本家利润总额的约58%。一个庞大的政府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总利润的基本稳定，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大区别。另外，净国内投资相当于资本家利润总额的53%，这说明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可以用大约一半的资本家利润来从事生产性投资。净国内投资

与净政府消费相加超过了利润总额，一部分是因为统计误差，一部分是因为贸易逆差（从而净出口对利润总额的“贡献”是负值）。

到了 1990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增加到了 16.6%。从需求角度分解，这一年美国的净政府消费仍然占 GDP 的 9.2%，净国内投资占 GDP 的 6.6%。就是说，到了 1990 年，只有大约 40% 的资本家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更多的资本家利润被用来从事挥霍浪费或金融投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净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增加到了 3.7%，相当于资本家利润总额的 22%。这说明，随着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陷入停滞，开始出现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庭开始依靠借债消费来维持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

最后一张图说明的是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到八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恢复到了 14-15%，初步走出了 1974-1982 年期间的利润率低谷，但是距离六十年代繁荣时期的利润率高峰仍然有相当差距。



当八十年代走向尾声的时候，核心国家的阶级斗争仍然处于僵局，美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势在国内阶级斗争的战场上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新自由主义初期的紧缩政策是核心国家资产阶级针对本国工人的短期策略，但是八十年代的高利率环境却对当时的半外围国家（主要是前苏联、东欧和拉美国家）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半外围国家产业后备军迅速萎缩，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小资产阶级也要求享受与核心国家小资对等的生活待遇。这些国家的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面临着一方面要争取实现快速资本积累（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人和小资对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要求（以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双重压力。

七十年代时，世界市场上的油价暴涨，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积攒了大量美元；由于这些石油输出国的封建王公无法将多出来的美元用于生产建设，这些数以亿计的美元就纷纷存入欧美国家的银行，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资本严重过剩、利率一度十分低廉，实际利率甚至是负值。这些因为石油价格暴涨而形成的美元存款，当时称之为“石油美元”。

面对正在形成中的积累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危机，东欧、拉美等半外围国家将欧美国家银行的低利率贷款视为救命稻草，幻想通过借债消费和投资，可以一方面维持快速经济增长，一方面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要。孰料，1979年，美联储大幅度提高利率，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也随之暴涨，许多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立刻陷入了无力偿还外债的窘境。以东欧国家为例，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后期，东欧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负担（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贸易额的比例）从原来的0上升到了32%。

1980年，波兰政府为了偿还外债，企图向工人阶级转嫁负担，被迫宣布提高基本食品价格，结果引起了团结工会运动。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到了1985年，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暴跌，以石油出口为主要外汇来源的苏联经济开始陷入困境，依靠苏联以易货贸易方式补贴外汇的东欧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朝鲜经济处境更加困难。到了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失败；两年后，苏联解体。

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时候，六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的阴霾似乎已经一扫而光，美国霸权似乎即将迎来“伟大的复兴”。资产阶级的御用辩护士们急急忙忙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了。

事实上，世界阶级斗争刚刚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形成，全世界劳动人民反抗新自由主义复辟和反动的斗争也就开始了。

第二十一期 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中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作者：草庐棋士、远航一号

自从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之后，中国逐渐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制成品市场，沦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面对民生凋敝、商旅不振、“匪”患不绝、贪腐横行的糜烂世道，中国统治阶级中的精英分子，即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也曾拿出过民族自救的方案。然而这些精英分子一不能团结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二不能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无法克服外围国家统治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因而终究无法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找到出路，无法为资本积累即工业化创造条件。“老大帝国”终究谢幕，“中华民国”也还是东亚病夫。要走出民族危机，再造“少年中国”，就必须搞广泛深入的社会革命。要搞广泛深入的社会革命，就必须动员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其实际历史内容来说，不是指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式来完成建设独立民族国家和完成基本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即传统上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的建立靠的是劳动人民的大联合，新中国存续的关键就在于让劳动人民分享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果实。支撑新中国时期（1949-1976 年）社会稳定和资本积累秩序的机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即劳动人民接受革命后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治格局，国家向劳动人民保证提升生活水平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然而随着掌控国家机器的革命干部逐渐蜕变为实际上掌握生产资料并拥有独立于劳动人民的特殊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也摇摇欲坠。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带领劳动人民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但是中国劳动人民在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无价瑰宝。

从 1967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总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总退却时期。在中国革命退却、世界革命高潮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毛主席对官僚特权集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事实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并且做出了重新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战略决策（这在当时具体表现为中美关系的急剧改善）。这一决策，在当时来说，是受到了国际国内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不得已的方面，但是其长远的影响是严重的。

随着中国重返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国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方面，更加依赖于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技术和先进设备；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特权集团（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享受越来越多的进口消费品。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需求以及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意味着中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逐步加深。以商品和服务进口占中国经济的比例来说，1960年为4.4%；六十年代，中国与原来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大幅度萎缩，到1970年，进口占中国经济的比例下降到2.5%。七十年代，中国加入了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至1980年，进口占中国经济的比例上升到了6.5%；至1990年，进一步上升到10.7%。从1970年至1990年，中国按照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同一时期，进口占GDP的比例翻了两番，意味着中国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5%，即进口的美元金额每隔四、五年就要翻一番。

要满足进口的高速增长，需要中国的商品出口也要高速增长。但是，虽然中国进行了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个别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然而总的来说，中国工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仍然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工业不可能在尖端技术领域与西方国家竞争。中国虽然国土广大、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比较贫乏，因而也不可能像中东、拉美国家那样靠出口自然资源来达到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样，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就只有一项“比较优势”，即只能依靠数量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来竞争。但是，要实现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首先就需要彻底瓦解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保障劳动人民基本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所以，只要官僚特权集团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中国重新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特权集团开始向官僚资产阶级演变。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依附于蒋家王朝的“官僚资产阶级”，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新产物，与旧的“官僚资产阶级”既不存在政治上也不存在经济上的直接联系。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亦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特权集团；后者虽然掌握政治权力和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权，但是还没有从法律上占有生产资料、住房等私有财产，其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主要依靠官僚特权待遇、裙带关系和零散的腐败行为，其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仍然是不正规和不稳定的。与官僚特权集团不同，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先是通过人民公社解体，再是通过价格改革、“双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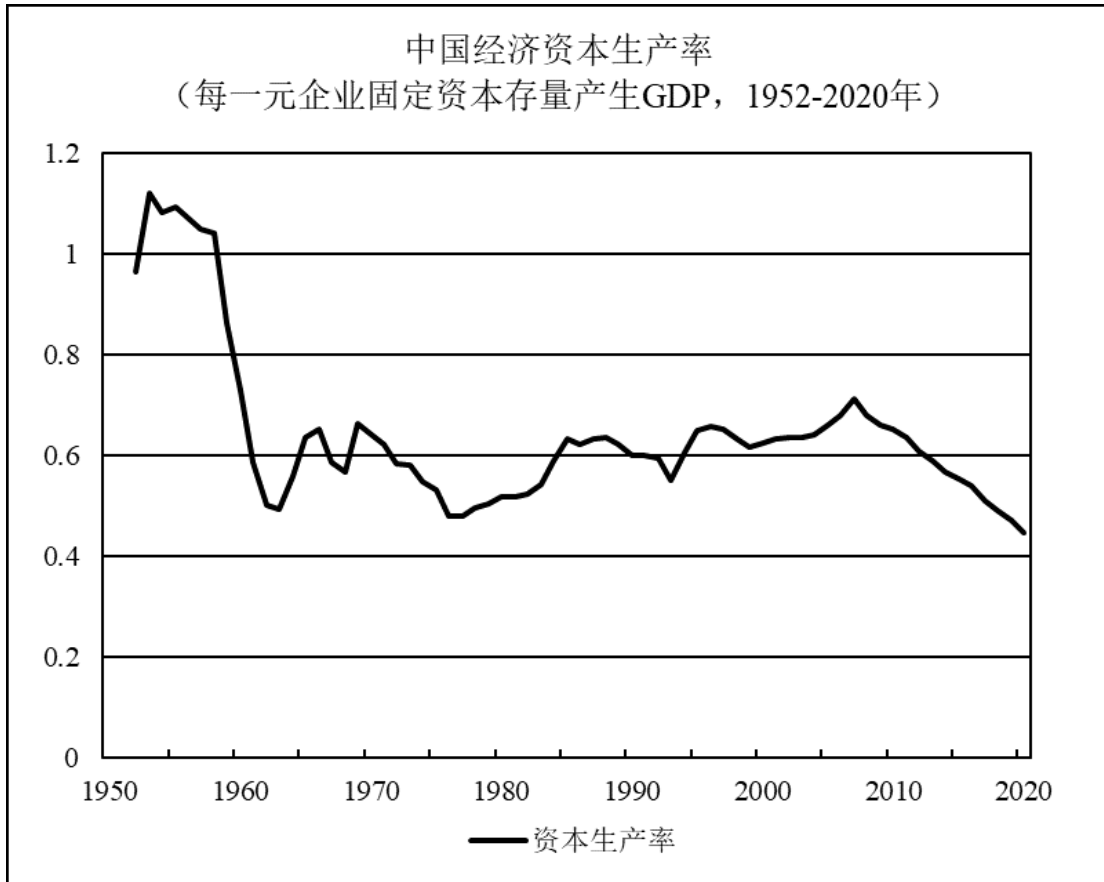
而后通过国企私有化等掠夺了大量原来属于全民与集体所有的财产，聚敛了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大量私人财富。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今天统治中国的具备完全形态的资产阶级也有所不同。从马克思主义看，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掠夺全民与集体财产，带有区别于一般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积累”的性质。在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拥有了受法律和政治制度保护的私有财产，他们主要依靠“正常”的资本积累直接剥削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巧取豪夺式的原始积累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仍很普遍，但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再围绕着以什么样的手段和条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演变为赤裸裸的相互对立。首先是官僚特权集团逐渐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并与一切被剥削阶级相对立，资本主义复辟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其他三个主角——城市无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也逐渐成形。上述四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是整个复辟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能不能“处理好”与三个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维护自身统治、逐步建立新的资本积累秩序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中心任务。

那么，从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怎样才能一方面维护自身统治、一方面建立新的资本积累秩序呢？对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就是要努力建立比较稳固的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经济秩序，同时调节并缓解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其它矛盾，从而实现比较高、比较稳定的利润率，进而实现比较快速的资本积累。

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测算社会主义时期的利润率；另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润率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利润率也不完全可比。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另外一个指标，即作为利润率决定因素之一的“资本生产率”（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所产生的 GDP）。**下面第一个图介绍了 1952-2020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



如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是比较高的，平均来说，保持在 1.1 上下。由于“大跃进”失败，中国经济在六十年代初陷入严重危机；1962-1963 年，资本生产率下跌到 0.49-0.5。1969 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恢复到 0.66。在七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虽然恢复了稳定增长，但资本生产率不断下降，这意味着维持一定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不断上升，因而是不可持续的。至 1976-1977 年（华国锋叛徒集团上台的第一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下跌到了 0.48，不仅低于六十年代初经济危机时的水平，而且低于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期间最低的资本生产率（0.52）。这说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初步出现了积累危机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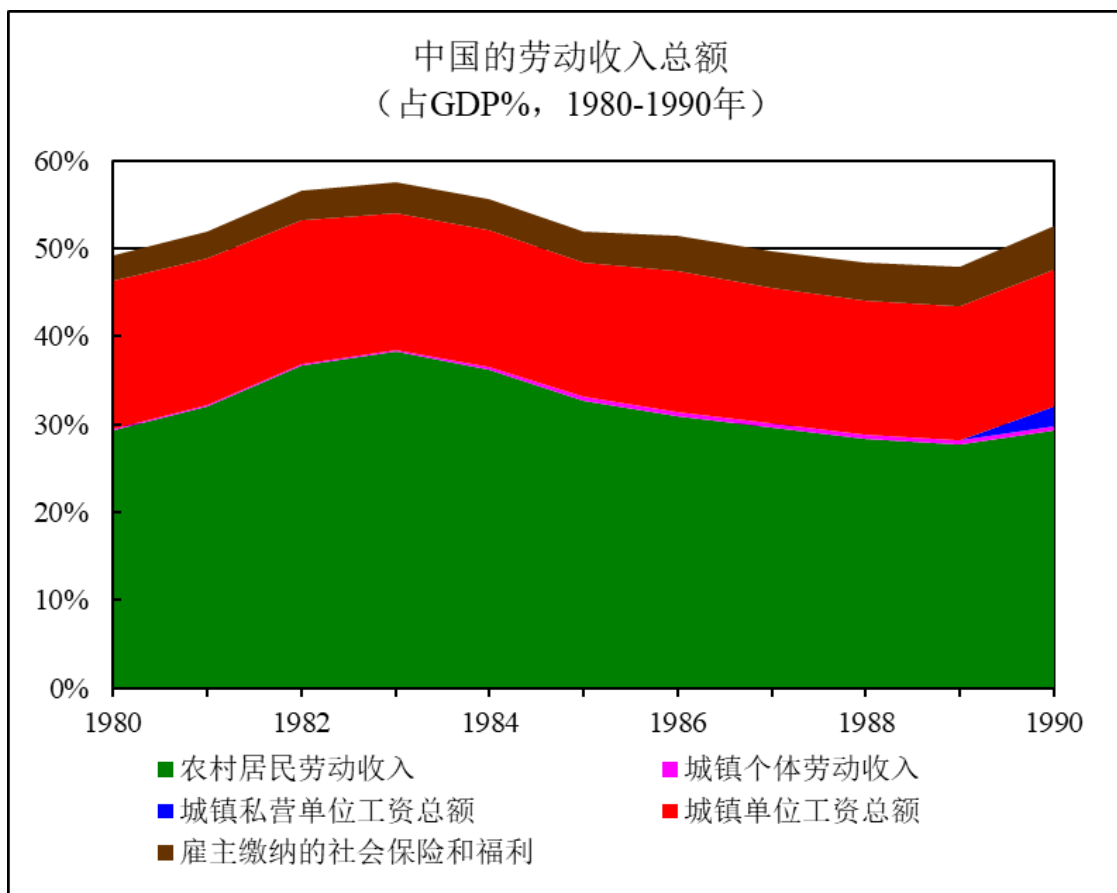
为了摆脱正在出现的积累危机，从官僚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出发，当然最好是迅速地提高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剥削率，进而提高利润率、加快资本积累。但是，如果对广大劳动群众过度剥削，势必让官僚资产阶级（后来的资产阶级）与三个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时进入敌对状态。这就意味着它在政治上会丧失合法性并陷入孤立。由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不可能从海外攫取大量剩余价值来同时安抚所有被统治

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像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通过让渡一部分从海外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来维持比较广泛的阶级妥协。纵观过去四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对三个被统治阶级执行“打（压制）一个，哄（麻痹）一个，拉（收买）一个”的分化政策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资本积累和维持政权合法性之间达成某种暂时的平衡。当然，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是总能够成功地执行“打一个，哄一个，拉一个”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能不能顺利地贯彻“三个一”的阶级斗争基本战略，要取决于中国资本积累的自身规律及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着什么样的客观历史条件。当客观条件良好时，中国资本主义自然可以在“三个一”政策下维持稳定，而当这些客观条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复存在时，中国资产阶级在处理与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就会陷入拉也拉不拢、哄也哄不乖、打也打不赢的被动局面。

具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说，官僚资产阶级基本奉行的是拉拢城市小资产阶级、哄骗农村半无产阶级，为向城市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做准备的反革命战略。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 1980-1990 年期间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保险和福利等）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八十年代，城镇单位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所谓“三资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等）。

在资本主义复辟刚刚开始的时候，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稳固，为了把反革命江山坐稳，还不得不对劳动群众采取一些欺骗手段。1979 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一年提高 22%；1980 年和 1981 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又分别提高 7%和 6%。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29%大幅度上升到 1983 年的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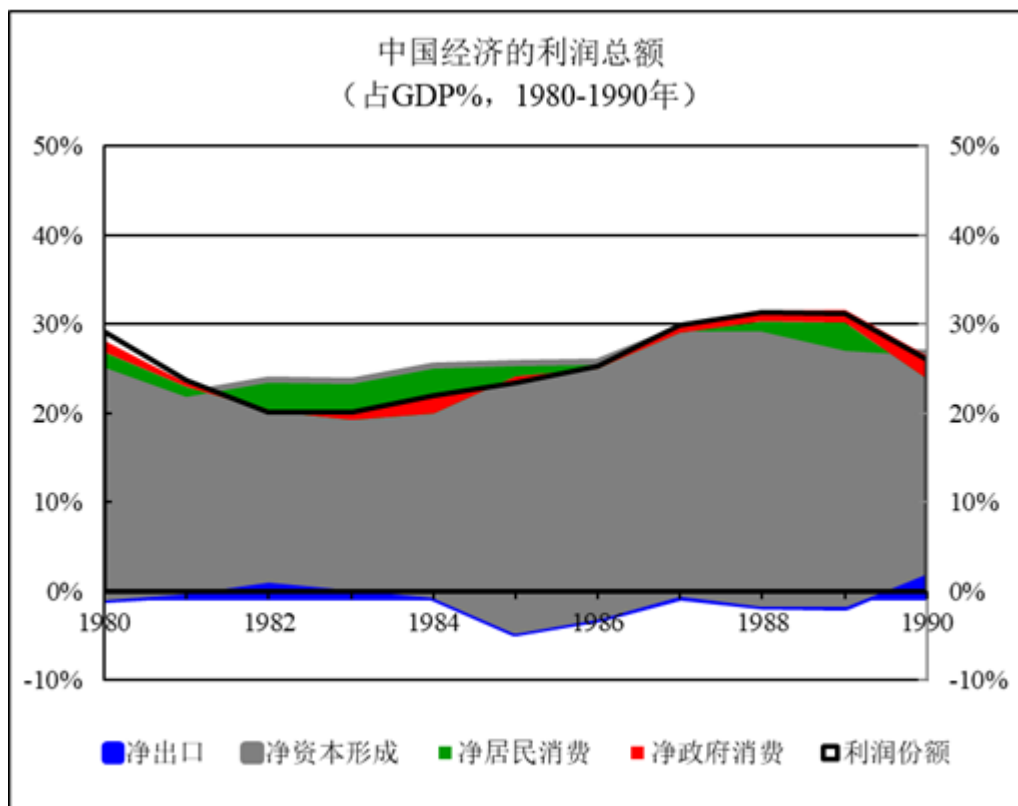


下面第三个图说明了利润总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所分解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上一期“学点经济学”所说明的，一个国家的利润总额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分解为净国内投资（国内总投资减固定资本折旧）、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减劳动收入总额）、净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减间接税）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GDP 的比例；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 GDP 的比例。

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中的政府消费与间接税总额大致相当，因而在多数年份净政府消费接近零。在 1982-1986 年期间，绿色区域出现在了黑粗线的上方。这说明，在这几年中，劳动收入总额超过了居民消费，劳动群众的储蓄水平有所增加，因而净居民消费是负值。

上一期“学点经济学”曾经说明，八十年代时，净国内投资仅占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40-50%。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利润总额几乎全部用于净国内投资；在有些年份（如 1982-1986 年），净国内投资的总额甚至还超过了利润总额。



在上图中，贸易顺差用零线以上的蓝色区域来表示，贸易逆差用零线以下的蓝色边框来表示。1985 年，中国经济发生大幅度贸易逆差，逆差规模达到 GDP 的 4%；此后，1986 年、1988 年、1989 年，中国经济连续发生贸易逆差。

如上所述，随着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势必要大幅度增加出口以满足对于西方技术设备以及消费品的需要。华国锋叛徒集团刚刚上台时，曾经幻想将中国建设成为能源和工业原料的出口国，通过出售原油等矿产品换得外汇以购买核心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进口高档消费品来满足官僚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奢侈消费的需要。这就是华国锋叛徒集团的所谓“洋跃进”计划。

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掌握了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权。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刺激下，国际原油价格从 1966 年的 1.8 美元/桶上升到了 36.8 美元/桶。在同一时期，中

国的原油产量也从每天 29 万桶上升到了 212 万桶，超过了传统产油国利比亚，接近了除东欧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产量之和。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原油行业产值在十三年内提高了 145 倍。中国在实现了原油自给目标的同时，又可以将原油产量的十分之一和大量的成品油用于出口。1980 年，中国矿物燃料出口（主要是原油出口）达到 43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 24%，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在八十年代初的官僚资产阶级看来，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当时的水平，中国石油产量的增长速度能维持六七十年代水平的话，那么“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大可通过卖石油来实现。华国锋的“建设十个大庆式油田、十个鞍钢式现代化钢铁企业”的雄心以及后来胡耀邦放纵能源矿产乱开采的“有水快流”政策都是这一设想的具体体现。

不过好景不长，国际油价在 1986 年前后又跌回到相当于 1980 价格三分之一的水平（这与美国为了搞垮苏联经济与沙特阿拉伯相勾结压低国际油价有一定关系）。1980 年后，中国石油产量的提升也极其缓慢，在七十年代仅需十年便能翻一番，而八十年代后的产量翻倍却用了超过三十年。至 1990 年，虽然中国矿物燃料出口总额达到 52 亿美元，但是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到了 8%。这样，官僚资产阶级企图依靠出口原油和矿产品出口创汇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就破灭了。

在八十年代，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是中国商品出口中另外一个主要项目。1980 年，中国出口各种轻纺产品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品 40 亿美元，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 22%；1990 年，中国出口各种轻纺产品 126 亿美元，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 20%。但是，要进一步快速扩大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就需要建立对大量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经济体制。然而，在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尚未完全瓦解，官僚资产阶级尚未做好向城市无产阶级全面进攻的准备。

至 1990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仍然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67%；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净产值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净产值的 70%。即使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轻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也仍然占轻工业工业总产值的 59%。半资本主义性质的“乡镇企业”以及完全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港澳台资企业虽然扩张迅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工业经济中还不占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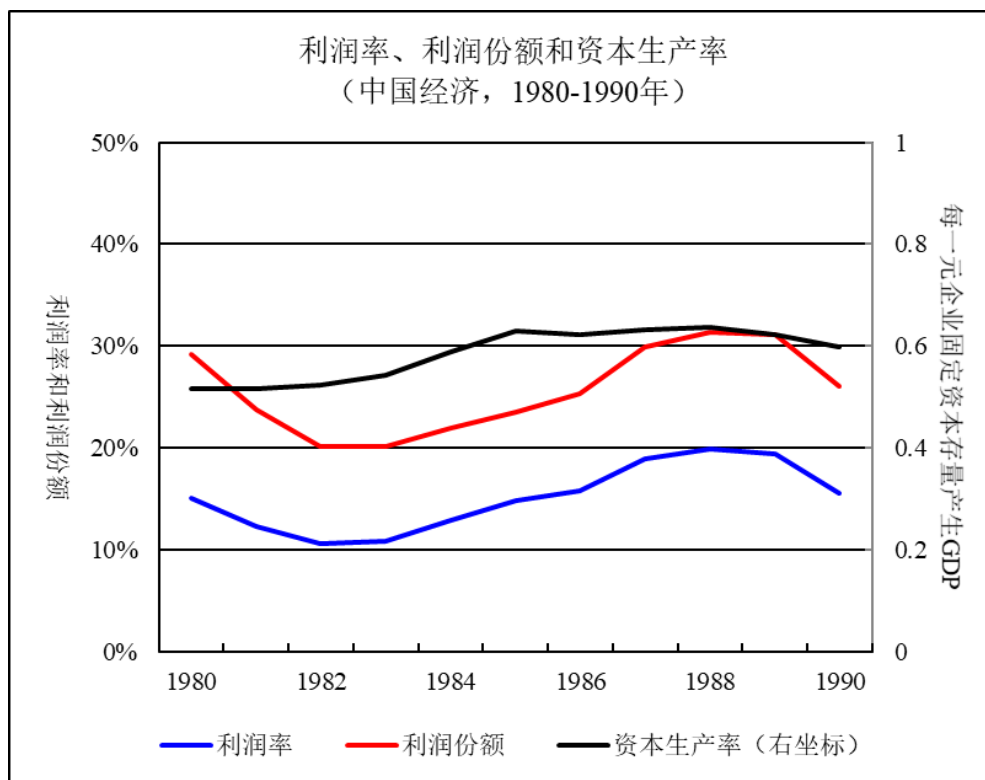
1984 年，在所谓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官僚资产阶级做出了实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国营企业中，官僚资产阶级推行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1987 年起，官僚资产阶级又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行所谓“承包制”，“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一部分剩余索取权交给内部管理人”。

不过，由于当时的城市无产阶级仍然得到“铁饭碗”等“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残余的保护，对国营企业的劳动过程仍然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仍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当时还不能够像一般资本主义企业那样任意开除工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时还不得不向工人以工资、奖金、福利等方式提供更多的“物质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资产阶级只能依靠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来维持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 1981 年的 1.7 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到 1985 年的 2.9 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再到 1990 年的 4.8 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1981-1990 年，人民币贬值 65%。

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造成了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带来了国内市场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 1985 年上涨了 12%，1986 年上涨了 7%，1987 年上涨了 9%，1988 年上涨了 21%，1989 年上涨了 16%。相比之下，1988 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比上年增长 20%；1989 年，比上年增长 11%。也就是说，在 1988-1989 年，即使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城镇职工平均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发生了下降。

下面的第四个图比较了 1980-1990 年期间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其中，利润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与资本家阶级的预付总资本（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之比。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资本生产率（见右坐标）是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经济产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 $\text{利润率} = \text{利润份额} * \text{资本生产率}$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总利润，指的是“税前利润”，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如图, 1982-1983 年, 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欺骗政策, 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一度下降到 20%; 但是, 到 1988 年, 利润份额上升到了 31%。1982 年时, 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一度下降到 11%; 至 1988 年, 利润率上升到了 20%。但是在这一时期, 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尚未取得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 因而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的政治基础仍然是极其不稳固的。

八十年代,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并不占有生产资料, 但是由于其掌握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知识, 对劳动过程有一定的垄断能力, 因而可以向雇主要求反映其垄断能力的高工资。现代小资可以相对容易地从落后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 从外围国家迁移到核心国家, 把自己的垄断技能卖出高价。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被民族国家的边界所分割不同, 现代小资产阶级可以参与一个在全球范围相对统一的高技能劳动力市场。

从其阶级利益出发, 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现代小资往往要求取消移民和旅行限制, 取消外国资本在本国投资的限制 (以利于自己在外资企业就业), 或者要求本国统治阶级为自己提供相当于核心国家小资的生活水平。因此,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 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往往是拥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而在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 小资产阶级则往往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恐惧和憎恨。由于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小资产阶级（所谓“知识分子”）的物质特权曾经一度受到限制，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确立自己相对于城市无产阶级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他们害怕劳动人民打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在政治上，他们害怕劳动人民打破他们的特权待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害怕劳动人民又把他们打成需要再教育的“臭老九”。官僚资产阶级充分地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这些恐惧和憎恨。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官僚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达成了战术同盟。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开放知青返城并安排工作、鼓励西单民主墙式的自由讨论来向小资示好，小资也投桃报李，为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舆论造势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分分合合，造成了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舞台上时而“河殤”舆论大行其道、时而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旌旗招展的怪诞局面。

然而，官僚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纵容引起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政治积极分子的错觉。他们开始大着胆子，不仅要求经济上的特权，而且要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其实质，是要向官僚资产阶级争夺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部分政治领导权，并为自己在资本主义复辟中争取更大的利益。

1989 年的社会运动从来不是自由派口中的什么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也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定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不是某些头脑不清醒的左派眼里追求更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的进步运动。这是一场由小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以向官僚资产阶级索取更高要价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小资产阶级向官僚资产阶级索取的更高要价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官僚资产阶级的贪污腐败和“官倒”不应当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小资产阶级物质消费水平应当显著且稳定地高于工人，这既可以通过中高层岗位和国际就业市场进一步对小资开放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直接给小资更多的特权待遇来实现；第三，通过开放“报禁”、“党禁”等方式，与小资产阶级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使得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人物”有更大的可能、以更加“透明”的方式加入统治阶级的队伍；第四，放松对非国营经济的管制，让小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下海”从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

在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在 1989 年的社会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仍然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没有独立地作为一个阶级发挥政治作用。

面对 1988-1989 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官僚资产阶级内部一度出现了严重分裂。以陈云为首的一批老修正主义者，幻想可以走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国内消费

市场的增长，为此就需要城市工人保持一定的购买力，还需要与城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达成某种妥协。陈云为此一度提出所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欺骗口号。

以赵紫阳为首的所谓“激进改革派”则代表着官僚资产阶级中与跨国资本关系密切同时也是政治上比较幼稚的一部分集团。一方面，他们急于打破城市无产阶级的抵抗，又迷信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条，企图实行“休克疗法”式的全面快速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赵紫阳主张，要在短时间内取消一切价格补贴和管制，叫嚣要让“价格一跳过河”。由于他们急于向城市无产阶级进攻，又高估了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赵紫阳集团主张对小资产阶级做出一定的政治上的让步以换取小资产阶级支持“休克疗法”式的“改革”。

但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邓小平集团手中，后者得到了官僚资产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并且控制着军队。在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依靠对廉价劳动力剥削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等重大问题上，邓小平集团与赵紫阳集团并无原则分歧。但是，邓小平是富有多年反革命经验的老资格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邓小平看来，赵紫阳对小资产阶级盲目让步，不仅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威胁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

“六四”的枪声吓醒了小资参政的美梦。1989年后，邓小平集团对陈云集团做了一些暂时的让步。1991年，苏联解体。此后，邓小平集团急于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策划了所谓南巡，同时通过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宣称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面对军事政变的威胁，陈云集团缴械投降。

官僚资产阶级在教训了小资产阶级以后，对于小资产阶级右派不仅给出路而且给政策，让他们在后来的私有化运动中做了高参。在九十年代初，小资产阶级右派事实上接受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愿意参加由官僚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复辟政治联盟。与此同时，来自农村的产业后备军蜂拥入城，减少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城市工人的依赖，国营企业逐渐被各种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私有经济所包围。在一片“历史终结”的痴言梦呓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向核心国家逐渐打开，核心国家由于工人斗争而变得过于昂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纷纷涌入中国。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来讲，彻底打垮城市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后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大国的资格加入世界分工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

第二十二期 新自由主义全面发展时期的美国经济和阶级斗争

作者：远航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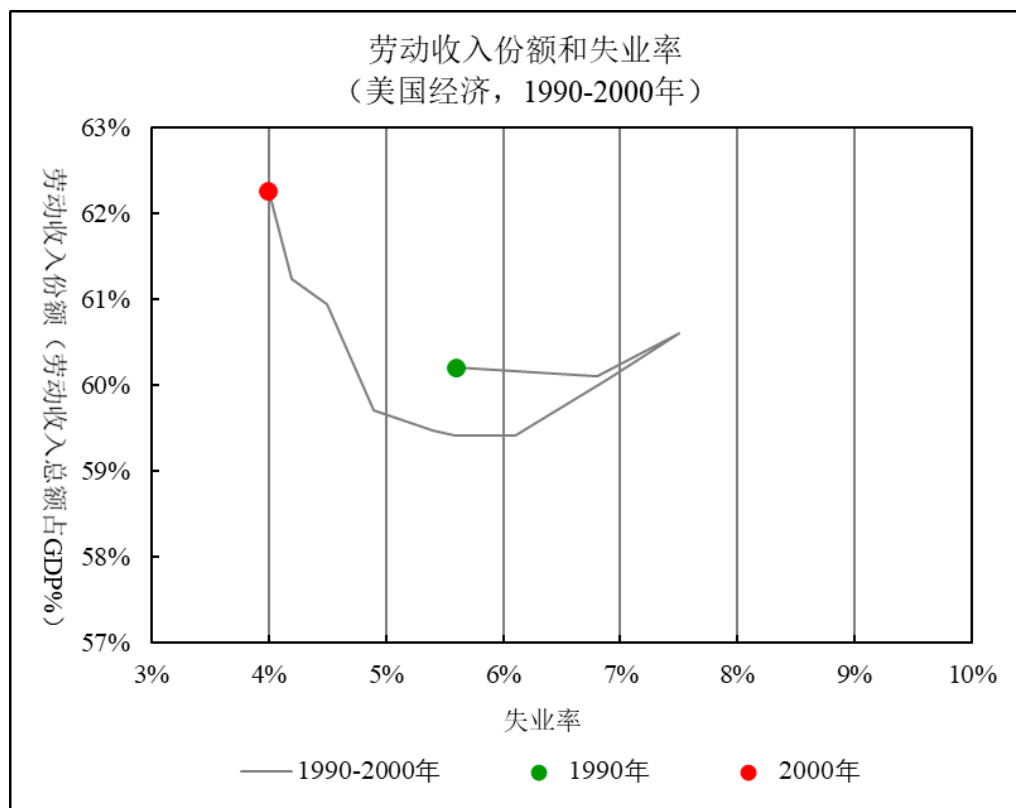
为了应对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革命高潮，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从七十年代开始策划全球范围的反攻倒算。到了八十年代，国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势形成了一整套战略，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战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主要通过货币主义政策（通过紧缩货币供给来人为制造高失业的政策），并辅之以在若干领域放松政府对资本家的管制，来打击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在半外围国家，利用拉美和东欧的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密切配合，迫使这些国家实行所谓“结构调整”、“休克疗法”，也就是用全面快速私有化的方法一举摧毁这些国家在以往几十年中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业或民族工业，进而给这些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他们不再对国际积累秩序造成威胁。

但是，我们将要看到，仅仅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反革命战略，还不足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恢复利润率并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也无法实现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基本稳定。要达到后面这几个目的，还需要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主要内容是将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已经无利可图的一些比较“成熟”的产业转移到新的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可供剥削的地区。这最后一个方面的反革命战略的实现，还有待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 1990 年到 2000 年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例）和失业率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劳动收入包括了全部雇员报酬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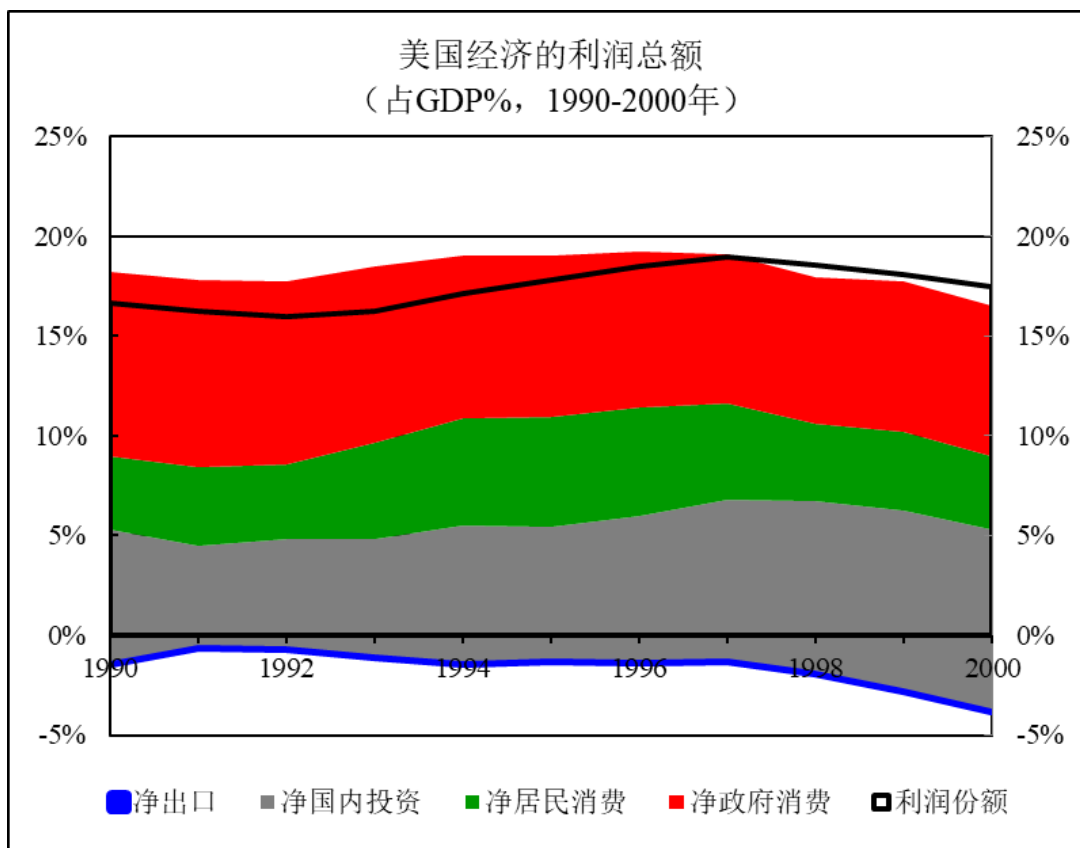
1990 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即“第一次海湾战争”）。次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失业率上升到 6.8%。1992 年，失业率进一步增加到 7.5%。虽然一般来说，高失业率意味着产业后备军上升，对工人阶级斗争不利。但是在衰退初期，资本家要压低工人工资、迫使工人增加劳动强度还有一个过程；所以有时在衰退初期或者衰退刚刚结束的时候，劳动收入份额可能短暂上升。1991 年至 1992 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从 60.1% 增加到 60.6%。



1993年和1994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59.4%。1997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下降到4.9%，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59.7%。此后几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至2000年（也是此次经济周期扩张的最后一年），劳动收入份额达到了62.3%（这是自1974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最高水平）。

从1992年至2000年，劳动收入份额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比较经典的U型变化轨迹，堪与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古德温周期模型”相比。这说明，在新自由主义全面发展的第一个十年，美国资产阶级在国内阶级斗争方面仍然没有取得相对于工人阶级的压倒性优势，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一些传统规律（如产业后备军萎缩造成工人斗争力量上升）仍然在起作用。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利润总额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所分解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以前的“学点经济学”所说明的，一个国家的利润总额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分解为净国内投资（国内总投资减固定资本折旧）、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减劳动收入总额）、净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减间接税）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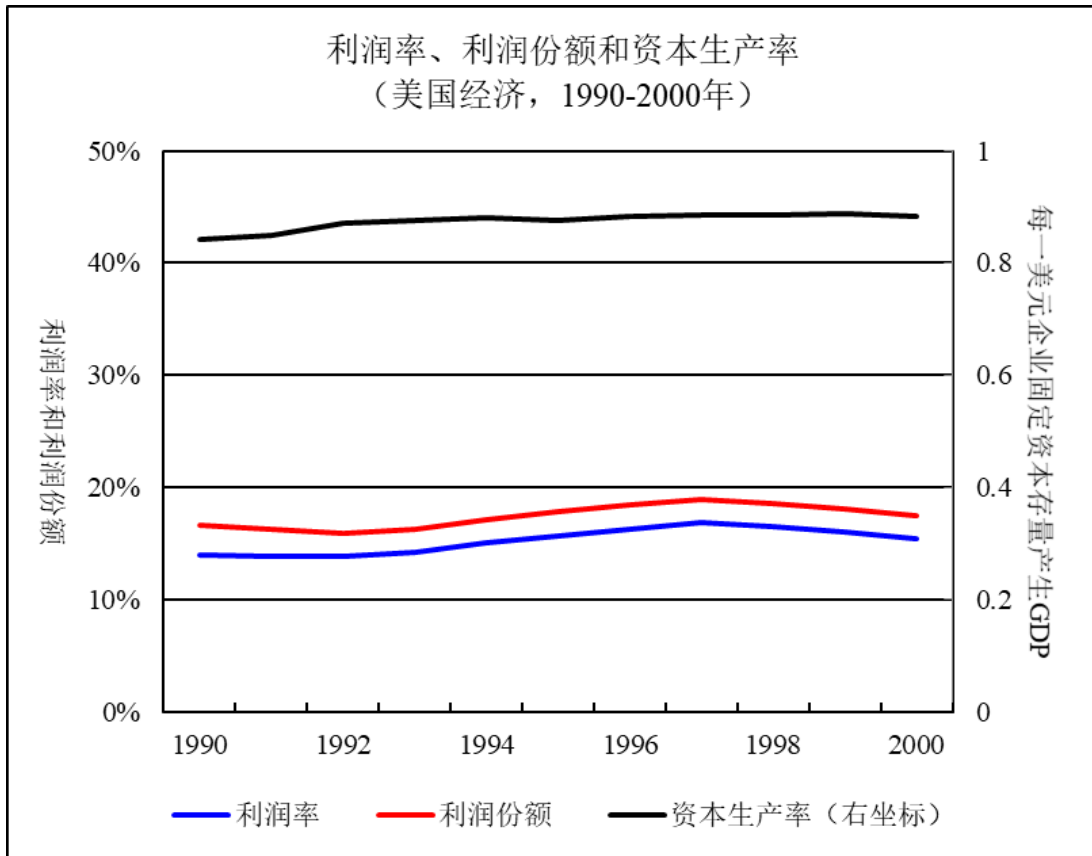
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GDP 的比例；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 GDP 的比例。1997 年以前，从需求方面计算的利润总额（即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和净出口之和）要大于按照收入法计算的利润总额；在 1997 年以后，从需求方面计算的利润总额要小于按照收入法计算的利润总额。这是由于支出法 GDP 与收入法 GDP 之间存在着统计误差。

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在 1997 年达到周期性顶点（19%）。同年，美国经济的净政府消费占 GDP 的 7.5%，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39%；净国内投资占 GDP 的 8%，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42%。这说明，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美国资本家总利润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投入了生产性投资。

1997 年，净居民消费占 GDP 的 4.8%，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25%。这说明，居民借债消费已经成为支撑美国经济扩张的一个显著因素。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相加，对利润总额的贡献超过了 100%。这是由于美国经济存在着贸易逆差。

在第二个图中，贸易逆差用零线以下的蓝色边框来表示。1997 年，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 1.2%，导致利润总额比没有贸易逆差的情况缩小 6%。

下面第三个图比较了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



这一时期，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加速创新和普及，美国和世界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即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在各工业领域的普及和应用为主要特点，发生于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中期；第二次技术革命又称第二次工业革命，其主要特点是电力设备和内燃机代替蒸汽机成为主要动力设备，同时伴随着通讯和信号传播领域的巨大变革，发生于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中后期）。受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从 1990 年的 0.84 提高到 1997 年的 0.89。

在资本生产率提高和利润份额提高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在 1997 年达到 16.8%；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所达到的最高利润率水平，但是尚未超过 1965 年的 19.7%（后者是战后美国经济最高的利润率水平）。

1989 年，东欧各社会主义国际失败；1991 年，苏联解体。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狂妄叫嚣；世界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面对一切敌人的永久胜利。此后几年，新自由主义反动给前苏联、东欧、拉美、非洲、中东、南亚等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地区的人民在一夜之间一贫如洗，俄罗斯等国发生了在和平时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显著下降的悲剧。

1995 年后，受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有所加速。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伙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强迫许多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鼓励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相继有 1995 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 年的韩国和东南亚危机、1998 年的俄罗斯和巴西危机以及 2001 年的阿根廷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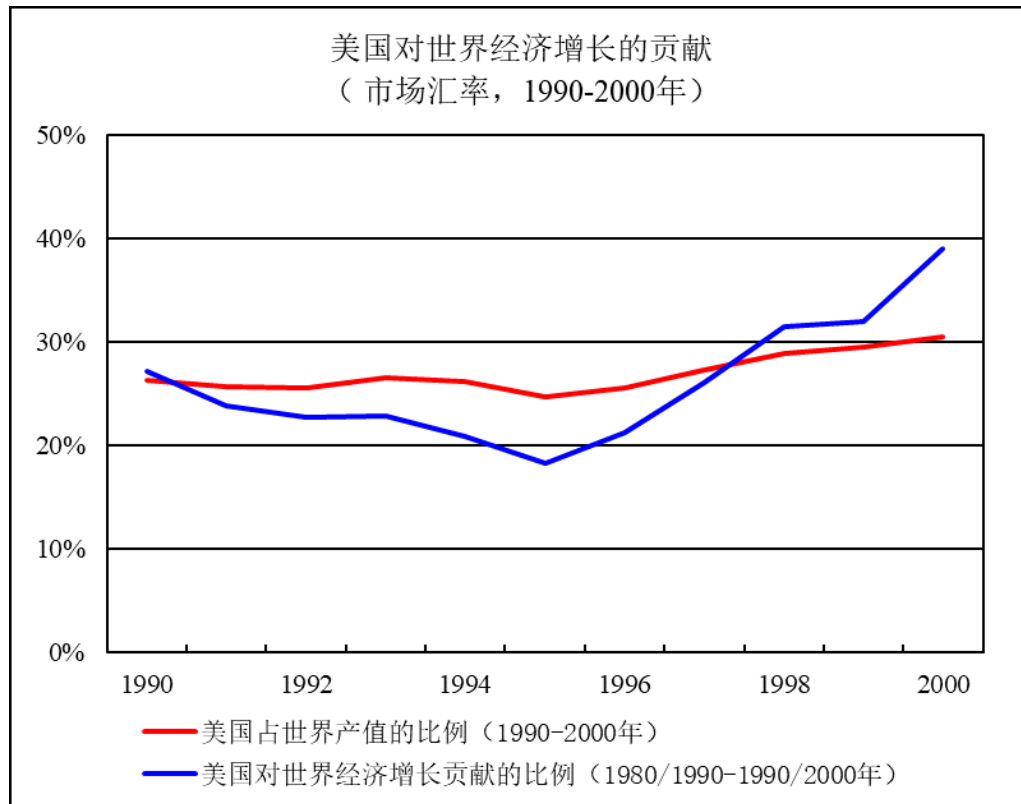
在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威胁下，许多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被迫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导致总需求萎缩。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扩大，导致许多国家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不足。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来抵消全球经济停滞和萎缩的趋势，全球经济很可能陷入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直至完全崩溃。

不过，在九十年代，美帝国主义尚有一定的力量来稳定全球经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比例从 1990 年 10.6% 增加到 2000 年的 14.4%。在整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对外贸易都处于逆差状态。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扩大。2000 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 GDP 的 3.7%。

美国进口和贸易逆差的扩大，一方面使得美国经济可以扩大与外围、半外围经济的不平等交换，并从中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为中国、日本、德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用出口增长来弥补这些国家国内需求的不足。

这一时期，美国的商品进口中，来自中低收入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主要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比例，1990 年是 7%，2000 年是 14%。不过 2000 年时，美国商品进口中仍有 64% 来自其它高收入国家，16% 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说明，在这一时期，美国尚未完成向东亚廉价劳动力地区的产业转移。

下面第四个图比较了 1990-2000 年期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以及 1980/1990-1990/2000 年期间美国经济在每一年之前十年期间的累计增长占同一个十年期间世界经济的增长的比例（以此来衡量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的贡献）。



199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产值的26%；200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产值的30%。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比例不断上升；在1990-2000年的十年间，美国经济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39%。到了世纪之交，美国霸权似乎已经全面“中兴”，甚至有人开始煞有介事地谈论美国将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全球帝国。

不过，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表面“繁荣”建筑在沙滩之上。就全球经济来说，中国、日本、德国等国要维持出口的增长，陷入金融危机的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国要避免完全崩溃，都需要美国提供越来越大的进口市场，这就要求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就美国国内经济来说，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意味着或者政府部门的赤字必须不断扩大，或者居民部门的借债消费必须不断增长（这是由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财务平衡关系所决定的，此处不赘述）。在九十年代，美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一趋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将进一步发展，直至动摇整个美国经济。

此外，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如日中天，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冒险分子已经开始担心，中国、印度等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将在长远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此外，俄罗斯如果复兴，美国势必失去对欧亚大陆的控制。他们幻想，依靠美国刚刚取得的不受挑战的、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一举控制住作为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基地的中东地区，从而达到“挟石油以令天下”、确保美国霸权永不衰落的狂妄目的。在这个狂妄目的支配下，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冒险就要开始了。

第二十三期 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期的中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作者：远航一号

经过 1989 年的政治较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右派放弃了对官僚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挑战。此后一个时期，官僚资本家集团、新兴的私人资本家、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右派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政治联盟。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城乡半无产阶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出卖雇佣劳动力、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小商品生产或其它来源的城乡劳动者）在政治上处于分散和被动的状态，资本主义复辟联盟就在事实上完成了对城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包围。到了九十年代末，官僚资本家、新兴私人资本家、在中国的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同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中国的统治阶级并以官僚资本家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理人。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在八十年代主要由半资本主义性质的乡镇企业所吸收。到了九十年代，绝大部分乡镇企业都私有化了。此外，八十年代以来，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增长迅速。到了九十年代，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成为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至 2000 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增加到了 48%。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资产阶级感觉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向城市的社会主义残余发动最后的进攻。

1990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仍然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 67%。1991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65%。1992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称“国有企业”；同年，国有工业企业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下降到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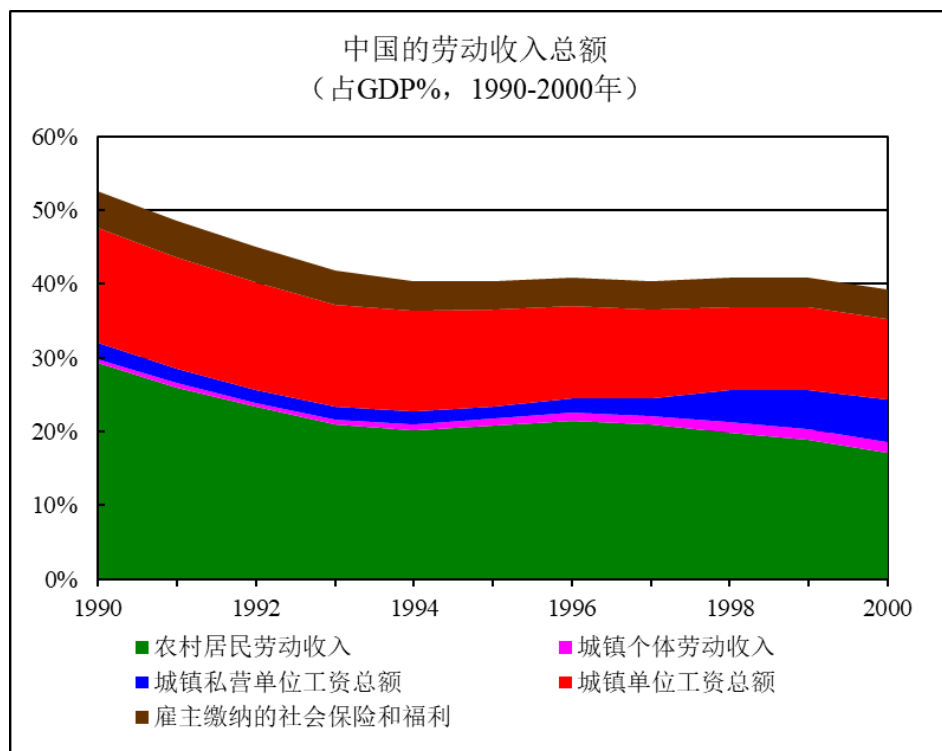
1992 年 10 月，在所谓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设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以前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并做出决定要对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实际上正式宣布了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目标。

1993 年，国有工业企业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到 56%。1994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49%（首次下降到 50%以下）；1995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47%；1996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43%；1997 年，这一比例又下降到 41%。

为了掩盖迅速发展的私有化，从 1998 年起，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而改为发布所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另外也不再发布“国有企业”的数据，而改为发布所谓“国有控股企业”的数据。按照官方的“国有控股”标准，并不要求国有股占企业股权的比例超过 50%，而仅要求所有国有股相加（比如几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参股一家企业）其股权之和大于任何一个非国有股权持有者单一持有的股权，即算做“国有相对控股”。打个比方说，一家江苏省的股份企业，其中江苏省政府持有 5% 的股份，南京市政府持有 5% 的股份，某家国有独资央企持有 5% 的股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 5% 的股份，另外 80% 的股份均摊给 8 个资本家、每个资本家持有 10% 的股份。虽然所有国有股加起来不过占 20% 的股份并且每一家国有单位仅持有 5% 的股份，但是国有股相加的 20% 大于任何一个资本家个人持有的股份，按照官方定义，也是所谓“国有控股企业”。所以，在九十年代以后，所谓“国有控股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部分或基本私有化的企业。

1998 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52%。2000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50%；2010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28%。此后，中国经济私有化的进程有所放缓，但也没有逆转。2019 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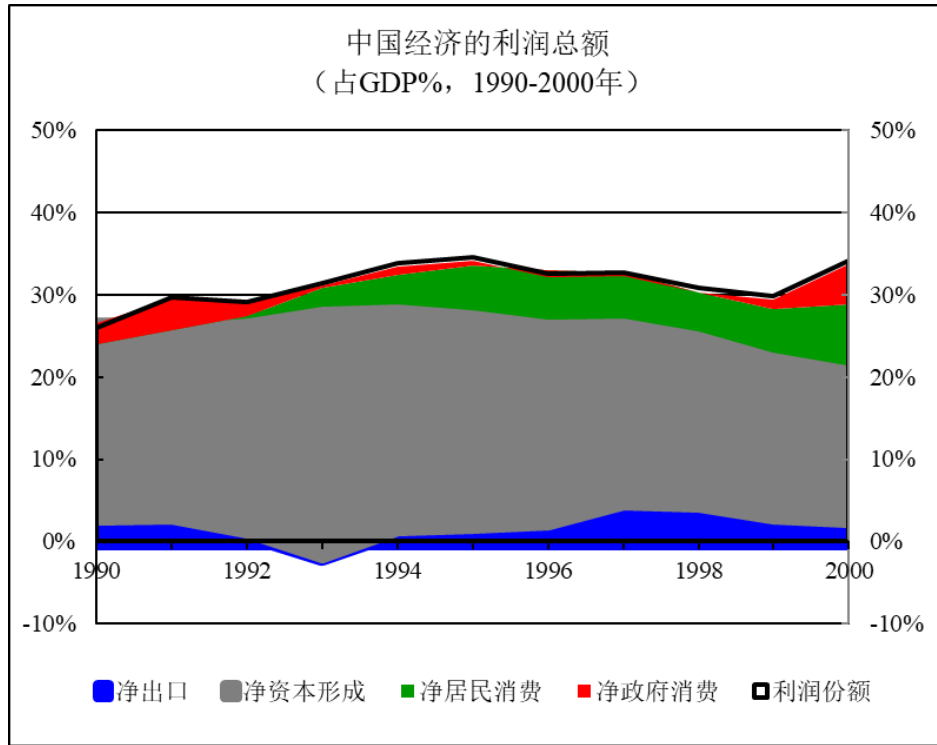
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 1990-2000 年期间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保险和福利等）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城镇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主要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如图，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过程中，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全面、大幅度下降。其中，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29% 下降到 2000 年的 17%；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6% 下降到 2000 年的 11%。全部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53% 下降到 39%。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利润总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所分解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第二十期“学点经济学”所介绍的，一个国家的利润总额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分解为净国内投资（国内总投资减固定资本折旧）、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减劳动收入总额）、净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减间接税）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GDP 的比例；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 GDP 的比例。



1990年，中国经济中的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1995年，利润份额暴涨到35%；此后几年略有下降，到2000年，利润份额又回升到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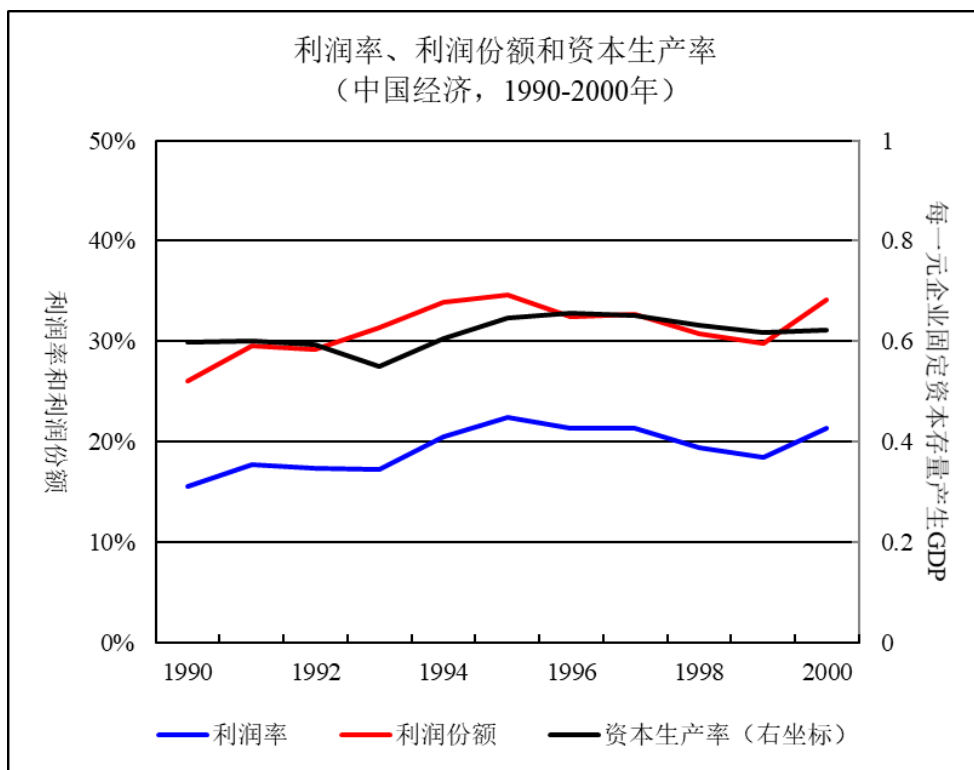
1990年，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与劳动收入份额大致相当。此后，如上所述，劳动收入份额大幅度下降，但是一方面普通的劳动群众通过政府救济、亲朋好友帮助、动用历年储蓄等办法努力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资本家的消费有很大增长，这样，居民消费份额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2000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7%；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总额与劳动收入总额之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7.4%，对利润份额的贡献为22%。

净国内投资仍然吸收了中国资本家利润总额的绝大部分。2000年，净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对利润份额的贡献为56%。

在上图中，贸易顺差用零线以上的蓝色区域来表示，贸易逆差用零线以下的蓝色边框来表示。199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后一次贸易逆差。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长期贸易顺差时代。2000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对利润份额的贡献为7%。

下面第三个图比较了1990-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其中，利润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

与资本家阶级的预付总资本（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之比。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资本生产率（见右坐标）是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经济产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利润率 = 利润份额 * 资本生产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总利润，指的是“税前利润”，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在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略有上升，从 1990 年的 0.6 增加到 2000 年的 0.62。由于利润份额大幅度上升、资本生产率稳中有升，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从 1990 年的 16% 提高到 2000 年的 21%。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繁荣最高点的 1997 年平均利润率为 17%（2000 年时下降到 15%）。这说明，到了九十年代末，在经过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及打垮了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后抵抗之后，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已经显著超过了国际资本主义平均的利润率水平。利润率的高涨奠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

1990 年时，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已经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4%；到了 2000 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了 21%。中国出口的结构也有很大变化。1995 年，所谓“机电产品”

（机械和电子类产品）占中国商品出口的比例达到 29%，首次超过纺织服装类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2000 年，机电产品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的比例达到 42%。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商品出口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8%增加到 2000 年的 3.8%。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具备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造业主要出口基地的条件。

第二十四期 新自由主义从繁荣走向危机

作者：远航一号

到 2000 年，美帝国主义霸权的“复兴”达到了顶点。2000 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了 30%；那一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不到 4%。在 1990-2000 年的十年间，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 39%。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 2800 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以下第二至第六军事强国（中国、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联邦）军费开支之和。

新自由主义秩序已经在全球占了统治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纷纷推行私有化和贸易、金融自由化。

被一时繁荣的假象所迷惑，美国统治集团利令智昏，幻想通过一次新的大规模军事冒险，确立美帝国主义的永久霸权，开辟永恒的美利坚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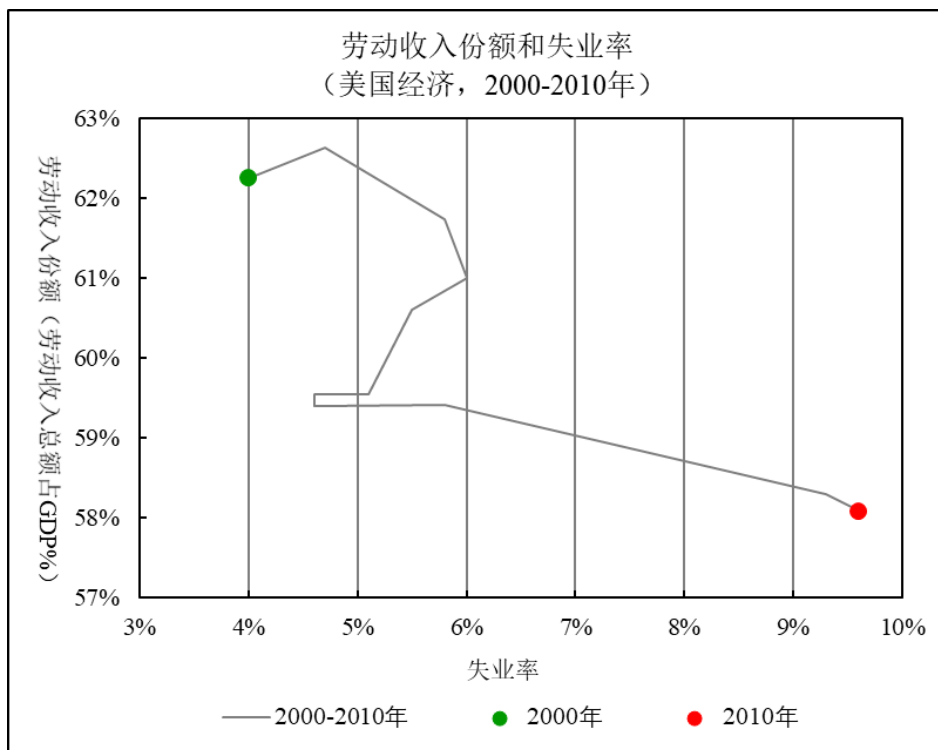
美帝国主义的计划是，动用其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军事力量，控制住对于世界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并且处于欧亚大陆战略中心地位的中东和中亚地区，将这两个地区变为自己永久的军事基地，一方面掐住其它各大国的能源生命线，另一方面可以随时从这两个地区出发对欧亚大陆的各个方面展开军事侵略。按照这一狂妄的侵略计划，美国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3 年以“九一一”事件为借口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野心与它的实际力量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像历史上所有的反动派一样，美帝国主义总是过高地估计它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世界各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力量。在越南战争以后，为了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美帝国主义就不得不与国内的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达成一个事实上的默契，即从此以后，美国资产阶级将不再以征兵的方式招募军队。在放弃征兵制以后，美国陆军的规模大大缩小。虽然美国陆军配备有各种最先进的高科技武器，可以打赢几乎任何一场常规战争，但是却无法出动一支足够庞大的地面部队来维持一个中等以上国家的安全秩序。

仅仅为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贫弱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就不得不投入其全球陆军力量的一半。结果，在阿富汗，塔利班民兵组织在退出首都喀布尔以后始终控制着阿富汗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伊拉克，尽管抵抗力量在政治上野蛮落后，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内部还相互倾

轧，美帝国主义也仅仅能控制住伊拉克南部的几座大城市。更加可笑的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推翻了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要社会基础的萨达姆政权，不得不依靠什叶派军阀建立新的伊拉克政府，这就给在什叶派穆斯林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伊朗伊斯兰政权以可乘之机。发展到后来，伊拉克政府没有伊朗的支持就无法运转；在美军被迫撤走以后，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成为伊朗的傀儡。这样，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侵略战争就在实际上大大加强了伊朗在该地区的力量，从而在战略上完全失败。

如我们在以前的“学点经济学”中介绍过的，虽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美国资产阶级试图向国内工人阶级展开进攻，但成效并不显著，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以美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来说，1980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是61%。虽然此后一个时期，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一度下降，但是，到了2000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又上升到了62%。这种情况，一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了决定性的变化。



上面第一个图说明了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和失业率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劳动收入包括了全部雇员报酬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

以往，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一般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趋于下降，当失业率下降到一定水平（通常是 5% 左右）以后，劳动收入份额就会趋于上升。但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整个经济周期期间，无论是在失业率上升的年份还是在失业率略有下降的年份，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趋于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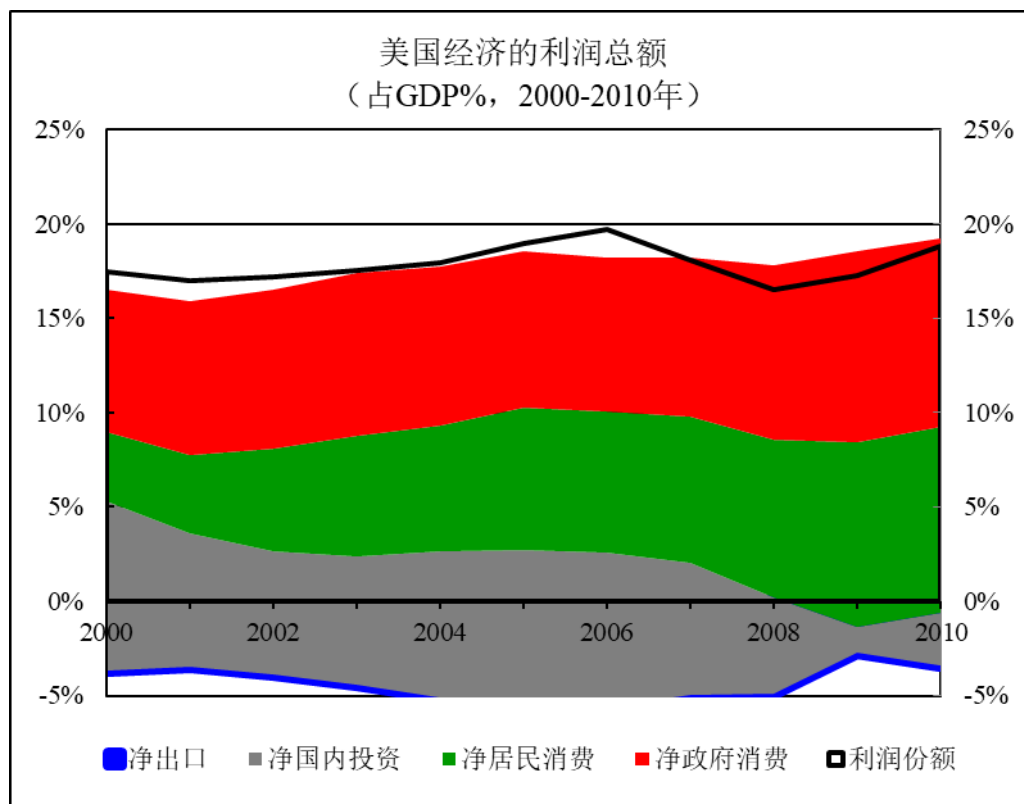
2001 年是衰退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一度达到 62.6%。随后几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到 2007 年——也是此次周期性扩张的最后一年，劳动收入份额已经下降到了 59.4%。在号称“大衰退”的 2008-2010 年经济危机期间，劳动收入份额继续下降，至 2010 年下降到了 58.1%。从 2000 年至 2010 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大约下降了 4 个百分点。

是什么因素使得美国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对工人阶级不利的重大变化呢？这个时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4% 提高到 2008 年的 17%。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全面发展阶段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最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基地（见下一期“学点经济学”）。在美国的商品进口中，来自中低收入东亚国家（以中国为主）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14% 提高到 2008 年的 21%，又提高到 2010 年的 24%。

通过将大量制造业活动转移到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节约大笔劳动力成本。不仅如此，即使美国资本家不将工厂整个地搬到中国，只要资本家做出威胁要将工厂搬走的姿态，也可以迫使美国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加恶劣的劳动条件。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利润总额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所分解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以前的“学点经济学”所说明的，一个国家的利润总额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分解为净国内投资（国内总投资减固定资本折旧）、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减劳动收入总额）、净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减间接税）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GDP 的比例；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 GDP 的比例。2006 年以前，从需求方面计算的利润总额（即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和净出口之和）要小于按照收入法计算的利润总额；在 2006 年以后，从需求方面计算的利润总额要大于按照收入法计算的利润总额。这是由于支出法 GDP 与收入法 GDP 之间存在着统计误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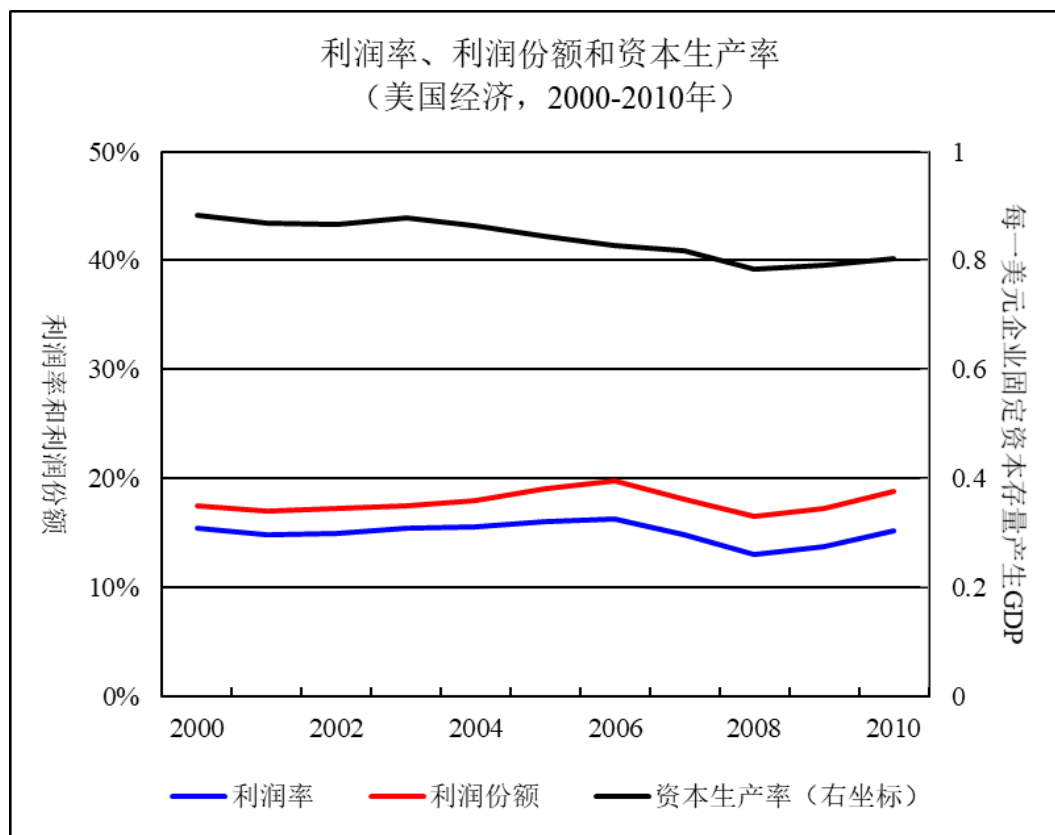


在本世纪第一个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在 2006 年达到周期性顶点（近 20%）。同年，美国经济的净政府消费占 GDP 的 8.2%，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42%；净国内投资也占 GDP 的 8.2%，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42%。

这一时期，虽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但是美国工人阶级通过借债消费勉强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个人消费约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2006 年，净居民消费占 GDP 的 7.5%，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38%，其贡献份额与净政府消费、净国内投资几乎相当。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相加，对利润总额的贡献超过了 100%。这是由于美国经济存在着贸易逆差。

在上面第二个图中，贸易逆差用零线以下的蓝色边框来表示。2006 年，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 5.6%，导致利润总额比没有贸易逆差的情况缩小 22%。

下面第三个图比较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



在 2000-2006 年期间，虽然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趋于上升；但由于房地产投资泡沫等原因，美国经济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过剩，导致资本生产率从 2000 年的 0.88 下降到 2006 年的 0.83。由于利润份额的上升部分地被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所抵消，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从 2000 年的 15% 略微上升到 2006 年的 16%。

2008 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崩溃，居民债务扩张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2008 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约 13%。

面对到那时为止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用所谓“量化宽松”的方法大幅度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将短期利率压低到几乎为零，为赤字财政提供保障。奥巴马政府一方面给资本家减税，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开支，使得美国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很快就恢复到了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到 2010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恢复到了近 19%。这一年，美国经济的净政府消费占 GDP 的 10%，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53%；净居民消费占 GDP 的 9.8%，从需求角

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52%。仅净政府消费、净居民消费两项相加，从需求角度对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 100%。

与 2006 年相比，净居民消费的“贡献”比例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虽然在经济危机后，美国居民部门的借债消费有所遏制，但是美国政府向居民部门提供了社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等转移支付。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美国经济中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已经完全靠政府赤字开支和居民借债消费来维持了。

另一方面，2010 年，净国内投资占 GDP 的比例下降到了 2.8%，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下降到了 15%；换言之，美国资本家的利润总额中仅有大约七分之一是用于各种生产性资本积累，其余都用于奢侈浪费或金融投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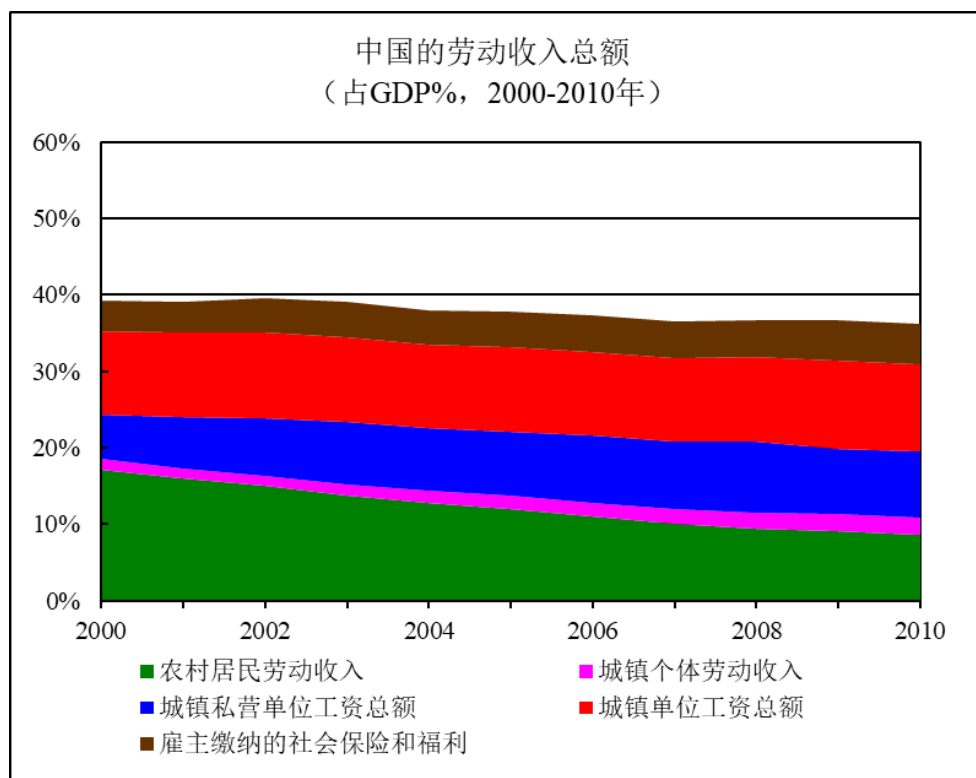
此外，2010 年，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 3.4%，导致利润总额比没有贸易逆差的情况缩小 15%。

第二十五期 中国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第一个十年

作者：远航一号

到 2000 年前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占了统治地位。形式上仍然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农业部门在产品销售、化肥种子采购等领域也被跨国公司或其它资本主义企业所控制。

2001 年 12 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以金融、农业、汽车、文化产品等领域对外资大幅度开放为代价换取美国和欧洲降低针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基地。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商品出口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4% 增加到 2010 年的 10%。我们以 2001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第一个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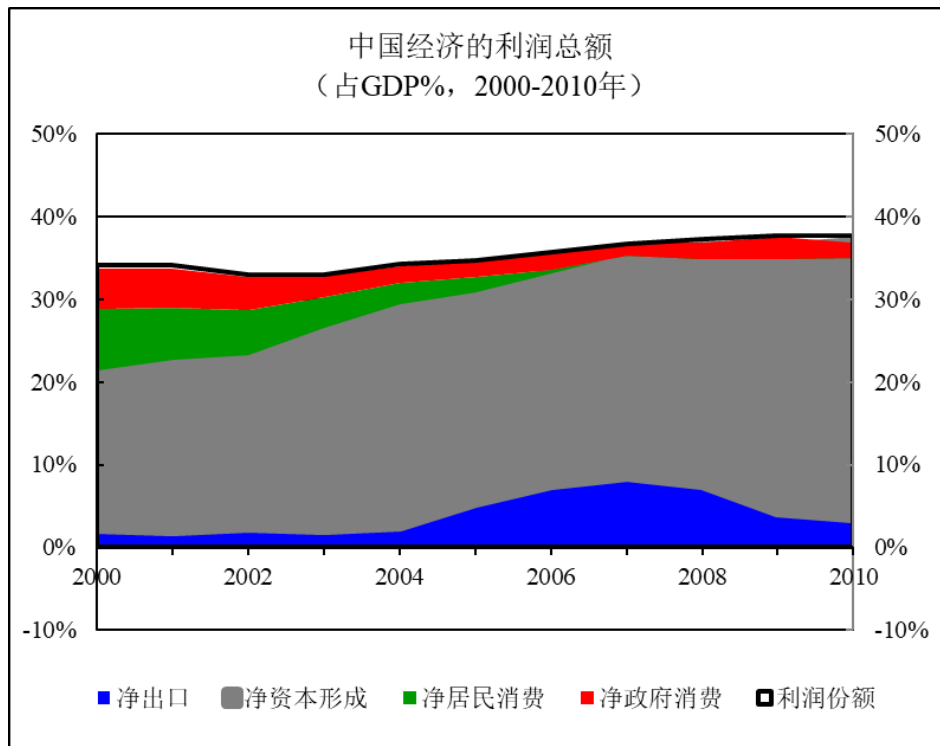
上面第一个图说明了 2000-2010 年期间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保险和福利等）占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城镇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主要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和完成了私有化的前国企）、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在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趋于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与九十年代相比有所放慢。其中，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17 下降到 2010 年的不到 9%；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这一个时期保持在 11%左右，没有继续趋于下降。全部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39%下降到 2010 年的 36%；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部分地被城市非正式部门劳动收入的增长所抵消。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利润总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所分解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第二十期“学点经济学”所介绍的，一个国家的利润总额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分解为净国内投资（国内总投资减固定资本折旧）、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减劳动收入总额）、净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减间接税）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GDP 的比例；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 GDP 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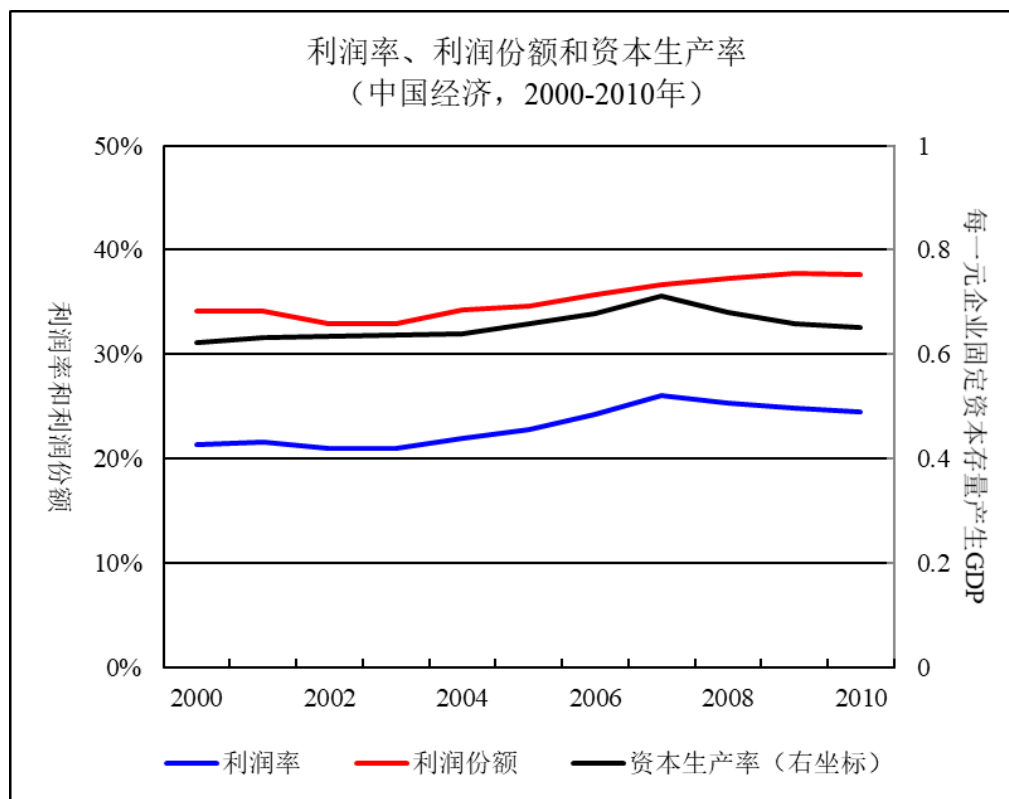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02-2003 年的 33%增加到 2009-2010 年的 38%。相比之下，2010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不到 19%。就是说，在 2010 年时，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大约是美国经济利润份额的两倍，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极高的剥削率。

图中，净出口（贸易顺差）用零线以上的蓝色区域来表示。2000 年，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从需求角度“贡献”了利润总额的 7%。2007 年，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相对繁荣达到顶点；这一年，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8.7%，对利润总额的贡献达到 24%。

2000 年，净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从需求角度“贡献”了利润总额的 56%。到了 2010 年，净国内投资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33%，从需求角度“贡献”了利润总额的 88%。换言之，中国资本家的总利润中，近九成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资本投资。相比之下，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中仅有大约七分之一用于物质资本积累。这反映了中、美两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行为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主要用于奢侈消费和金融投机，而中国资本家的总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资本主义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资本主义。

2010 年，净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说明由于工人阶级储蓄有所增加，劳动收入总额略微大于居民消费总额，这一项对利润总额的贡献是负值；净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刚好抵消净居民消费的负贡献；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7%，从需求角度“贡献”了利润总额的 10%。

下面第三个图比较了 2000-2010 年期间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其中，利润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与资本家阶级的预付总资本（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之比。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资本生产率（见右坐标）是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经济产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利润率 = 利润份额 * 资本生产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总利润，指的是“税前利润”，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2000年至2007年, 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从0.62增加到0.71。这说明, 在这一时期, 通过接收从欧美日等核心国家转移过来的一部分工业生产过程、引进一些相对于中国工业原有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技术, 中国经济中资本投资的平均效率有所提高。相应地, 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从2000年的21%提高到2007年的26%。相比之下, 2007年, 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是15%; 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达到美国经济平均利润率的1.7倍。

但是, 2007年以后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 资本生产率开始趋于下降, 到2010年已经下降到0.65。虽然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 利润份额还有所上升, 但是已经不能完全抵消利润率的下降。到2010年, 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不到25%。

在下一个时期, 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继续趋于下降。不仅如此,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初步出现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2010-2020年的十年期间, 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发生了持续的、大幅度的下降。

中国经济资本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反映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的制造业出口国的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矛盾继续发展下去, 就可能最终完全埋葬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第二十六期 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第一阶段

作者：远航一号

2008-200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称之为“大衰退”。2020年，受新冠病毒疫情打击，全球经济再次陷入严重衰退。2008-2020年之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陷入全面危机的第一个阶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的胜利，以及美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陷入严重危机，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摇摇欲坠。为了扑灭世界革命高潮，恢复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资产阶级向各国劳动人民发动了反革命攻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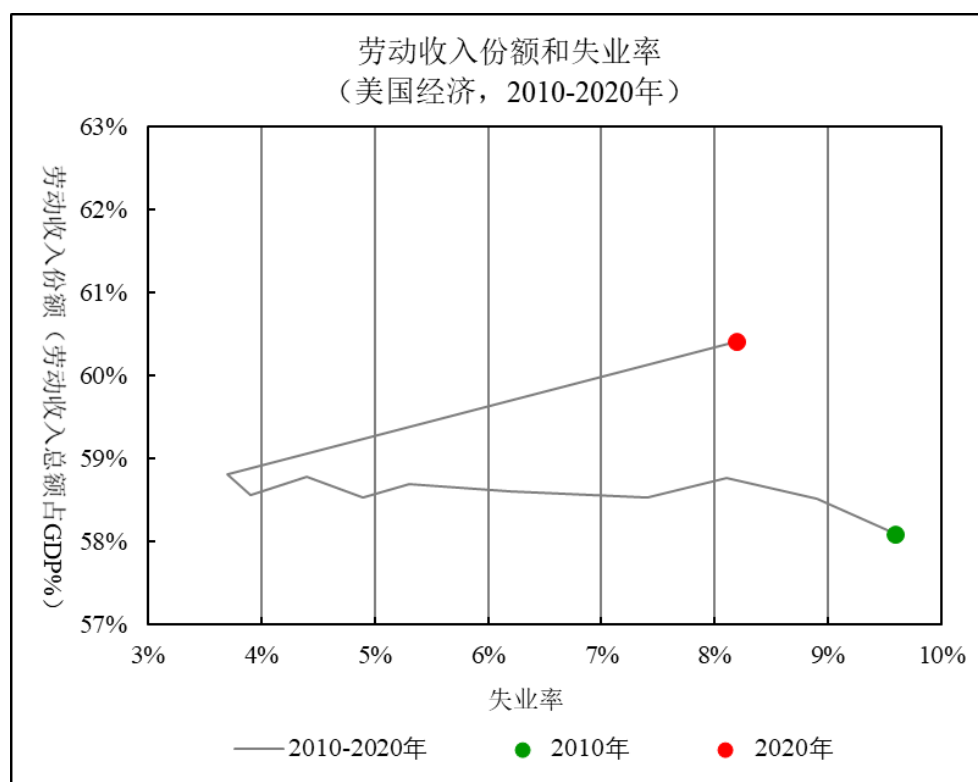
国际资产阶级的战略目的，是打击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恢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在世界范围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为了这一目的，国际资产阶级大力推行所谓“全球化”，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又有资本积累适当条件的地区（主要是中国），一方面扩大世界范围的不平等交换并攫取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增加全球范围的产业后备军，打击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到了本世纪初，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制造业出口的主要基地，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也一度出现相对繁荣的局面。

但是，从长远来看，新自由主义的倒行逆施造成了一系列新的世界历史条件。首先，由于将相当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地区，造成中国和印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等传统核心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去工业化”，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迅速下降。以美国来说，2000年时，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经济仍然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0%；到2010年，美国的份额下降到了23%。1990-200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39%；2000-2010年，美国的贡献下降到了15%。

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冒险加速了美帝国主义的衰落。2010年以后，美国无法再靠债务消费的扩张来支撑国内总需求的增长，也丧失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同时，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在东亚，美国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在中东，美国的军事力量撤出以后，已经无力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对于世界资本

主义能源供给至关重要的整个中东地区成了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以色列等区域强国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局面；由此引发的危机，不仅会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可能吞没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整个欧洲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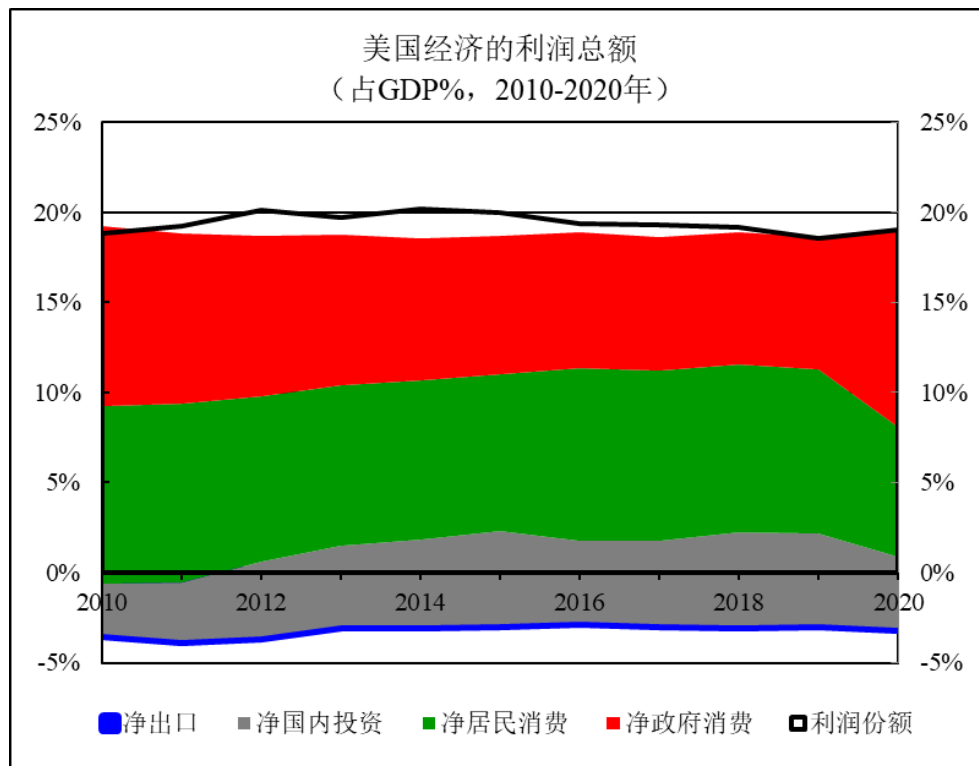
就美国国内来说，2010 年以后，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阶级矛盾继续发展。但是，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居民债务规模有所缩小，工人阶级家庭在实际工资停滞的条件下已经无法继续用借债消费来维持有体面的物质生活水平了。



上面第一个图说明了 2010 年到 2020 年期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例）和失业率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劳动收入总额包括了全部雇员报酬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

以往，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一般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趋于下降，当失业率下降到一定水平（通常在 5% 左右）以后，劳动收入份额就会趋于上升。但是，在本世纪第一个经济周期（2001-2008 年）期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趋于下降。在 2010-2019 年期间，尽管美国经济的官方失业率从 9.6% 下降到 3.7%，但劳动收入份额始终没有出现明显上升的迹象。到

2019 年时，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仍然不到 59%。不过，2020 年，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由于政府减税、增加补贴等因素，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意外地增加到了 60%以上。随着美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是否会触底回升，还有待于观察。



上面第二个图说明了利润总额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所分解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以前的“学点经济学”所说明的，一个国家的利润总额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分解为净国内投资（国内总投资减固定资本折旧）、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减劳动收入总额）、净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减间接税）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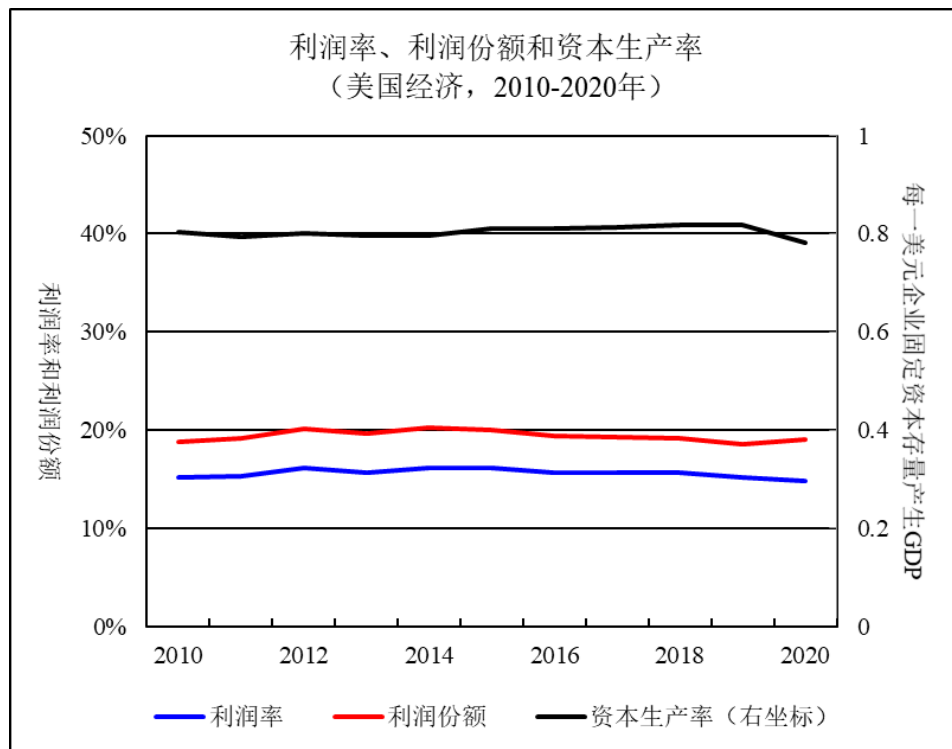
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GDP 的比例；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 GDP 的比例。图中，在 2012-2017 年之间，从需求方面计算的利润总额（即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和净出口之和）要小于按照收入法计算的利润总额，这是由于支出法 GDP 与收入法 GDP 之间存在着统计误差。

2012-2015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保持在接近 20%的水平，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最高水平，也是自 1944 年以来美国经济中利润份额的最高水平。2020 年，尽管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由于美国政府对资本家的补贴，利润份额相对于 2019 年还略有增加，保持在 19%。

在“学点经济学”第二十四期中，曾经指出，从需求角度来看，现代美国经济中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几乎完全靠政府赤字开支和居民借债消费来维持。在 2010-2020 年的十年期间，仍然是这种情况。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政府赤字大幅度增加，净政府消费达到 GDP 的 11%，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58%；净居民消费占 GDP 的 7.2%，从需求角度“贡献”了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 38%；两者相加，就从需求角度“贡献”了几乎全部的美国资本家利润总额。

在第二个图中，贸易逆差用零线以下的蓝色边框来表示。2008 年经济危机以前，贸易逆差曾经高达美国 GDP 的 5%以上。2011 年以后，由于美国页岩油、页岩气生产大幅度增加，减少了能源进口，美国的贸易逆差幅度略有缩小。2020 年，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 3.1%；这一年，净国内投资占美国 GDP 的 4%。可以说，现在美国国内物质资本积累的大约四分之三都是靠借贷外国资本来维持的。随着拜登政府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冒险政策，未来几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否会显著增加，还有待于观察。

下面第三个图比较了 2010-2020 年期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一直维持在 0.8 左右，只是在 2020 年下降到了 0.78。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 2012-2015 年达到了 16%（但是并没有达到作为新自由主义时期最高点的 1997 年的水平，当时平均利润率达到了 17%）。2020 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略低于 15%。



第二十七期 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作者：远航一号

这一期的“学点经济学”本来准备过一两个星期再写。但是刚刚看到“依狄尔特”网友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完全瓶颈期”的评论（<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84>）。在评论中，依狄尔特网友提出，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在四五年内还无法获得净利润，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将面临有限改良与阶级矛盾激化相互赛跑的局面。

关于“一带一路”问题，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再讨论。概括来说，我们认为，所谓“一带一路”的投资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相对于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其规模是十分有限的，相差好几个数量级。不要说中国资本主义的海外投资得不到一般核心国家在外围投资的回报率，即使是得到了那样的回报率，“一带一路”对于缓解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是杯水车薪。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以及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相近的靠雇佣劳动谋生的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在半外围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中国资本主义又无法满足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要求。

就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来说，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数量上的增长，而且还表现在他们斗争能力的增长、阶级觉悟的形成和提高。在统计上，这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上升。是的，这里说的是“上升”！尽管中国资产阶级穷凶极恶，仍然实行着世界上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之一，将 996、007、过劳猝死等强加于中国劳动人民，但是已经不得不开始对劳动人民做出有限的让步。这种让步，目前还不是反映在劳动人民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增长上，也不是反映在劳动条件的改善上，但是已经初步地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得到了反映。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升的，只有中国。

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另一面，就是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在，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就其主要部分来说）无法染指在世界上带有垄断性的尖端技术，因而无法通过剥削外围地区的劳动人民获得

大量的超额垄断利润。注意：这里说的是“大量的”、而不是少量的或个别的超额垄断利润。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超额垄断利润，中国的资产阶级就不具备在内部通过社会改良来建立某种阶级妥协的条件，也不具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本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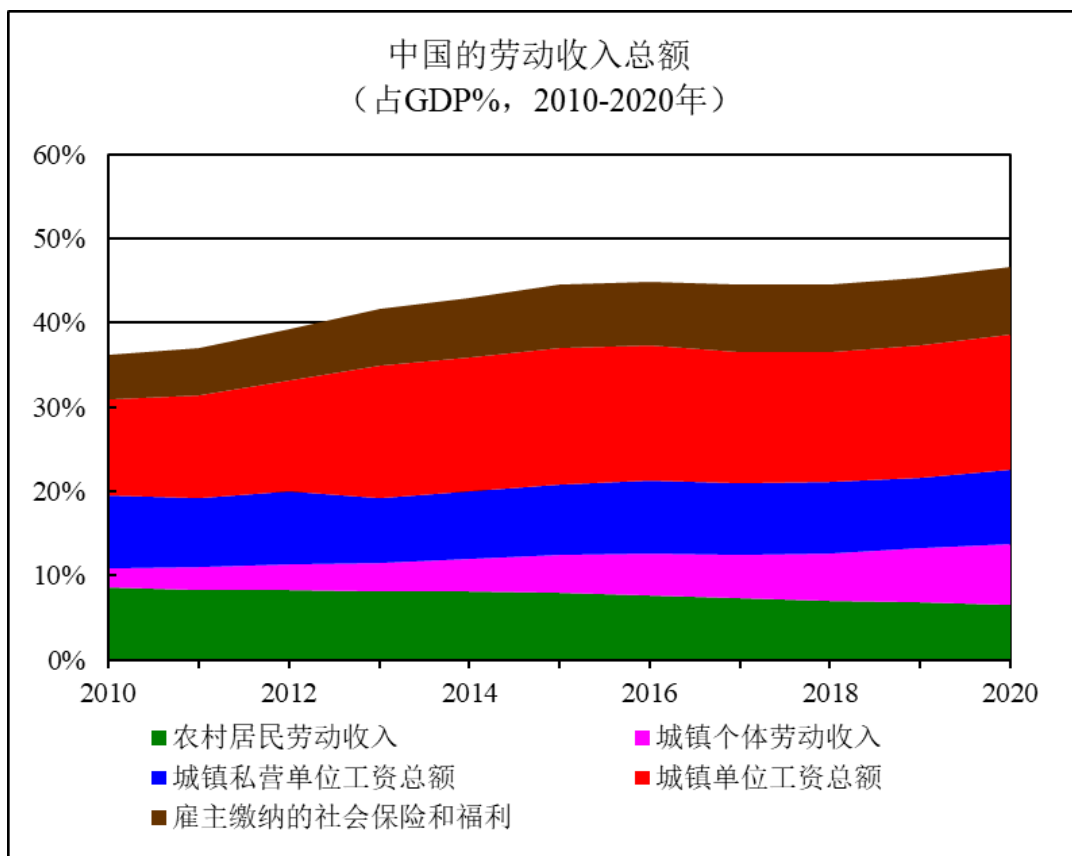
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通过从西方国家转移的产业中获得相对于中国当时工业水平较为“先进”的技术，再与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物质资本就可以换来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中国经济的平均“资本生产率”（每单位企业固定资本可以带来的 GDP）在 2007 年以前一直趋于增长（见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和第二十五期“学点经济学”）。

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与核心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核心国家不再向中国大量转移世界前沿的技术（并且近年来开始积极阻挠中国获取最前沿的技术），而中国已经掌握的一些较为“成熟”的产业又开始向一些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区转移，中国资本主义不得不依赖持续的高密度投资来支撑劳动生产率的生长，而每一单位劳动生产率增长所需要的新投资越来越多。于是，自 2007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平均资本生产率就一直在趋于下降。

利润份额的下降与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近年来一直趋于下降。

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 2010-2020 年期间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保险和福利等）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城镇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主要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和完成了私有化的前国企）、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统计数据的发布滞后，在这张图以及下面第二个图中 2020 年的数据只是初步数据。其中有些指标在未来可能随着统计数据的更新和调整而发生变化。不过，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几个关键指标在 2020 年的大致变化方向。



就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说，2010-2020 年的十年时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2010 年至 2015 年。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从 2010 年的 36% 提高到 2015 年的 44%，提高了 8 个百分点。就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说明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了对工人阶级明显有利的变化。有心的读者，如果将这张图与第二十五期“学点经济学”中的第一张图比较一下，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个显著的变化。

这里要再次强调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因为在马列主义左派中，**有一些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甚至害怕承认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在这一个时期，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出现了上升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经过了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迅速萎缩的趋势。2010 年至 2015 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 54% 下降到 48%，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 50% 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 37% 下降到 28%。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压低城市工人工资、破坏城市工人斗争力量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历史因素。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萎缩，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沿海制造业工人首先感觉到了自身力量的增长，发起了频繁的罢工和其它形式的集体斗争。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陷入了严重的内斗，政局不稳，对所谓“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争执不休。处于分裂和动摇状态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劳动人民做出一些让步。在就业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罕见的“再正式化”趋势。所谓“再正式化”，就是说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相对较好、资产阶级法律执行相对严格和“规范”的城市正式部门重新出现了扩张的趋势。中国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在经历了自九十年代私有化以来的持续下降以后，在这一时期，恢复了增长。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从 2010 年的 1.31 亿增加到 2015 年的 1.81 亿，增加了大约 5000 万。而工人平均工资在这一时期增加得也比较快。这样，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11% 提高到 2015 年的 16%，增加了 6 个百分点，大约占这一时期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四分之三。从上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红色区域的宽度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

2015 年以后，进入了这一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权力斗争告一段落。政局稳定以后，资产阶级上层企图向工人阶级发起新的攻势。他们打出“供给侧改革”的反动旗号，企图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则推行反人民的事业单位企业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数在 2015 年以后逐年下降，到 2019 年已经减少到 1.7 亿，在 2015-2019 年期间平均每年减少约 250 万。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部门的就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非正式化”趋势。在中国官方统计中，这集中表现为没有福利待遇也基本不受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有关所谓“个体就业人员”的大幅度扩张。传统上，“个体就业人员”主要指城市经济中的小业主及其家属。但是，近年来，随着所谓“平台经济”的快速增长，大批通过网络平台就业的人员，如“滴滴司机”、外卖员等都被官方统计归为所谓“独立承包者”，因而被列入所谓“个体就业人员”。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出确切的估计，但是有很大的可能，小业主及其家属已经只占官方统计的“个体就业人员”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所谓“个体就业人员”都是以雇佣劳动谋生的无产者或半无产者。

按照官方统计，各式各样的“个体就业人员”从 2010 年的 4500 万增加到 2015 年的 7800 万，然后暴涨到 2019 年的 1 亿 1700 万，在 2015 年至 2019 年的四年间，每年平均增长近 1000 万。从上图中，读者看到粉色区域的宽度在 2015 年以后的迅速增长。

除了城市就业结构的非正式化以外，在 2015 年以后，资产阶级当局加强了对自由派、左派各种尚处于萌芽中的工人斗争组织的镇压；到这一个时期结束时，已经基本清除了各种有形的、合法或半合法的所谓“劳工维权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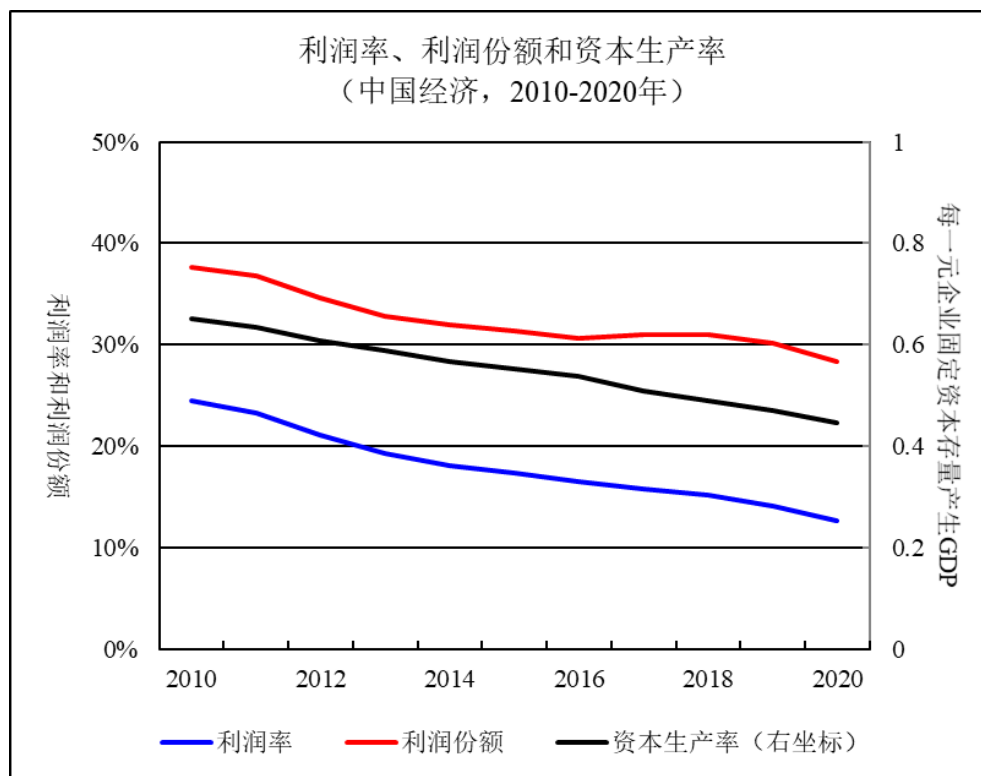
尽管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明显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攻势，但是，从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变化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虽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16% 下降到 2018 年的 15%，但是全部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不大；到了 2019 年，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反而略微增加到 45%。

从中国经济总的就业结构来看。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萎缩。至 2019 年，乡村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下降到 43%，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萎缩从客观上加强着城市工人的斗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攻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再向九十年代那样打垮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了。

到了 2020 年，根据初步数据，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了近 47%。这一令人可喜的变化到底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迫于新冠危机而做出的暂时让步，还是意味着新一轮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起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就未来趋势来说，如井冈山卫士首先提出又由远航一号在“要善于想象革命”一文中进一步论证的，中国 30 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有可能在未来 20 年左右的时间中完全消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未来的阶级力量对比可能进一步发生对工人阶级相当有利的变化。

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 2000-2010 年期间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其中，利润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与资本家阶级的预付总资本（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之比。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资本生产率（见右坐标）是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经济产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利润率 = 利润份额 * 资本生产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总利润，指的是“税前利润”，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在 2010-2020 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三个关键指标都出现了持续的、大幅度的下降。资本家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38% 下降到 2020 年的 29%，减少了 9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平均的资本生产率从 2010 年的 0.65 下降到 2020 年的 0.44，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 1933 年资本生产率是 0.52。

在 2007 年时，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仍然高达 26%，比美国经济在同一年代的利润率要高出 11 个百分点（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期“学点经济学”）。到了 2020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下降到不到 13%，比美国经济当年的利润率要低两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以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本外逃和投资崩溃的风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以及中国新一代劳动者越来越无法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选择以“躺平”、拒绝生育等方式减少被资本家剥削的时间和强度，中国资产阶级要想提高利润份额所面临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甚至可能无法阻止利润份额与利润率同时下降。

只要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阻止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真实的）势必持续趋于下降，从而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增长率也势必趋于下降，并且在未来的某一个

时点下降到无法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继续补偿 996、007、“过劳死”剥削模式的临界点。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劳动人民的消极反抗就会向积极反抗转化，普遍的“躺平”就会转化为普遍的怠工和罢工，普遍的经济斗争进而转化为普遍的政治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的瓦解，中国资产阶级将丧失满足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最基本、最起码的历史性要求的能力，创造历史的主动权也就必然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第三单元 中国经济问题

第二十八期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作者：远航一号

最近大家关心经济问题，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聊怎样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由于中国马列毛左派在过去几十年思想上、政治上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很多同志对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发展完全不了解，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或者没有接触过或者浅尝辄止，从而不了解在当前条件下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上占压倒地位的当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网络时代，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流行着各种在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基础上进一步庸俗化、娱乐化的所谓经济“分析”。其中有的是满足一些人猎奇、耸人听闻的心理，有的是为了诱惑人们进行股市、房市等投机，即使是所谓“严肃”些的分析也往往将一些枝节的、次要的方面夸大，在少量有用信息背后笼罩着大量信息垃圾。

绝大多数初步觉悟的左派同志，一说到资本主义危机，往往就搬出过去教科书上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教条，不分具体情况地套用。

凡此种种，都不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也不能发现真正的主要矛盾。久而久之，恐怕还会从急切盼望危机马上就来的幻想跌落为“危机怎么还不来”的失望，直至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所以，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很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每年都发布红色经济观察。希望大家都来阅读红色经济观察，提出意见和建议。此外，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积累，我们过去在“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经济学”系列中都有过论述，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建议去看看。

概括地说，决定资本主义积累的是利润率（当然同等利润率下，不同国家的积累情况也有差别，暂时不说）。简单化一点说，如果利润率高、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比较繁荣；如果利润率在趋于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就面临严重的问题，就在走向危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趋于

下降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下降是从很高的水平开始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投资崩溃。这个转折点什么时候来到，还要观察。

决定利润率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利润份额，这个指标主要反映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也受其它一些短期因素影响）；二是产出资本率，这个指标在短期受需求影响比较大，在长期受技术影响。就长期来说，如果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简单说，就是需要很高投资来维持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产出资本率就会下降（这是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产出资本率就会大致保持不变（这是美国目前的状况）。

我们想象一下，大夫给病人看病，这个病人可能有各种症状，什么发烧、头疼、肚子痛、关节酸胀。高明的大夫不会仅仅根据这些表面症状就诊断开药。打个比方，要望闻问切，现代条件下，要用仪器测量病人身体各个器官的指标、运行情况，这些指标有的要紧，有的不大要紧。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做出诊断，找到病人疾病的病根，抓住主要矛盾。

我们写红色经济观察，就等于给中国资本主义做诊断，衡量它的各个关键指标，然后根据这些关键指标运行的情况，再判断资产阶级当局这个“大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然后再得出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阶级斗争策略。当然，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把病人治好，而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给“治死”。但不管要治活还是治死，都要找准要害。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的要害就是利润率，其它诸如股市、楼市、地方债、资本流进流出，都是肘腋之疾，要不了命的。

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总的基本矛盾就是由其作为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所派生出来的矛盾。因为这个基本矛盾，一是必然导致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壮大，从而导致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二是必然导致产出资本率下降（这是半外围条件下被迫用高投资维持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两者共同作用，就导致利润率必然下降，最终就必然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失败、灭亡。

关于第一个方面（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2011年至2015年是工人阶级斗争一个高潮，取得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的成果。2015年以后，资产阶级尝试反扑，但现在看来，资产阶级的反扑取得的“成果”有限，劳动收入份额近几年大致保持不变（甚至还略有上升）。原来根据初步数据，以为2021年劳动收入份额会有比较大的下降，现在根据更新后的数据，下降幅度不大，所以还是处于2015年以来阶级斗争僵持的局面。未来，只要广大劳动群众

坚持“躺平”斗争，坚决地、普遍地、大量地减少各种形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就一定能为新的工人斗争高潮创造条件。

那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怎么应对这些矛盾的积累，挽救自己赖以作威作福的社会制度呢？很多同志受网络“分析”影响，一说起经济，就爱谈股市、房地产、债务，加息减息、央行放不放水等。我给大家泼点冷水，这些都是噪音，都不是主要矛盾。

从宏观经济学来说，上面说的这些因素，最后都要通过需求起作用，不是影响消费，就是影响投资。但是，以中国资本主义来说，至少在目前，任何单纯因为需求减少的危机，都不是致命危机。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单纯”因为需求减少的危机（比如，因为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崩溃，不是单纯因为需求减少）。任何单纯因为需求减少的危机，资产阶级当局都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是不会爆发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不是房地产泡沫，也不是地方债。如果假设资产阶级当局不出昏招，不长期坚持必然失败的清零防疫政策，疫情应当也不是致命问题。我们暂时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出昏招上。

中国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是由半外围资本主义矛盾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那么，从中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如何才能制止利润率下降、争取利润率回升呢？

理想情况下，首先要阻止产出资本率下降。做到这点，有两条路，一是主动选择大幅度降低投资率，以便使得投资与较低的、可持续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适应。但这意味着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永久放弃“强国梦”。再一条路，那就是维持现有的投资率，同时想办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国资产阶级近年来搞所谓“制造业强国 2025”、“自主创新”、各种“产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但成效十分有限。

从历史上来看，半外围国家要上升为核心是十分惊险的战略大冒险。过去一百年，凡是成功地由半外围上升为核心的（如日韩台），都是霸权国家有意扶持的结果。与霸权国家对抗、又试图上升为核心的，典型的如苏联，无一不失败。

核心国家之所以是核心，就是因为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技术。而垄断技术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技术、人才、资金、配套基础设施、上下游市场的培育和积累。如果是小国，集中突破一两个领域，也许还能碰碰运气。大国要上升为核心，必须在许多领域全面开花，没有几百个不搞 996 的华为根本不可能。

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因为在国际市场上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制造业，所以绝大多数资本家都极端贪婪吝啬、急功近利，根本不可能花大钱、冒大险搞自主创新。资产阶级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可能避免私人资本的急功近利和短视。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比如中国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成为像日本通产省、韩国企划厅一类的“发展主义国家”、准计划经济，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资产阶级国家的产业政策也不一定成功。资产阶级国家集中起来的资源只能投入有限的几个技术发展方向；由于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大规模投资有可能成功，但也有可能冒险失败（比如历史上苏联重点发展电子管而不是晶体管导致电子工业落后）。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它的所谓产业政策，实际上没有什么统一规划，而是各种假大空的堆积，无非是集中一些钱，然后在各个资本家集团间分赃；所以连真正成功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不能制止产出资本率下降，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条“出路”就是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提高利润份额。过去几年，他们搞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供给侧改革”、事业单位市场化，以及鼓吹“灵活就业”，都是服务于这个战略意图。但是，我们看到，劳动人民通过开展“躺平”斗争，实际上在这个方面也挫败了资产阶级的战略意图；未来，还有可能发起对资产阶级的反攻。

最近很多同志关心李克强的那个所谓 12 万人大会。与上述资产阶级的战略失败相比，李克强的那些“稳经济”政策，30 条也好，300 条也罢，都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狗皮膏药，完全不值得重视。稍微有些实质内容的，就是李继续其减税降费的反动政策，其实质，无非是挖资产阶级财政的肉，来稍稍缓解一下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那么，我们马列毛左派怎样来分析经济问题，又如何对外宣传呢？这里，要区分内部和外部。在内部，比如在红色中国网，我们要把话讲透。在外部，我们的宣传要符合群众的短期利益，要符合加速资本主义灭亡、无产阶级胜利的长远目标。

如何加速资本主义灭亡、无产阶级胜利？如果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回答，那就是一切有利于加速中国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经济主张，都是好主张，否则，都是坏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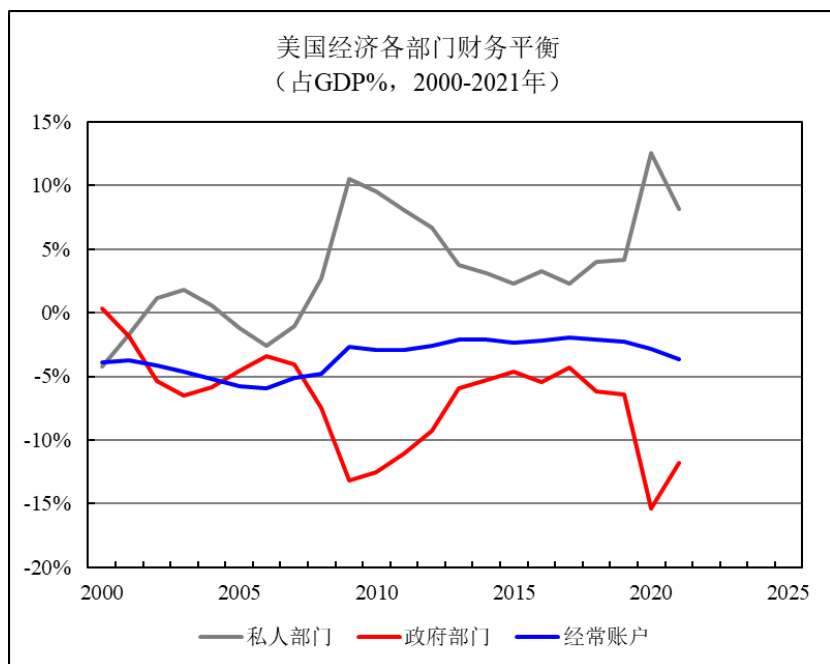
所以，凡是什么给资本家（包括给小资本家）减税、降费、纾困的政策都是反动政策！更不必说那些直接鼓励资本家违反劳动法或者违法犯罪可以不追究的政策。要打破落后群众对于“万众创新”的幻想！要揭露所谓只有企业家盈利才能“创造就业”的胡说！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胡说有一定客观真理性。在宣传上（指公开宣传），可以采取主张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增加就业而不是靠私人资本家“创造就业”的办法。

另一方面，凡是能够增加资产阶级困难的主张，无论来自哪里、无论出于什么政治动机，都有利于群众的短期利益，都有利于加速利润率下降，因而都是好政策。比如，资产阶级提“共同富裕”，我们就要求其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落实”共同富裕“（提高工资、增加政府福利支出），而反对其所谓”三次分配“（靠资产阶级施舍）。再比如，有人提出，为了鼓励大家生孩子，政府应该拿出几万亿元给大家发生育补贴，咱们也可以适当附和。总之，要把群众的预期提高，把胃口吊起来，向资产阶级当局提的要求越多越好、越高越好，越”不合理“越好。

在私人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上，一般来说，反对一切私有化，反对一切所谓“国退民进”，重点打击剥削最残酷、利润率最高的私人资本。要坚决反对一部分所谓”左派“跟在自由派屁股后面鼓噪所谓”国有资本垄断“的反动言论！要在群众中逐步培养，宁要国家垄断，不要私人资本垄断、不要外资垄断的观念。对于鼓噪国有资本垄断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要质问他们：你们不要国家垄断，难道是为了让资本家垄断、让跨国公司垄断吗？

未来，根据资产阶级新的花招，我们还可以依据上述原则，调整我们的宣传策略。比如，假如资产阶级主张用从东南亚大规模移民的方法来解决劳动力短缺（虽然这实际上很困难），那么，我们要与劳动群众的短期利益坚定地站在一起，不受西方“左派”精神包袱的束缚，坚决反对把中国变为“移民国家”。

下面简单说一下美国经济的情况。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不同。大家从红色经济观察中可以看到，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利润率是比较稳定的。目前看来，美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应对内外矛盾，冒险采取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导致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到，2021 年美国的政府部门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12%，贸易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4%；今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能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5%。美国的财政赤字，一靠私人部门的储蓄来弥补，二靠来自外国的储蓄来弥补（表现为贸易赤字）。未来，如果私人部门储蓄减少，利率会大幅度上升；如果来自外国的储蓄减少，美元会贬值，并有崩溃的危险。

美国资产阶级当局如果选择继续冒险实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则美元崩溃的风险会加大。

美国资产阶级当局如果选择接受经济衰退，用减少总需求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增加私人储蓄，那么美元维持稳定的可能性较大。目前看来，美国资产阶级当局采用后一种办法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中国资产阶级也有两种可能的应对办法。一是不采取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措施，听任国内总需求低迷。这样做，对资产阶级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劳动人民失业、削弱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减缓利润率下降的步伐；坏处是增加资产阶级的政治困难，中小资本家也会哇哇叫。

中国资产阶级可能采取的第二种办法，是模仿温家宝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实行新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如果是这样，可以减少劳动人民失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有利于提高工人斗争力量，加速利润率下降。在对外经济方面，由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需求的主要

推动力量，中国将从贸易顺差国变为贸易逆差国；中国的贸易逆差有赖于外国资本流动来弥补，但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将有很大的投机性。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提前爆发的可能。

这里再补充几句，过去一些年，许多左派同志受自由派和网络舆论的影响，盲目地反对温家宝的“四万亿”、盲目地反对大基建、盲目地反对央行放水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当局如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短期利益的；就中国来说，这些政策还有着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额外长期“好处”。

总而言之，未来几年，凡是有利于群众短期利益的，我们就拥护，就支持。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有利于群众短期利益的，也就是在长远能够要资本主义命的。因此，“改良”的，也就是革命的。

第二十九期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阶级斗争，1980-2020年

作者：远航一号

近日，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重弹所谓“共同富裕”的老调。怎样看待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样一种“改良”姿态，将怎样影响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以及将来中国革命的前景，是有利于缓和中国社会矛盾还是会不以资产阶级自身意志为转移地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的现状以及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变化。

那么，怎样才能够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出一个相对准确、全面的认识呢？有人认为，只要观察自己个人以及周边亲友的经历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方圆 900 多万平方公里，各个地方、每个地方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千差万别。仅仅从个人和亲友的情况出发，或者仅仅依靠通过局部社会调查得来的印象，很难正确反映全局的、一般的状况。除了这种局部与整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别以外，个人对于经济状况的认识往往还受到阶级地位、思想感情、政治见解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多的偏差。比如，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的反体制积极分子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言外之意，就是一般工人实际工资的购买力是趋于下降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不需要接受资产阶级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日子过得好多了”一类欺骗宣传。毫无疑问，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亿万劳动者残酷剥削的基础上；这种残酷剥削，体现在血汗工厂、996、过劳死等各式各样的非人压迫上。但是，尽管有这些非人压迫，中国一般劳动者的物质消费水平与资本主义复辟之初相比，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情况，包括了解国民收入分配的情况，就必须善于运用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无论什么社会制度，要了解一个社会一般的、全面的情况，必须通过了解和分析统计数据。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有大量水分，乃至公然造假，因而没有利用价值。不客气地讲，这种对资产阶级官方统计数据一概简单否定的态度，是一种十分简单化的、无知的做法，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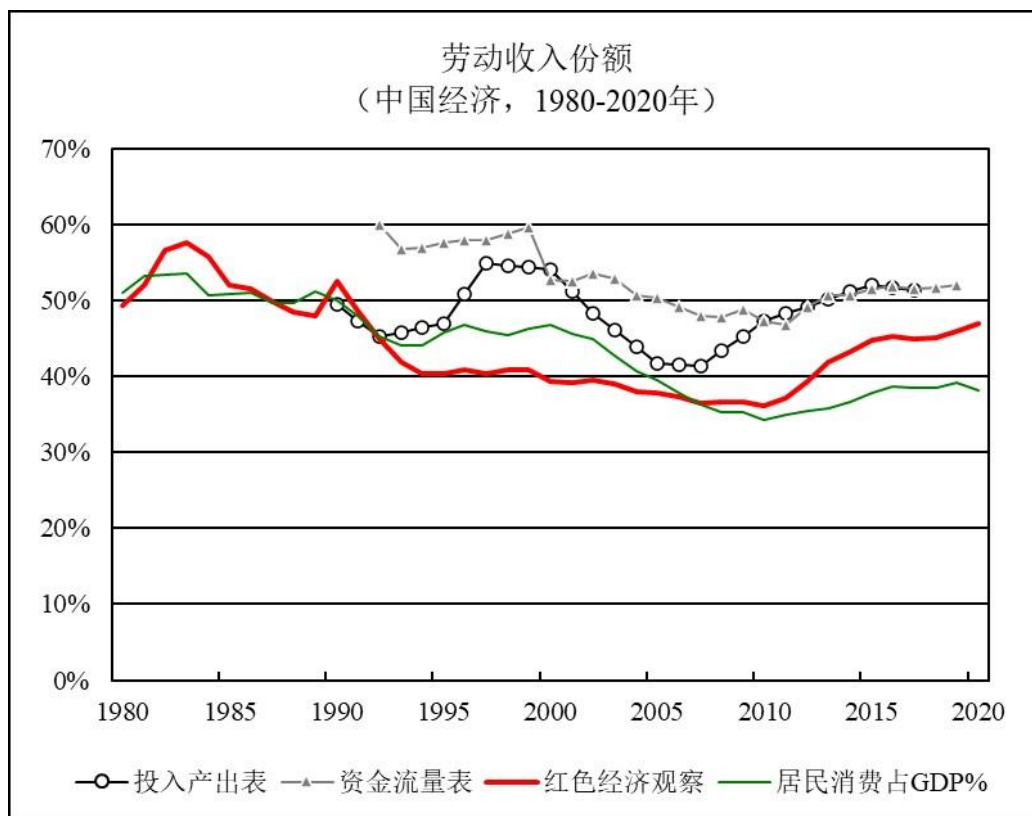
当然，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粉饰太平，是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数据做一些篡改，从而部分地掩盖真相的。但是，资产阶级实行统计调查制度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欺骗人民群众，更主要地，是为了获得有关社会和经济的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并以此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依据。如果听任统计数据全面地、大范围地失真，这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即使资产阶级的统计部门确实有可能对一部分数据进行篡改，但大量的、占主要部分的统计数据往往还是相对准确或者有参考价值的。即使对于资产阶级统计部门已经加以篡改的数据，通过与资产阶级统计部门发布的一些相对准确的数据相互比对，也可以对之做出修正从而得到比较接近真实状况的数据。

从一般经济与社会研究者的经验来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在世界范围来说是比较好的，虽然不能与美国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顶尖核心国家相比，但是好于绝大多数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统计数据质量，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分析所需要的数量信息的基础。

就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主要是来自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这两套数据相互之间采用的方法、数据并非完全一致，每一套数据系列内部在不同时间段上所采用的方法、数据也不完全一致，从而给研究者带来很大困惑。

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包括了一些在国际上知名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经过 2014 年以来的反复推敲和研究，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估算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自 1980 年以来分别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计算得出的中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历年变化的情况。此外，第一个图还包括了自 198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在历年变化的情况，作为参考。



在上图中，“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工资和薪金、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以及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和提供的其它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了 1992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连续数据；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了 1990 年至 2017 年期间的各个基准年数据，每两个基准年之间相隔两年或三年，缺失的年份用线性内推法粗估；按照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则包括 1980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连续数据。

首先来看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2-1999 年期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保持在接近 60% 的较高水平。从 2000 年起，国家统计局修改了资金流量表中关于“劳动者报酬”的定义，主要是将一部分所谓“混合收入”（即小业主和小资本家的收入）重新定义为“营业盈余”的一部分。2000 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是 53%；此后，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至 2010 年，下降到 47%。2015 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约 52%；此后几年，一直保持在大约 52% 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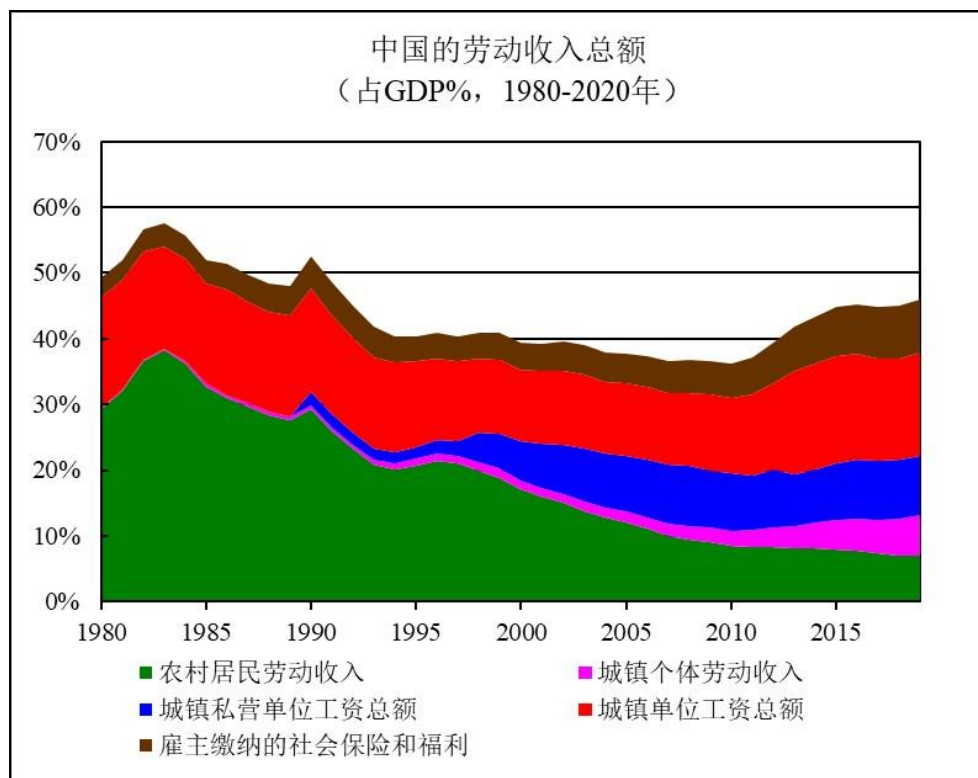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波动较大。1990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是 49%，至 1997 年竟然上升到 55%，至 2005 年又下降到 42%，至 2010 年又上

升到 47%。这几次大的波动更多的是反映国家统计局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变化，而不是真实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2010 年以后，投入产出表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定义调整为与资金流量表相一致，从而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与资金流量表基本一致。2015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到 52%，至 2017 年略微下降到 51%。

从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两套官方数据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至 2010 年总的来说趋于下降。其中，在 2000-2010 年期间，按照资金流量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6 个百分点；按照投入产出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7 个百分点。2010 年以后，资金流量表与投入产出表基本一致，按照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都表明，在 2010-2015 年期间，劳动收入份额显著回升约 5 个百分点；2015 年以后，按照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都保持相对平稳。

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同，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我们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工资、居民收入、社会保险等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从 1980 年至 2020 年的连续劳动收入份额序列。仅从统计分析上来说，与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相比，红色经济观察的劳动收入份额序列时间跨度更长并且连续不断，可以反映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状况及其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反映。在上述历史时期的范围内，我们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概念和数据来源可以做到基本一致，因而可以对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比较。

下面第二个图介绍了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各个组成部分在 1980-2020 年期间变化的情况。



我们所计算的劳动收入总额包括了五个组成部分：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

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农村居民劳动收入总额用乡村总人口乘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劳动收入来计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其中，前者属于常住农村、只在城市从事季节性打工的农民工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个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收入。关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9年，中国乡村总人口约5.5亿（其中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约3.3亿、农业就业人员总数约1.9亿）。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单位”（又名“城镇非私营单位”）主要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党政机关以及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其中一部分是“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2019年为例，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约1.72亿；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约5500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就业人员合计约8500万（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员约3000万）、外商投资企业和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合计约 2400 万，此外还有一些诸如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等就业人员较少的企业类别。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了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已经私有化、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等显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并不包括官方定义的所谓“城镇私营单位”。

总的来说，“城镇单位”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式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要明显好于其它就业类型，税收、劳动法等资产阶级法律在“城镇单位”中执行得较为“规范”。在各类工资和收入数据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总额数据也最完整、最可靠。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用城镇私营单位和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之和乘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得出。在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私营单位”指的是“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大致相当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家族式资本主义企业。此外，所谓“乡镇企业”也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官方统计不直接提供城镇范围内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的数据，但这一数据可以用全部城镇就业人员减去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以后的余额来推算。2019 年，城镇私营单位和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之和约为 1.65 亿（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约为 1.46 亿）。

2009 年以前，国家统计局不提供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对于 2009 年以前的年份，我们用就业状况与私营企业相近的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代替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本来，在官方统计中，“个体就业人员”指的是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成员劳动为生的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近年来，大量的所谓“新就业形态”就业者，如快递员、外卖员、滴滴司机在官方统计中被认为是与互联网平台发生“独立承包”关系的就业人员并被归为“个体就业人员”。因此，在官方统计中，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人数近年来恶性膨胀，从 2010 年的约 4500 万暴涨到 2017 年的约 1.17 亿，增加了约 7200 万，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总数约四分之三。

所谓“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中，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有小业主，有外卖员、快递员等雇佣劳动者，也有个别的小资本家。目前，关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收入没有可靠的官方统计。原来主要以小业主为对象的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的概念已经不能反映所谓“新就业形态”急剧膨胀以后许多“个体就业人员”的收入情况。我们暂且假设，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平均的劳动收入（包

括外卖员、快递员等“平台经济”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从而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等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乘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从劳动力市场的规律来说,如果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低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那么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就会放弃现有的“平台经济”工作或者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小微企业,转而谋求在一般私营企业中出卖劳动力;这样,两个部门中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就会逐步趋同。所以,假设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近年来官方统计的“个体就业人员”恶性膨胀,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劳务派遣工”。在官方统计中,劳务派遣工被视为实际用人单位的雇佣人员,其工资也算入实际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除了上述城乡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各项外,劳动收入总额还应该包括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以及企事业单位向职工支付的各项福利。

在1998年及以前,国家统计局提供完整的城镇单位保险福利开支总额。对于1998年及以前的年份,我们就用城镇单位保险福利开支总额来代表那个时期的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

对于1998年以后的年份,国家统计局不再提供企事业单位保险福利开支的数据。不过,国家统计局提供历年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来源有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城乡居民和财政补贴。各地对各项保险中单位和个人的缴纳比例所做的规定不尽一致。但大致上,在企事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中,单位缴纳的比例约为70%、个人缴纳的比例约为30%。考虑到总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城乡居民和财政补贴,对于1998年以后的年份,我们假设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等于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的50%。

此外,根据一些历史数据,我们假设城镇单位职工的福利总额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25%。社会保险以外的福利费用可能包括由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住房公积金、交通补贴、餐饮补贴、出差报销或补贴、劳保开支等。

我们假设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和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没有除雇主缴纳社会保险以外的福利。

从上面两个图可以看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夺取了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根基还不稳，为了欺骗群众，采取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给城市工人发奖金等收买人心的政策。1983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中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一度上涨到约58%。但是，好景不长，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段，一方面官僚资产阶级推行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向工人阶级进攻并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做准备，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吞噬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在官方统计中，1988年和1989年是“改开时期”城镇单位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发生下降的仅有的两年）。至1989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48%。

1990年，惊魂未定的官僚资产阶级一度为了稳定政局对城市工人阶级做出了短暂的让步。此外，此前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的大约2400万乡镇企业职工被纳入官方统计。在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53%。

此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时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几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所谓“三农问题”全面恶化。至2000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39%，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1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按照官方的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2-1999年期间没有变化，按照官方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0-2000年期间反而增加了5个百分点，完全不能反映这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全面进攻、工人全面溃败的阶级斗争动态。

2000-2010年期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又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个变化趋势与官方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所显示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红色经济观察所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个时期的下降幅度大约是同一时期官方统计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的一半。

2010年至2015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从36%增加到45%，增加了9个百分点。官方的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也显示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是5个百分点，大约是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幅度的一半。

2015年以后，官方的资金流量表、官方的投入产出表、红色经济观察都显示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保持在6-7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自2000年以来，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变化趋势上大体一致，但变化的幅度在每个时期各有不同，而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

入份额始终小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两者之间的差距在 2000 年曾经高达 14-15 个百分点，到了 2017 年仍有 6-7 个百分点的差距。

那么，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较，哪一组劳动收入份额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呢？在上面第一个图中，除了三组劳动收入份额以外，还显示了自 198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历年变化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三组劳动收入份额中，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比例最为接近，变化趋势也大体一致。

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居民住户调查，2017 年，中国居民平均约将可支配收入的 70%用于消费。2017 年，按照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约为 45%，如果其中的 70%转化为消费，那么，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这一年的消费总额大约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5%。2017 年，中国经济中全部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8.5%。这就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或相当于劳动群众消费总额的 22%。如果假设资本家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 5%，以上结果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费大约相当于劳动群众人均消费的 4 倍。

如果我们采用官方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那么，2017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为 51.5%，如果其中的 70%转化为消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这一年的消费总额大约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6%。这样，留给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总额仅有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这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费仅比劳动群众的人均消费高出约 30%。这样的结果显然是荒谬的！

通过与居民消费数据做比较，可以看出，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显然比官方的劳动收入份额更加合理。

为什么官方统计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会显著高于红色经济观察的劳动收入份额呢？通过对官方的投入产出表做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差距可以通过对农业部门劳动收入计算方法的差别得到解释。在官方的投入产出表中，实际上将农业部门的全部产值（增加值）都视为“劳动者报酬”，因而使得 2017 年农业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8%。相比之下，按照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2017 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总额（大致相当于个体农民从农业生产和经营中获得的劳动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与官方统计中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差距为 4.5%；这可以解释 2017 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总差距的大约 70%。

无论是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还是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都表明，在 2010-2015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明显上升，此后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哪些变化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仅仅是一种“假象”，是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资本家为了弥补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不得不给工人增加工资。这是一种漏洞百出的错误观点。且不说不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家会不会自动就根据生活成本的上涨给工人涨工资，如果工人工资的增加纯粹是物价上涨引起的被动反应，那么，资本家一手给工人增加工资，另一手又用高物价把拿出去的钱再拿回来，那么，在整个的国民收入中，资本家的利润所占的份额怎么会下降？工人的工资所占的份额又怎么会上升呢？

实际上，从统计上来说，如果果然发生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情况，几乎一定意味着实际工资不仅在上涨（也就是说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价的增长速度），而且上涨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

在历史上，中国经济曾经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发生过两位数的高通货膨胀，两次高通货膨胀时期都伴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长期的、持续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定是反映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中，官僚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全面确立，中国进入了“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经历了本世纪初前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显著扩大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萎缩的趋势。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剥削以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初步的发展。2007 年以后，沿海制造业工人的斗争开始逐步高涨。此外，以国企“老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马列毛主义社会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出现了对于工人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

习近平当局上台后，企图恢复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在所谓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对剩余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 年，习当局又提出全面的“供给侧改

革”计划，企图向残余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人阶级发起全面进攻。此外，在 2015 年以后，习当局加紧了对自由派和左派的劳工组织的镇压。

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复辟之初。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萎缩，资本家面临着青壮劳动力和有技能的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开始逐步学习与资本家斗争的办法，并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和社会要求。资产阶级的反扑与对工人阶级客观上有利的长期结构性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在 2015-2018 年期间，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暂时的僵局，形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平稳的局面。

但是，据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2019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恢复上升，增加到 46%；2020 年，进一步上升到 47%。

虽然在 2018 年以后，一批左派青年小组遭到镇压，但是，大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青年在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下逐步觉醒并开始接受马列毛主义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尽管中国处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压迫之下，中国的劳动群众还是以各种灵活多变的方式开展自己的反抗。在青年中愈发流行的“躺平”要求正在从根本上威胁依靠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广大劳动群众根据自身直接的生存利益所做出的拒绝生育、推迟生育的决定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断绝中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供应。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再上一个台阶。

面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新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不得不抬出“共同富裕”的欺骗口号。但是，基于中国资产阶级贪婪狭隘的本性，也是受制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作为半外围国家无法在世界市场上攫取大量垄断利润），在“共同富裕”的口号后面，永远是口惠而实不至，拿不出真正的真金白银来缓和阶级矛盾。

尽管如此，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一策略变化仍然有着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在 2013 年就开始策划、在 2015 年全面发动的对工人阶级的新一轮反扑已经彻底失败了，因而现在不得不至少在口头上承认工人阶级要求的某种合理性，在口头上承认——如果再不满足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中国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无法维持了，资产阶级国家就要“国将不国”了。

然而，资产阶级现在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那么，假以时日，他就无法阻止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其他的广大劳动群众来要求真正的“共同富裕”。这种真正的“共同富裕”不是

资产阶级所许诺的庸俗富裕（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而是消灭 996、消灭血汗工厂、消灭工人不能热饭不能上厕所的奴隶制度，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有人的尊严的“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的“共同富裕”，是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都可以摆脱金钱和宗族束缚自由追求爱情的“共同富裕”。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无法提供这样的“共同富裕”；而当中国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拿出他们自己许诺要拿出的“共同富裕”，而 996、蜗居、过劳死、爱情的绝迹又为绝大多数劳动者无法再忍受的时候，旧世界爆炸和毁灭的时候就要来临了。

只有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联合起来的自由的人们，才能开始建设一个更好更美的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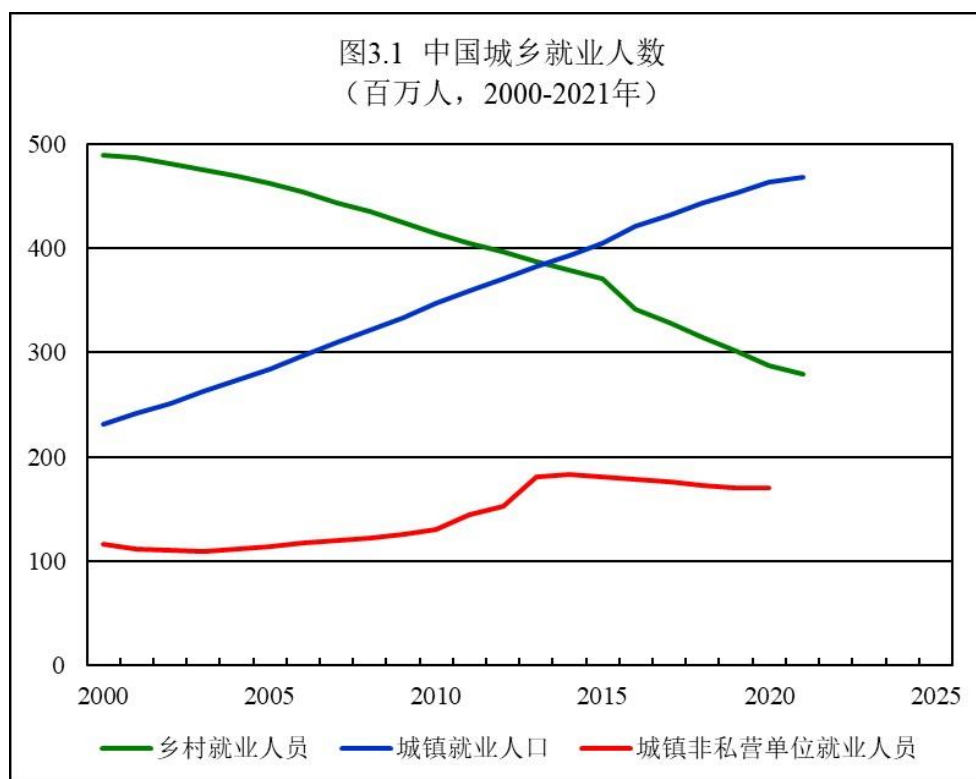
第三十期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2000-2021年

（编注：本期原为“红色经济观察”2022年第3期。）

作者：红色经济观察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据红色经济观察组的研究，目前，城镇无产阶级（城镇就业者中完全或主要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劳动者，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官僚）约有 2.3 亿，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官方统计中的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和城镇失业人员）约有 1.5 亿，乡村半无产阶级（包括乡村就业人员和乡村失业人员）约有 3.3 亿，城镇小资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官僚）约有 7000 万，资本家阶级（包括资本家和上层官僚）约有 2000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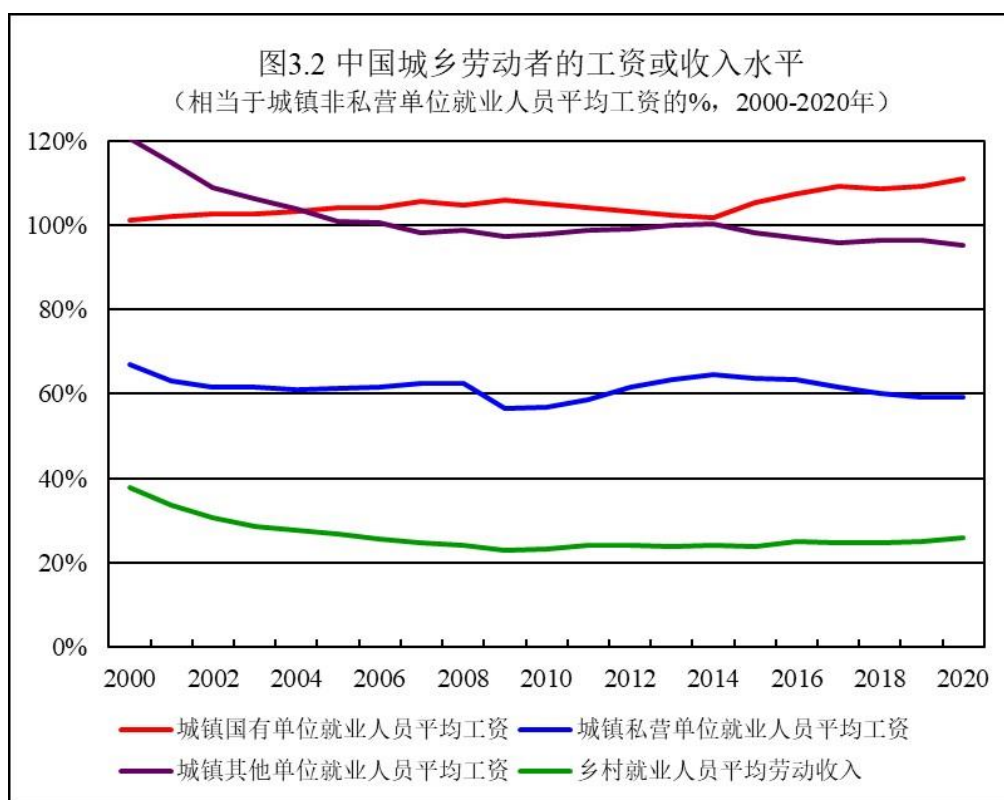
图 3.1 说明了 2000 年至 2021 年期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的情况。



2000年，中国有4.9亿人在乡村就业；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4.1亿；2021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2.8亿。

2000年，中国有2.3亿人在城镇就业，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3.5亿；2021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4.7亿。目前，在城镇就业人员中，有大约1.7亿人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工作，另外3亿人是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就业人员。在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大家通常说的“国企”和非国有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说，城镇“非私营”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对资产阶级法律执行得较为严格，在其中就业的人员工资较高、待遇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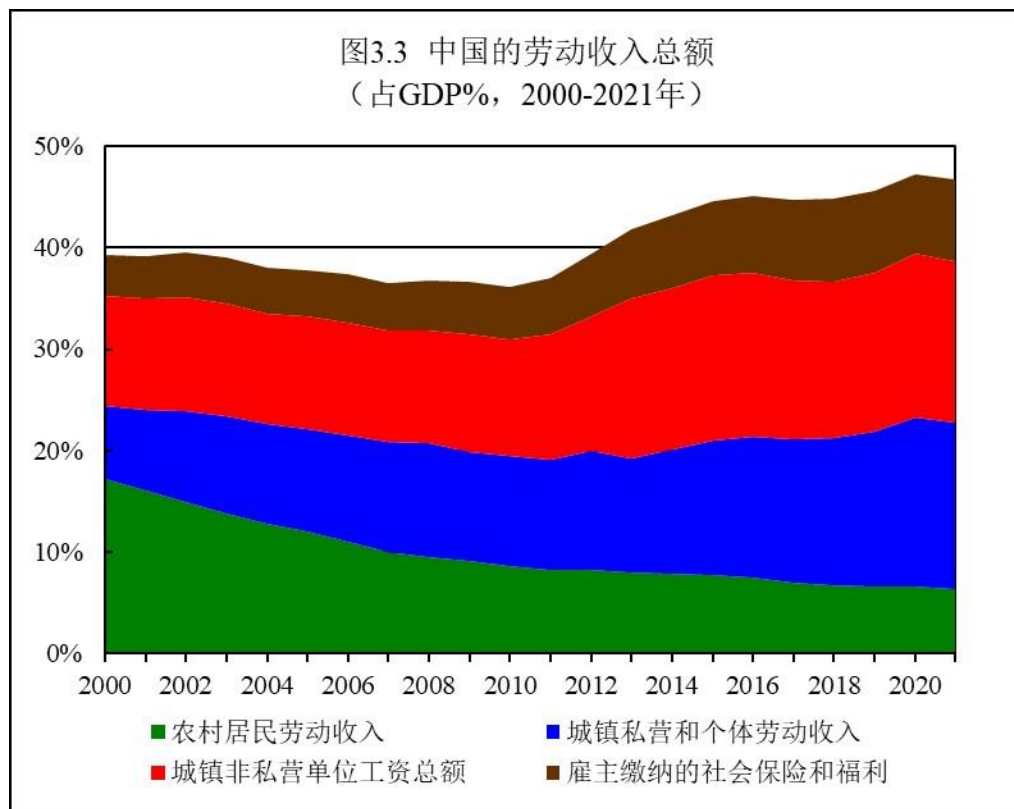
图3.2 比较了在各类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或劳动收入。



近年来，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1.1 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在本世纪初，乡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包括务农劳动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此后，乡村就业人员与城镇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自 2010 年以来，乡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一直稳定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左右。

图 3.3 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劳动收入份额是一个国家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的劳动收入总额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假设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按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 50% 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 25%之和粗估）。

劳动收入份额是观察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斗争动态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晴雨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历史性失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力量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从 1990 年的 53% 下降到 2010 年的 36%。

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第一次工人斗争高潮。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11 年，全国各地发生工人斗争 203 次（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113 次）；到 2015 年，全国各地工人斗争增加到 2775 次（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527 次）（参见远航一号，“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看近年来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495>）。这些斗争，当时主要集中在南方沿海省份的制造业企业。到 2015 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了 45%。

2015 年以后，资产阶级当局加强了对工人斗争的镇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当局提出要对残存的国有企业实行所谓“混合所有制”；后来又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旗号，要对公有制的事业单位实行所谓企业化、“民营化”。资产阶级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导致工资较高、待遇较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自 2015 年起缓慢下降。此外，2015 年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部分制造业企业转移海外，导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另一方面，与互联网技术相联系的所谓“平台经济”快速扩张；大量新增城镇就业人员在官方统计中以“独立承包”的方式与“平台经济”发生关系，缺少社会保险和劳动保障，同时由于缺乏与其他劳动者面对面的沟通，不利于以集体方式开展斗争。

尽管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上述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不利的变化，但是劳动收入份额自 2015 年以来始终在 45%左右徘徊。总的来说，自 2015 年以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暂时的僵持局面。2021 年，中国的劳动收入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7%；其中，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 16%，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占 16%，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占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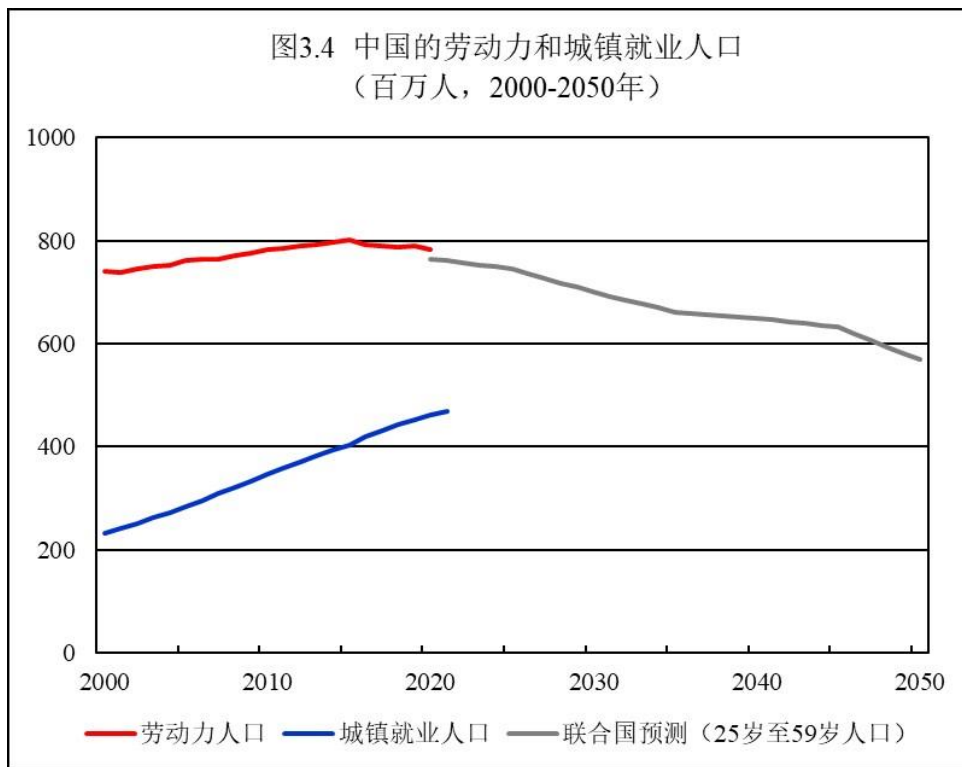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阶级所蒙受的剥削在全世界是最深重的之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中国特有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上。在罪恶的“996”体制下，中国工人在一年中的平均劳动时间长达 3600 小时。相比之下，墨西哥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2300 小时，越南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2200 小时，印度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2100 小时，美国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1800 小时，日本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1700 小时，法国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1500 小时。据估计，过度劳动每年导致约 50 万中国劳动者猝死。

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会长期忍受如此超乎寻常、非人的剥削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充当着资本主义积累的产业后备军。如图 3.2 所显

示的，在乡村劳动者和城镇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乡村劳动者只要能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其预期货币收入可以立即翻一番以上。对于很多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来说，为了换取收入和消费的巨大改善，并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哪怕几年、十几年如一日的忍受“996”乃至更残酷的剥削，也是值得的。来自农村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不断地给城镇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害怕与资本家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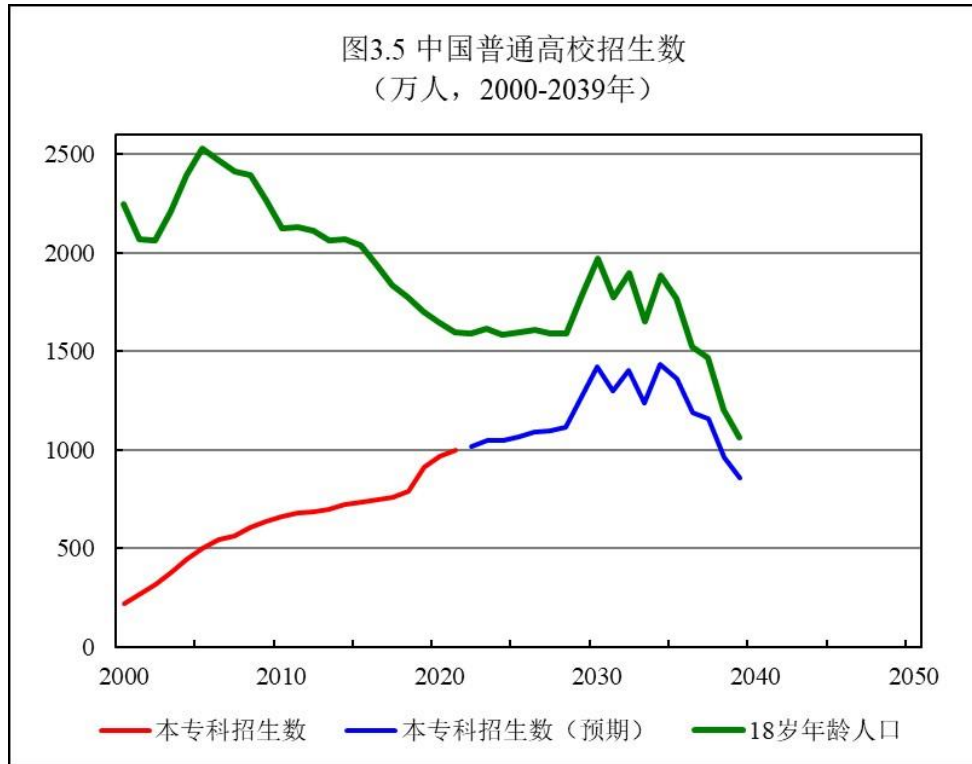
然而，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现在终于开始萎缩了！新一代城镇劳动者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也终于喊出了“躺平”、“摆烂”的斗争口号。

图 3.4 说明了中国劳动力总数在过去增长的情况以及未来趋于下降的情况。



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在 2015 年达到 8 亿后就趋于下降。2020 年，中国的劳动力总数下降到 7.8 亿。中国未来的劳动力数量，主要取决于 25 岁至 59 岁年龄人口的数量。据联合国预测，中国 25 岁至 59 岁年龄的人口将于 2030 年减少到 7 亿，于 2040 年减少到 6.5 亿，于 2050 年减少到 5.7 亿。过去十年，中国乡村就业人员总数减少了大约 1.3 亿。如果未来中国的乡村就业人员总数每年减少约 1000 万，那么，在 2050 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储备就将全部耗尽、彻底枯竭。

图 3.5 说明了历史上以及未来预期的中国普通高校（包括本专科）招生的情况。



2000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为221万，占当年18岁年龄人口的10%。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在本世纪初，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2021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1001万，占当年18岁年龄人口的63%。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相对“高端”的专业人才到为资本主义企业供应一般的廉价劳动力的转变。

未来几年，中国的18岁年龄人口会稳定在1600万左右。但是，由于在2012年至2016年有一个出生人口小高峰，2030年至2034年，中国的18岁年龄人口会接近2000万。自2022年起，我们假设高校招生总数占当年18岁年龄人口的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样，2030年至2034年，中国高校招生总数可能达到每年约1400万；从而给2034年至2038年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但是，这可能是中国资本家可以享受的“最后的辉煌”了。

从2035年起，中国的高校招生总数以及未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都将断崖式下降！至2039年，当年的18岁年龄人口将下降到1060万、高校招生总数将下降到86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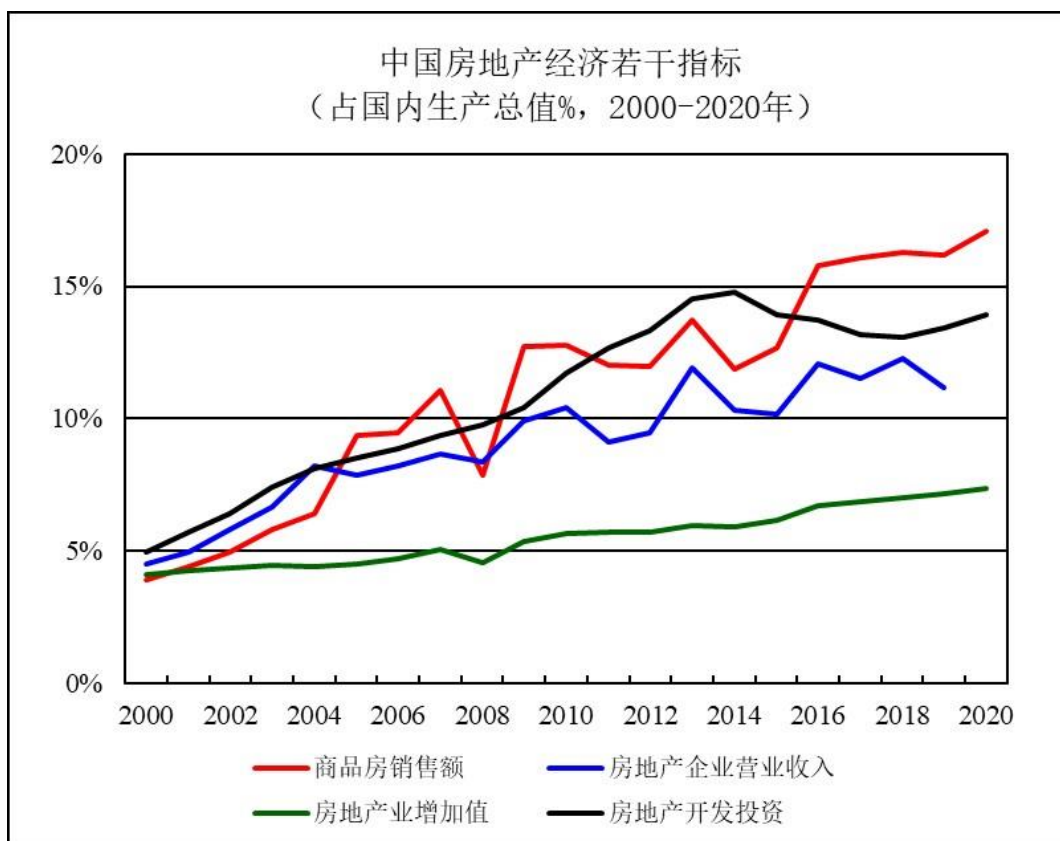
进入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完全枯竭。到那时，“10后”、“20后”、“30后”等新兴青年将完全无法忍受非人的“996”、过劳死，也不会再面对源源不断的落后农民工的竞争，他们将既有强烈的愿望、又有充足的底气向恶贯满盈的中国资本家开展普遍的“躺平”斗争。他们的斗争必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全面崩溃，而离开了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剥削强度就不会赚钱的中国资本家也必然纷纷垮台，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到那时就必然土崩瓦解！

第三十一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一）——从“房地产经济”说起

（编注：本期原标题为《中国经济杂谈（一）——聊聊房地产》。）

作者：远航一号

最近，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恒大公司面临债务重组，对整个的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底有多大？企业部门的债务有多严重？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经济是否会遭遇宏观层面的债务危机？一个正常的城镇工薪阶层家庭，需要多少工资才能买得起房而不造成严重的生活负担？所谓“土地财政”有多重要，是不是离开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就揭不开锅？这些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从今天起，笔者将不定期地撰写“中国经济杂谈”系列，主要侧重从知识性、实用性的角度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做通俗简单的分析，能做出初步结论的地方提出一些结论供大家参考；暂时得不出确切结论的问题，则留下来供大家思考。

今天先来说说房地产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到底占多大的分量。上面这个图分别用四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房地产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一个指标是商品房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商品房销售额指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一年当中出售新建商品房屋的合同总价款（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合同总价）。这里说的“商品房屋”主要包括住宅，但是也包括商业和办公用楼。

在过去二十年中，商品房销售额占中国经济的比例在波动中一直趋于上升，从2000年的4%增加到了2020年的17%。在2010-2020年的十年期间，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量相当于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期增量的五分之一。2020年，受新冠危机冲击，中国许多经济部门增长缓慢甚至萎缩，但房地产业一枝独秀。2020年与2019年相比，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量几乎相当于两年之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一半，充分体现了房地产“繁荣”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

不过，商品房销售额是按照合同价款计算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不会在当年到账。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业收入。这个指标，反映了房地产企业通过出售或出租房屋实际发生的营业收入。

自本世纪初以来房地产企业营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总的来说也是趋于上升的，从2000年的5%增加到2018年的12%，2019年略降到11%。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房地产企业营业收入与商品房销售额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19年时，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整整5万亿元）。

房地产企业的营业收入包括了房地产企业购买土地的成本以及从其它行业购买的各种中间投入的成本。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说，这些成本都不属于房地产业自己生产的增加值。

图中第三个指标显示的是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图中的各个指标中，只有这个指标说明的是国民经济中由房地产业自己“生产”出来的部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包括了房地产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工资和福利）、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利润和利息）以及房地产企业所缴纳的间接税。但是，按照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统计上的房地产业增加值中还包括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按照资产阶级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居民居

住在自有住房中，相当于自己付租金购买自有住房提供的“服务”，由此产生的增加值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根据投入产出表等统计资料，在中国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全部房地产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一。2000 年至 2020 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4%增加到 7%。

图中的第四个指标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前三个指标着重考察房地产业的收入或增加值不同，第四个指标着重考察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2000 年至 2014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5%增加到 15%；2018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13%；2020 年，又回升到约 14%。

2020 年，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总投资达到约 14 万亿元，其中约 9 万亿元属于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约 5 万亿元属于土地购置及相关费用。

通过观察这四个指标，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印象。那就是，近年来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确实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如果用商品房销售额来衡量，大约可以占到中国经济的六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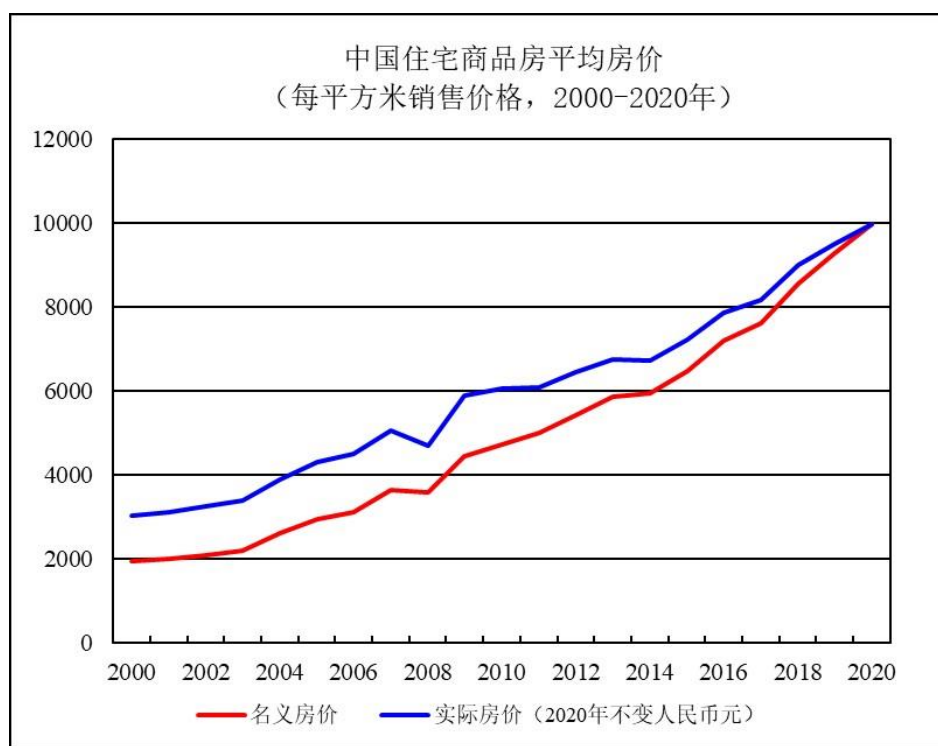
但是，房地产经济的这种繁荣是可持续的吗？高房价给城市的普通劳动者带来了哪些负担？一旦房地产繁荣终结，对于国民经济、人民生活以及地方财政，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以后的杂谈中慢慢聊。

第三十二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二）——房价与工资

（编注：本期原标题为《中国经济杂谈（二）——房价与工资》。）

作者：远航一号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多少。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自 2000 年至 2020 年全国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变化的情况。



图中的红线显示的是“名义房价”，即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房价，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房价。按照名义房价计算，2000年，全国新建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1900多元；2020年，全国新建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接近每平方米10000元。在二十一年时间中，全国新建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大约上涨了4倍（也就是上涨到原来的5倍）。其中，在2011-2020年期间，全国新建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年平均上涨约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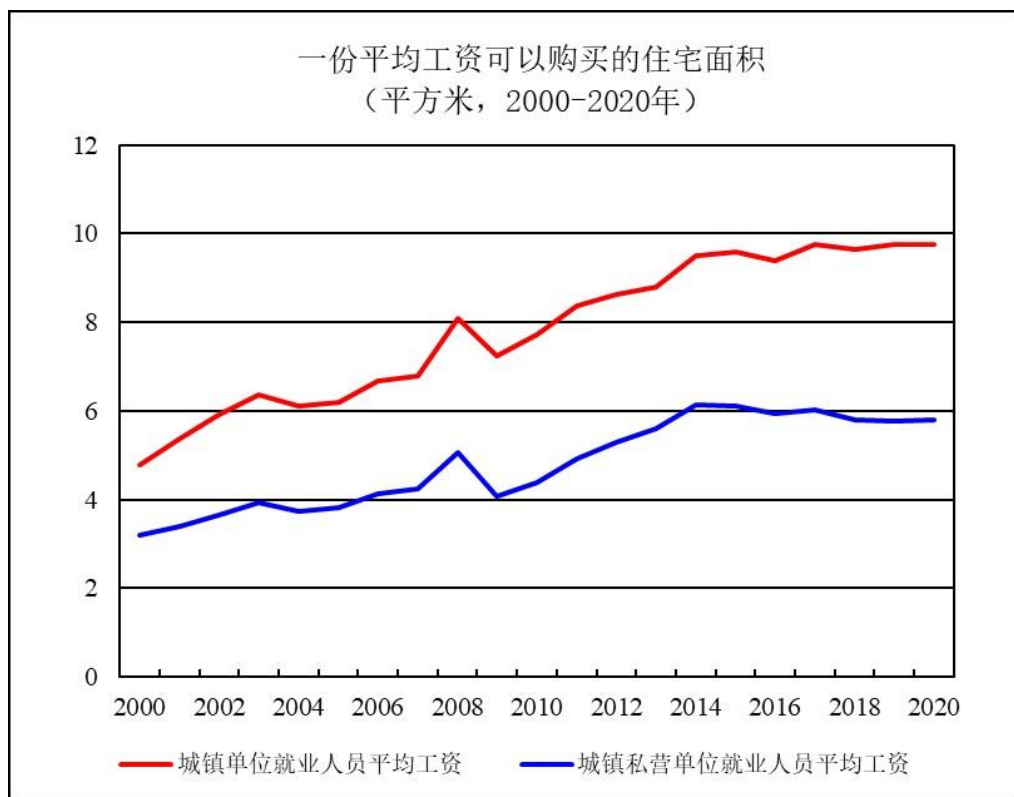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全国”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包括了一二三四线乃至四线以下、小县城的所有城市和城镇的房价。如果要讲北上广深等所谓一线城市，那么 2020 年的平均房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 60000-70000 元。不过，全国人民并非仅仅生活在北上广深，劳动者也不仅仅是在一、二线城市打工。要了解全国平均的住宅商品房市场情况以及各地劳动人民的买房能力，还是要看全国平均的住宅商品房销售价格。

上图中的红线显示的是名义房价变化的情况。但是，除了买房以外，人们在生活中总还要吃穿用行。从 2000 年到 2020 年，城镇消费者价格的平均水平上涨了 55%。如果我们从名义房价中扣除通货膨胀（也就是平均物价水平上涨）的影响，就可以计算“实际房价”。上图中的蓝线显示的就是按照 2020 年不变人民币元计算的实际房价，也就是如果购买住宅的每一元都与 2020 年的一元人民币有同等购买力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房价。按照这一方法计算出来的实际房价从 2000 年至 2020 年增加到原来的 3 倍多；其中，在 2011-2020 年期间，新建住宅商品房实际房价年平均增长约 5%。

如果名义房价比平均物价水平增加得快，实际房价就会上升；反之，实际房价就会下降。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绝大多数年份，房价的上涨速度都超过了平均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不过，也有例外。2008 年，平均名义房价下降了约 2%，城镇消费者价格指数增加了约 6%，导致那一年的平均实际房价下降了约 7%。

那么，中国的平均房价与城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比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一个劳动者家庭大约需要怎样的工资水平才能买得起一套平均的住宅呢？

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自 2000 年至 2020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及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理论上可以购买的住宅商品房面积。这里说，是在“理论上”可以购买的住宅商品房面积，就是说，假想一个劳动者一年不吃不喝不纳税，也不缴纳五险一金，将全部的税前年工资都用于购买住房，那么可以买多少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2014 年以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及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理论上可以购买的住房面积总的来说都是趋于上升的，说明在这一时期，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房价的增长速度。但是，从 2014 年以后，一份平均工资可以购买的住房面积就不再增加了。现在，一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可以购买不到 10 平方米的住房面积，一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可以购买不到 6 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这里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包括“体制内”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以及准“体制内”的国企就业人员、股份制企业就业人员、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就业人员，总数大约是 1.7 亿，大约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五分之二、全国劳动者总数的五分之一。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基本可以代表全国劳动者中相对状况最好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2020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约为 97000 元。

这里说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指的是城镇私营内资企业的就业人员，总数约为 1.5 亿。此外，城镇就业人员还包括大量的个体就业人员（其中包括一些名为“个体”实际上为资本家打工的所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总数约为 1.3 亿）。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大致可以代表城镇“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2020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约为

58000 元。作为参考，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 年，全国约有 1.7 亿外出农民工（其中约 1.3 亿为“进城农民工”，属于城镇就业人员统计范畴）、月平均收入约 4500 元（折合年平均收入 54000 元）。

与现在的房价水平相比，什么样的工资水平才是合理的工资水平呢？据官方统计，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 40 平方米。如果保守估计，一个三口之家的城镇普通劳动者家庭维持一份“体面”生活至少需要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宅。按照现在的全国平均房价（每平方米约 10000 元），购买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宅就需要 100 万元；如果首付 30%，那么就需要贷款 70 万元。现在的房贷利率约为 5%，如果在 15 年内还本付息，15 年中累计还本付息约 100 万元，平均每年“房供”（买房贷款还本付息）约 66000 元。

据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住户调查，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约 62%用于消费支出、38%用于储蓄。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上一年相比有所下降，情形特殊。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约 66%用于消费支出、34%用于储蓄。此外，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小资）家庭的储蓄率一般要低于资本家和上层官僚家庭的储蓄率。所以，对于一般城镇劳动者家庭来说，如将可支配收入中约三分之一用于支付“房供”，大约就是这些家庭“房供”支付能力的上限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城镇劳动者家庭靠自己的财务能力来买房的情况，不去算马云所谓的“六个钱包”。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家庭来说，即使有“六个钱包”，顶多勉强应付买房首付，“房供”还是要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解决。

如果每年“房供”要占到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每年要支付 66000 元“房供”，一个城市劳动者家庭的可支配年收入就需要达到约 20 万元；如果扣除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之后的净收入占税前收入的四分之三，那么这个城市劳动者家庭的税前年收入就需要达到 26-27 万元；如果这个家庭的夫妻双方都有“体制内”正式工作，那么夫妻二人的年平均工资需要达到 13 万元。与 2020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比，与当前房价水平相匹配的“合理”工资水平要高出约三分之一；与 2020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比，与当前房价水平相匹配的“合理”工资水平要高出约 1.2 倍。

这里讲的房价水平指的是全国平均的房价水平。如果说的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那么所需要的收入水平大约是与全国平均房价相匹配的收入水平的七倍，也就是家庭税前收入需要达到 180 万、夫妻双方平均年工资需要达到 90 万，大概才有可能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买到一套 100 平方米左右的住房。

那么，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解决广大城镇劳动者的住房问题，帮助绝大多数城镇劳动者实现“住着有其房”的“中国梦”，又帮助广大的男青年摆脱生不起孩子、结不起婚、谈不起恋爱的困境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 2030 年前后，使得房价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达到相对合理的水平，需要怎样的条件。2030 年距离现在大约还有十年时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在 2030 年前后实现让一般城市劳动者家庭买得起房的目标，这大致意味着，现在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城市男青年（约 25 岁），在即将步入中年之前（约 35 岁）还来得及买房、谈恋爱、解决人生大事，生活还有点盼头。

如上所述，按照现有房价，如果要达到与全国平均房价相匹配的“合理”工资水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需要提高三分之一（就是要提高到相当于现在水平的 1.3 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需要提高约 1.2 倍（就是要提高到相当于现在水平的 2.2 倍）。如果按照工资可以购买的住房面积来说，那么城镇劳动者平均年工资可以买到的住房面积需要提高到 13 平方米。

如果全国平均房价继续按照以往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每年增长约 8%，那么，至 2030 年，全国平均房价将上涨到每平方米约 22000 元。如果年平均工资可以买 13 平方米的住房面积，那么，城镇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需要达到约 29 万元。如果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要从现在的约 10 万元增加到 2030 年的 29 万元，那么，从 2021 年至 2030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需要年平均增长 11%。如果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要从现在的不到 6 万元增加到 2030 年的 29 万元，那么，从 2021 年至 2030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需要年平均增长 17%。

至 2030 年，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大约可以达到 5.5 亿；如果城镇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到时增加到 29 万，那么仅仅是城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就将达到 160 万亿元，相当于中国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6 倍。即使到那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现在翻一番，可以保证所有城镇劳动者都买得起房的工资总额也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80%。钱都给劳动者了，资本家还赚什么钱？钱都发给工人买房了，“国家”还怎么“强大”？显然，如果要在房价继续上涨的情况下，靠工资比房价增长得更快来解决广大城市劳动者的住房问题，至少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绝对做不到的。

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方法，比如，房价不再上涨，工资继续按照过去的速度上涨，直到工资增加到可以买得起房的“合理”水平。202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分别增加了不到8%。如果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8%，那么，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才可以增加到13万元，也就是按照2020年的房价可以购买13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如果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8%，那么，大约需要11年的时间，才可以增加到13万元左右并且可以按照2020年的房价购买13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但是，房价能够保持4年至11年不上涨吗？如果房价连续多年不上涨，房地产企业的营业收入也就很难增加。2019年和2020年，住宅商品房的年销售面积已经达到15亿平方米以上。如果按每户100平方米计算，15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足够解决1500万户的住房问题。相比之下，按照“十四五规划”，预计未来五年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如果按照平均每两名新增就业人员需要一套住房计算，那么每年共需新增住房550万套。也就是说，现有的住宅商品房年销售面积已经大大超出了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真实需要。这样，即使考虑到资本家和官僚的炒房“需求”，住宅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在未来也很有可能进入一个“平台期”，不再增加。如果销售面积不增加、销售价格也不上涨，房地产企业的营业收入自然无法增加。然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利息支出、购地成本、房屋造价、工资支出，都完全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长和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继续上涨。这样，要不了多久，整个房地产行业就将陷入全行业亏损；接下来，一系列相关产业，比如建筑业、钢铁业、水泥业，靠卖地维持财政支出的地方政府，乃至一大批借债买房、寄希望于房价上涨来还债的居民家庭，都可能陷入困境。

第三十三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三）——投资房地产赚钱吗？

（编注：本期原标题为《中国经济杂谈（三）——投资房地产赚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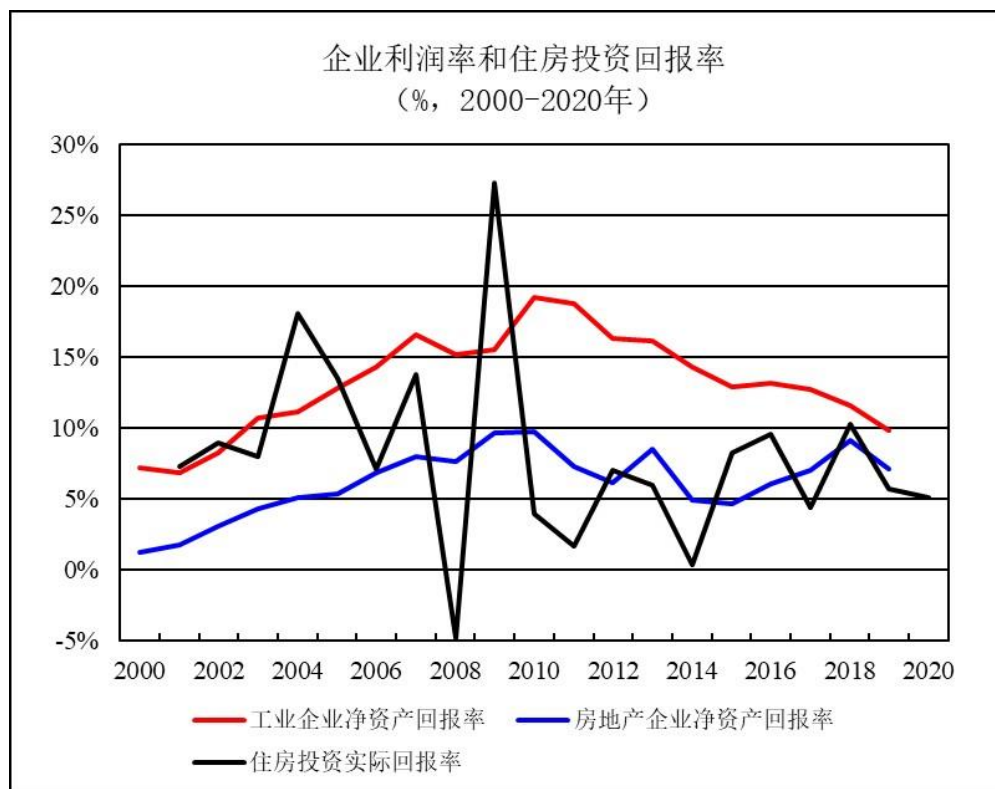
作者：远航一号

上一篇杂谈说过，要做到合理负担买房贷款以及还本付息，一个城市劳动者家庭的平均工资应当至少相当于 13 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而目前即使是“体制内”的城市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也仅相当于 10 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至于“体制外”的城市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即使一年不吃不喝不纳税也仅购买 6 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既然广大的城市劳动者都负担不起现有的房价，又是谁在买房呢？中国的商品房销售为什么还能节节上升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商品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炒”而不是用来住的，住房购买者（或“投资者”）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普通的城市劳动者。至于一般城市劳动群众是怎样解决居住问题的，对于“体制外”劳动者来说，很大一部分依靠单位宿舍或租房；“体制内”的劳动者中则有一部分仍然住在社会主义时代或资本主义复辟初期从单位获得的“福利分房”。至于城市劳动者中确实买得起商品住房的，一种情况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超过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资本家或官僚亲友的帮助。

那么，投资房地产到底是不是“赚钱”呢？从现有的统计资料看，投资房地产确实赚钱，但并非像人们有时渲染的那样大赚特赚。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和全国平均的住房投资实际回报率。



图中，“工业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指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利润总额与净资产总额之比（净资产就是总资产与总负债之差，也叫“所有者权益”），“房地产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指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业利润总额与净资产总额之比。工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净资产都调整为按重置成本计算（这样，在原则上可以排除通货膨胀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

从2000年至2010年，工业企业净资产回报率和房地产企业净资产回报率都趋于上升。2010年，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9%，房地产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约10%。

此后，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趋于下降，于2019年下降到10%。在2010-2019年的十年期间，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为14%。房地产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于2015年下降到不足5%，此后于2018年上升到9%，再于2019年回落到7%。在2010-2019年的十年期间，房地产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约为7%。这样看来，房地产并非中国经济中最赚钱的行业，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约为房地产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的两倍。

如果说，房地产企业并非特别赚钱，“炒房”是不是就可以赚得更多些呢？这需要考察一下投资商品住房的实际回报率。

投资商品住房的回报来自两部分，一是通过出租住房可以得到租金；即使买房后不出租，如果买房者也是居住者，那么可以节约租住房屋所需要的租金，这样节约下来的租金也可以算做投资住房所得回报的一部分。

投资商品住房回报的另一部分（在中国也是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资本利得”，即通过房价上涨得到的回报。

此外，要计算投资商品住房得到的“实际回报”，还要从总回报中扣除因为通货膨胀和房屋折旧造成的损失。

所以，投资商品住房实际回报率的公式就是：

$$\text{住房投资实际回报率} = \text{年租金房价比} + (\text{房价上涨率} - \text{通货膨胀率}) - \text{房屋折旧率}$$

公式中的年租金房价比就是一套住房一年的房租与该套住房市场价格的比率。中国住房市场上常用的比率“租售比”指的是一套住房的月租金与该套住房市场售价的比率，如果将中国住房市场上常说的“租售比”乘以 12 就可以得到这里所说的年租金房价比。

关于中国住房市场上的租售比或年租金房价比，目前没有很全面的数据。不过，根据“诸葛找房”报告，2020 年，全国 50 个大中型城市平均租售比约为 1: 600，就是说，年租金房价比约为 2%（或者说，房价相当于年租金的 50 倍）。相比之下，美国近年来大多数城市的年租金房价比约为 5-6%（或者说房价相当于租金的 15-20 倍）。

在这篇杂谈中，笔者假设 2020 年全国住房平均每平方米的年租金是 200 元（相当于月租金 17 元，全国平均的每平方米房价约 10000 元）。对于 2020 年以前的年份，我假设每平方米租金每年都与通货膨胀率同步上涨（即实际租金保持不变）。

在上面的公式中，房价上涨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即实际房价上涨率，这可以从历年实际房价中推算出来（历年实际房价见上一篇杂谈的第一个图）。房屋折旧率则采用砖混结构建筑的常用折旧率，每年 2%。

根据这些假设，就可以计算历年的住房投资实际回报率。2010 年以前，住房投资的实际回报率波动很大。近年来，住房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大致稳定在 5%至 10%之间。2010-2019 年的十年期间，住房投资的平均实际回报率大约是 6%。

由于住房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不缴纳所得税，而企业利润要缴纳所得税，如果不考虑偷税漏税、“合法”避税以及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那么 6%的住房投资实际回报率大致相当

于 8%的企业利润率（按照 25%的企业所得税率计算）。所以，近年来，住房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大致相当于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率，但是还比不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率。

要维持现有的住房投资实际回报率，就需要房价继续按照每年约 8%的速度上涨。但是如上一篇杂谈所说，如果房价继续上涨，那么除非工资按照足以让大多数中国资本家破产的速度上涨，否则绝大多数城市青年劳动者是不能指望在进入中年阶段以前买房恋爱结婚的——更别提生育了。

如果房价不再上涨，那么现在的年租金房价比只有 2%，如果折旧率是 2%、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假设为 2%，那么住房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就会变成 **-2%**！显然，没有哪个资本家会在回报率为负值的资产上投资。

如果住房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变成负值，资本就会从住房投资中大规模退出，转而投入工业等有较高回报率的行业。这一过程会导致房价大幅度下跌，直到房价的下跌引起年租金房价比上升（如果一套住房的租金不变但房价下跌，年租金房价比就会上升），使得住房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开始恢复时为止。

举个例子，如果在房价大跌以后，名义房价不再下降并保持不变，假设通货膨胀率为 2%、折旧率仍为 2%；那么，投资者如果想要通过住房投资获得 6%的实际回报率，年租金房价比就必须上升到 10%。与现在 2%的年租金房价比相比，如果租金保持不变，房价就必须下跌五分之四；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房价完全保持不变（而不是先大跌再保持不变），那么租金就必须涨到现在的五倍，才能使年租金房价比上升到 10%。无论是房价下跌五分之四还是租金涨到五倍，其经济和社会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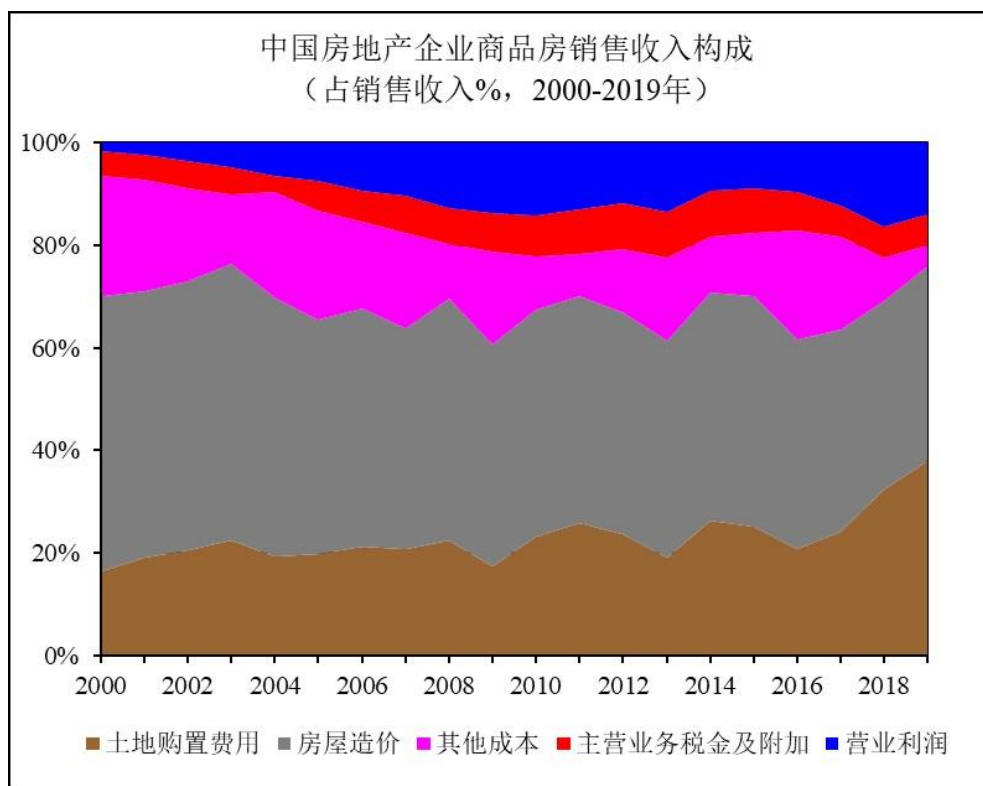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期 中国房地产问题（四）——房地产与财政

（编注：本期原标题为《中国经济杂谈（四）——房地产与财政》。）

作者：远航一号

按照现在的全国平均房价，买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宅大约需要 100 万元；而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大约需要 700 万元。这样昂贵的房价具体又是怎样分配的呢？其中哪些成为房地产业、建筑业的利润？哪些成为政府的税收？哪些又成为其它各项成本呢？

下面第一张图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包括住房和非住房）在各项成本和利润间的分配情况：



如图，在 2017 年以前，土地购置费用大约占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收入的四分之一，房屋造价（包括建筑业企业的税收、利润和成本）大约占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二，房地产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合计大约占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一。

自 2017 年以后，土地购置费用急剧上升。如果粗略计算，现在每用 100 万元买房，其中大约 40 万元是土地购置费用、40 万元是房屋造价和其它成本、10 万元是政府各项税收、10 万元是房地产企业利润。

2019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购置费用达到 4.2 万亿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4%。房地产企业的土地购置费用是全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一部分。下面第一个表说明了 2019 年中国各级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以及各项基金收支的情况：

中国各级政府的各项收支，2019 年（万亿元）

	支出	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	23.9	19.0
其中：中央	3.5	8.9
地方	20.4	10.1
政府性基金	9.2	8.5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7.4	7.1
国有资本经营	0.2	0.4
社会保险基金	7.5	8.4
合计	40.8	36.3

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98.7 万亿元（接近 100 万亿元）。所以，2019 年，中国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很不平衡。地方政府占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3%，但是却负担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这就造成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在本级财政上入不敷出，全部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各项政府性基金的总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其中的大头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政府性基金的总支出大于总收入，但由此产生的赤字大致可以被社会保险基金的盈余所抵消。

如果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相加，则中国政府的广义总收入共约 36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7%；如果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相加，则中国政府的广义总支出共约 41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

从表面上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占政府部门广义总收入的 20%、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0%。不过，如上表所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安排的支出大致相当。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中，大部分（约五分之四）属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前期开发等“成本性支出”，其余则用于支援农业农村、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建设等。

以上将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支、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四类账户相加的办法不便于将中国政府的收支情况做国际比较，也不便于观察政府部门收支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下面第二个表列举了按照资金流量表口径计算的 2019 年中国广义政府部门收入和支出的主要项目：

中国广义政府部门收入和支出的主要项目，2019 年（万亿元，资金流量表）

	支出	收入
政府消费和补贴	16.6	
其中：政府部门雇员报酬	8.9	
政府部门支付的财产收入	1.2	
政府部门转移支付	8.3	
政府部门投资总额	4.4	
减去：政府固定资本折旧	1.2	
政府部门净投资	3.2	
各种间接税		9.8
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		4.8
政府部门财产收入		2.7
政府部门转移收入		7.3
非金融资产处置净收入		2.4
合计	29.3	27

如上表所示，按照资金流量表口径计算的中国广义政府收支与第一个表中用四类账户相加办法得出的数字有所不同。其中主要的差别来自于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府性基金的处理。在第一个表中，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府性基金的收入和支出采取了分别列出的方法。在第二

表中，则只列出了政府部门非金融资产处置得到的“净收入”（即政府部门卖地净收入）。如果去掉政府性基金收支这一部分，则两个表中的其余部分大致相当。

其中，间接税、收入所得税、政府部门财产收入相加（17.3 万亿元）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致相当，政府部门转移收入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大致相当；政府消费和补贴、政府部门支付的财产收入（利息等）、政府部门净投资之和（21 万亿元）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致相当，政府部门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大致相当。

为了了解中国政府部门收入和支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有哪些特点，下面第三个表说明了 2019 年美国广义政府部门收入和支出的主要项目：

美国广义政府部门收入和支出的主要项目，2019 年（万亿美元）

	支出	收入
政府消费和补贴	3.0	
其中：政府部门雇员报酬	2.1	
政府部门支付的财产收入	0.9	
政府部门转移支付	3.2	
政府部门投资总额	0.8	
减去：政府固定资本折旧	0.6	
政府部门净投资	0.2	
各种间接税		1.5
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		2.5
政府部门财产收入		0.2
政府部门转移收入		1.7
合计	7.3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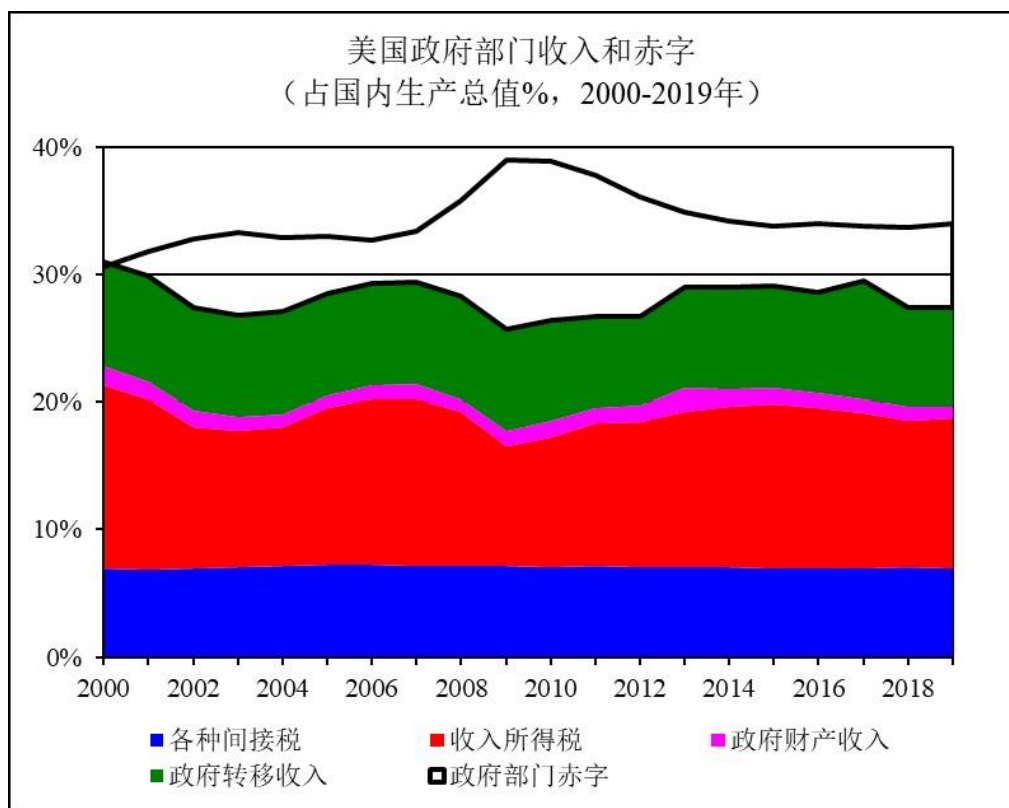
2019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21.4 万亿美元，美国政府部门总收入约 5.9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7%），总支出约 7.3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4%），总赤字约 1.4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7%）。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新冠危机爆发以前的财政状况。

与中国政府部门的收支相比，美国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直接税（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其中个人收入所得税 2.2 万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相比之下，中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仅 1 万亿元，相当于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在支出方面，美国政府部门几乎没

有净投资，而中国政府部门净投资达到 3.2 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这说明中国的政府部门比美国政府部门更加积极地参与资本积累。

此外，美国的社会保险账户有巨大赤字（约 1.7 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社会保险账户仍然略有盈余。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自 2000 年至 2019 年美国政府部门各个收入项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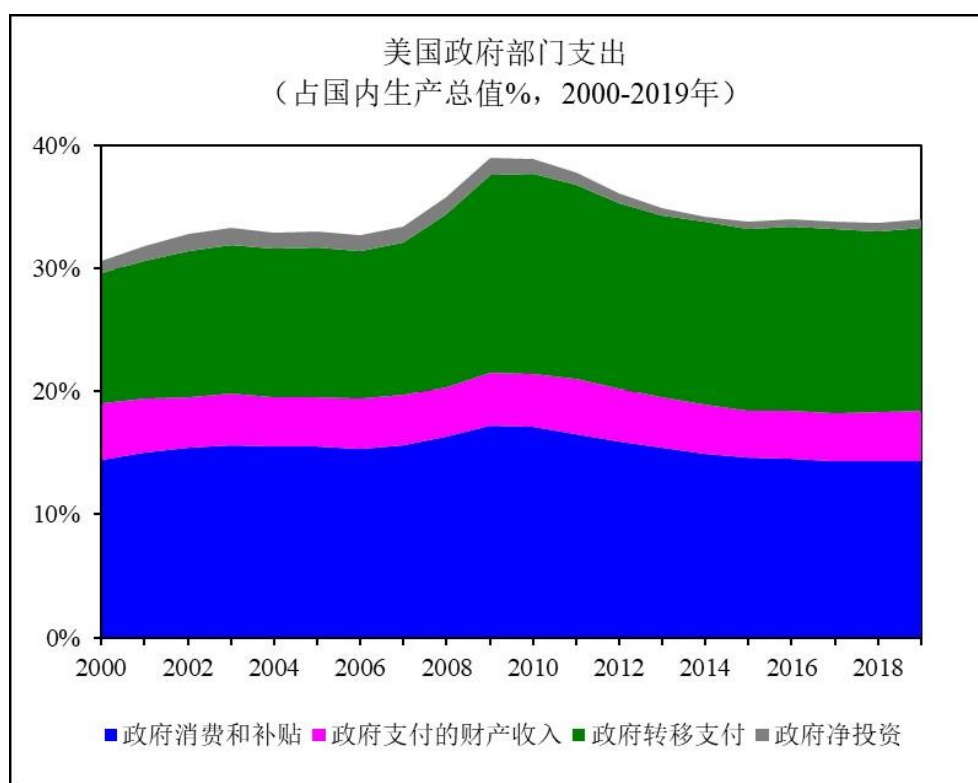
2000 年时，美国经济繁荣，政府部门总收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1%。此后，美国政府部门的总收入随着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大致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26%-29% 之间波动。

美国政府部门的总收入中，各种间接税（指对商品或服务征收的税，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房产税、关税等）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全部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随着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而波动，在繁荣时期可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3%-14%，在衰退年份则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9%-10%，一般占美国政府总收入的五分之二以上；各种转移收

入（主要是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保险缴款）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美国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强。

上图中黑线所包括的区域代表着美国政府部门的总赤字。美国政府部门常年处于赤字状态，且赤字规模庞大。在 2009 年经济衰退期间，政府部门总赤字曾经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即使在经济周期的扩张年份，美国政府部门的总赤字一般也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5%以上。

下面第三个图说明了自 2000 年至 2019 年美国政府部门各个支出项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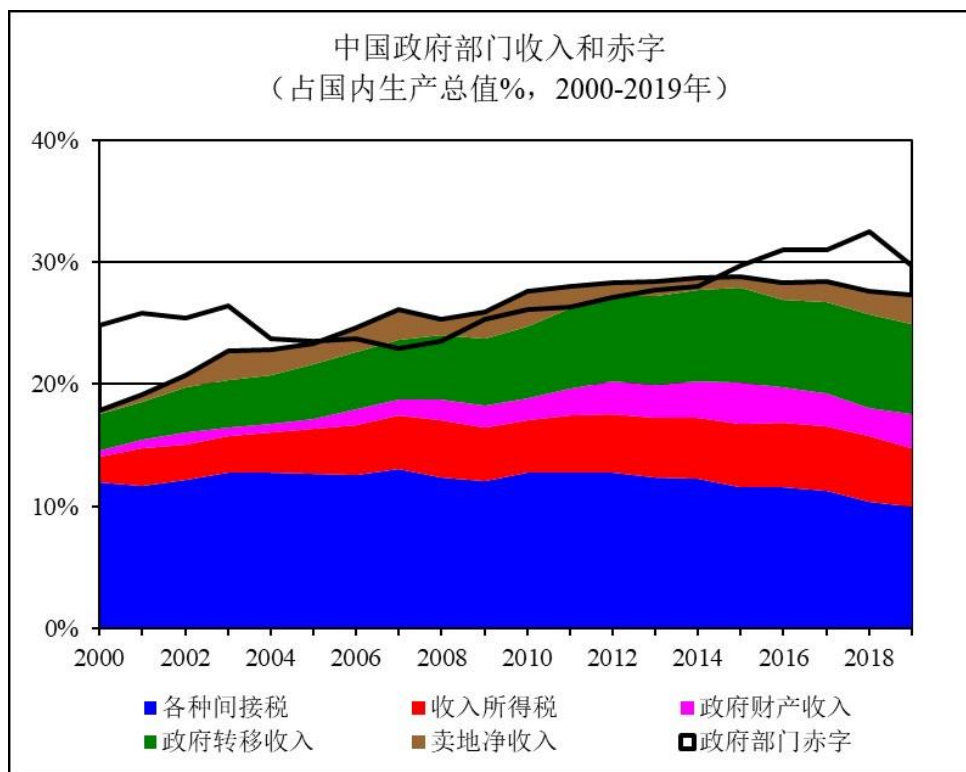
在正常年景，美国政府部门的总支出通常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遇到衰退年份，则可能上升到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美国政府部门总支出中，一个主要的项目是政府消费（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各项日常开支，其中的大头是政府雇员报酬），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15%、全部政府总支出的五分之二。图中所说的补贴指的是政府给企业的价格补贴，一般只占国内生产总值很小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在新冠危机之前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08%。所以，政府部门支付的利息等财产收入是美国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美国政府总支出的八分之一。

美国政府部门总支出的另外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各种转移支付（主要是政府支付的各项社会保险）。在新冠危机之前，各种转移支付已经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全部政府总支出的五分之二强。美国在社会保险账户上的巨大规模赤字决定了美国政府部门的赤字很难缩小，并且一遇到经济危机还会急剧增加。

下面第四个图说明了自 2000 年至 2019 年中国政府部门各个收入项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的情况：



在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部门的总收入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0%，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到了 2015 年，中国政府部门总收入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9%；2019 年，回落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7%。中国政府部门总收入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目前与美国大致相当。

中国政府部门总收入中最大的组成部门是各种间接税。2012 年以前，各种间接税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13%。2019 年，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 10%，仍然占全部政府总收入的近五分之二。中国政府总收入中的间接税比例较大，说明中国政府的税收有比较强的累退性，即收入越低的人所要缴纳的各种税收相对于收入的比例反而越高。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实行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和意愿都比较低。

与本世纪初相比，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近年来有所增加。2019 年，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全部政府总收入的近五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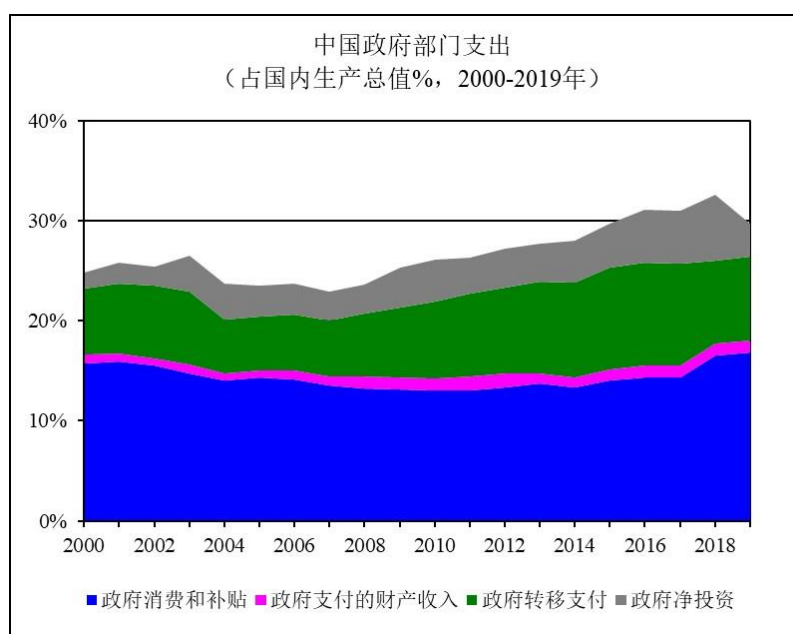
由于中国经济中仍然有一个相对较大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以红利、租金等形式得到的财产收入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要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全部政府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发展，各种转移收入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7%、全部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近年来，政府部门的卖地净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占全部政府总收入的比例一般不到十分之一。

在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部门曾经有比较大的赤字。从 2006 年至 2014 年，中国政府部门连续多年有盈余；不过，如果扣除这些年的卖地净收入，则政府的常规收支大致相抵、基本平衡。2015 年以来，中国的政府部门一直处于赤字状态。2018 年，中国政府部门赤字一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2019 年，赤字有所减少。

下面第五个图说明了自 2000 年至 2019 年中国政府部门各个支出项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的情况：



在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前，中国政府部门的总支出一般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此后，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2018 年，中国政府部门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增加到 33%，大致相当于正常年景美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过，2019 年，由于政府投资减少，中国政府部门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回落到 30%。

中国政府总支出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政府消费。2019 年，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全部政府总支出的近五分之三。

2008 年以前，中国政府部门的各种转移支付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至 2015 年，已经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019 年，因为统计口径调整（政府给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从转移支付的一部分改为政府消费的一部分），各种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回落到 8%、占政府部门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强。

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各种转移支付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未来很可能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无法向资本家阶级有效征税，导致劳动人民承担大部分税收（以间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的形式），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税收能力似乎已经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面财政危机。

第三十五期 “碳中和”与中国经济

（编注：本期原标题为《中国经济杂谈（五）——“碳中和”与中国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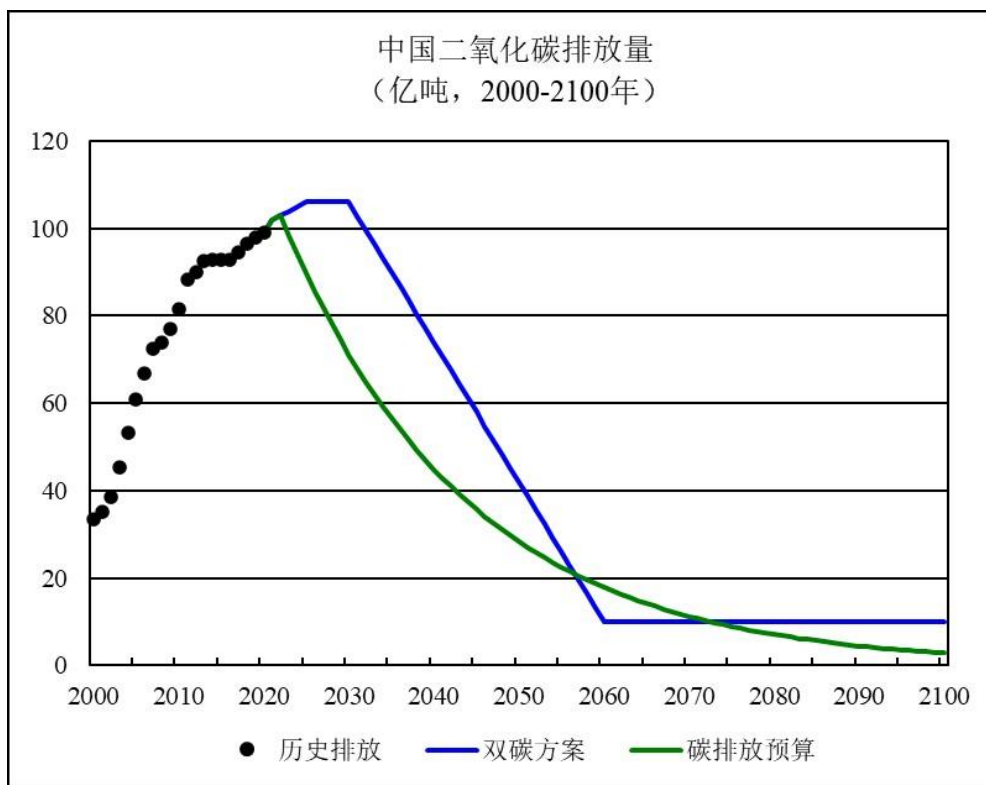
作者：远航一号

自从 2020 年底中国资产阶级当局提出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以来，所谓“双碳目标”成了网络流行语，也成了新能源、储能等若干行业资本家炒作的的一个重大“概念”。

所谓“碳达峰”、“碳中和”说的是什么？资产阶级当局能不能实现这些宏大目标？对于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又有哪些影响？作为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对于未来中国能源发展，应该注意观察哪些方面？这一篇杂谈就来聊聊这些问题。

所谓“碳达峰”，说的是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最高峰（峰值）以后开始下降。所谓“碳中和”，说的是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与该国自身的生态系统所能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因此也叫做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就中国来说，中国的陆地生态系统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大约 10 亿吨，所以“碳中和”大致意味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下降到 10 亿吨以下。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中国经济自 2000 年以来历年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所谓“双碳方案”未来预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轨迹以及在防止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的前提下中国所分得的碳排放预算所要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轨迹。



从 2000 年至 2020 年，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33 亿吨增加到 99 亿吨，年平均增长 5.5%；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从 2000 年的 19 万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02 万亿元，年平均增长 8.7%（虽然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率相对于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估了约 3%）。

在“双碳方案”下，我假设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今年将增加 3%，此后每年增加 1%；至 2025 年，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 106 亿吨。2026 年至 2030 年，假设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不变。从 2030 年起，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每年线性下降 3.2 亿吨，直至 2060 年下降到 10 亿吨。

科学家们广泛认为，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将导致海平面大幅度上升，淹没世界上大多数沿海城市，并引起一系列气候反馈，最终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如果要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那么，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全球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能超过 1.3 万亿吨。如果全球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世界各国现有的人口均匀分配，那么，中国可以分到的“碳排放预算”大约是 2340 亿吨。要将中国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限制在这个碳排放预算以内，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从 2023 年就开始下降，此后每年都下降 4.5%。

如果按照中国资产阶级的“双碳方案”，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 3140 亿吨（如果假设 2060 年以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不变），比两度方案下中国可以拥有的碳排放预算多出 810 亿吨。即使假设 2060 年以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零，“双碳方案”下中国经济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比两度方案下中国可以拥有的碳排放预算多出 410 亿吨。就是说，即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双碳方案”，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气候稳定以及生态可持续性，也仍然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当局提出的“双碳方案”仍然不失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不过，这个“双碳方案”的设计是颇有技巧的。它的第一步仅仅是要求在 2030 年以前实现“碳达峰”而不必立即开始下降。即使现任领导人连任再连任，到 2030 年也将基本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了。按照中国经济现在的节能减排力度，仅仅要达到“碳达峰”，不算特别艰难。真正难的是 2030 年以后。从 2030 年至 2060 年，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整整下降 96 亿吨，至 2060 年，要比峰值水平下降 91%。毫无疑问，中国资产阶级是狂热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工业党也是）！

按照这个“双碳方案”，2031 年至 2040 年，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年平均下降 3.5%；2041 年至 2050 年，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年平均下降 5.5%；2051 年至 2060 年，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年平均下降 13%。

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碳排放强度（平均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下降 4.6%；在同一时期，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的碳排放强度年平均下降 3.2%；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年平均下降 1.4%。表面上，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较快，但是，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碳排放强度大大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高出约 70%，因而节能减排相对容易；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率高于真实的经济增长率。

即使乐观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可以保持在 5%，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坚持实现“双碳目标”，那么，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要下降到 1.5%；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经济将转入负增长；到 2050 年以后，中国经济需每年负增长 8%。

既然如此，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又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并准备积极实施这一貌似自掘坟墓的“双碳方案”呢？自本世纪初期以来，国际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成员为气候变化问题忧心忡忡；其中确有一部分，试图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长远利益，妄图在不严重威胁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以及保全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方面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全球生态可持续性，以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资产阶级愿意充当“负责任大国”，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中国资本主义也面临着一系列实际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能源消耗巨大，石油、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国石油消费的进口依赖度已经超过 80%，天然气消费的进口依赖度也超过了 40%。虽然中国煤炭消费的进口依赖度不算很高（不到 10%），但是如今夏以来各地拉闸限电的窘况所证明的，即使中国减少从个别国家的少量煤炭进口，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引起整个电力系统的供应不足，进而威胁经济运行。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均不同程度依赖进口而国际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秩序又更加动荡与不稳定的大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必然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如果能够借着碳达峰、碳中和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费，同时减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增加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也可以算是名实双收。

按照近日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自从现任领导人上台以来，几乎所有重要官方文件的大标题都变得无限冗长绕口乏味、不知所云而且糟蹋汉语文语法），中国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是到 2030 年时，非化石能源消费要占全部能源消费的 25%（现在约为 16%）；到 2060 年时，非化石能源消费要占全部能源消费的 80%。但是，即使这些如意算盘全部都“如意”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 2030 年至 2060 年期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90%以上，也仍然是个迷。

如果从 2030 年至 2060 年，中国经济的化石燃料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例可以从 75%减少到 20%，那么，倘若不考虑化石燃料消费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就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每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 73%（在三十年期间年平均减少 4.3%）。但是，减少 73%距离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减少 91%还有距离。即使假设中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到 2060 年时果然可以减少到 2030 年的 27%，要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到 2060 年时减少到 2030 年的 9%，那么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还必须从 2030 年至 2060 年减少大约三分之二！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论证过，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正常发展”，至 2060 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增加到现在的三倍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加到美国的一半（见“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第六篇）。如果用 2060 年与 2030 年比，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可以翻一番。到那时，中国仍将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

如何能够在能源消费总量减少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争取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这将对中国资产阶级点石成金能力与智慧的严峻考验。

还有一种可能性需要考虑到。那就是现任领导人是最喜欢好大喜功的，而他手下的谋臣食客们又必然是了解他的这一个性的。以往，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出诸如“千年大计”、“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类宏大命题，若干年或若干个月后往往不了了之。这一次，从发改委到国家能源局到新能源业的资本家们都做了严密的计算，为领导人的梦想提供了充足的科学依据，再加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将“双碳方案”的梦想列车顺利地开出起点站，再开到 2030 年的中间休息站，应该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

至于 2030 年以后，就像路易十五说的：“*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或者，如果中国资本主义不再“正常发展”，谁将荣幸地担任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路易十六呢？正如莎士比亚说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第三十六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一）——从“新时代社会契约”说起

作者：马列游侠经济观察

从今日起，马列游侠公众号聘请经济学专业人士就国内外重大经济问题不定期发表评论，取名“马列游侠经济观察”栏目。

第一期和随后几期的题目是探讨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能否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问题。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上面这一段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执政党向全国人民郑重承诺，至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各项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指标将“全面提升”，中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将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本观察家看来，这一宏伟目标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执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新时代“社会契约”，可以简称为“新时代社会契约”。这一社会契约能否兑现，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幸福安康，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长期巩固。

在这一期和随后几期经济观察中，本观察家将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所需要的条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国际上，现代化理论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最早提出并开始流行的。但是，对于什么是“全面现代化”，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代化”通常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各个领域追赶并达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比如，中国科学院网站关于“什么是现代化？”的词条，就做了如下解释：“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也是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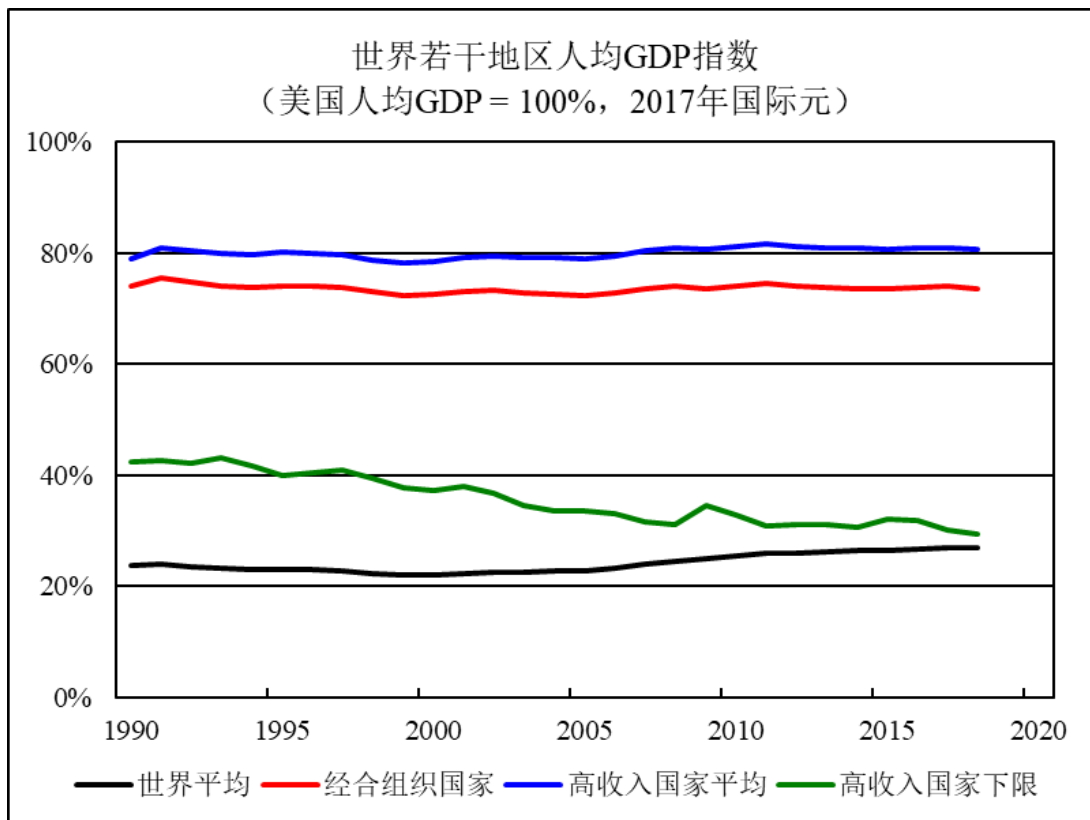
按照这个理解，所谓实现“全面现代化”应该就是指的本世纪中期中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成为当时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发达国家或先进国家；其中，在经济领域成为发达国家应当是在其他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如果要在经济领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发达国家，需要满足哪些标准呢？

首先，我们要区别“发达国家”与“高收入国家”这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有很大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发达国家肯定是高收入国家，但是，越来越多的高收入国家不再是发达国家。这是因为，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指的是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照 1987 年不变美元计算在 6000 美元以上的国家。

这个标准，在 1987 年刚刚提出的时候，基本符合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一些准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的人均经济产值不断提高，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下限已经越来越不能反映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了。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世界若干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所有的指数都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2017 年国际元为单位（一单位 2017 年国际元与 2017 年美国国内市场上的一单位美元有相等购买力），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00%（因为美国可以代表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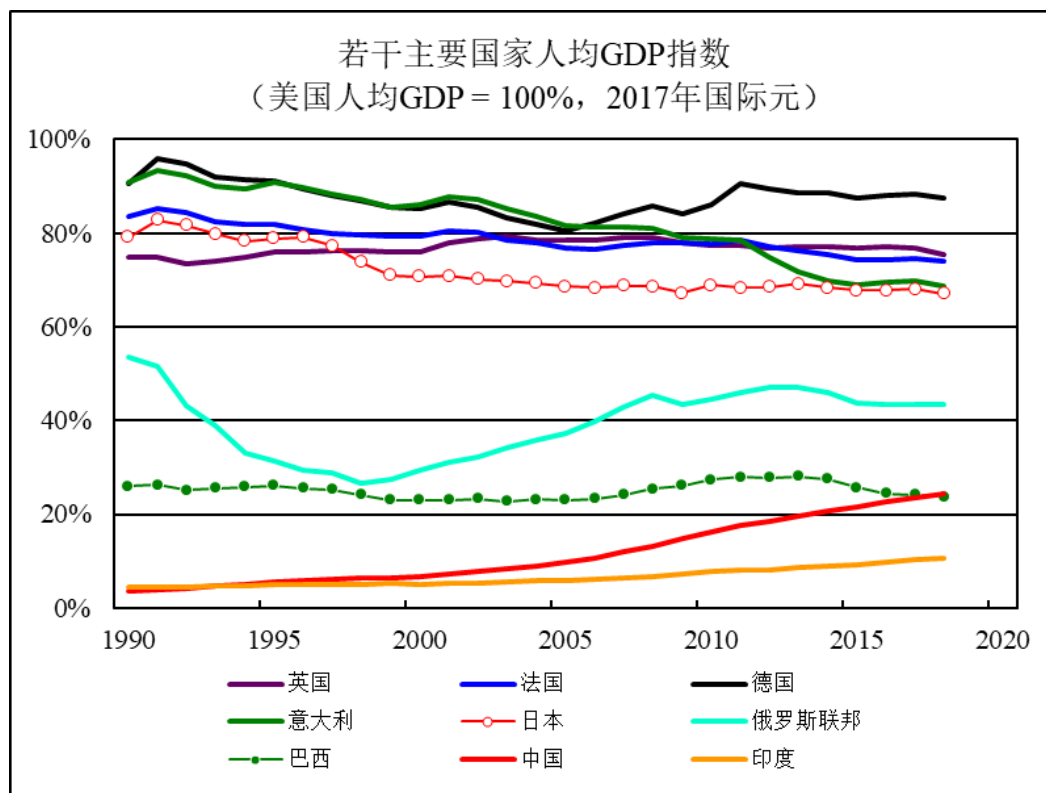


如上图所示，自 1990 年以来，高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80%的水平；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又称 OECD 国家）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3%-74%的水平。其中，经合组织国家包括了当前世界上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若干个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等）。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以及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大体可以代表当前世界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上图还显示了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下限。将世界银行所规定的作为高收入国家最低标准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换算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2017 年国际元以后，可以算出，1990 年时，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42%，又相当于当时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当时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但是，到了 2018 年，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仅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29%，与当年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相比也仅仅高出两个百分点。

按照中国经济现有的发展势头，在未来几年进入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行列问题不大。但是，即使中国经济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被列入“高收入国家”，实际上也仅仅是表明中国经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略高于世界平均的水平，还远不能算是达到了发达国家或“全面现代化”的标准。

那么，中国经济要达到怎样的水平才能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发达国家呢？第二个图比较了世界上若干主要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仍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00%。



在第二个图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几个公认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保持在相当于美国 90%的水平，英国和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三，意大利和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另一方面，近年来，俄罗斯联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美国的 43%-47%。在当今世界上，俄罗斯联邦显然已经不是发达国家了，也不能算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国家。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发达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要达到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一半以上，那么或许可以说，这个国家实现了“基本现代化”，即成为准发达国家；而要实现“全面现代化”，恐怕需要这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巴西相当，大约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那么，到 2050 年前后，中国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吗？关于这个问题，本观察家将在今后几期“马列游侠经济观察”中继续探讨。

第三十七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二）——经济增长的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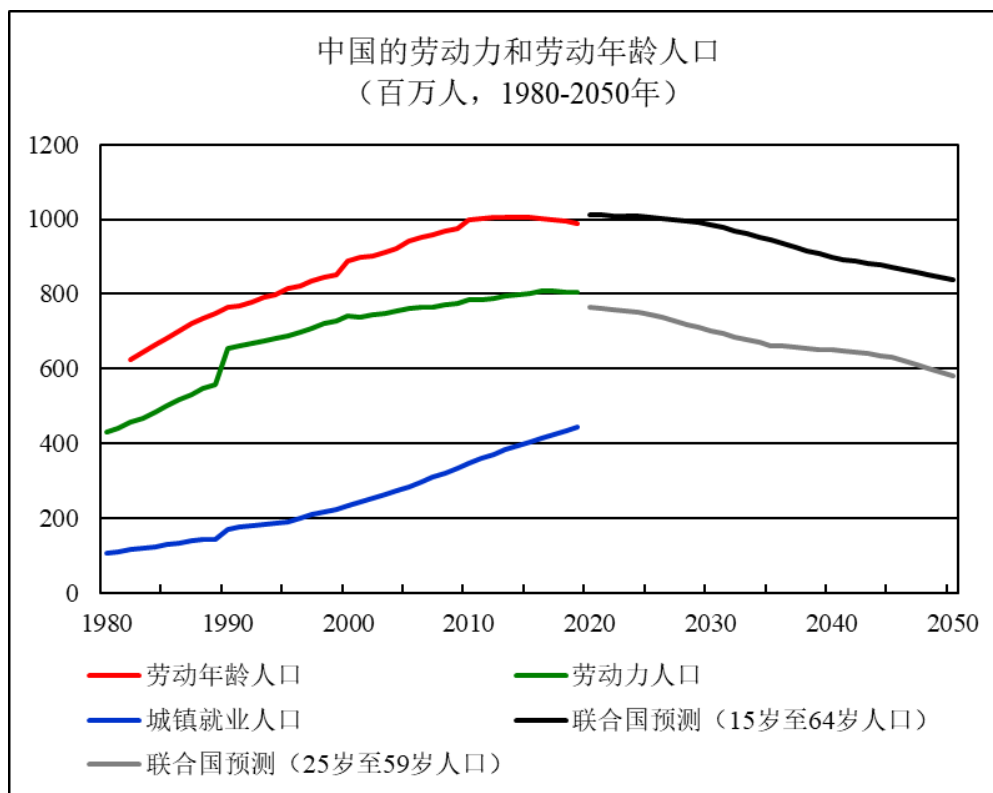
作者：马列游侠经济观察

在上一期经济观察（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一））中，本观察家指出，中国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基本现代化”，到那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美国大约一半的水平；而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到那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至少需要达到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二的水平。

中国到本世纪中期能否实现全面现代化，取决于中国在未来三十年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虽然学术界对于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靠存在着一定争议，有研究认为，近年来，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真实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高估了大约三个百分点。但本观察家的讨论仍然以官方经济增长率为基础，暂不介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可靠的讨论。

从统计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表达为该国就业人口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收获了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巨大的人口红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业总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人口）在 2013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的 10.06 亿以后，就开始缓慢下降。据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 2030 年下降到 9.86 亿，于 2040 年下降到 8.98 亿，于 2050 年下降到 8.38 亿。

中国的总就业人数在 2017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的 7.76 亿以后也开始趋于下降。不是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参加工作。中国未来的就业人数主要取决于最佳劳动年龄人口（25-59 岁人口）的规模。据联合国预测，中国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将于 2030 年下降到 7 亿，于 2040 年下降到 6.5 亿，于 2050 年下降到 5.8 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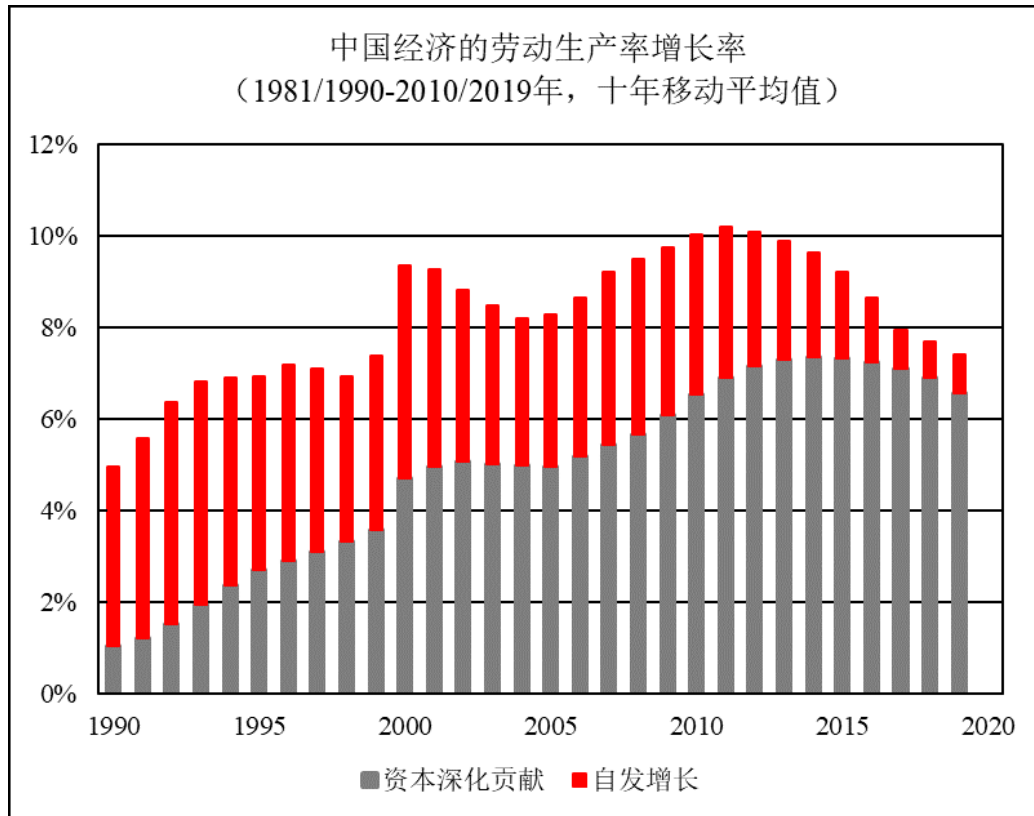


上面第一个图说明了 1980-2050 年期间中国劳动力（含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历史上实际变化的情况和未来预期变化的情况。如图所示，按照联合国预测，在 2020-2050 年期间，中国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约四分之一。这样，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不但无法收获人口红利，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还将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中的一个沉重负担。

由于中国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完全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隐患。

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通过增加固定资本的投入、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等方法来代替活劳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提高“资本技术构成”）；二是在不增加固定资本投入的前提下，通过改进制度和组织、改善劳动过程、提高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等方法“自发”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通过迫使工人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而增加的产出，在统计上也会表现为“自发”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的贡献（称之为“资本深化贡献”）和“自发”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问题涉及增长经济学的原理，此处不做详细解释。下面的第二个图说明了自 1981-1990 年以来中国经济历年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及其构成：



第二个图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进程以及未来的隐患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上面的柱状图中，为了便于观察长期趋势，每一个观测值取的都是十年平均值。比如，对应着 1990 年的第一个观测值指的是 1981-1990 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对应着 2019 年的最后一个观测值指的是 2010-2019 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每一个观测值又分为两个部分，下面灰色的部分代表由于固定资本投入增加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深化贡献），而上面红色的部分代表的是劳动生产率的自发增长；两者之和代表某一个十年时间段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

从第二个图中可以看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自发增长，劳动生产率的自发增长率平均约为 4-5%。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自发增长速度比较快，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见第一个图中城镇就业人口的快速增长）。由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

如果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相当于中国劳动力总数 1%的劳动力（大约 1000 万人），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在统计上就可以提高 1-1.2 个百分点。1990-2019 年，中国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 40%增加到了 75%，平均每年增加约 1.2 个百分点。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私有化、市场化过程中，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大大增加、劳动强度大大提高。

但是，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的贡献。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每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在 2002-2011 年期间达到历史最高峰（10.1%）；此后，就趋于下降。至 2010-2019 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7.4%。在 1991-2000 年期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中，大约 50%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另外 50%来自于自发增长。到了 2010-2019 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中，大约 89%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只有 11%来自于自发增长。

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过度依赖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即固定资本的投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企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利润率）在不断下降。我们知道，在私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私人资本只有在预期可以得到相当的回报率的前提下才会从事生产性投资并提供就业。如果私人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那么或迟或早，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求与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之间会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特别是其中的自发增长部分）在近年来趋于下降？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经济还没有彻底市场化、私有化。所以，他们的建议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进一步取消政府管制，在政策、法律方面进一步向企业家倾斜，将劳动者的命运交给自由市场。在本观察家看来，这样的建议与中国经济实际面临的问题南辕北辙，并可能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执政党的政治安全。

从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趋于下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情况，一些私有制完全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并不比中国经济快。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就可以扭转目前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于下降的局面。

本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趋于下降且过度依赖资本深化贡献，说明中国经济以往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和进口西方先进技术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这个瓶颈，靠私人资本和市场配置资源是无法突破的。

如果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要求与私人资本逐利动机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前景呢？本观察家将在以后的经济观察中继续阐述。

第三十八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三）——高投资陷阱

作者：马列游侠经济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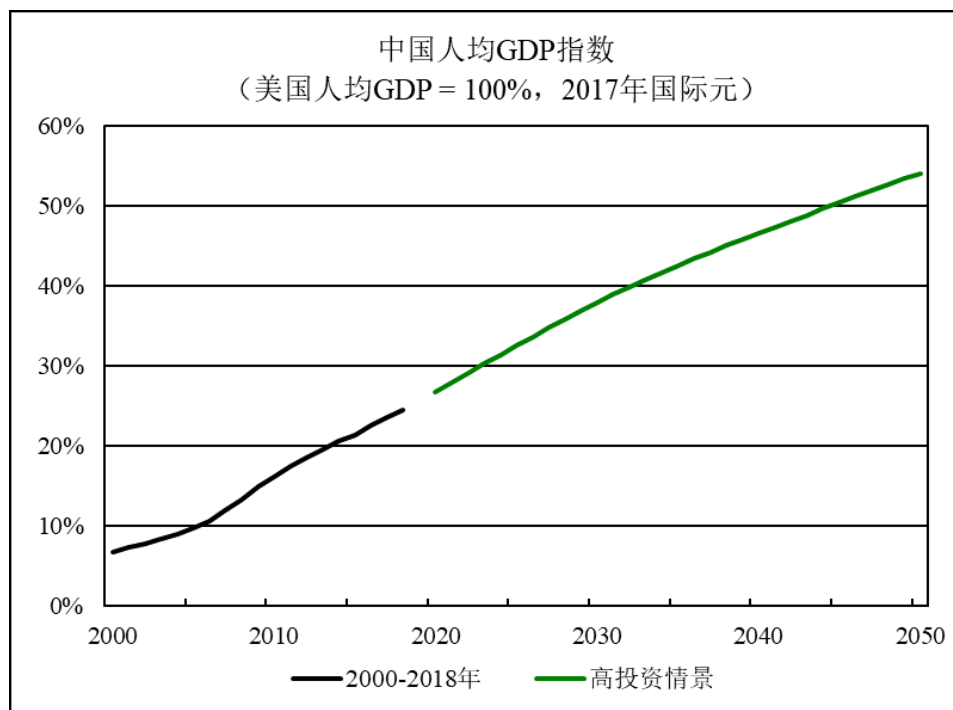
在上一期经济观察中，本观察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面临着两大隐患。一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队伍在未来将持续下降，二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已经在趋于下降。

中国近十年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约为 7%，其中来自于“资本深化贡献”的部分（即来自于通过机械化、自动化用固定资本代替劳动的部分）约为 6%（接近九成），来自于自发增长的部分约为 1%（实际不到 1%，约占一成）。

中国经济目前的“资本产出弹性”约为 0.5；就是说，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等，固定资本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产出倾向于增加 0.5 个百分点。所谓“资本产出弹性”也等于“资本收入份额”（即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在增长经济学中，如果“资本深化的贡献”占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例大于“资本产出弹性”，那么就会有两个后果：一，企业资本的回报率（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率）会趋于下降；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根据以上的数据，任何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未来会一直趋于下降，直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到 2% 左右，然后才会稳定下来。

这样，我们用联合国所预测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就可以估计中国未来劳动力队伍变化的轨迹。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资本产出弹性、投资率等指标，就可以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在未来的增长轨迹做出合理的估计。将两项估计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推算出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的增长率。如果再对美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的增长率做出类似的估计，就可以评估中美两国经济在未来三十年相对地位的变化了。



在本文的结尾处，本观察家列出了计算中国和美国未来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主要假设，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按照现有的假设，至 2050 年，中国经济的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达到美国经济的两倍。中国将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不过，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两倍的经济总量优势不能算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仅取决于经济的总量，更要看经济的质量和综合技术水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总量约为日本的五倍，战争结果众所周知。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了，或者中国周边的各种争端以及祖国统一问题就必然迎刃而解了。事实上，近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越发展，祖国统一问题不是越好解决，而是在实际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就经济的质量和综合技术水平来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可以说明问题。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日本的一半。上面第一个图说明了 2000-2050 年期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2000-2018 年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况；2020-2050 年是按照上述假设所预期发生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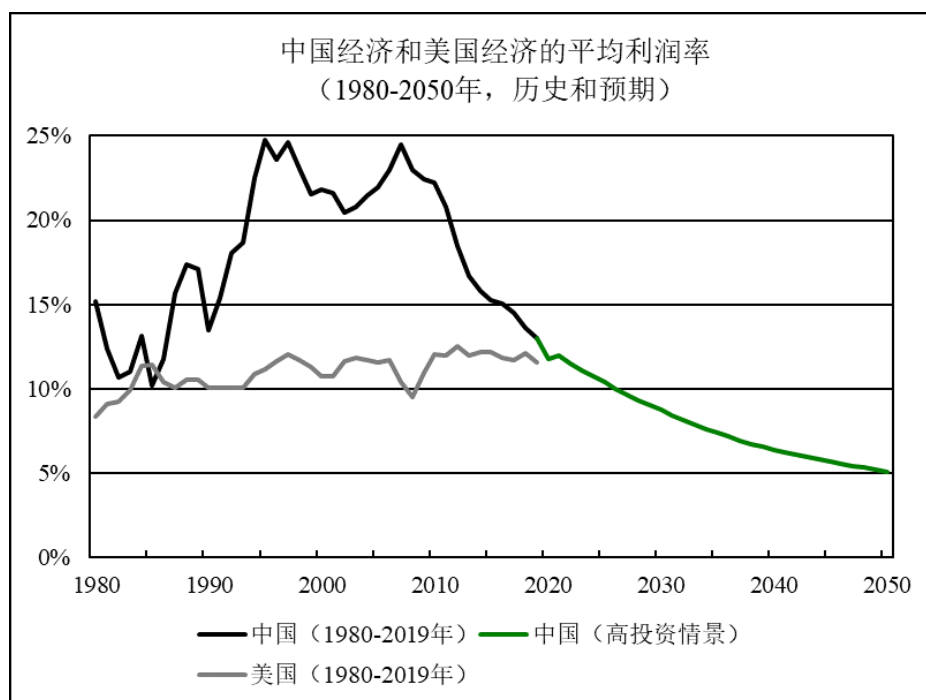
2018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24%；预期到 2050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的 54%。这个比例，略高于现在俄罗斯联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如本观察家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第一篇评论中所说明的，中国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

“基本现代化”，到那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美国大约一半的水平；而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到那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需要达到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二的水平。按照第一个图中所预期的前景，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可以实现“基本现代化”，但是还无法实现“全面现代化”。

在第一个图中，假设中国经济在未来将维持现有的高投资率（企业部门投资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所以在第一个图中所展示的情景也叫“高投资情景”。在高投资情景下，中国经济将基本维持现有的经济发展势头，经济增长率逐步缓慢下降，与美国在人均经济产值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

但是，如本文在一开始指出的，这样的高投资情景对于资本家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资本家的利润率会不断地趋于下降。很多人现在还误以为国有经济仍然在中国经济中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实际上，据笔者估算，国有经济成分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仅有六分之一左右；如果扣除其中属于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部分（也就是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属于公有的部分），真正属于国有企业的增加值大概也就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左右，至多不会超过 10%。

所以，私有制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无论主流经济学如何美化私有制经济，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私有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如果利润率不断地趋于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私有制企业必然要减少投资、缩小生产规模，甚至于关厂搬迁。这已经是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法靠行政命令来解决的。



第二个图比较了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平均利润率（用全部税后财产收入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来代表）以及在“高投资情景”下中国经济未来预期的利润率变化情况。

以美国经济来说，历史上的利润率一般都在 10%以上，只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和 2009 年遇到严重经济危机时才会下降到 10%以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一直大大高于美国，大约相当于美国同时期利润率的两倍。但是，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利润率持续快速下降；到 2019 年，已经下降到 13%。

在“高投资情景”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将继续趋于下降，到 2025 年以后，就会下降到 10%以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经济危机。所以，我们无法评估利润率下降到什么水平，中国经济就必然陷入危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无法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上平均的利润率而不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 10%以下（美国经济危机时的利润率水平），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到那时，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将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由于私人资本是以追逐利润为动机的，一旦中国经济的利润率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私人资本必然要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增加在国外的投资。这种资本运动一旦形成潮流，就会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资本外逃，从而导致中国的正常经济发展进程中断。这样的趋势，是由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决定的，不是靠减税降费或者“可捕可不捕，不捕”一类对企业家的优惠政策就可以逆转的。

所以，“高投资情景”实际上可能将中国经济推入正常发展进程中中断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高投资情景”也可以称之为“高投资陷阱”。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假设（高投资情景）：

就业人数保持在劳动年龄人口的 77%；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 = 1%；企业部门固定投资等于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1%；资本产出弹性 = 0.54；折旧率 = 5%

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假设：

就业人数保持在劳动年龄人口的 70%；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 = 1%；企业部门固定投资等于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3%；资本产出弹性 = 0.37；折旧率 = 8.6%

第三十九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四）——低投资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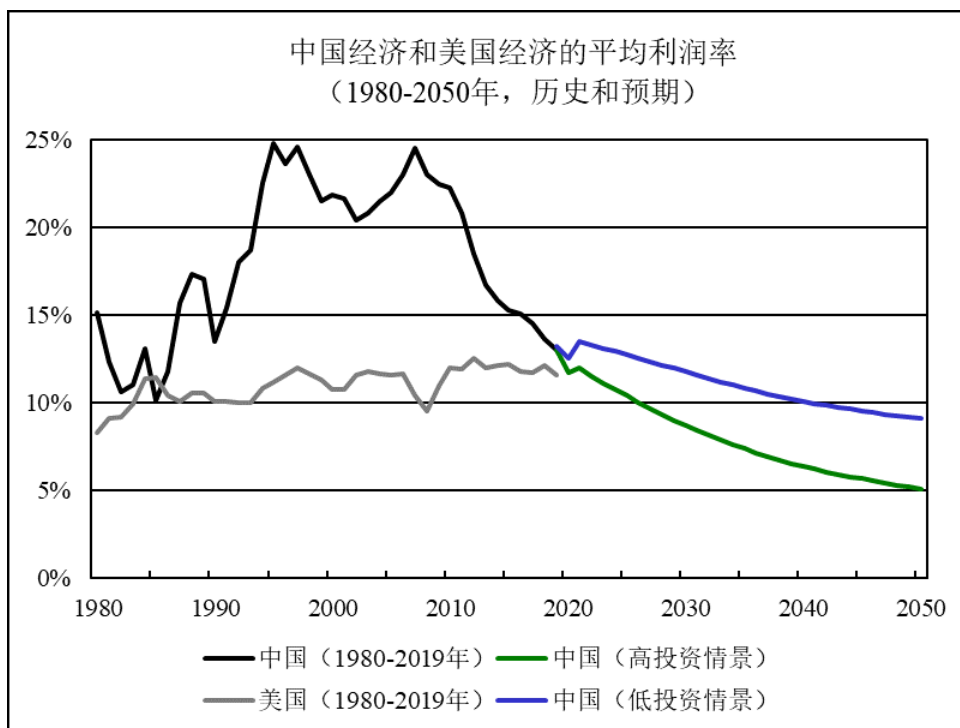
作者：马列游侠经济观察

在上一期经济观察（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三））中，本观察家指出，按照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趋势，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逐步减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趋于下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有望在 2050 年前后达到美国一半的水平，从而实现“基本现代化”。

但是，要实现上述前景的一个前提，是中国要维持现有的高投资率；如果维持现有的高投资率，又必然意味着中国企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利润率）不断下降，直至引起大规模资本外逃和中国正常经济发展进程的中断。这样，上述的“基本现代化”前景也就无法实现了。这说明，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要求、执政党向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新时代社会契约”与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要避免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在理论上有两种可能性。在理想情况下，中国经济可以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自发增长率，也就是在不增加固定资本投入的条件下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但是，笔者所假设的中国在未来的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符合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长期经验。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平均技术水平接近发达国家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技术转移方面对中国加强限制，中国的“技术赶超红利”也接近于枯竭，因而未来要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的可能性不大。

要制止利润率的下降，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降低投资率。在这一期经济观察中，笔者设想一种“低投资情景”，假设中国的企业部门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高投资情景减少 10 个百分点（下降到 20%左右）。在本文的结尾处，本观察家列出了计算中国和美国未来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主要假设，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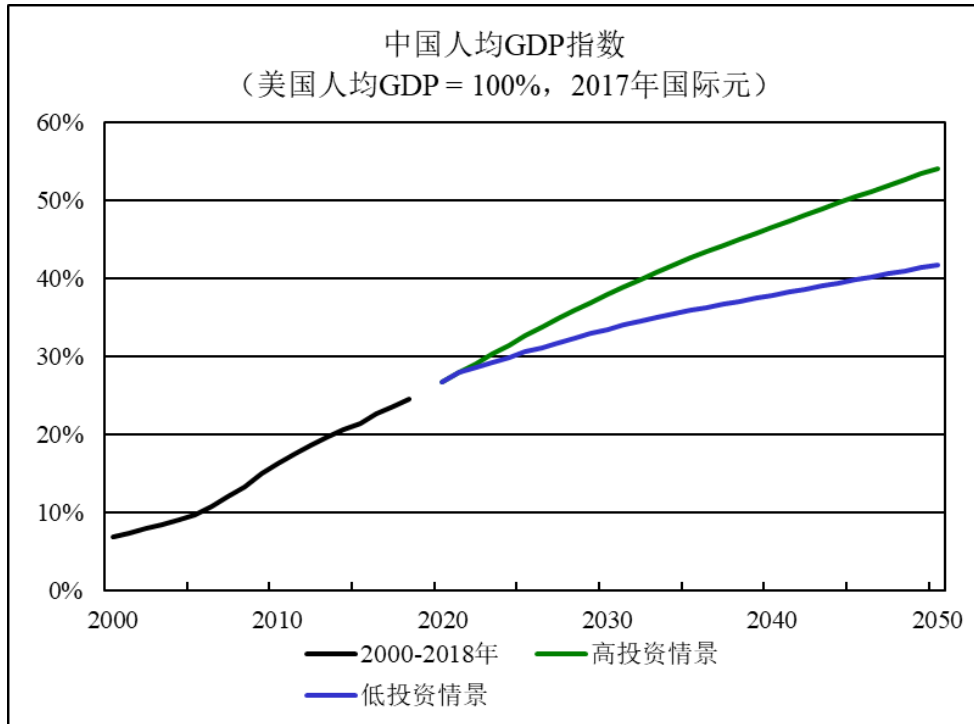


上面第一个图比较了中国在“高投资情景”和“低投资情景”下平均利润率变化的情况。在“低投资情景”下，虽然中国经济还无法完全避免利润率趋于下降，但是平均利润率在未来两年会暂时回升，此后则缓慢下降，在 2040 年以前都可以保持在 10% 以上，不会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危机。对于中国的私人资本来说，“低投资”情景是一种相对比较理想的选择。

但是，在投资率下调 10 个百分点以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势必放慢。就中国经济总量来说，至 205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可以达到美国的 1.5 倍（而在“高投资情景”下可以达到两倍）。不仅如此，在 2050 年以后，由于中国人口趋于下降而美国人口将继续缓慢增长，中、美两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将基本保持稳定，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可能逐步下降。

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在“低投资情景”下，至 2050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的 42%（而在“高投资情景”下可以达到 54%），与现在俄罗斯联邦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相当。中国经济将不仅无法实现“全面现代化”，而且无法实现“基本现代化”。中国经济将陷入距离现代化一步之遥却又隔着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的“发展中陷阱”。在这个意义上，“低投资情景”也可以称之为“低投资陷阱”。

第二个图比较了在“高投资情景”和“低投资情景”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轨迹：



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假设 (低投资情景)：

就业人数保持在劳动年龄人口的 77%；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 = 1%；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等于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1%；资本产出弹性 = 0.54；折旧率 = 5%

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假设：

就业人数保持在劳动年龄人口的 70%；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 = 1%；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等于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3%；资本产出弹性 = 0.37；折旧率 = 8.6%

第四十期 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五）——再分配陷阱

作者：马列游侠经济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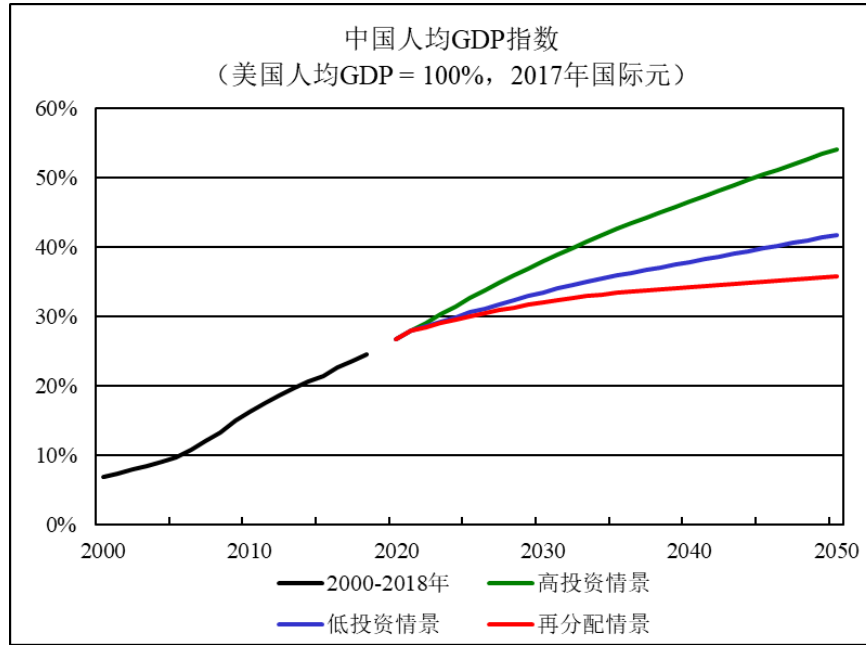
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第三篇评论（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三））中，本观察家指出，在“高投资情景”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无法同时兼顾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化要求以及中国私人资本的逐利要求。

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第四篇评论（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四））中，本观察家设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优先满足私人资本的要求，降低投资率以达到稳定利润率的目的。但是，在“低投资情景”下，中国经济将不仅无法实现“全面现代化”而且无法实现“基本现代化”。

不仅如此，“低投资情景”还包括着另外的矛盾。粗通经济学的读者可能知道，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包括着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等几个大项。在上一期经济观察中，笔者假设，企业部门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高投资情景”相比下调 10 个百分点，但并没有说明，由此而出现的总需求缺口用什么来弥补。如果用政府支出来弥补，会造成大幅度的财政赤字，形成不可持续的政府债务。由于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市场需求萎靡，中国经济也很难像本世纪初期那样，大幅度增加出口和贸易顺差。这样，由于调低投资率而形成的总需求缺口只能靠消费来弥补。

广大劳动者是消费者的主体，要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前提是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这一期经济观察中，笔者假设，为了弥补投资率下降而出现的总需求缺口，党和政府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的“共同富裕”的承诺，通过实行市场经济范围内的常规改良（比如鼓励集体谈判、征收累进所得税、加大转移支付和扶贫力度等，但不改变私有制主导的所有制结构），促成国民收入“再分配”，成功地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提高 10 个百分点，从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从 46%提高到 56%（接近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要从 54%减少到 44%。因为增长经济学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固定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产出会增加零点几个百分点）等于资本收入份额，这样，中国经济未来的资本产出弹性也要调低到 0.44。这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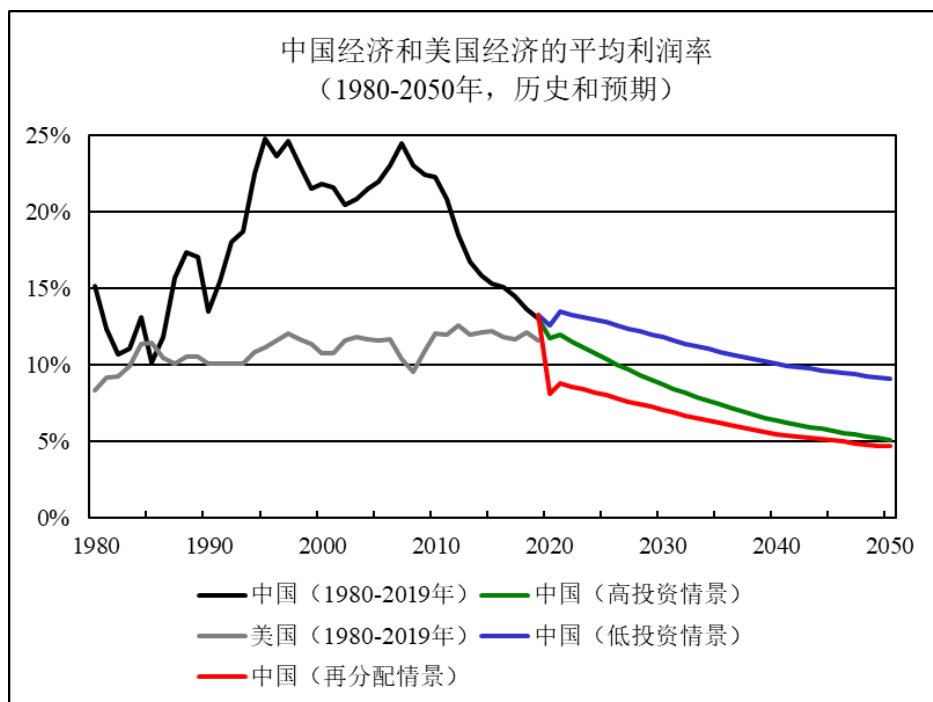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在“高投资情景”、“低投资情景”和“再分配情景”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轨迹。在本文的结尾处，本观察家列出了计算中国和美国未来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主要假设，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在“再分配情景”下，至 205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 1.3 倍（在“高投资情景”下是两倍、在“低投资情景”下是 1.5 倍）。在 2050 年以后，由于中国人口下降、美国人口继续增长，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将逐步缩小。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再度超过中国、重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

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在“再分配情景”下，至 2050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的 36%（在“高投资情景”下是 54%、在“低投资情景”下是 42%），远远没有达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

不仅如此，在“再分配情景”下，由于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大幅度下降，还会在实行再分配政策的同时，立即造成中国经济平均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并有可能随时引发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危机，迫使政府放弃经济改良政策。



第二个图比较了中国在“高投资情景”、低投资情景”和“再分配情景”下平均利润率变化的情况。

到这一期经济观察为止，本观察家一共用五篇文章评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条件和所面临的挑战。笔者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第一篇评论论证了，中国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届时要达到美国的一半以上，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届时要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以上。

第二篇评论文章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隐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趋于下降。

第三篇评论文章论证了，按照中国经济的现有发展趋势，到本世纪中期，中国有望实现“基本现代化”但无法实现“全面现代化”。而且，在中国实现“基本现代化”所需要的高投资率与私人资本的逐利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有被大规模资本外逃打断的危险，从而陷入“高投资陷阱”。

第四篇评论文章论证了，如果要优先满足中国私人资本稳定利润率的要求，则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经济将无法实现“基本现代化”，从而陷入“低投资陷阱”。

本期经济观察（也是关于现代化问题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论证了，在不改变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的前提下，如果为了弥补实行低投资率而造成的总需求缺口、同时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而实行市场经济范围内的常规的再分配改良，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远离现代化目标。不仅如此，私人资本的大规模外逃将反过来要挟党和政府，迫使后者放弃改良政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陷入危险的“再分配陷阱”。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不克服“高投资陷阱”、“低投资陷阱”、“再分配陷阱”，中国经济将无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现代化目标，这意味着执政党无法兑现其向广大人民群众郑重承诺的“新时代社会契约”，也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渴望的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红利的“共同富裕”愿望，从而带来经济上和政治上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

以上分析还表明，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中国经济将很难乃至根本不可能跨越上述陷阱。反之，如果能够逐步地恢复并加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上述几种困境都将不难克服。比如，如果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而不是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私有企业，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就可以一方面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同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缩小贫富差距，而不必担心高投资和再分配对于利润率的负面影响，更不必担心大规模资本外逃。

这说明，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殷切期望、执政党郑重承诺的“全面现代化”目标，迫切需要在经济改革和建设领域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市场决定论的条条框框，认真考虑和部署恢复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假设（再分配情景）：

就业人数保持在劳动年龄人口的 77%；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 = 1%；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等于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1%；资本产出弹性 = 0.44；折旧率 = 5%

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假设：

就业人数保持在劳动年龄人口的 70%；劳动生产率自发增长率 = 1%；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等于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3%；资本产出弹性 = 0.37；折旧率 = 8.6%

第四十一期 中国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2000-2020年

（编注：本期原为“红色经济观察”2022年第1期。）

作者：红色经济观察

自即日起，红色中国网开始发布 2022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红色经济观察系列由红色经济观察组撰写，于每年夏季发布，通过整理和分析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统计数据，追踪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借以认识和分析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资本主义积累内外条件的变化，力求在科学的基础上推断资本主义危机来临的可能性以及未来革命迫近的程度。

红色经济观察组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超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最大限度。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从世界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以便在国内工人阶级中收买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人贵族队伍；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矛盾将无法以阶级妥协或社会改良的方式求得解决。中国资本主义作为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一特点，还决定了，或者中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企图将归于失败，或者中国资产阶级将根本无心、无力谋求足以带来充足超额剩余价值的对外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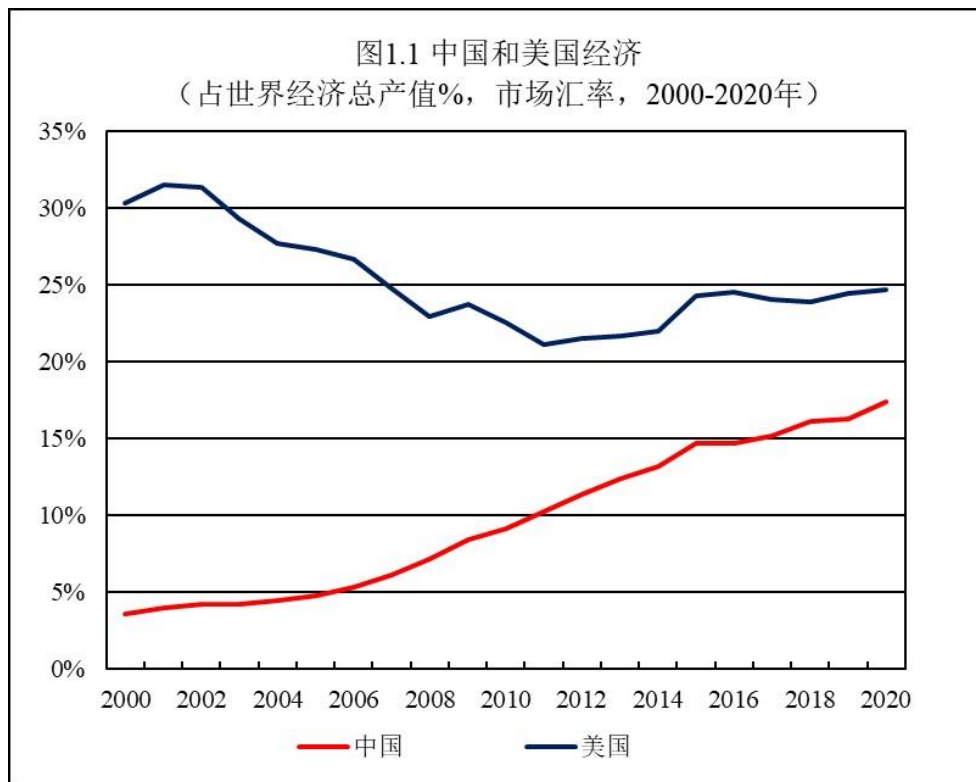
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基本矛盾，决定了未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如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在考察社会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 ... 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

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红色经济观察系列要做的工作，就是力求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努力正确地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来解释包括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在内的世界上的种种变化，进而为改造世界服务；而不是从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出发，在想象中实现“变革”，更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或抚慰小资产阶级的脆弱心灵。

图 1.1 比较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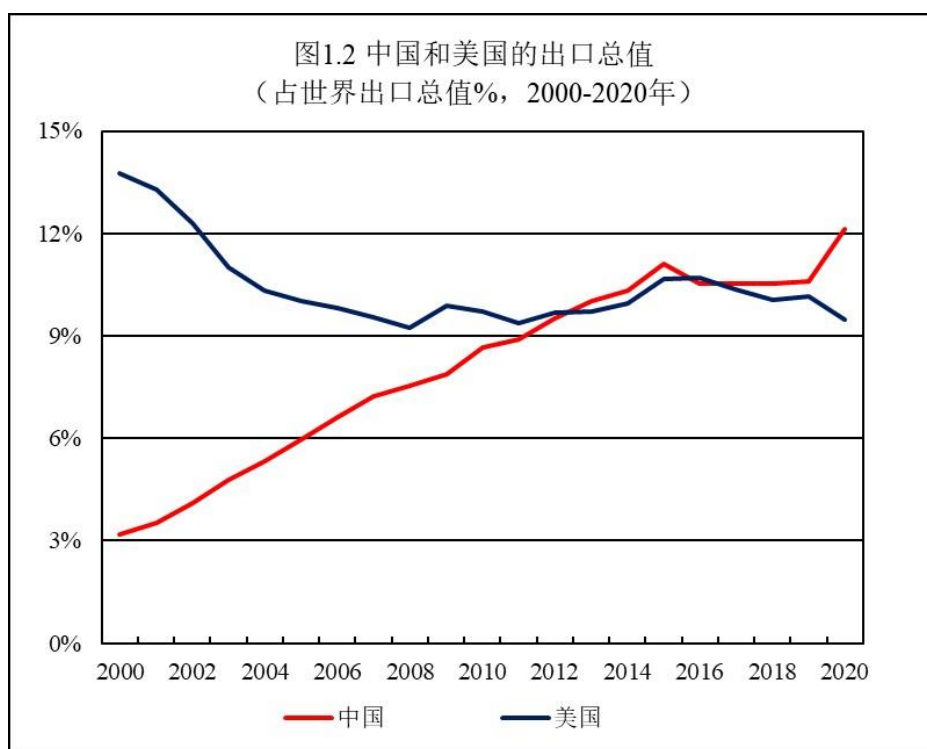
2020 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总产值达到约 85 万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 15 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 21 万亿美元。

在本世纪初，美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31%，中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4%。到了 2011 年（即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下降到了 21%，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上升到了 10%。此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有所

回升。202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保持在25%，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则进一步上升到17%。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仍然按照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那么，可以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如果看中国和美国各自对于2011-2020年期间累计世界经济增长（即按照当期美元计算的世界经济总产值在2010年和2020年之间的差额）的贡献，中国在这十年期间贡献了47%的世界经济增长，美国则贡献了33%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美合计贡献了80%的世界经济增长。这显示了中、美两国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图1.2比较了自2000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这个比例可以反映中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分别占有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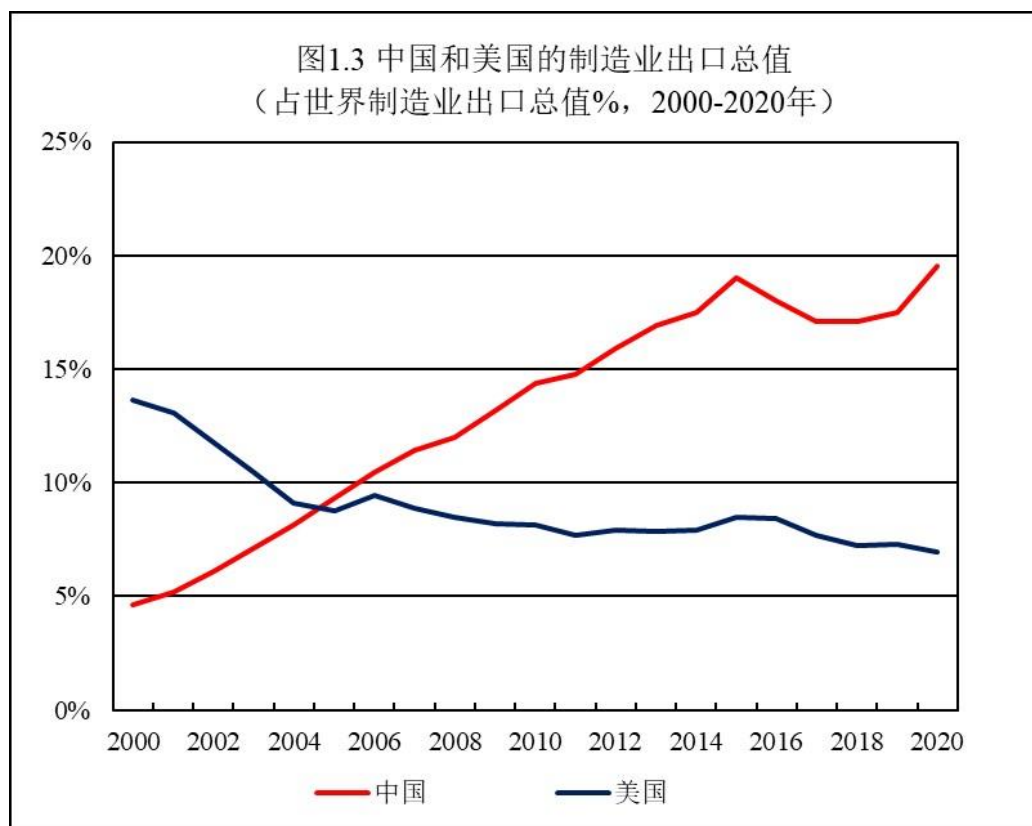


2000年时，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仍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4%。到了2008年，美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下降到了9%。此后，美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一度有所回升。但是，到了新冠危机爆发的2020年，美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再次下降到了约9%。

从 2000 年至 2015 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例从 3% 大幅度上升到 11%。2013 年，中国出口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不过，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似乎遇到了某种瓶颈，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徘徊在略低于 11% 的水平。

2020 年，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深陷新冠困境而中国在疫情初期的严厉防控一度获得成功，使得中国成为在世界贸易萎缩的大环境中唯一有能力增加出口的主要经济体。在这一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例增加到了 12%。未来几年，如果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继续保持增长，则说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反之，如果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遭遇到新的瓶颈甚至开始下降，则可能是中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开始集中爆发的早期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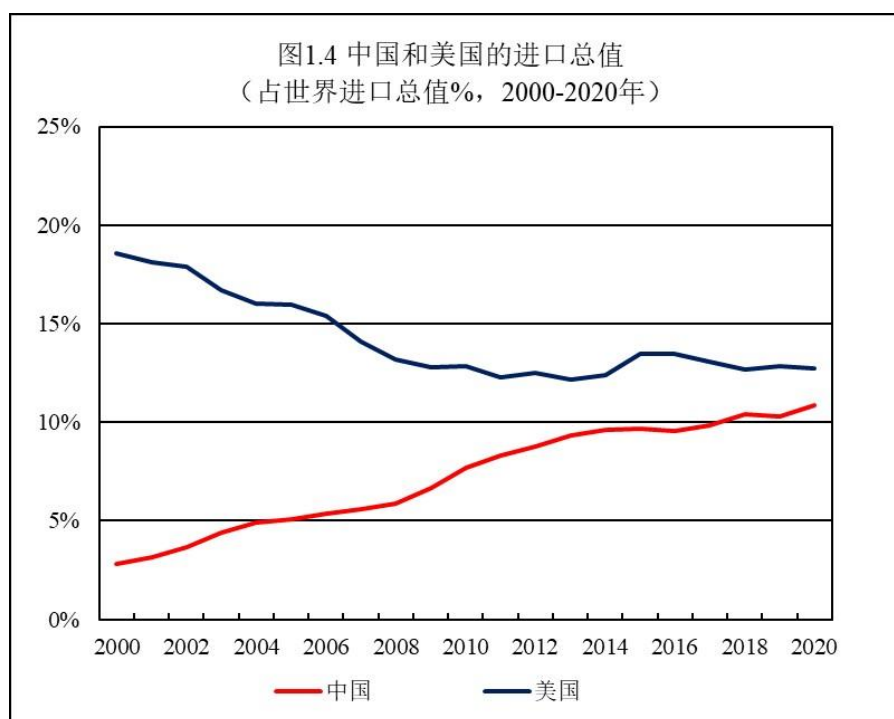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中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图 1.3 比较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总值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



2005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出口国。2015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达到世界制造业出口总值的 19%。此后，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世界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出口能力下降，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总值的比例增加到了近 20%。未来几年，需要观察的是，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市场的份额是否会突破五分之一并保持增长，还是在五分之一左右遭遇瓶颈甚至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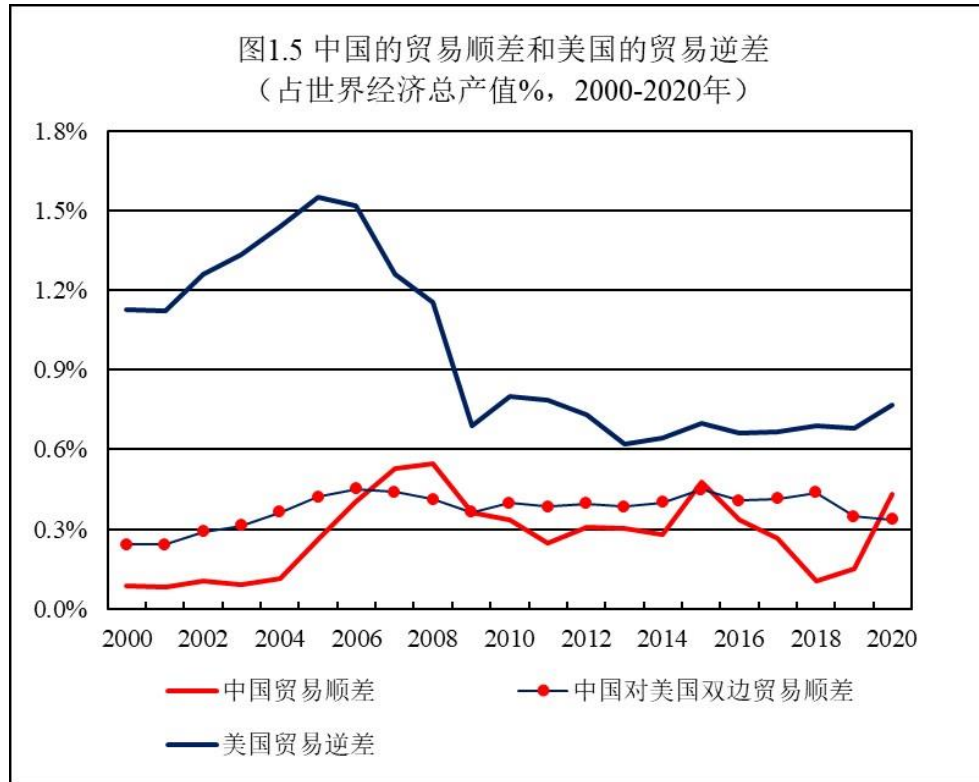
图 1.4 比较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世界进口总值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这个比例可以反映中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对其它经济体所产生的需求，即向其它资本主义经济体所提供的市场的大小。



在本世纪初，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额约占世界进口总值的 19%。2020 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值的 13%，仍然是世界第一进口大国。从 2003 年至 2014 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值的比例从 3%增加到近 10%。不过，从 2014 年以后，中国占世界进口总值比例增加的步伐有所放缓。2020 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值的 11%。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不得不依赖出口来维持增长。但是，如果许多国家都要保持贸易顺差，那么就必须有另外一些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而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保持贸易逆差的国家往往面临资本外逃和金融危机的风险。所以，实践中，主要是美国（作为拥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国家）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逆差。

图 1.5 比较了自 2000 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各自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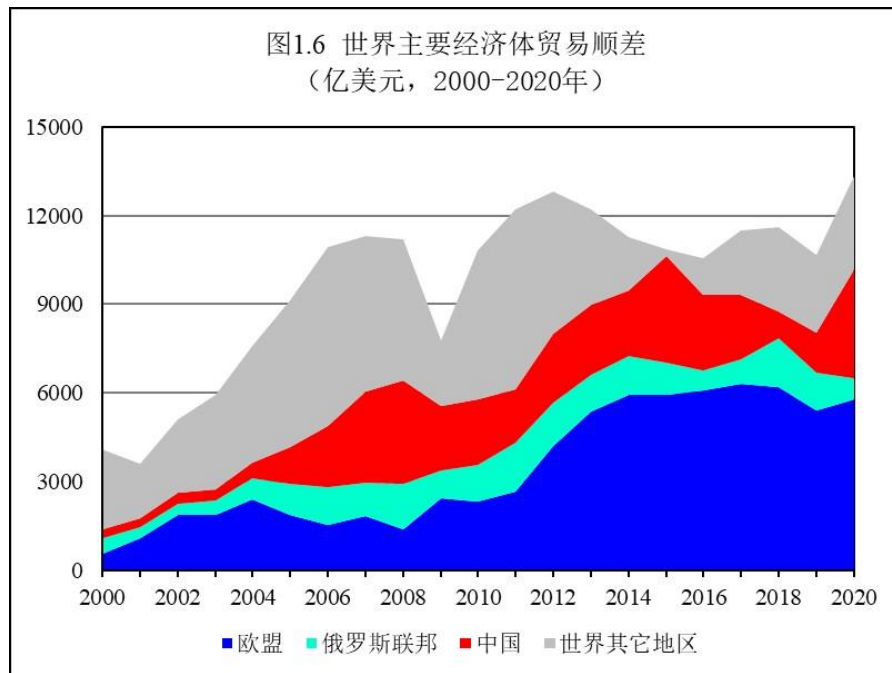


在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债务消费来维持总需求扩张，导致全球经济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失衡。2005 年和 2006 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近 8000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5%。当时世界经济总储蓄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27%-28%，扣除固定资本折旧后，世界经济净储蓄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2%；就是说，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吸收了世界经济净储蓄的八分之一（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需要通过外部资本净流入来弥补）。2010 年以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有所缩小。新冠疫情以前，美国的贸易逆差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0.7%。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大致在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0.4%左右波动，大约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六成。2019 年和 2020 年，由于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下降到略高于世界经济总产值 0.3%的水平。在新冠疫情之前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显著高于中国的全部贸易顺差。这说明，虽然中国一直对美国保持贸

易顺差，但是对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大多数年份保持贸易逆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起着弥补美国的总供给不足、抑制美国通货膨胀以及稳定美元的作用。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贸易逆差，则起着把美国贸易逆差对世界经济总需求拉动作用的一部分传导到世界其它国家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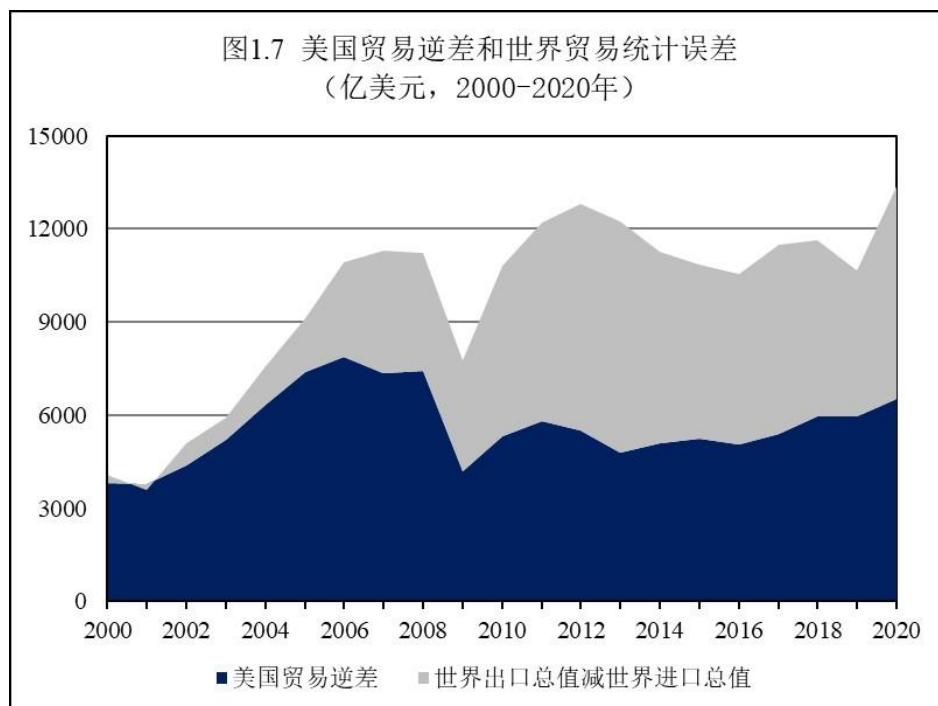
图 1.6 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若干世界主要经济体累计贸易顺差变化的情况。



自 2011 年南欧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整个欧盟对外的贸易顺差暴涨。自 2014 年以来，整个欧盟对外的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在 6000 亿美元上下，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紧缩因素（就是说，如果欧盟的贸易顺差得不到其它国家贸易逆差的弥补，就会引起世界经济总需求收缩）。

2020 年，欧盟的贸易顺差约 5800 亿美元，俄罗斯联邦的贸易顺差约 700 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顺差约 3700 亿美元，除欧盟、俄罗斯联邦、中国和美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合计有贸易顺差约 3200 亿美元。以上各个地区合计的贸易顺差超过 1.3 万亿美元。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在 2010 年以前曾经多年保持大幅度贸易顺差；但近年来，日本的贸易账户已经大致平衡，在有的年份还有逆差。

图 1.7 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与世界贸易统计误差变化的情况。



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常年保持大幅度贸易逆差，从而起着吸收世界其它国家贸易顺差的作用。然而，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统计上无法完全平衡世界其它各国累计的贸易顺差。自从 2005 年以来，世界贸易统计中就出现了巨大规模的误差，世界出口总值始终显著超过世界进口总值；自 2011 年以来，两者之间的差额经常保持在 6000 亿至 7000 亿美元的规模。

这个统计误差之“迷”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如果我们假设，世界贸易统计误差主要是由于对进口额低估造成的并且由此造成的误差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国的进口额上，那么，2020 年经过调整以后的美国贸易逆差约为 7400 亿美元，经过调整后的欧盟贸易顺差为 3700 多亿美元、俄罗斯联邦贸易顺差为 600 多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为 2900 多亿美元、世界其它地区贸易顺差为 100 多亿美元。

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经济当局冒险实行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今年初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每月 1000 亿美元以上的规模。这意味着美国全年的贸易逆差将超过 1.2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3%。这样，美国贸易逆差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将接近 2005 年、2006 年全球金融严重失衡时的水平。

未来，如果美国无法继续维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将给全球经济特别是欧盟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第四十二期 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000-2020年

（编注：本期原为“红色经济观察”2022年第2期。）

作者：红色经济观察

红色经济观察组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一期红色经济观察考察近年来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变化的情况。

为此首先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做一个说明。按照世界银行 2017 年对世界各国购买力平价的评估，这一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14244 国际元、国内生产总值是 19.9 万亿国际元（一国际元与一美元在美国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相同）。这个数据是世界银行根据对各国物价水平的调查计算出来的，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但是，如果以中国在 2017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起点，再用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向以前的年份倒推，就会发现，越是往前的年份，倒推出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越是低估中国的真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下表比较了 2000 年中国与若干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电力消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若干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人均电力消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 年

	人均预期寿命	人均电力消费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岁)	(度)	(2017 年国际元)
中国（世界银行）	71	992	3452
中国（麦迪逊）			5335
泰国	71	1448	9810
埃及	69	977	7745
乌克兰	68	2778	7497
秘鲁	71	666	6422
斯里兰卡	71	295	5950
印度尼西亚	66	390	5689
蒙古	63	1054	4524
菲律宾	69	499	4454
津巴布韦	45	898	4353
巴基斯坦	63	362	3245

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可以反映食物消费、营养状况、教育和医疗卫生对人民综合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人均电力消费可以反映工业发展水平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但是也会受到地理环境、气候、产业结构等影响）。将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可以大致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正在情况下，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际比较中的排序应该大致符合其人均预期寿命、人均电力消费的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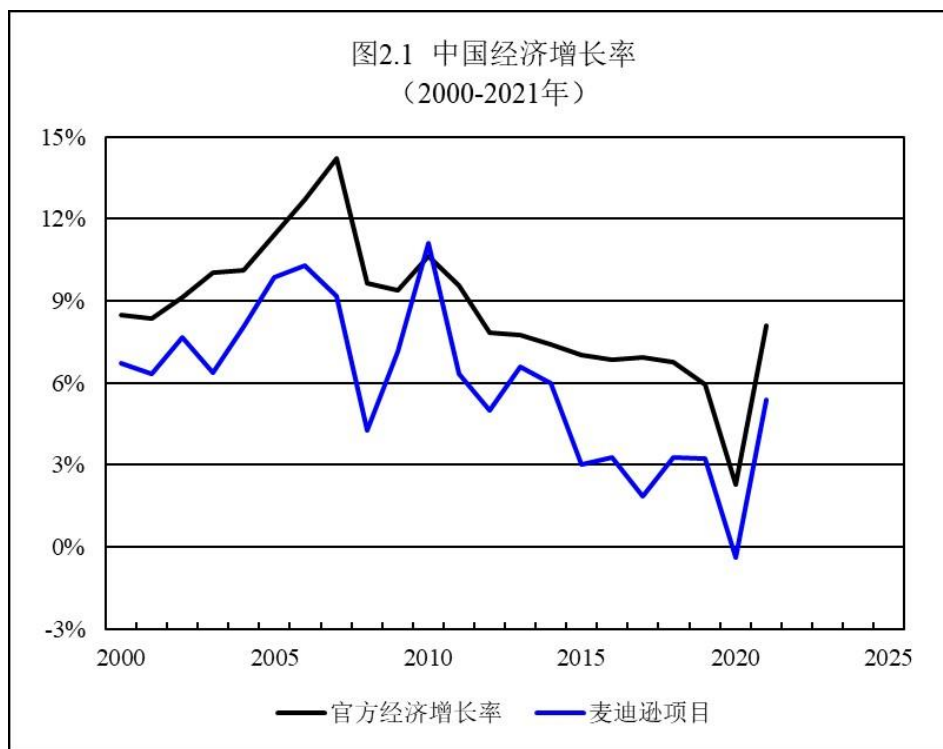
如果按照官方经济增长率推算，那么可以得出，中国在 200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3452 国际元（即表中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 2017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在表中 11 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 2 位（仅略高于巴基斯坦）。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另外三个国家并列第 1 位，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费排在第 4 位。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印度尼西亚高 5 岁，人均电力消费是印度尼西亚的 2.5 倍，但是按照官方经济增长率推算出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印度尼西亚的 61%。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埃及高 2 岁，人均电力消费略多于埃及，但是按照官方经济增长率推算出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埃及的 45%。

这些比较说明，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电力消费所反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比，由官方经济增长率推算出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严重低估了中国在 2000 年的真实发展水平。如果世界银行所估算的中国 2017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比较可靠的，上面的分析就表明，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显著高估了中国在 2000 年至 2017 年期间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以 2017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起点，如果经济增长率越是高估，那么越是往前的年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越会被低估）。

国际上有一个“麦迪逊项目”，专门研究各国经济的长期比较。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做了调整，去掉了一部分水分。如果以世界银行估算的中国 201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起点，但是采用麦迪逊项目所估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由此推算出来的中国 200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5335 国际元，与印度尼西亚接近，高于蒙古、菲律宾、津巴布韦、巴基斯坦，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在 2000 年的真实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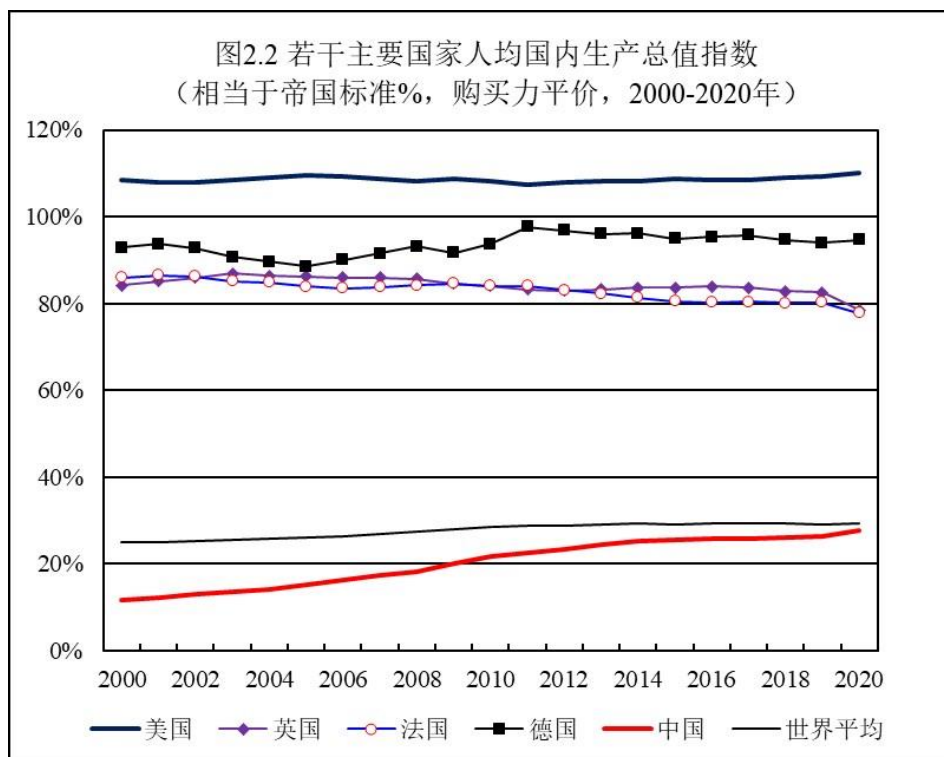
考虑到麦迪逊项目所估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更接近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在这一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以世界银行估算的中国 201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然后采用麦迪逊项目所估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来推算此前和此后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图 2.1 比较了 2000 年至 2021 年期间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和麦迪逊项目所估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在 2009 年至 2018 年期间，按照官方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8.0%；但是按照麦迪逊项目的估算，中国经济在这十年间年平均增长 5.3%，官方增长率平均高估了 2.7 个百分点。麦迪逊项目还没有发布 2018 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对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我们将官方经济增长率统一下调 2.7 个百分点，作为麦迪逊项目所估算经济增长率的延伸部分。其中，在新冠疫情的 2020 年，按照官方数据，中国经济正增长 2.3%；而按照下调后的数据，中国经济负增长 0.4%。

图 2.2 比较了自 2000 年以来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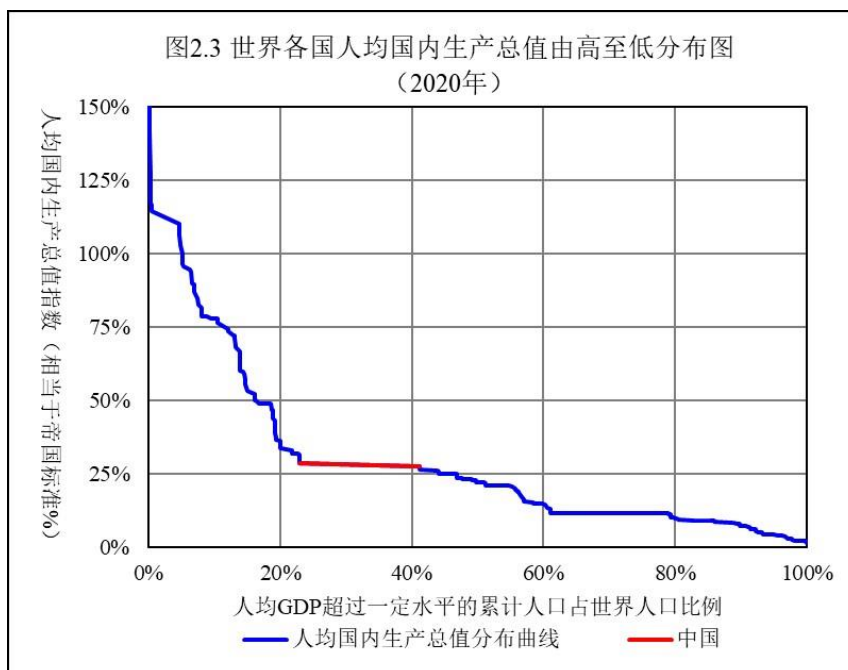


图中，各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计算为相对于“帝国标准”的百分比。所谓“帝国标准”，指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人口加权的平均值，可以代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标准水平。自2000年至2019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处于略低于“帝国标准”110%的水平；20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帝国标准”的1.1倍。英国和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趋于缓慢下降；2020年，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下跌到“帝国标准”的80%以下。在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前，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在“帝国标准”的90%上下。此后，德帝国主义的相对地位有所上升，近年来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帝国标准”的95%。

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帝国标准”的12%上升至“帝国标准”的25%。此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升的幅度有所放缓。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帝国标准”的28%。

此外，从2000年至2020年，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帝国标准”的25%上升到“帝国标准”的29%。

图2.3说明了2020年世界上所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高至低分布的情况。



图中，各个国家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高到低排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在最左边，最低的国家在最右边。每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计算为“帝国标准”的百分比。横轴显示的是在一定水平的人均 GDP 以上的国家的累计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比如，人均 GDP 在“帝国标准”100%以上的国家的累计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约 5%；人均 GDP 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的累计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约 11%；人均 GDP 在“帝国标准”50%以上的国家的累计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约 16%；人均 GDP 在“帝国标准”25%以上的国家的累计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约 44%。

列宁在 1920 年为《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 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列宁在这里说的“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就是指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全世界，其总人口一般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超过五分之一。据此，我们可以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100%以上的国家为一流核心国家，其余为二流核心国家），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50%以上、但是不到 75%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准核心”国家（这些国家处于核心与半外围之间的过渡带），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25%以上、但是不到 50%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

此外，如上所述，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常高于“帝国标准”的 25%。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帝国标准”的 25%，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往往就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可以将所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帝国标准”25%的国家都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

202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流核心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5%。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达到了一流核心国家标准。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二流核心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6%。一些主要的二流核心国家有：荷兰（100%，括号中的百分比指的是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帝国标准”的百分比，下同）、奥地利（95%）、德国（95%）、瑞典（94%）、比利时（90%）、澳大利亚（90%）、芬兰（87%）、加拿大（85%）、英国（79%）、韩国（78%）、法国（78%）。此外，虽然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不符合一般核心国家的标准，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帝国标准”的 8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准核心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6%。一些主要的准核心国家有：日本（74%）、意大利（72%）、以色列（72%）、捷克共和国（71%）、西班牙（67%）、波兰（60%）、葡萄牙（59%）、匈牙利（57%）、罗马尼亚（53%）、土耳其（5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半外围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28%。一些主要的半外围国家有：希腊（50%）、马来西亚（49%）、俄罗斯联邦（49%）、智利（43%）、保加利亚（41%）、阿根廷（36%）、墨西哥（33%）、泰国（32%）、中国（28%）、巴西（2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25%以下的国家、也就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56%。一些主要的外围国家有：南非（23%）、伊朗（23%）、乌克兰（23%）、埃及（22%）、蒙古（22%）、印度尼西亚（21%）、秘鲁（21%）、伊拉克（17%）、越南（15%）、菲律宾（15%）、老挝（14%）、印度（11%）、西岸和加沙（10%）、尼日利亚（9%）、孟加拉国（9%）、缅甸（9%）、巴基斯坦（8%）、柬埔寨（8%）、尼泊尔（7%）、津巴布韦（6%）、海地（5%）、坦桑尼亚（5%）、埃塞俄比亚（4%）、马里（4%）、阿富汗（4%）、乍得（3%）、莫桑比克（2%）、尼日尔（2%）、索马里（2%）、刚果民主共和国（2%）、中非共和国（2%）、布隆迪（1%）。

第四十三期 中国和不平等交换，2000-2020年

作者：蒸馏水

商品中价值的实现与转移——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长，商品中凝结的劳动越多，商品的价值就越高。但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价值，却并不见得能够在交换过程中以货币的形式被全部实现，可能只能实现部分。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的劳动量（单位都是每人每年）对应的货币价值并不相同。所以在不同国家交换同等货币价值的商品时，各国进口、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并不相同。为了对比各国进出口商品包含的劳动量的差异，我们引入“劳动贸易条件”的概念。

所谓劳动贸易条件，指的是一单位本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外国劳动。具体来说，各国以同等市场价值的商品进行交换时，某一国（或地区）进口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除以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得到的比率即为该国的劳动贸易条件。

同为劳动，交换价值却不一样，这反映在各国不同的劳动贸易条件上，表现为国际贸易间的“不平等交换”，即部分国家用包含较多本国劳动量的商品来交换另一部分国家同等货币价值但包含较少劳动量的商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往往前者是外围国家，后者是核心国家。不平等交换使得外围国家所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时间）转移到了核心国家。

不平等交换除了发生在外围和核心国家之间以外，也发生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之间、半外围和核心国家之间。核心国家是不平等交换的受益方，或者剥削者；外围国家是不平等交换的损失方，或者被剥削者；半外围国家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是损失方，在与部分外围国家的贸易中获益，但总体上损失大于收益，是不平等交换中被剥削的一方。

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核心国家占据国际分工中的垄断环节，如信息技术、高端材料、生物化学工业和军工产业等，进而可以通过提高其产品的相对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

外围国家因不掌握尖端技术，且被核心国家以金融、军事等手段压制，所以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高竞争性、低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比如农业、采矿业（如非洲大部分国家、东南亚诸国、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国）和轻纺工业（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因为这些领域的竞争相对

激烈，因而外围国家难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为了维持出口商品价格低廉的“国际竞争力”，外围国家倾向于压低本国工资，放宽环境污染标准，以及放松对企业违反劳动法规的惩处力度。

半外围国家的产业结构兼有外围、核心国家的特点。一般来说，半外围国家的大多数行业与外围国家类似，通过剥削廉价劳动力，不合理地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也有少数行业或个别产品可以与核心国家竞争。

不平等交换产生了什么后果？

最直接的后果体现在大量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从外围、半外围国家转移到了核心国家。这种劳动的转移强化了外围、半外围、核心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分工和地位，为其带来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对于外围国家来说，因为剩余劳动所生产的一大部分产品被转移而没能用于本地消费和投资，所以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只能掌握有限的物质资源。一方面，这限制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从而限制了无产阶级化的发展，导致外围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另一方面，这也限制了外围国家的财政攫取能力。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无力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正常秩序，也无力提供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甚至许多外围国家根本不存在统一、有效的中央政府。

而核心国家因为获得大量转移的劳动，得以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满足了其内部工人阶级对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增加了改良主义的发展空间，消除了社会革命的隐患；同时，核心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得以长期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能够支配更多剩余，进而提高其投资水平。此外，核心国家通过从不平等交换中获得大量劳动，自身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力就被节约下来。这部分劳动力可以用于教育、医疗、研究和开发，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核心国家对少数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的垄断；可以充当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从而维持“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可以转化为金融市场的经理、经纪人、职员，在为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同时又进一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掠夺外围国家的财富；还可以从事销售、餐饮、娱乐、法律咨询等非生产性活动，为资本家阶级及其附庸（上层小资产阶级）服务。

半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转移剩余劳动，同时从外围国家攫取剩余劳动。因此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虽然弱于核心国家但是强于外围国家，有能力维持相对有效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所以历史上，每当核心国家因为利润率下降而发生

积累危机的时候，半外围国家往往成为核心国家资本转移的目的地，接替核心国家从事由于竞争加剧、垄断地位丧失、从高附加价值下降为中等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例如重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和电子工业（这些工业在二十世纪中期曾经是核心国家的主要工业）。但是，半外围国家一般并不从事这些工业中附加价值最高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活动，并且高度依赖核心国家提供的最关键的机床和部件。中国是这一类半外围国家的典型代表。

还有一些半外围国家，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以出口能源、原材料为主。例如主要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沿岸诸国，以及主要出口粮食的阿根廷。当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原材料价格高涨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接近甚至超过核心国家；但是当世界市场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低落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则可能在短时间内下跌到外围国家水平。

普遍来看，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要高于外围国家并且接近核心国家。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能力要显著超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小生产者，也超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村半无产阶级。同时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又不像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掌握充足的、可用于维持内部阶级妥协的物质资源，因此，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半外围国家便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种矛盾汇聚的地方，是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2000-2020 年世界各国的不平等交换

一、什么是高收入国家？

我们采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来计算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将全球分为 9 个部分来分别计算其劳动贸易条件：

- 1) 中国
- 2) 美国
- 3) 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
- 4) 中低收入欧州和中亚
- 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 6) 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
- 7) 南亚
- 8) 撒哈拉以南非洲
- 9) 高收入国家（不含美国）

上述地区中只有“高收入国家”是不以地理区位进行划分的。什么是高收入国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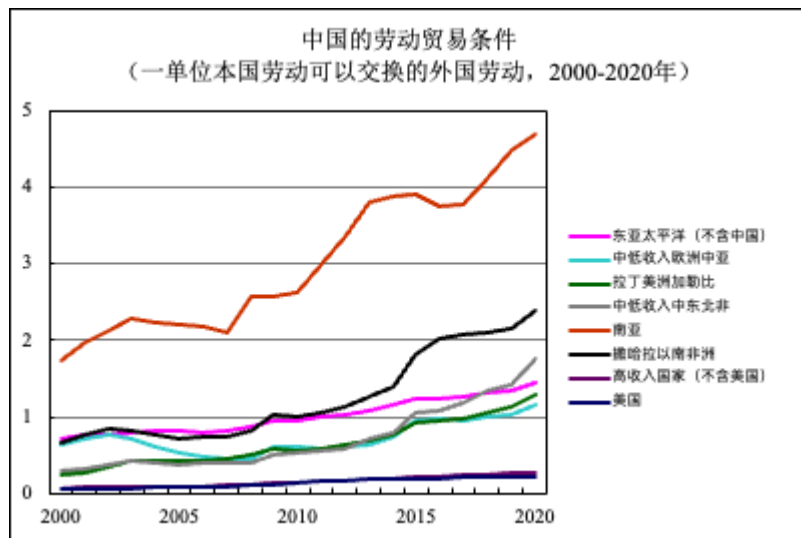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合称为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指的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某个标准的经济体（地区或国家）。此标准在1987年为6,000美元（约为1987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¹的30%），2020年为12,535美元（约为2020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20%）。“高收入国家”不仅包括所有的核心国家，还包括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上层半外围国家（和地区），如沙特阿拉伯和海湾石油出口国、若干南欧和东欧国家、个别南美国、东亚的韩国，以及中国的港台地区。

相应的，“低收入国家”指的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某个标准的经济体（地区或国家）。此标准在1987年为480美元（约为1987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2.2%），2020年为1,035美元（约为2020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6%）。

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438美元（约为2021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8%）。有评论称“中国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称这“将是人类历史重要里程碑”。但其实客观来看，“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从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30%降为20%。标准降低了，一些半外围国家（如中国）确实更容易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半外围国家成功突围成为核心国家，也不意味着这些半外围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显著改变。

二、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



图一：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2000-2020年

¹ 1987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1,390美元，2020年为64,210美元，2021年为69,375美元。

表一：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2000–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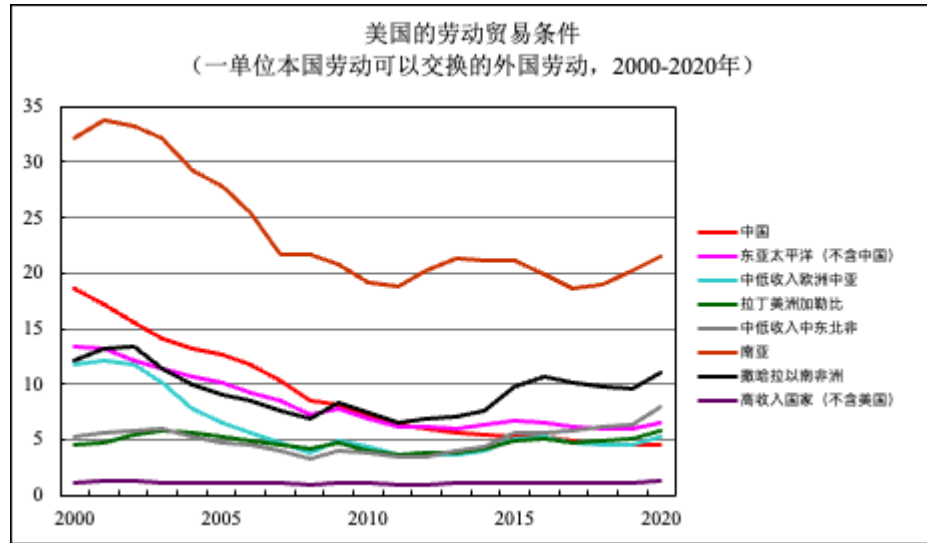
（一单位中国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可以交换到的其他国家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	0.72	0.81	0.95	1.24	1.45
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	0.63	0.52	0.61	0.94	1.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24	0.42	0.56	0.92	1.28
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	0.28	0.37	0.53	1.05	1.76
南亚	1.72	2.20	2.63	3.92	4.70
撒哈拉以南非洲	0.65	0.72	1.01	1.81	2.40
高收入国家（不含美国）	0.06	0.09	0.15	0.22	0.27
美国	0.05	0.08	0.14	0.19	0.22
平均	0.17	0.25	0.36	0.52	0.70

表一显示了 2000 年至 2020 年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即包含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一单位中国劳动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包含在外国出口商品中的外国劳动。2000 年，一单位中国劳动平均只能交换到 0.17 单位的外国劳动（或者说，大约需要六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才能交换到一单位外国劳动）。此后，中国的对外“劳动贸易条件”逐年大幅度改善。至 2020 年，一单位中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 0.70 单位的外国劳动（或者说，大约需要 1.4 个单位的中国劳动可以交换到一单位外国劳动）。

目前，中国在与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中分别可以以一单位的本国劳动交换到大约 4.7 单位的南亚劳动和 2.4 单位的非洲劳动；在不平等交换中处于明显受益的地位，也可以说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中国在与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地区、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中处于有所受益的地位。但是中国在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中仍然明显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平均来说，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对外转移的劳动大大超过从外国商品中获得的劳动（见本文第六部分）。

三、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



图二：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2000-2020 年

表二：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1990-2020 年

(一单位美国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可以交换到的其他国家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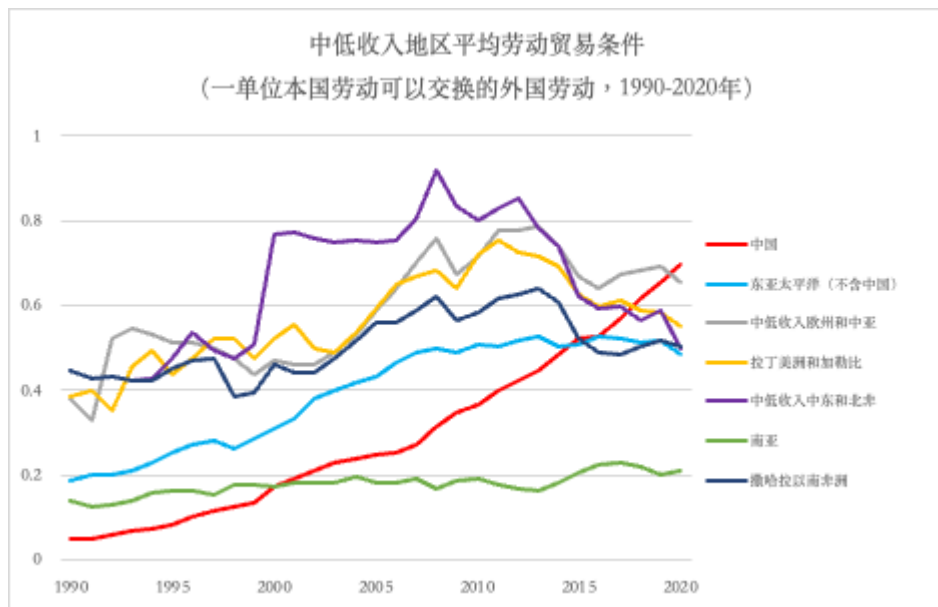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中国	18.67	12.61	7.30	5.38	4.58
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 (不含中国)	13.42	10.17	6.92	6.69	6.61
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	11.76	6.57	4.47	5.05	5.2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57	5.24	4.06	4.95	5.86
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	5.31	4.69	3.84	5.64	8.06
南亚	32.16	27.74	19.23	21.07	21.49
撒哈拉以南非洲	12.12	9.07	7.40	9.72	10.97
高收入国家 (不含美国)	1.18	1.10	1.08	1.20	1.24
平均	4.63	4.70	3.79	3.76	3.82

表二显示了 2000 年至 2020 年美国与世界各地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也就是包含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包含在其他国家出口商品中的其他国家劳动。

202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到大约4.6单位中国劳动、6.6单位除中国以外的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劳动（主要是东南亚诸国和太平洋岛屿）、5.3单位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劳动（主要包括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一些国家）、5.9单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劳动、8单位的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劳动、21.5单位的南亚地区劳动、11单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和1.2单位的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劳动。

平均来说，200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4.6单位的其他国家劳动；2005年，当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上一轮扩张接近顶点时，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4.7单位的其他国家劳动。202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的其他国家劳动下降到了3.8单位。这反映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尽管如此，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的最大受益者。

四、中低收入地区平均劳动贸易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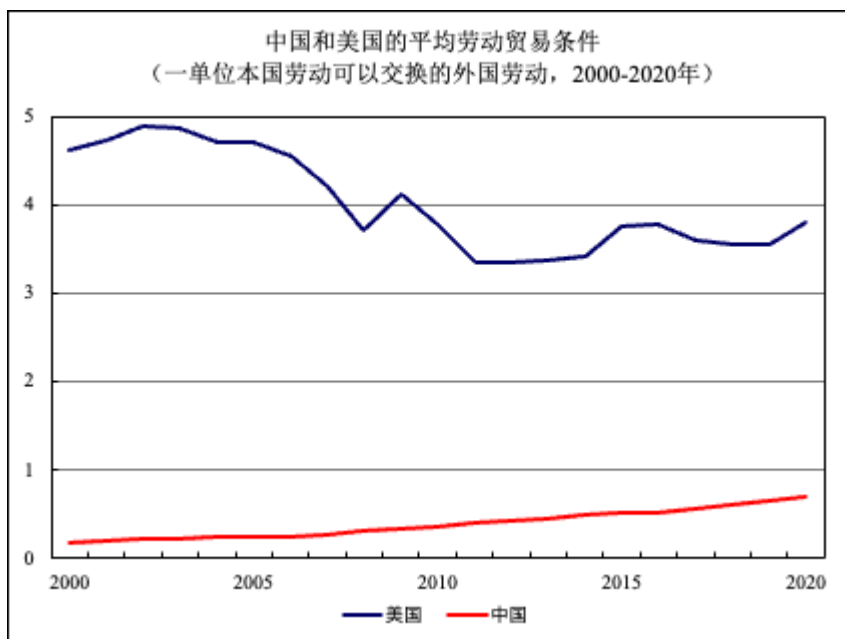
图三：中低收入地区平均劳动贸易条件，1990-2020年

图三比较了中国和世界上各个中低收入地区的“劳动贸易条件”在1990年至2020年间的变化情况。首先，所有的中低收入地区的劳动贸易条件都在1以下，说明所有的中低收入地区在对外贸易中用一单位的本地区劳动平均可以交换到的外国劳动都小于一单位，从而在不平等交换中受到损失。

在1990年至2008年期间，各个中低收入地区的劳动贸易条件都有所改善，说明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的不平等交换程度有所减轻。但是，2008至2020年期间，中低收入的中东和北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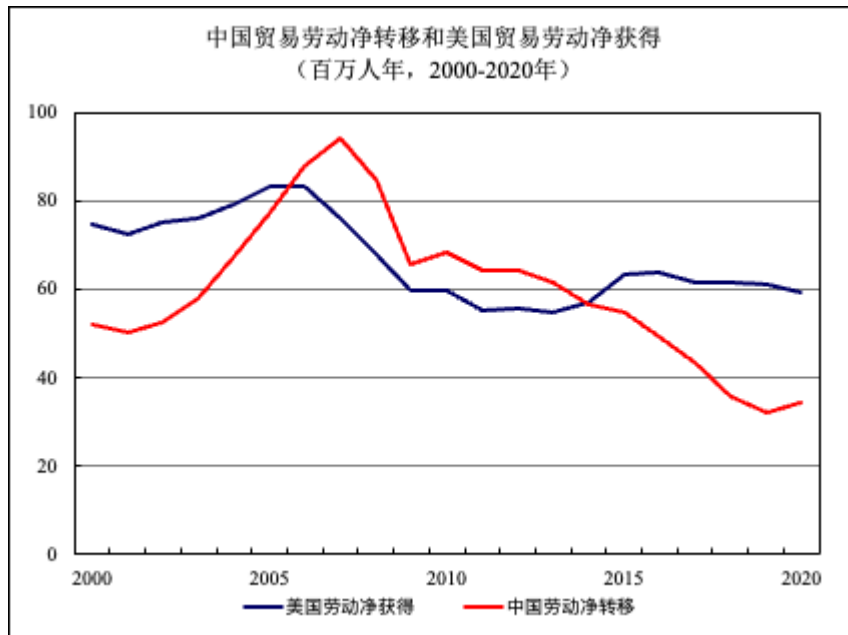
低收入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劳动贸易条件都发生了显著的恶化，南亚和中低收入的东亚国家的劳动贸易条件则大致保持不变，只有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继续大幅度改善。

五、中美对比



图四：中国和美国平均劳动贸易条件，2000-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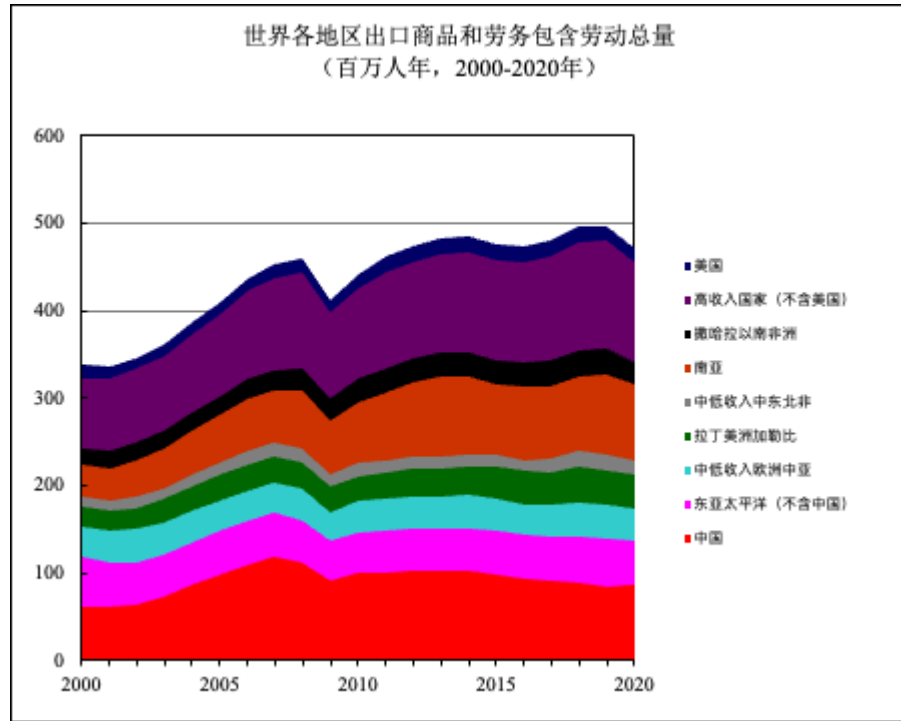
就中美平均劳动贸易条件而言（图四），1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约3.8单位外国劳动，而1单位中国劳动则只能交换0.7单位外国劳动。因此，美国是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而中国则处于被剥削地位。美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从2000年的4.6降至2008年的3.7，之后在3.5左右浮动，这说明美国的核心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较稳定的剥削者的状态。而中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则在20年间从0.3稳步上升到0.7，说明中国虽然仍处于被剥削状态，但在全球分工中从事越来越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并将更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到其他外围或半外围地区。



图五：中国贸易劳动净转移和美国贸易劳动净获得（百万人年，2000-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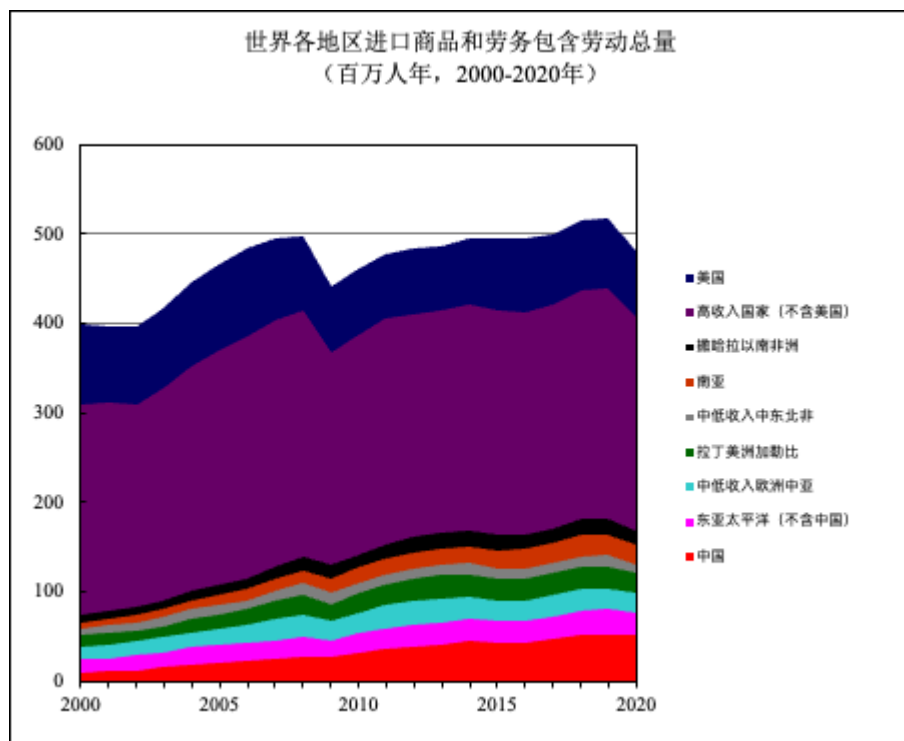
图五显示 2005 至 2015 年间，中国劳动净转移与美国劳动净获得相近，可看做中国净转移的劳动几乎全部被用于建设美国资本主义。而 2015 年后，中国劳动净转移与美国劳动净获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劳动净转移变少，逐渐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

六、世界范围



图六：世界各地区出口商品和劳务包含劳动总量（百万人年，2000-2020年）

图六显示了中国 2008 至 2020 年出口商品和劳务包含的劳动总量有减少的趋势，而南亚出口劳动总量却不断增加，其他地区基本维持不变。



图七：世界各地区进口商品和劳务包含劳动总量（百万人年，2000-2020 年）

图七中，自 2014 年以来，世界各地区进口商品和劳务包含的劳动总量大致保持不变，其中高收入国家所进口的劳动量约为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劳动量之和的两倍。

表三：国际劳动转移平衡表（2020 年，百万人年）

	出口商品包 含劳动	进口商品包 含劳动	净劳动转移	净劳动获得
中国	87	53	34	
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	51	24	27	
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	35	23	1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0	22	18	
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	15	10	5	
南亚	87	21	66	
撒哈拉以南非洲	26	16	10	
高收入国家（不含美国）	115	241		126
美国	15	74		59
统计误差		-11		-11
世界	471	471	174	174

表三说明了 2020 年世界各大地区出口和进口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以及净转移或者净获得的情况。2020 年，南亚地区对外劳动净转移达到了 6600 万劳动人年。这说明近年来南亚地区已经超过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对外劳动净转移的地区。

美国在一年中通过不平等交换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高达 5900 万人年的劳动净转移，相当于美国劳动力人口的 37%²。如果没有不平等交换，那么美国为了维持其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必须将 5900 多万劳动力从服务业转到物质生产部门，这意味着美国的服务业产值要减少大约 60%³。

相比之下，中国一年对外的劳动净转移有 3400 万劳动人年，大约相当于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总数的 16%⁴。如果不参与不平等交换，这部分劳动力就可以节省下来，生产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工业品。现在大约 40% 的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用于生产出口商品，就是说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中大约只有五分之三是用于为本国人民生产工业品。如果将因为不平等交换损失的劳动力节省下来，改为生产满足国内需要的工业品，那么，中国人民得到的工业品就可以比原来增加大约四分之一。此外，节省的劳动力也可以用于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如果将避免不平等交换后节省的劳动力全部用于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中国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可以减少六分之一。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呢？

成为一个核心国家，意味着用一单位本国劳动来交换多个单位的外国劳动。中国现在的出口商品包含了大约 8700 万人年的本国劳动。如果要像美国那样，用一单位本国劳动平均交换 3.8 单位外国劳动，那么中国进口的商品就必须包含 3.3 亿人年的外国劳动；而全世界所有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还不到 5 亿人年，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样大的一个地区来向中国输入包含那么多劳动人年的出口商品。

即使是采用美国以外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以一单位中国劳动来交换大约 2 单位外国劳动，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外国劳动也必须增加到 1.74 亿劳动人年，也就是说中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净获得大约 8700 万人年的转移劳动。现在，中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年净输出 3400 万劳动人年。成为核心国家以后，中国不但不再输出，还要每年攫取 8700 劳动人年。一进一出，世界剩余的外围地区必须在满足现有的核心国家对劳动净获得的要求之余，再向中国额外提供 1.2 亿劳动人年（这大约相当于除了中国和东亚地区以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现在的对外

² 2020 年美国劳动力约为 1 亿 6 千万。

³ 2020 年 11 月美国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约为 1 亿，数据来源：《总统经济报告 2021》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ERP-2021/pdf/ERP-2021.pdf>。

⁴ 2020 年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为 21543 万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劳动净转移总量)。世界剩余的外围地区能够承受如此大量的额外剥削而不发生革命或崩溃吗？或者，核心国家就必须将它们现在获得的劳动净转移总量（约 1.7 亿劳动人年）的三分之二让渡给中国？那么现有的核心国家还能保持核心国家地位并维持内部稳定吗？

如果迫使现有的核心国家或者大幅度降低物质消费水平，或者大幅度减少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规模，那么现有的核心国家将无法同时维持本地区资本家阶级的较高利润率和内部的阶级妥协，从而将陷入无法摆脱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核心国家的危机将进一步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核心国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资本主义将遭遇其他半外围国家在历史上遭遇过的危机，即无力既满足无产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又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各种必要条件。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同样有可能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瓦解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

第四十四期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2000-2021-2050年

（编注：本期原为“红色经济观察”2022年第4期。）

作者：红色经济观察

在今年的第一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概述了红色经济观察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看法：“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超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从世界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以便在国内工人阶级中收买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人贵族队伍；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矛盾将无法以阶级妥协或社会改良的方式求得解决。... 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基本矛盾，决定了未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在第二期红色经济观察（编注：第四十二期）中，我们论证了目前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在第三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论证了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在2011-2015年期间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此后，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进入了僵持局面。未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还将发生新的对中国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为新的工人阶级斗争高潮创造条件，并最终在本世纪中期以前导致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全面崩溃。

在这一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将进一步论证，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产阶级无法从世界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无法既满足国内阶级妥协的需要，又满足资本家积累的要求。目前，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出资本率的下降和利润率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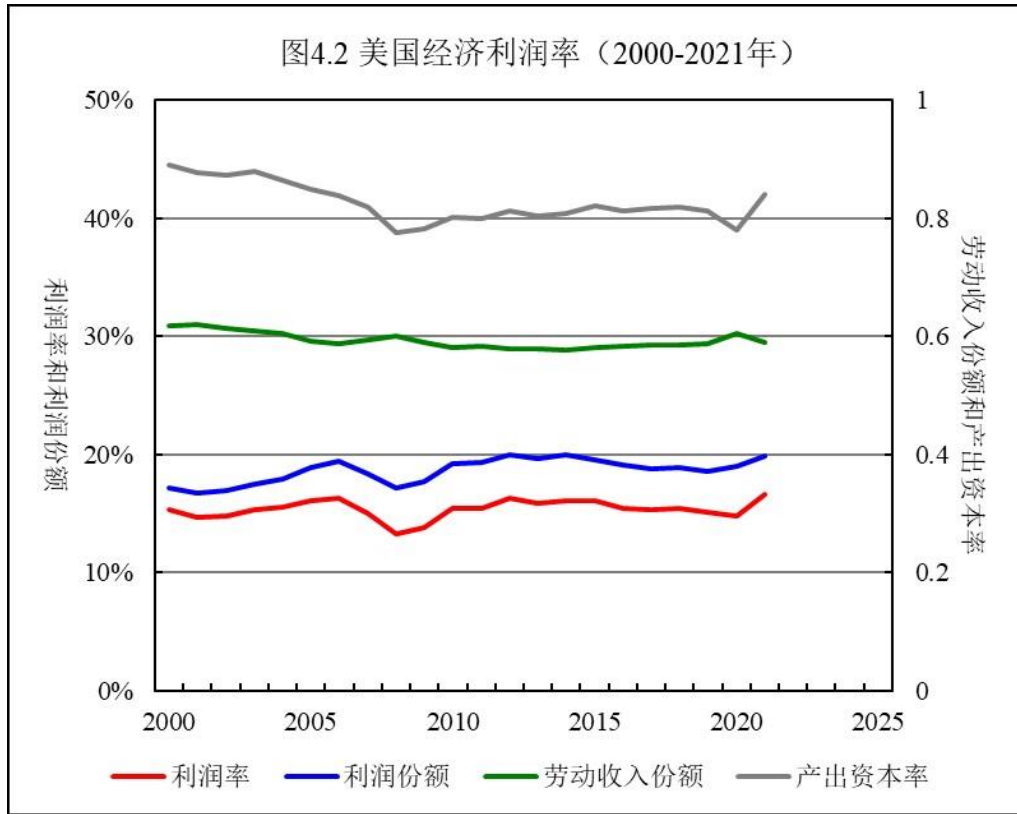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分析，强调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平均利润率的研究，并通过观察和分析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来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并评估经济危机对阶级斗争的影响。

先以美国为例来观察一下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几次重大的利润率向下波动。图 4.1 说明了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变化的情况。平均利润率的计算方法是用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财产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除以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



如图，在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危机中，平均利润率都发生了大幅度下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平均利润率下降到 10% 以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平均利润率从近 20% 下降到 12%；这一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停滞膨胀，美元几乎崩溃，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和反战运动，美帝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霸权发生严重动摇。相反，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显著回升；这一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美帝国主义霸权也一度回光返照。在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又一次显著下降。不过，在 2020 年新冠危机期间，由于危机原因特殊，且美国资产阶级当局冒险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以挽救危机，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并未大幅度下降。

图 4.2 说明了 2000 年至 2021 年期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劳动收入份额和产出资本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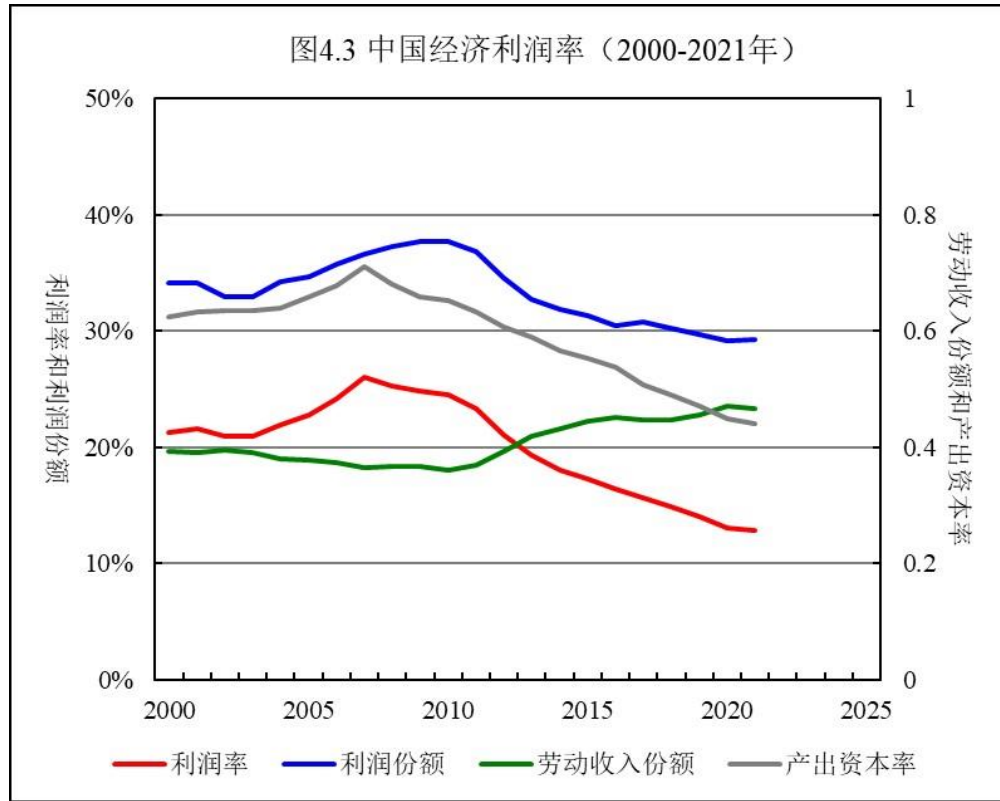


利润份额指的是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全部财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全部劳动收入（包括雇员报酬和所谓“业主收入”中的劳动收入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产出资本率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利润份额乘以产出资本率，就可以得到平均利润率。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观察和比较，在上图中，利润率和利润份额用左坐标来显示，劳动收入份额和产出资本率用右坐标来显示，右坐标的最大数值是左坐标的两倍。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趋于上升，近年来保持在近 20%的水平。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不过，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2021 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约为 59%。按照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除了劳动收入和资本家的财产收入以外，还有政府获得的间接税减补贴，以及固定资本消耗（即固定资产的折旧）。

产出资本率可以反映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平均的投资效率。在本世纪初，美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有所下降；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保持在 0.8 左右。2021 年，美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达到了 0.84，即平均一美元投资可以形成 0.84 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图 4.3 说明了 2000 年至 2021 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劳动收入份额和产出资本率。



在 2010 年以前，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份额趋于上升、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2009 年和 2010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高达 38%；这一利润份额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2010 年以后，由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增强，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16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下降到 30%。2021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为 29%，比美国经济 2021 年的利润份额高 9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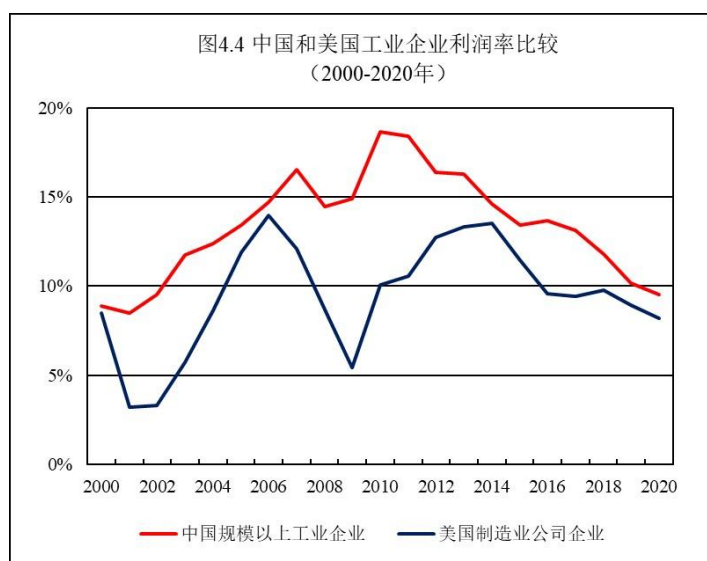
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趋于上升。2007 年，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达到 0.71，与当时美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相比差距不是太大。但是，自 2007 年起，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2021 年，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下降到 0.44，仅相当于美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一半。

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持续下降，很可能反映了中国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本世纪初，中国刚刚成为世界制造业出口中心，通过引进核心国家技术，可以用相对较少的投资就带来一定规模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但是，在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平均技术水平与核心国家的差距缩小、核心国家加强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从核心国家引进的技术无法再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靠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发家的中国资本家阶级贪婪吝啬且急功近利，不可能投入足够的资源在需要长期投资和高风险的领域进行真正的、有突破性的创新；大量所谓的“创新”都是模仿性、应用性的。至于资产阶级国家推行的所谓“自主创新”产业政策，往往是各个资本家集团相互争夺的产物，而不是根据人民的长远利益、在统筹协调基础上形成的合理规划，因而在执行中往往造成大量浪费，没有多少真正的成果。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只有靠不断增加投资，来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每一单位投资所能够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平均投资效率不断下降。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平均利润率是利润份额与产出资本率的乘积。既然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率在过去一个时期都趋于下降，那么，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必然也趋于下降。2007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是 26%，比美国经济同年的平均利润率高 9 个百分点。到了 2021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了 13%，与 2007 年时相比下降了一半，比美国经济 2021 年的平均利润率低 4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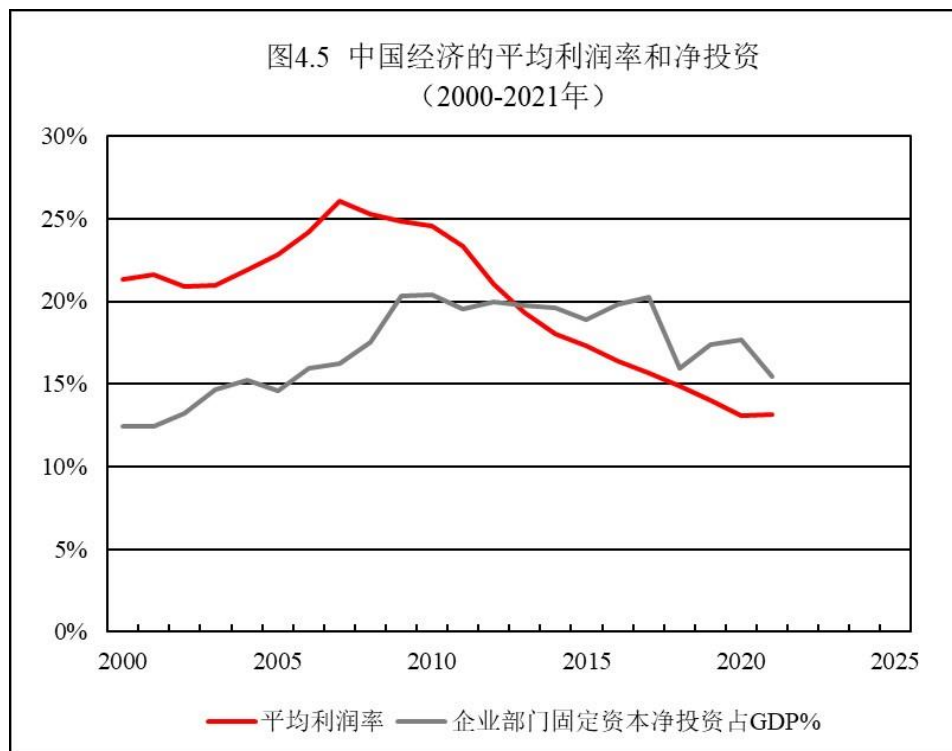
不过，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利润中，相当一部分是金融资本的利润；企业部门净利息支付与金融公司利润之和大约占美国经济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如果只看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目前仍然高于美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图 4.4 比较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与美国制造业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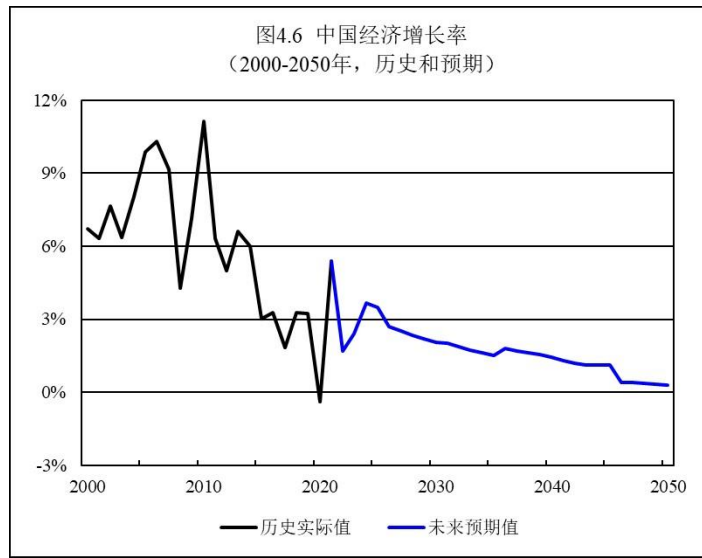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从 2010 年的约 19% 下降到 2020 年的约 10%。美国制造业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则在 2014 年达到了约 14%，这也是上一个经济周期中美国制造业企业利润率的最高峰；2020 年，美国制造业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 8%。

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生产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所以利润率下降最终必然给资本主义积累带来不利的影 响。图 4.5 比较了 2000 年至 2021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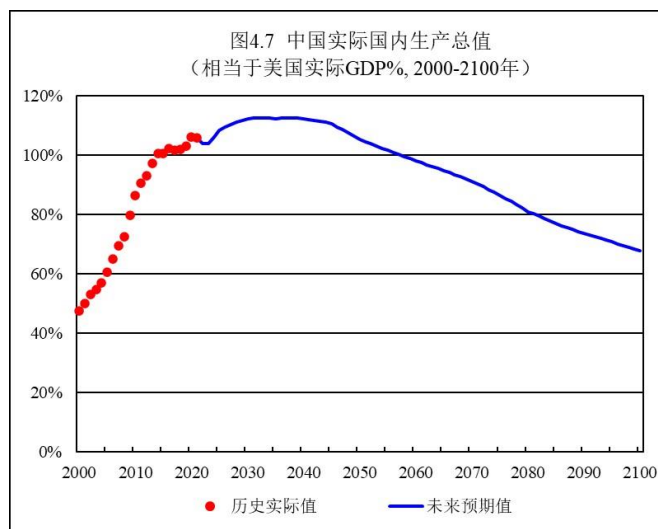
2009 年以前，企业部门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趋于上升。平均利润率从 2007 年就开始下降；但是，利润率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在利润率开始下降后最初几年，平均利润率虽然下降，但是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时，资本家不但不会马上减少投资，反而会通过增加借债等手段尽可能维持高投资，以使用更多的投资弥补每单位投资所带来利润的减少，同时争取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所以，从 2009 年至 2017 年，中国企业部门的净投资一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左右。然而，随着利润率进一步下降，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陷入经营困难，其中一部分陷入资不抵债的绝境；即使是尚能盈利的资本家对投资前景也开始感到迷茫。2018 年，企业部门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 16%；2021 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 15%。

图 4.6 比较了中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实际增长率与未来预期的增长率。



上图中，中国经济在 2000 年至 2021 年的增长率采用的是在麦迪逊项目研究基础上经过调整的增长率而不是官方增长率（见今年红色经济观察第二期）。在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时，我们的一些主要假设有：中国经济未来的就业人数由联合国所预测的 25 岁至 59 岁年龄人口决定；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现在的 15%逐步下降到 2050 年的约 2%；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后，在长期稳定在每年 2%。根据这些假设，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从 2024 年和 2025 年的 3-4%逐步下降到 2045 年的约 1%；此后，中国经济将趋近于零增长。

图 4.7 说明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实际经济规模相对于美国经济规模的比例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预期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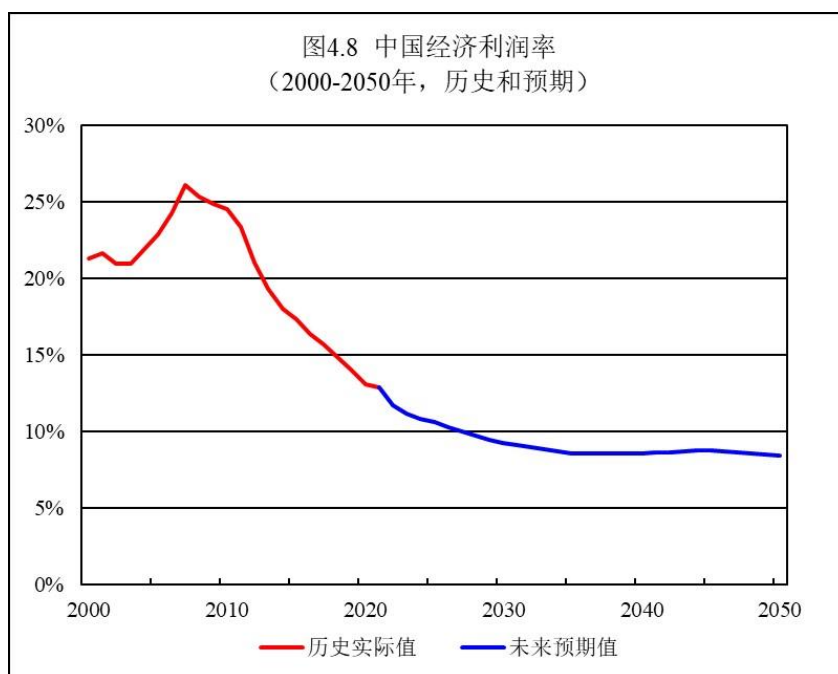
在预期美国未来经济增长时，我们的一些主要假设有：美国经济未来的就业人数由联合国所预测的 25 岁至 59 岁年龄人口决定；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保持在 2%；美国经济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约保持在每年 1%。根据这些假设，美国经济在 2050 年之前大约每年增长 1.5%。

如上图，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于 2030 年达到美国的 1.1 倍；此后，直至 2045 年，中美两国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将大致保持不变。2045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显著落后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到 2060 年，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将被美国经济反超；到 2100 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只有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请读者注意：所有这些结果都是在假设中国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美国长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两倍的前提下得出的；如果假设中国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美国一样，那么中国经济未来的情景还会更加悲观。

根据前面所说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以及投资率的假设，就可以推算中国经济未来的产出资本率。预计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将从 2024 的 0.4 下降到 2035 年的 0.35，此后大致保持稳定。

在推算了产出资本率后，再加上其它一些假设，就可以推算未来的平均利润率。我们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不变（47%），但由于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上升，利润份额将于 2030 年下降到约 25%，此后大致保持不变。

图 4.8 说明了中国经济历史上以及未来预期的平均利润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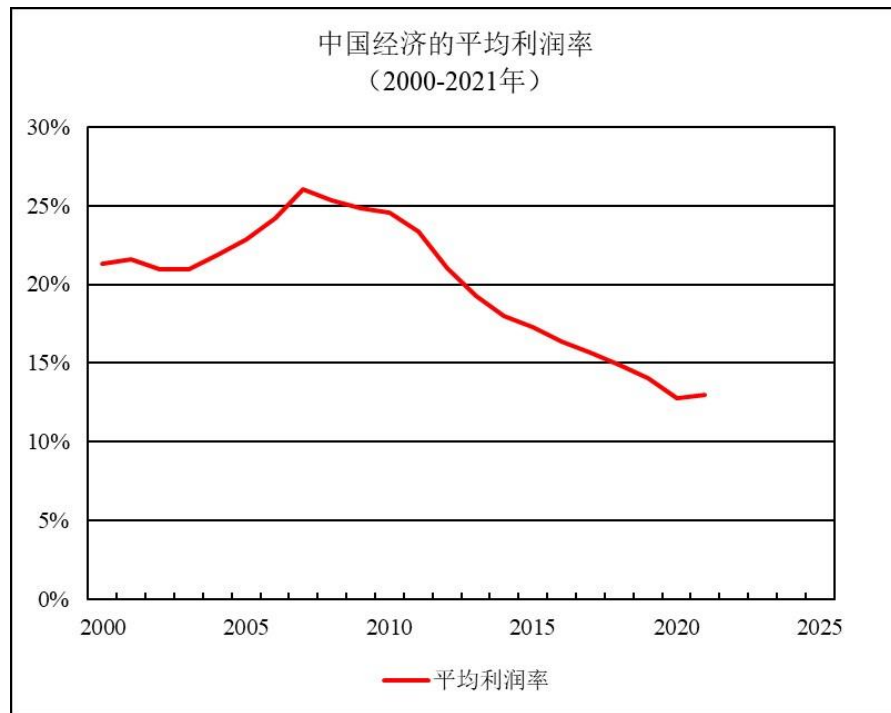
如图，预计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将于 2030 年以后下降到 10%以下，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大萧条最严重时的水平。2035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将稳定在略低于 9%的水平。这里，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 2035 年以后得以保持大致稳定，是建立在企业部门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断下降的基础上（前面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假设的一部分）；如果假设企业部门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将来始终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 2035 年以后还将继续快速下降。

在上一期红色经济观察（编注：第三十期）中，我们曾经评论说，由于 2012-2016 年出生人口小高峰带来的 2034-2038 年最后一轮高校毕业生高峰，不能排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还能通过压榨相对过剩的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得到最后一轮剥削红利。然而，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到 2030 年以后下降到远远低于国际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届时将面临投资崩溃和大规模资本外逃的严重风险。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投资崩溃以及大规模资本外逃，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将提前结束，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将大大加快！

第四十五期 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财政危机

作者：远航一号

红色中国网认为，中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随着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阶级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斗争力量不断增强，他们对广泛的经济与政治权利的要求与中国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体制发生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与历史上的核心国家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攫取足够的超额利润来缓解内部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持续趋于下降。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自 20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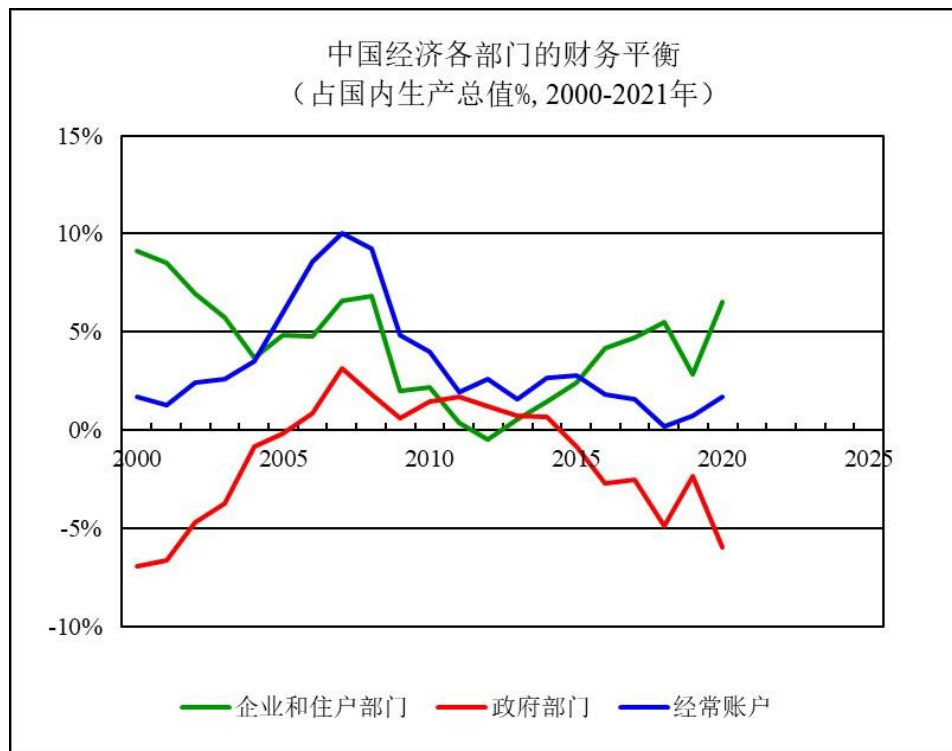


2007 年时，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曾经高达 26%；到 2021 年，已经下降到了 13%，与 2007 年相比下降了一半。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斗争力量增强，导致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与本世纪初相比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中国资本家阶级无法染指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由核心国家垄断的高价值生产环节，从而导致产出资本率趋于下降（即每单位固定资本存量可以带来的经济产值不断下降）。

只要中国资本主义无法扭转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国资本主义或迟或早必然陷入无法克服的积累危机，进而出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政治局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来着重探讨一下未来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而将要发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中企业和住户部门、政府部门和对外部门（经常账户）财务平衡的状况：



中国住户部门的财务平衡（即住户部门储蓄减住户部门投资）经常处于盈余状态。2012-2021 年，住户部门的财务盈余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部门严重依赖借贷来维持高投资，常年处于赤字状态，导致住户部门的财务盈余大部分被企业部门的财务赤字所抵消。近年来，企业和住户部门相加后的财务盈余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经常账户平衡是一个国家对外部门的财务平衡，相当于企业和住户部门的财务平衡与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务平衡之和。2007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曾经高达国内

生产总值的 10%。到 2018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几乎消失。然而，随着新冠危机爆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经历新一轮出口繁荣，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又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在 2006 年至 2014 年期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顺利发展，中国的政府部门一度连续多年处于财务盈余的状态。从 2015 年开始，政府部门的赤字不断扩大，到 2020 年已经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6%。

下面第一个表概括了中国一般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2020 年财政收支的情况：

中国一般政府部门财政收支，2020 年
(万亿元，括号中数字为占国内生产总值%)

收入		支出	
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4.8 (4.7%)	政府消费	17.4 (17.1%)
各种间接税	8.9 (8.7%)	政府转移支付	7.4 (7.3%)
社会保险缴款	5.5 (5.4%)	利息支付	1.1 (1.1%)
利息收入	0.8 (0.8%)	其它财产支付	0.2 (0.2%)
其它财产收入	1.6 (1.6%)	政府给企业的补贴	1.5 (1.5%)
其它转移收入	0.9 (0.9%)	政府净投资	4.4 (4.3%)
国有土地出让	3.4 (3.3%)		
收入合计	25.9 (25.5%)	支出合计	31.9 (31.4%)
附：赤字	6.1 (6.0%)		
其中：初级赤字	5.0 (4.9%)		

下面第二个表概括了美国一般政府部门（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2020 年财政收支的情况：

美国一般政府部门财政收支，2020 年
(万亿美元，括号中数字为占国内生产总值%)

收入		支出	
个人收入所得税	2.2 (10.6%)	政府消费	3.1 (14.9%)
企业收入所得税	0.3 (1.3%)	政府转移支付	4.3 (20.3%)
各种间接税	1.5 (7.2%)	利息支付	0.8 (3.9%)
社会保险税	1.5 (6.9%)	政府给企业的补贴	0.7 (3.1%)
利息收入	0.1 (0.5%)	政府净投资	0.2 (0.9%)
其它财产收入	0.1 (0.5%)		
其它转移收入	0.2 (0.9%)		
收入合计	6.0 (28.4%)	支出合计	9.1 (43.3%)
附：赤字	3.1 (14.9%)		
其中：初级赤字	2.3 (11.0%)		

2020 年，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相比之下，同年，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8%（2021 年约占 29%）。2020 年，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相比之下，同年，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3%（2021 年约占 41%）。在总的国家干预能力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国家与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相比，并无优势。

在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各项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政府消费”，主要是用于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正常运转的支出（其中大部分用来支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也有一些用来维持公立教育和医疗；这些支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7%。政府转移支付主要是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以及所谓“社会福利”，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相比之下，政府转移支付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为了扶植资本积累，中国的各级政府向资本家提供大量补贴，每年提供的补贴多达约 15000 亿元。此外，中国的各级政府通过投资和新建基础设施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政府净投资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

在政府收入方面，由于半外围资产阶级国家腐败严重、审核企业和个人收入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在资本主义复辟中暴发起来的中国资本家普遍贪得无厌、偷税漏税，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国家高度依赖给劳动人民带来沉重负担的各种间接税（如销售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此外，社会保险缴款实际上也完全由劳动人民负担。各种间接税与社会保险缴款相加，约占中国国内生

生产总值的 14%。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收入再分配手段的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其中，个人收入所得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相比之下，美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国有土地转让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2020 年，国有土地转让净收入（即扣除拆迁补偿等土地转让成本以后的转让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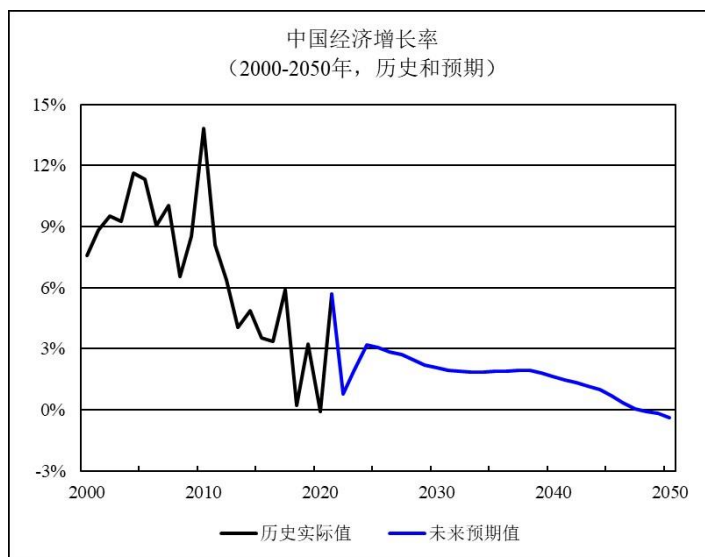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许多省市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部分地方政府陷于或濒临破产。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未来是否会陷入财政危机？这首先要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增长的情况。

国内外学者都曾经指出，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显著高估了真实的经济增长率（<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0443>）。如果采用国际上学术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简称“宾州大学世界表”）所估算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按照宾州大学世界表的数据并对近两年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做相应的下调，2001-2010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9.8%（按照官方数据计算年平均增长 10.6%）；2012-2021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3.6%（按照官方数据计算年平均增长 6.7%）。

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广大劳动群众被迫普遍开展“躺平”斗争，用不生、少生的方法减少眼前生活压力，客观上大大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赖以维持其残酷剥削体制必不可少的廉价劳动力队伍的枯竭。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已经从 1990 年的 2.5 个、本世纪初的 1.6 个下降到现在的 1.2 个。即使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能保持稳定并略有恢复，预计中国的劳动力总数（按 2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计算）也将从现在的 7.5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5.5 亿，平均每年减少约 1%；至本世纪中期，劳动力队伍每年萎缩的速度将超过 2%。

近年来，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趋于下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约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时，美国经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经济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此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经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将从现在的约 4%逐渐下降到约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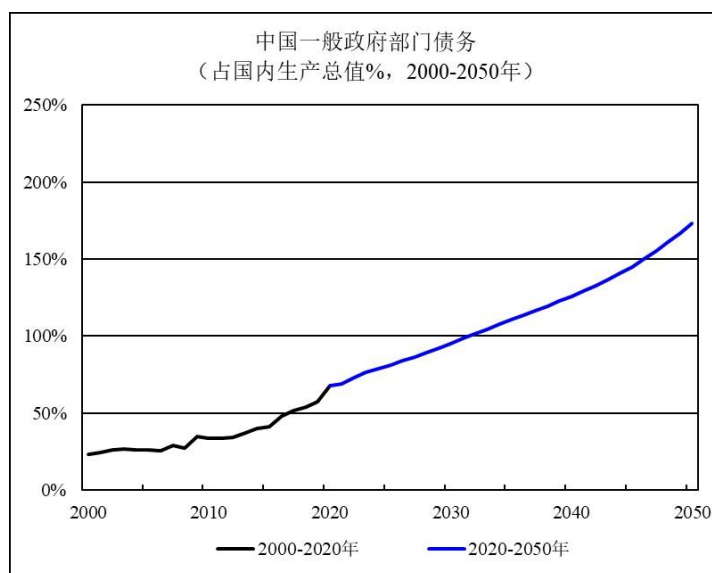
下面第三个图比较了 2000-2021 年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实际的增长率及 2022-2050 年预期的增长率：



预期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 2025 年前后可以恢复到大约 3%，此后即趋于下降。到 2045 年以后，由于劳动力队伍快速萎缩，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整个经济将陷入负增长。这里说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指的是预期的常年平均增长率，不包括遇到经济危机时经济萎缩的情况。

有了预期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再加上一些假设，就可以推算中国政府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未来变化的情况。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假设未来中国政府部门的初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减去利息支付以后的部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4%，假设中国政府部门在债务上平均支付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为 1%。

下面第四个图说明了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历史上以及在未来预期变化的情况：



按照上述假设，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现在的约 70%增加到 2050 年的约 170%。如果上述假设的条件不变，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 2050 年之后还会继续趋于上升，至本世纪末达到 4.7 倍。

以 2050 年来说，如果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倍，而平均支付的名义利率为 5%，中国政府部门每年的利息支付就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8.5%；再加上每年初级财政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4%，合起来的财政赤字就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3%。这还是在正常年景平均的财政赤字情况，在经济危机期间财政形势将更加恶化。

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或者要靠向私人部门借贷来解决，或者要靠向国外部门借贷来解决。如果住户和企业部门各自的财务平衡相抵后得到的盈余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5%，那么，要支撑高达国内生产总值 13% 的财政赤字，中国经济的经常账户逆差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8%。历史上，美国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是在 2006 年，当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6%；两年后，美国即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以上的分析还没有考虑到未来随着中国经济陷入负增长，政府转让国有土地收入将面临枯竭的情景。如果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既无法通过向私人部门借贷来解决，也无法靠国外资本净流入来解决，政府债券将会崩溃，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将陷入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不仅如此，如果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伴随着巨额经常账户逆差，而又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的情况，到那时，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严重的国际支付平衡危机。

历史上，长期而持久的财政危机往往是王朝颠覆的前奏，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具体体现。未来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将为伟大革命形势的到来准备条件。

第四十六期 中国经济形势与马列毛主义者

（编注：本期原标题为《中国经济杂谈（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说说“中国经济，细思极恐”》）

作者：远航一号

网上有篇文章，“中国经济，细思极恐”，原本是发在右派网站新品葱上的，红色网友可以在我们的红色社区论坛上看到：<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9>。作者似乎是一个金融投机家，基于其对金融投机的认识，又夹杂了一些粗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了他自己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的看法。虽然作者的立场反动，方法也不尽正确，但他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我们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看法、坚定我们对于未来革命事业的信心。

先把“中国经济，细思极恐”一文的基本观点梳理一下。如果去掉原作者各种故弄玄虚的投机术语，作者的经济分析方法大致是某种粗糙的重商主义，又掺杂了货币数量论（货币供应量决定总需求）和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按照这种粗糙的重商主义，对于中国这种本国货币并非世界货币的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总需求的最终来源）是通过贸易顺差产生的外部需求，这种外部需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又通过一系列渠道和传导机制（在中国主要是居民因买房而产生的债务）决定了国内投资和消费（仍然是通过房地产投资来传导）。如果外部需求出问题了，或者由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的传导机制出问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无法继续了。

按照原作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细思极恐”，其根据，大概有这样几条：（一）中国居民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不断趋于上升，正在逼近极限，一旦达到极限，房地产泡沫将无法维持；（二）老龄化将加重房地产萧条；（三）房地产泡沫崩溃后，土地财政将无以为继，导致基建投资减少，而社保缺口将压缩领取社保人口的消费；（四）未来出口将因为欧美财政刺激支出用完而停滞，还会受到印度和东南亚的蚕食。以上几点，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大约从2025年起开始落后于美国，并于十年以后导致“内战”（内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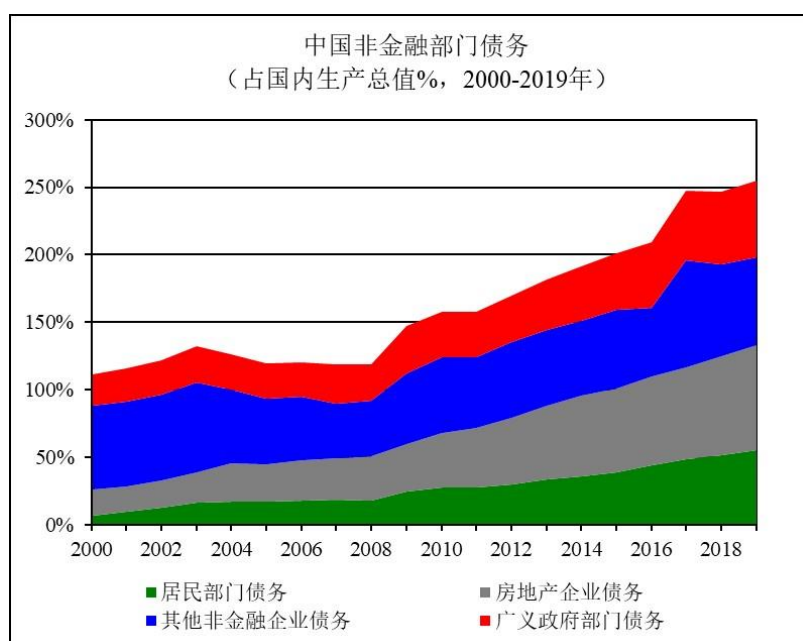
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尝试用产业升级来摆脱对房地产泡沫的依赖并实现经济软着陆（房市稳定“横盘”、居民债务用更高的收入水平来消化）。但是，作者认为，中国虽然有一些在个别行业领先的高价值企业（举了华为、宁德时代、隆基股份作为例子），但这些企业相对于房地产经济的体量太小。中国政府虽然以往渡过了几次难关，但是每次都是通过放宽货币供应、拉动房地产市场来拖延清算时间。

作者还将中国经济的前途与日本、美国房地产泡沫崩溃后的处境做了比较。关于日本，作者认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崩溃后，日本还可以通过占有中国市场来获取较高的国民收入。中国无法得到类似的历史机遇，因为中国无法占有足够大的海外市场来维持十四亿人的高消费。

关于美国，作者认为，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体制允许资不抵债的居民破产（从而免除无法支付的债务负担），从而将居民债务转化为银行坏债，美联储再通过“量化宽松”将银行的坏债都买下来（实际上即私人债务社会化），从而使得私人银行部门和居民消费都得以逐步复苏。关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作者只是说，中国的体制不会允许居民破产后不再给银行还债。站在作者的立场，也许作者还可以强调人民币不具备美元那样作为世界货币的信用，从而使得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具备无限承担银行坏债的能力。

以上是对“中国经济，细思极恐”一文的梳理和总结。那么，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怎样看待这篇文章罗列的一些经济现象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将在十年后面临暗淡的前途呢？

先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如图，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各个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确实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从 2008 年至 2017 年，非金融部门债务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2 倍增加到 2.5 倍。2018 年和 2019 年，非金融部门债务之和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致稳定。但是，2020 年，非金融部门债务之和进一步上涨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8 倍（由于 2020 年的数据不全，在图中没有显示）。

如果看各个部门债务的构成，推动非金融部门债务上升的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债务（2008 年至 2019 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33% 增加到 77%，增加了 44 个百分点），其次是居民部门债务（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增加到 55%，增加了 37 个百分点）和广义政府部门债务（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27% 增加到 57%，增加了 30 个百分点）。

广义政府部门债务包括了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地方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投资平台”等机构的债务。2020 年，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进一步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6%（图中没有显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图中显示的居民部门债务仅限于居民部门对银行部门的债务，没有包括诸如“花呗”、“校园贷”、“租金贷”、“P2P”等高利贷性质的非正规债务，因而显著低估了居民债务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从近日恒大等房地产企业的债务危机来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确实初步出现了破灭的迹象。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投资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现在每年新增住房商品房销售约 15 亿平方米。另一方面，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约 1000 万，按人均 50 平方米计算，需要新建住房约 5 亿平方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的话，中国每年新建住房与新增就业人口的住房需要相比过剩约三分之二。房地产投资大约占中国经济规模的六分之一；假如房地产投资减少一半，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直接减少约十二分之一。如果再考虑到房地产崩溃对相关产业以及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房地产崩溃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可以达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十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

如果在未来几年，中国果然发生由于房地产崩溃引起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当局是否有应对的良方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现代条件下，对于纯粹因为总需求大幅度下降引起的危机，资产阶级当局只要坚决大胆地实行赤字财政并辅以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要在没有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前提下，一般是可以实现经济的基本稳定并避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萧条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发生困难而引起的危机（即资本家剥削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无法在市场上按照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变现）。我们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组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不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

熟悉我们的读者知道，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中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在与外围国家（如非洲、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交往中处于有利地位，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在与核心国家（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的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通过不平等交换向核心国家输出剩余价值。

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出口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确实重要，但是其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经济，细思极恐”一文作者所说的，是所谓只有靠出口换取外汇才能发行“基础货币”（货币银行学术语，指的是流通中现金与银行系统中的准备金之和），而在于通过出口使得中国得以参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通过与外围国家的贸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低价进口中国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通过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国固然要通过不平等交换输出剩余价值，但是可以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后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必需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优势”就是依靠对数量庞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表现为中国劳动者被迫普遍接受超长劳动时间以及超高的劳动强度；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平均年劳动时间约 2300-2400 小时，大约是欧美工人年劳动时间的一倍半）、劳动强度之高，在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是罕见的。

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正在遭到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的积极和消极反抗。特别是，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枯竭，为了维持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正在迅速萎缩。2025 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队伍（特别是青壮劳动力队伍）将开始加速减少。

随着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开始减少，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将完全依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才能够维持。以往，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于中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核心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一方面，通过单纯的技术赶超实现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若

干领域，随着中国资本家对欧美日的技术垄断造成威胁，核心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技术封锁（比如对中国的芯片“制裁”）。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从核心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来比较容易地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不得不依靠固定资本的大量投入来勉强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固定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这种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使得企业部门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债务过度扩张来维持投资；另一方面增加了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刻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以及国内投资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开始下降到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利润率以下）。如果发生后面一种情况，那么，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无法抵消劳动力队伍的快速下降，中国经济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陷入零增长或负增长。

当然，从日本、美国、欧洲近年来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来看，在严重资产泡沫破裂并引起危机以后，资产阶级当局的宏观经济干预虽然可以防止经济全面崩溃，但却无法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后摆脱停停走走的停滞局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将面临类似的困境，还有待观察。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总任务，是认识并向广大劳动群众揭示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规律，并将这种规律转化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行动。

为了这个总的目的，我们要准备经过若干个步骤和阶段来争取实现劳动群众解放斗争的目的。

作为**第一步**，要揭露中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激发广大劳动群众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仇恨、觉醒及反抗斗争的决心，同时展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这一项工作，绝大多数马列主义小组以及各种进步工作团体，已经在做，并且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

第二步，是逐步掌握并正确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握这一矛盾的基本发展规律，并据此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胜利做出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实际、能够为未来的历史进程所验证的回答。只有对于这两个问题做出比较正确的回答、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规律性的认识，中国未来的革命运动才能在思想和理论上站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对于未来革命的信心才能是比较坚定的，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的，而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动摇的。

第三步，是要积极地参与和鼓动劳动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日常斗争。

在现阶段，这种斗争尤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躺平”。具体来说，劳动者的“躺平”斗争，一方面表现为在工作场所力争以普遍的怠工结合偶尔的停工、罢工来反抗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或者是为生活所迫、或者是自觉地以不生、少生的方式减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所需要的劳动力再生产。

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条件下，不生、少生是一种可以直接减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成本同时又能够给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长远利益以沉重打击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要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如果不生或尽可能晚生，更好），那么只要一代人的时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新生血液（青壮劳动力）就将减少一半，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迅速枯竭，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将迅速瓦解。所以，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躺平”是有革命意义的。

这种“躺平”斗争的进行主要是由劳动群众自己来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也逼迫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躺平”状态。但是，**马列毛主义者对于主要由劳动群众自己进行的“躺平”斗争完全可以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我们要积极宣传“躺平有理”、“斗争有功”、“为资本家劳动可悲”、“靠资本家施舍而发财致富可耻”的观念，特别要注意批判某些青年农民工中仍然存在的“劳动致富”的陈旧观念，要在劳动群众中形成一种“躺平光荣”的风气，而且要让那些幻想“劳动致富”并且通过个人为资本家劳动给其他群众造成“内卷”的个别工贼成为群众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随着“躺平”成为风气，随着剩余劳动力储备的枯竭，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最多不出二十年，必然土崩瓦解。

第四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继续下降，资本主义经济转入零增长或负增长，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将陷入普遍的财政破产，中央财政也将出现债台高筑。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地方政府将无法提供大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地方教育、医疗、养老金、公共交通将无法维持，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全面辅警化，辅警职能则外包给私人资本家或黑社会等。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能力的下降，在若干地方（特别是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劳动群众可以自行组织起来，在暂时不公开挑战资产阶级政府权威的前提下，以自愿结合、民主自治的方式自行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并且维持治安，打击黑社会。

第五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也必然激化（如果经济陷入长期零增长或负增长，那么这种斗争将更加激烈）。

这个时候，在经过一个时期地方民主自治的锻炼以后，在劳动群众中将涌现出一大批有政治才干的先进分子，将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登上政治舞台。

这个时候，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力量，只要审时度势，利用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必要时，以满足资产阶级中某一派的短期利益来交换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长期利益，从而孤立并打倒资产阶级中可以打倒并且应该打倒的那一派，就一定可以创造条件，首先在一些最有利的地方建立一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中国的无产阶级只要有了第一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又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政治策略，从这里出发，就不难发展壮大；到那时，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烂到哪里，无产阶级的地方政权就发展到哪里，假以时日，必然得陇望蜀、问鼎中原。